

My Life with the Saints

襪子堆裡的 聖人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 著；范京生 / 譯

上主的花園裡，花團錦簇

聖女貞德 (Joan of Arc)、里修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多默·牟敦 (Thomas Merton)、
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伯鐸·雅魯培 (Pedro Arrupe)、伯爾納德 (Bernadette Soubirous)、
德蕾莎姆姆 (Mother Teresa)、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Pope John XXIII)、桃樂斯·戴 (Dorothy Day)、
伯鐸 (Peter)、聖道茂 (舊譯多瑪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聖方濟 (Francis of Assisi)、
大聖若瑟 (Joseph)、烏干達的眾殉道者 (The Ugandan Martyrs)、
磊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聖母瑪利亞 (Mary)

My Life
with the Saints

襪子堆裡的
聖人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 著；范京生 / 譯

My Life With The Saints

By James Martin, SJ
Translated by Paul Ging-Sheng Fan

Copyright © 2006 by James Martin, SJ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LOYOLA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Chinese language complex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 1 被塞在襪子堆裡的聖人
導言 007
- 2 天主的子女
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017
- 3 心靈劇場
里修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 033
- 4 真實的自我
多默·牟敦 (Thomas Merton) 049
- 5 愈顯主榮
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079
- 6 更甚於往日
伯鐸·雅魯培 (Pedro Arrupe) 109
- 7 馬薩比耶爾的岩洞內
伯爾納德 (Bernadette Soubirous) 133
- 8 這份喜悅，與人共享
德蕾莎姆姆 (Mother Teresa) 161

9	基督的代表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Pope John XXIII)	187
10	在她的世界內生活 桃樂斯·戴 (Dorothy Day)	217
11	因為，我是罪人 伯鐸 (Peter)	237
12	信仰與理智 聖道茂 (舊譯多瑪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259
13	為了基督，我成了別人眼中的瘋子 聖方濟 (Francis of Assisi)	277
14	平凡的生活 大聖若瑟 (Joseph)	305
15	他們信靠天主 烏干達的眾殉道者 (The Ugandan Martyrs)	321
16	他是我的寶中之寶 聶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	337
17	聖寵滿被 聖母瑪利亞 (Mary)	351
18	人人當成聖，各個皆精采 結語	377
	延伸閱讀	397

襪子堆裡的

聖人

1

被塞在襪子堆裡的聖人

導言

九歲那一年，我最大的樂趣是，用郵購的方式來買我所想要的東西。放在廚房架子上的麥片盒子，背面都印有一片郵購小玩意兒的表格。剪下來，填上地址，附上一塊錢或兩塊錢美金的紙幣，然後寄出去。幾週後，一個寫上了我的姓名的牛皮紙包裹，就會出現在信箱內。再沒有什麼比這種事，更讓人興奮的了。

通常，最讓人心動的小玩意兒，都是連環漫畫書的附贈品，可是實際收到的，卻不像廣告上誇大的那回事。所謂「恐怖的飛天幽靈」，在翻開《蜘蛛人》漫畫書封底的內頁，發現的是一個廉價的塑膠球，或是一條橡皮圈，再不然，就是一片白色的紙巾。還有「塔蘭托蜘蛛大怪獸」，怎麼看都不像個怪獸。

最糟糕的是，一種被誇耀為「海底猴孫」的東西。彩頁的廣告上，畫著一羣在某個海底城嬉鬧、活蹦亂跳、猴子般的傢伙（其中一個，還戴著金色的王冠）。然而，六個禮拜的等待，換來卻是大失所望——我的深海猴孫怎麼只是一盒蝦卵？姑且丟進臥室椅子上放著的水族箱裡。終於，「深海猴孫」開始在孵化了，細細小小的幾乎看不見，而就我所能看到的，沒有一個戴王冠的。

每年冬季例行的感冒，讓我打了一個大噴嚏，差一點毀了這座海底城。

其他還有幾次的郵購經驗，還滿好的。接連吃完好幾盒糖霜麥片，才收集到足夠的盒蓋後，我終於等到了「游泳健將老虎東尼」，連我的父母都稱奇它的泳技。黑條紋的橘色老虎，兩隻手能打轉，兩條腿瘋狂的亂踢，廚房的水槽儘管是波濤巨浪，東尼總是翻騰地狂泳著。有一天，東尼剛游完泳，不小心從我的濕手上滑掉了，摔在地板上。兩隻手摔脫了，這短暫的游泳生涯遂告結束。我把斷臂東尼放到水族箱裡，和海底猴猴作伴。似乎，他們彼此都沒意見。

就算是對郵購東西著了迷吧，可是，這個理由還是很難解釋，為什麼一個小孩會對在一本雜誌上偶爾翻到的一尊聖猶達（St. Jude）塑像的廣告動心。我記不得那是怎樣的一本雜誌，而通常我父母都不把教會的刊物放在家裡。很顯然地，一定是塑像的圖片非常吸引我，才會讓我捨得把三塊五毛的美金放進信封袋內。這個動作，代表三個禮拜的零用錢沒了，也等於捨棄了一本「阿基」（Archie）的漫畫書——以當時的狀況來說，可是一大犧牲哩。

我不知道聖猶達是何許人，家裡也沒提過他，僅憑雜誌上的廣告說：聖猶達是絕望無助者的主保聖人。即使我有興趣多了解他的事，但猶達是個謎一般的人物，有關他的資訊實在太少。他是耶穌的十二位宗徒之一，然而，整部新約聖經僅非常簡短的，一共三次，提到猶達。事實上，福音書上有兩次完整地列出十二位宗徒的姓名時，都稱他是「達陡」（Thaddeus）。因而，後世流傳著「聖猶達·達竇」這個名字。更讓人混淆的是，《馬爾谷福音》提到耶穌有一位表兄弟名叫猶達。古老的一些傳說中，提

到猶達曾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Mesopotamia，約略今日的伊拉克）傳教，《天主教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Catholicism*）上斬釘截鐵地寫著，「我們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沒有什麼可靠的資訊」。

猶達的傳記，我沒興趣。絕望無助者的主保聖人，才是我想要的。想想看，這樣的人物，對我將多麼的有用。一個聖人，他能幫助我得到我想要的東西，那個只會在水槽裡游泳的小老虎玩具，怎能相提並論？我可是大方地付出了三塊五毛美金的代價。

幾個禮拜後，郵包到了，是一座九英寸高、米白色、塑膠製的立雕像，還附了一本如何向聖人祈求的祈禱手冊。米白色的聖猶達，手裡拄著一根棍子，胸前掛著一片盤狀的徽章，上面是一個人的臉孔（很難分辨出是誰，大概是耶穌吧），立刻被請上臥室的衣櫃上方最尊榮的位置。

那個時候，我向天主的禱告，是斷斷續續的，而且，大致上是求助一些事。譬如，「請幫助我下次考試能拿到A（即高分）」；「請幫助我在今年的小聯盟比賽時表現良好」；「請幫助我在學校拍生活照時，身上皮膚光潔」。在我的心目中，天主是「化解難題的大人物」。只要不斷懇切的禱告，使用正確的禱詞，以完全正確的方式，祂就會替你解決任何的困難。如果天主不能幫我解決（似乎，愈來愈不能如我的意），那我就轉而求聖猶達。我在想，如果連天主都不願幫忙的事，肯定就是絕望無助了，那就只好去找聖猶達了。

所幸，這本聖猶達的祈禱手冊內，有許多很好的禱文。其中一則，還是用拉丁文寫的，以「*Tantum ergo sacramentum*……」（皇皇聖體……）開頭。在為最絕望到底的事：譬如，期末考試

和諸如此類的事，我就用這則拉丁文禱詞來祈求。在迫切需要某樣東西時，我會跪下來，唸三遍「Tantum ergo sacramentum……」禱詞。

就這樣，聖猶達一直很有耐心的站在我的衣櫃上，直到上了中學。到家裡來玩的同學們，都會到我臥室來瞧瞧（大家都這樣彼此好奇的嘛）。雖然，我是滿喜歡聖猶達，可是又怕同學們看到衣櫃上這尊奇怪的塑像，一定會問東問西而受窘。只好，讓聖猶達屈尊就卑委屈在衣櫃內的襪子堆裡，每逢特別的情況，才把他請出來。

往後幾年，可以這麼說，我的信仰也降級到放襪子的那個抽屜裡了。中學期間，大致上每週望一次彌撒；大學期間，就偶爾才進堂（但仍向「化解難題的大人物」禱告）。當信仰愈來愈淡的時候，對聖猶達的喜愛，就顯得好像有點幼稚了——愚蠢、迷信、有點令人左右為難。

我二十六歲那年，情況有改變。在企業化美國的商業世界裡奔波了五年，我過的生活是很可悲的。失望之餘，我開始盤算著一定要過另一種生活。至於，到底要做什麼呢？當時，我一點概念都沒有，唯一的念頭就是，離開這個商業的世界。在這個情緒低落的挫折中，天主介入了，這位化解難題的大人物開始化解我的難題。在全無頭緒的難題中，每過一段時間，在我自己都沒有提出的問題上，祂給了我一個答案。

有一個晚上，結束了一天煩累的工作，坐在電視機前，隨意的轉台。本地的公共電視台，正在放映一部天主教牟敦神父（Thomas Merton）生平的記錄片。從沒聽過這個人，可是影片中受訪的、有頭有臉的人物都作證說，牟敦神父對他們的生命，有過重大的

影響。幾分鐘看下來，我就有了一些概念——牟敦神父是一位聰明、風趣、聖潔，而且很特別的人物。津津有味的看完了記錄片，我還想多了解這個人，又特別去買了一本他的自傳《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來看。書中描述他自己，如何從生活漫無目標的青年人，最後卻走進天主教隱修院的整個心路歷程。沒有幾本書，能像它這樣的擄獲了我。

此後的兩年內，每當我認真地思考未來將如何時，擺在眼前的幾條路子，似乎只有進修會修道，才是最有意義的最佳選擇。當然，這期間內，也不是沒有過懷疑、瞻前顧後的徬徨，還擔心是否會有窘困。終於，在二十八歲那一年，辭去了工作，進入了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一般通稱為耶穌會士（Jesuits）。這是我一生的最佳抉擇。

剛進初學院時，我很訝異的發現，大部分的初學弟兄都有一位自己特別恭敬的聖人。一談起這位聖人，很明顯的帶著一種親切的口吻，好像親身經歷打過交道似的。譬如，有一位弟兄特別喜愛桃樂斯·戴（Dorothy day，譯者註：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天主教徒工運領袖之一，熱心的模範教友），在我們每週例行的研討會上，幾乎是隨口引用她的言行；另一位，則常提到聖女小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弟兄們恭敬聖人的態度上，看得出來是很誠摯的，也很有耐心的向我講述聖人的事蹟。然而，我認為向聖人祈禱，那完全是一種迷信的表現。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是天主教在俯聽我們的祈禱，為什麼要去找聖人呢？

我發現初學的圖書架上，有一系列的聖人傳記，答案都在那裡。

我之所以從這個書架上，取出來第一本這樣的書，那是因為禁不起一位弟兄以很認真的口氣催促我（可以說近乎「糾纏」）：

「你一定要讀這本《聖女小德蘭回憶錄》（*The Story of a Soul*），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喜愛小德蘭。」

那時，我哪知道「小花」（Little flower）是誰。心裡猜想，這個里修的小德蘭大概就是那種枯萎的百合花之類的人物吧——膽小善變又遲鈍。讀完了她的自傳，我才大吃一驚，原來是這麼一位可愛、勤奮、意志堅定的小婦人，為什麼以前不認識她呢？於是，書架上的聖人傳記，我一個接一個的讀下去。有些聖人是大家所熟知的，有些則似乎平凡得不為人知——聖達義·葛斯加（St. Stanislaus Kostka），不顧在波蘭的家人的反對，步行了四百五十英里的路，才得入耶穌會的初學院；聖多默·穆安（St. Thomas More），一位高尚的知識分子和愛國者，卻沒忘記天主是生命的重心；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Ávila），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也在許多人的焦慮中，著手大幅地改革她所屬的加爾默羅聖衣會；我很高興的發現，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不僅心腸好、具有創新的勇氣（譯者註：召開梵二大公會議），而且非常的機智風趣。

逐漸地，我發現自己對這些聖人有了喜好，也開始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我認為聖人和現代的信徒們息息相關，是修德成聖的榜樣，更讓人領悟，在個別的生命上，天主的作為是何等的奇妙。成聖的方式各有不同，更顯示出天主是多麼地珍視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就如同魯益師教授（C. S. Lewis，譯者註：二十世紀中葉，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著作等身，不僅一般神學論說受人歡迎，更是系列兒童傳奇故事納尼亞傳奇 *Narnia* 的作者）在《基督宗教》（*Mere Christianity*）一書中所說的，「歷史上的暴君和征服者，他們彼此是多麼地類似；然而，諸聖者的行徑，卻又是多麼地各異其趣」。

這種認知，為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不是每一個人都要成為

小德蘭、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或者多默·穆安。我要成為我自己，讓天主在我自身內，藉著我的獨特性和我的人性來作為。如同聖道茂（St. Thomas Aquinas）的名言，「聖寵建構在本性上」（Grace builds on nature）。

再者，聖人們成了我生活上的夥伴——需要幫手時，你可以去求助的那種朋友。我的初學導師認為，聖人是大哥哥、大姊姊之類的人，你可以去找他出主意、指點迷津。一位天主教神學家肯寧翰（Lawrence S. Cunningham）在《聖人的意義》（*The Meaning of Saints*）書中，建議視之為「先知性的見證者」，他們能激勵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再接再厲，活出完完全全基督門徒的生活。一定有人會說，只要有了耶穌，就夠了。這是當然的囉，耶穌是我們的一切，而諸位聖人和聖女比你和我更明白這個道理。

天主以祂的智慧，讓耶穌的這些好夥伴，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一路相隨。他們的友誼和鼓勵，難道不是很好的禮物嗎？不要害怕熱心敬禮聖人，會阻擋我們走向耶穌，因為，諸聖的所作所為均以耶穌為中心，都指向祂。在初學院的教堂內，有一天我聽到這樣的一則謝恩禱詞，內心如此激動，宛若首次聽聞一般：「天主，藉著不斷地興起如此彰顯聖潔的男男女女，活生生地見證祢那永不止息的愛火，在每一個世代更新了祢的教會。他們英勇的生命激發了我們。他們不停的祈禱，幫助我們成為祢救贖大能活生生的標記。」

是的，我也的確這麼認為。

在閱讀聖人一生的行誼時，我發現某些事蹟或經歷，常能印證在我自己身上。這也是讓我最欣賞的地方：和世上的每一個人一樣，他們也曾掙扎於人性的軟弱中。有了這個認知，每逢某一

時刻或某種需求的場合，我會毫不猶豫地向他們禱告。隱修者牟敦神父經常努力克服驕傲和自誇的毛病，遇到相同的掙扎，我就求他代禱。生病時，我祈求小德蘭，她能了解病人的自怨自艾和孤寂。需要一往直前的勇氣，我找聖女貞德。要付出同情心，得找磊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要有更大的幽默感和化解生活上的無奈，找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準沒錯。

就這樣，我從一個對於敬禮聖人感到窘困的狀態，變成了喜好者。初學結束後，耶穌會士接續的培訓中，我又讀到更多的聖人，品嚐更多的喜悅。朋友還會嫌多嗎？

現在，反倒是我常向人推薦我喜聖人，同時，也有人推薦給我。有趣的是，發現一個新聖人的途徑，就和認識一個新朋友的方式一樣。或許，你曾聽說某某人很好，就會想，哪天有機會時，也去認識他。譬如，讀英國天主教歷史的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多認識這位多默·穆安。可能，人家認為你一定會喜歡某人，於是找機會介紹你認識。前面提到的，初學弟兄介紹小德蘭給我，就是這樣。也可能，由於日常生活的因緣際會，遇見了一個新朋友。在耶穌會的哲學培訓期間，我首次遇見了聖奧斯定，閱讀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s*），於是，著迷於他的其他著作，和他那種講論天主的方式。

這就是本書的主旨：一種非常個人式的介紹，讓大家認識我自己所喜愛的一些聖人和聖女，聖潔的人物與夥伴（雖然，嚴格地說，「聖人」是經過教會的宣聖儀式，或正式承認一個人在世時，度過聖潔的生活，蒙主悅納，值得信徒公開的敬禮）。最近幾年，每當對某個聖人有特別親密的感觸，我就會花點時間把它寫下來。某些篇章，根據眾所周知的聖人行誼和傳記，反映出一

種敬禮：某些章節，則立論於聖人鮮為人知、淡泊平凡的一生，所作的相當個人式的反思——一小段別人沒注意到的事蹟，卻曾深深地觸動和影響了我。

本書中各個聖人的略傳，大致上是與我自己接觸到的早晚次序而編排的。這樣，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能依循著我本人的心路歷程而前進。一個篇章內，也有可能跨越了數年，甚至一、二十年。譬如，我在耶穌會初學的時候，首次接觸到聖伯爾納德（St. Bernadette）這個人，可是，一直要到約十五年後，去露德（ Lourdes）朝聖時，才真正心領神會地明白她的事蹟。

我不是在為這些心靈上的勇士們寫傳記。篇章的內容，是一種反思和默想，一個基督徒和諸聖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我是怎樣和他們認識的；他們的事蹟啟發了我什麼；在我的生活中，他們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本文開始的段落中，我曾提到，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引導我和聖猶達展開這一段親切的關係。如今，再仔細的想一想，我知道那是天主的作為。以某些奇特怪異的方式，天主感動了一個小男孩，開始他敬禮聖人的生命歷程，而藉由雜誌廣告的媒介，僅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天主的聖寵，是祂自發性地賞予的恩惠。回首生命的來時路，不由得要感謝這麼多可愛的聖人——為我代禱、給我慰藉、示我以好門徒的表率，並且一路伴隨相助。

總而言之，首先要感謝的是聖猶達。窩在襪子堆的日子裡，他不停地在為一個全然不知情的小男孩代禱著。

2

天主的子女

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問：妳怎麼知道，那是聖麗達 (St. Margaret) 和聖佳琳 (St. Catherine) 在跟妳說話？

答：我已經告訴過你多少次了，跟我說話的人就是聖麗達和聖佳琳——相信我，如果你能的話。

——聖女貞德受審的筆錄

我十二歲那年，有一個重大的決定要做：選修法文，還是西班牙文？在學校裡，七年級開始的外語學習課程，是希望選修外語的學生，能每年持續選修，直到高中畢業。這樣，即使到最後仍未有非常流暢的外語能力，但有了出席學生會議的歷練，至少不難在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總部在紐約市) 的機構中找到一份工作。在 1970 年代的美國，西班牙語還不是眾所矚目的第二外國語選項。因此，這是一個困難的抉擇，也是我第一個「成人」的決定，說不定還會影響往後的一輩子哩。

「你自己看囉」，這是我媽的答覆。她從前是法語教師，妹

妹和我年幼時，她常一面在廚房煮飯，一面哼唱法文歌曲。雖是一句輕鬆平常的回答，但我能猜透她的心意。我爸的西班牙話，說得很流利。在我考慮這個重大抉擇的期間，他在辦公室裡到處跟聽得懂西班牙話的同事囔囔這件事，當然，說的是西班牙話。

我當然可以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來解釋為什麼後來選擇了法文，諸如，優雅好聽、有神祕感、是國際通行的語言；或者說，我有一個直覺，法國有很多聖人，我將來可以用法文閱讀聖女小德蘭的自傳啦，長大後能去露德朝聖等。但說老實話，我當時之所以選擇法文，是因為有一次見到一本法文的教科書，它似乎要比西班牙文的教科書薄些，所以，比較容易學習。

於是，在樸利茅斯初中（Plymouth Junior High School）的三年歲月裡，我跟著薛曼老師（Mr. Sherman）學習法文。他留著一撇小山羊鬍，總是穿著整齊，而且，堅持在課堂上，要用法語稱呼他——「Monsieur Sherman」。

七年級的第一堂法文課，第一件事就是取個法文名字。薛曼老師沿著課桌，逐個詢問姓名，然後予以「授洗」，改成法文的稱謂，而大體上是直譯。於是，我的 James Martin 就變成 Jacques Martin；而佩姬（Peggy），到了法文就是 Marguerite；琴恩（Jeanne）在法文裡拼法不變，但發音（唸為 Zhaann）大不相同。

學習一種外國的語文，是滿有意思的。法文裡「u」的音，要齧起嘴唇，「r」則幾乎要把舌頭吞下去，這都是英文裡沒有的發音，新奇、不同、有趣。十二歲還是個記憶力旺盛的年紀，一長串的生字、一頁又一頁的不規則動詞表，還難不倒我。三年來，大家輕鬆地跟著薛曼老師學習法文——聽寫和生字的反覆練習、造句、作文、扮演小短劇、練習演講、觀賞「古老的」（約略1950

年代) 電影片段以及有關法國和法國文化的電影。

奇怪的是，教科書和教學電影上的談話對白，似乎千篇一律地類似下面的例句：

瑪歌 (Margot)：哈囉。

老師 (Le Professeur)：哈囉。

瑪：你好嗎？

師：我很好。

瑪：書在哪兒？

師：書在圖書館裡。

瑪：謝謝你。

師：不客氣。

瑪：再見。

師：再見。

這樣聽起來，法國是一個很無趣的地方。在那兒，顯然地大家沒什麼好談的。「書在哪兒？」就是人們談話的結束句。怪不得瑪歌想要走開。噢，忘了交代，瑪歌是我的課本《我會說法語》(*Je Parle Français*) 的主角人物。她整天都在問，書在哪兒；不嫌煩地談著天氣；把為度假準備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來，唸給朋友們聽——「這是我的襯衫！」還有，「這是我的帽子！」

就如同很多人學外語的經驗一樣，我直到現在還能一五一十地記住當年的課本和影片上，那些呆板的對話。畢竟，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一個十二歲少年的腦海中。

第一年法文的最後一堂課上，薛曼老師把他寶貝的幻燈片，放映給我們看。那是他上回去心愛的法國旅行時拍攝的。我記得，

很多都是有關羅浮宮和巴黎的地下鐵。其中，還有一張是一個年輕的女孩騎在馬上的銅像，地點是某一個小鎮。

「阿爾克的少女貞德（Jeanne d'Arc）」，是薛曼老師的旁白，還來不及提問題，卡啦一下，我們已來到了中古世紀的著名城市查特（Chartres）了。

跟隨薛曼老師讀完了三年的法文，我們升入高中，同樣的這一夥人，又都坐在包洛老師（Madame Paulos，譯者註：法文的Madame即是英文的Mrs.）和蘭賽老師（Madame Ramsey）合教的法文課堂上了。包洛老師對於法國當代的哲學很有興趣，教我們這些十年級的小毛頭，讀了不少沙特（Jean-Paul Sartre，譯者註：法區存在主義哲學的大師）的著作。我敢說，在這個地區的十五歲青少年人中，我們是僅有的存在主義者（Existentialist）。還真得感謝這兩位教師的殷勤教導。上了大學之後，在選修的法文課堂上，我在同學中很自傲，因為我會寫出「未來完成式」的文法詞類變化（在英文的領域裡，我還不會哩）。還有，大一時的室友，曾得意地說他正在閱讀沙特的著作，我則一副不屑地回他：「噢，這個，我十年級的時候就已經讀過了，而且讀的是法文的原文！」（這也是實情！）

我大學是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arton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讀的。課程多為必修，所以選修的不多。我還想多進修法文，因此大一時，選修一門「中級法文文法」。可是發現他們要教的東西，我在中學時都學過了。因而改選「進階級法語會話」，希望我的會話程度，能在書本、圖書館和衣服之外，更多增進一些。

萬萬沒想到，這所大型的賓州大學所開設的法語會話課，可

不僅只有像我這樣費城郊區高中的畢業生，還有土生土長在法國的美國學生，而且，他們在課堂還占多數。這個進階級法語會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如此這般的刺激之下，遂萌生一個念頭將來要走出課堂，去闖蕩我的法語。大學畢業典禮一結束，我就迫不及待地籌劃我的歐洲之旅。



讀完大學，我手頭上還結餘了一筆錢。加上，臨門一腳——父母贈送給我一份慷慨的畢業禮物，買一張三十天的歐洲聯營火車券（Eurailpass）還綽綽有餘。更令人高興的是，一起讀了六年法文的高中同學琴恩（就是法語發音叫Zhaann的那位），願意加入這個衝刺般的歐洲暢遊。

我首次的海外旅遊，可說是即興式的，沒有固定的行程表——從倫敦（London）到巴黎（Paris）、再到羅馬（Rome）、佛羅倫斯（Florence）、威尼斯（Venice），又轉赴維也納（Vienna），最後回到倫敦。必看的景點，當然一個也沒錯過，包括許許多多的大教堂。琴恩是在基督新教的貴格會（Quaker）家庭長大的，有關天主教的事情，我就是她的萬事通囉（事實上，我所知甚少）。在佛羅倫斯，要進去參觀一座富麗堂皇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大教堂時，因穿著不合宜而被拒：T恤衫和毛邊的牛仔短褲。氣憤不已之下，我還在琴恩面前激動的大聲嚷嚷：「嘿，我可是每次彌撒時都給教堂奉獻了一塊錢美金，憑什麼不讓我進去！」（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教人汗顏。）

雖說學了這麼多年的法文，我們在巴黎還是沒能免掉鬧笑話。

有一次在咖啡店裡，想點一盤水果。我倆使盡渾身解數，用上那連薛曼老師都會引以為傲的法語發音，包括那噉嘴的「u」和吞舌頭的「r」。結果，端上來的是一盤冒著熱氣的油炸水果餡餅。但也不能說法語全沒派上用場，闖蕩巴黎全城，逛遍了想看的各個景點。到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參觀教堂和逛禮品部，各占一半時間。我有一串貴重的黑色念珠，就是在那兒買的。

某天早上路過金字塔廣場（Place des Pyramides），瞥見聖女貞德騎在馬上的銅像，亮晶地閃耀在朝陽的照射中。我跟琴恩說：「快看妳的主保聖人！」（譯者註：Joan 和 Jeanne 的法文發音相同。）此刻，肯定地我們都在想家了。費城的藝術博物館外，豎立了一座一模一樣的複製雕像。勇敢、果斷的少女貞德跨騎在雄壯的金色戰馬上，目中無人似地高舉著一幅旗幟，迎著匆忙路過、急著要進城去的各式車輛。

在銅像前拍照的時候，琴恩詢問我關於貞德的事蹟。我窘困地說，只知道一點點。依稀還記得薛曼老師在課堂上提到她的事：一位年輕的少女（至於有多年輕？不知）；曾聽到來自天上的聲音（誰在說話？不知）；領導法國軍隊打敗敵人（敵人是誰？不知）；被綁在木樁上燒死（為何？不知）；後來，被天主教會列為聖品（何時？不知）。

旅遊結束返家後，我已打定主意，將再度遊訪歐洲，那裡還有許多地方值得去遊訪的。手頭上的錢都花光了，等我在奇異公司的新工作存夠了錢，我一定會再度前往。

三年後，荷包飽滿了，遂約了另一位高中同學佩琪，籌劃另一次的歐遊。當時，佩琪和我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學著迷。我們賓州大學的一位教授保羅·佛塞爾（Paul Fussell），寫了一本

《大戰憶往》（*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他的書詳述了，這個世界大戰如何地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作家們，也引發我深入閱讀的興趣。這一連串的閱讀，包括羅伯·葛瑞夫（Robert Graves）的自傳《俱往矣》（*Good-bye to All That*），西格菲·沙頌（Siegfried Sassoon）的《喬治·薛斯頓的回憶錄》（*Memoirs of George Sherston*），以及愛蒙·布蘭登（Edmund Blunden）、魯培·布魯克（Rupert Brooke）、威弗烈·歐文（Wilfred Owen）等人的詩集（譯者註：以上五位的追憶和憑弔戰爭的殘酷，是反戰的文學）。

老實說，佩琪和我這般對一戰文學的興趣，是沒法在公開的場合，拿出來和朋友們分享的——它不是朋友們聊天歡聚的場合上，可以冒出來的話題。

佩琪建議，我們可以計劃一個兩週的歐洲之旅，憑弔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境內的一次大戰的戰場遺跡：伊普爾（Ypres）、帕森鐸（Passendale）、凡爾登（Verdun）。

有一天晚上，在我家廚房的大桌子上，佩琪和我攤開一張皺巴巴的米其林版地圖，研究我們的旅遊安排。這幾個幽靈戰場的憑弔之旅，愈是深入地探討，愈是感覺到非常無聊（何況，都是些墳墓）。我們的眼光，反而被吸引到，更南方一點、完全不同的景點上，諸如，法國中部的查特古城和蘭斯（Reims）城內的中古世紀大教堂、香檳地區（Champagne）以及羅亞爾河谷地（Loire Valley）諸多傳奇的古堡。

於是，我們的結論是：將探索一戰遺跡的興趣，擱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法國古老葡萄園的美景、中世教的教堂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堡。

這幾週的旅行，像上回一樣，充滿了歡樂。我們在巴黎租了

一部迷你型的小汽車，往南行駛，隨興式地遊覽沿途的城鎮和城堡。我們所學的法文，又奇蹟般地順暢流利了起來。羅亞爾河谷地的鄉村居民們，比巴黎城裡的人和氣多了，他們更樂於包容我們高中程度的法語和發音。

當然囉，使用異國語言而鬧出笑話，是免不了的。有一次，我先行搭乘火車南下查特城，佩琪隨後才從巴黎開車來相會。但是，駛出巴黎市區的過程，邊走邊問路，冤枉路繞來繞去的都快抓狂了。

在法文中，「尋找」的動詞是 *chercher*，而「找到」是 *trouver*。佩琪把這兩個法文動詞搞反了。她的車在巴黎迷宮式的街道上，走沒幾分鐘就停下來，搖下車窗，探出頭來問路人：「我找到（*Trouve*）往查特城的路。」不用說，眾多的巴黎人都會聳聳肩，似乎表示替她高興，有一個甚至於還回說：「恭喜妳啊！」

第二天見面時，她還不好意思的自嘲了一番：「薛曼老師要是知道，一定會氣炸了！」

旅途中的十一月一日，諸聖瞻禮日（*Feast of all Saints*），我們抵達奧爾良城（*Orléan*）。這座城，坐落在我們打算要去的各城堡和城鎮的軸心交通位置上。尤其，在這已經疲累不堪的傍晚時分。因此，決定在此打尖，在鎮中心的一個廣場邊上，找到一間溫馨的小旅館，享用一頓可口的晚餐。我們計劃，在往蘭斯城之前，先瀏覽一下附近的各城堡。

第二天早上，翻查旅遊手冊，看看如何介紹這個奧爾良城。除了隱約知道，這個城市和聖女貞德有關之外，其他的一概不知。



在英國和法國之間的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期間，以及法國國內的奧爾良與布根弟（Burgundy）兩大家族的爭權奪利之中，有一位年輕的農家少女對外號稱，她聽到三位來自天上的聖人——彌格（Michael）、麗達（Margaret）和佳琳（Catherine）——給她的指示，要她挺身而出，以拯救法國。起初，沒什麼人理會她。在歷經幾次戰役失敗的預言被證實後，得到（未來的國王）皇太子接見以及經由一羣神學專家審查後，終於被委以領導法國軍隊、對抗入侵英軍的任務。

西元 1428 年 10 月，英軍包圍奧爾良城。少女貞德請求皇太子准許她，領軍去解圍。1429 年 4 月，身穿一副白色盔甲，手持繪有天主聖三圖像和「耶穌及瑪利亞」字樣旗幟的貞德，騎在雄糾糾的戰馬上，率領法軍進攻。雖然她肩膀中箭，法軍終於在 5 月 8 日收復了奧爾良，並且攻占了附近英軍的營地。從 1430 年以迄於今，奧爾良城每年慶祝這個勝利，並尊她為：「奧爾良少女」。

貞德又再一次的軍事勝利後，促成了皇太子在蘭斯大教堂加冕為法王查理七世（King Charles VII）。然而，謗亦隨之——宮廷貴族排擠她，全屬男性的軍隊排斥她。在接下來的一次戰役中，貞德被布根弟家族的軍隊所俘，隨即被轉賣給其英軍盟友。很顯然，新擁立的法國國王並未干預此事。貞德被監禁了一年。在此期間，審訊她的教會法庭，懷疑她的立場，而英國方面的教會法庭，更尋求以「女巫和異端」的罪名來定她的罪（她拒絕穿著婦女的服裝，更加惹火了審訊的法官）。

西元 1431 年 2 月 21 日，貞德在受制於英軍的法國波維教區柯

羣主教（Cauchon, bishop of Beauvais）主審的法庭上受審。漫長的審訊期，歷經六次公開的和九次私下的開庭，之後，一份動過手腳的貞德的供詞摘要，分別呈送給承審法官和巴黎大學的官員。貞德自始至終堅持的說法是，她親耳聽到聖人們給她明確的指示。也許，正如理查·麥博連（Richard McBrien）在《聖人傳記》（*Lives of the Saints*）中所說的，「她缺乏神學上的熟稔與老練，而導致受害的失誤。」她被公開指為異端者。

雖遭嚴刑拷打的威脅，她始終拒絕撤回她的證詞。之後，在一次面對大批羣眾時，她似乎在受脅迫的情況下做了某種程度的悔過（其細節仍有爭議）。然而，回到牢房後，又恢復了往日的自信，再回到原來的堅持：再度身穿男士的衣著，以及確信，事實上是天主透過這些聖人，在指派她。5月29日，宗教法庭斥責她為「故態復萌的異端者」，並交由政府當局處置。翌日，她被處以火刑——綁在木樁上燒死。臨死時，她口中呻吟的話語是「耶穌，耶穌」。

依照巴特勒《聖人傳記》的記載，貞德的骨灰「被輕蔑地投入（巴黎的）塞納河中」。

閱畢旅遊手冊上的其他記載，盤桓過她所解救的這個小城，佇立在城內葛羅斯洛旅舍前一個廣場上的貞德銅像前——她低著頭、孤伶伶地立著，銅鏽斑駁的臉龐透露出憂愁的表情，我打定了主意，將會追根究柢地去了解她。



一回到家，我就著手去探索她的事蹟。她是我接觸的第一位聖人，不再只是彩色玻璃窗上的一個圖像，或是教堂大門上的一

個名字。幾經搜尋，我找到了一本《聖女貞德》（*Saint Joan of Arc*），是畢塔·沙威爾·維斯特（Vita Sackville-West）於1936年出版的聖人傳記。全書在嘉許她的所言所行之外，也詳述了所以致之的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

閱讀過這本書之後，我又在電視上觀賞了維克多·弗萊明（Victor Fleming）導演的電影《少女貞德》（*Joan of Arc*）。原先銘記在腦海中的貞德的形象——在奧爾良的廣場上，面帶愁容的貞德，被電影中的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取代了。她身著耀眼的銀白色盔甲，騎著白色的戰馬，襯托在好萊塢式蔚藍的天空之中。時而腦海中浮起，飾演皇太子的荷西·佛瑞（José Ferrer），用一副不屑的眼光，透過凸顯的大鼻子，望著跪在面前的少女貞德。或是，綁在木樁上待刑的那一幕——細長的木十字架，被遞到她的嘴唇邊上，作最後的親吻。這裡的貞德，是那樣的漂亮，彷彿在黑暗中閃耀著光芒，充滿了羅曼蒂克。

也許，她的長相，在電影中被美化了。畢竟，初次晉見皇太子時，貞德才十六歲。在檢視過現有的證據之後，傳記作者沙威爾·維斯特的說法是，「我們可以假設，她是一個意志堅定、身強體健、長相平庸的女孩」。作者暗示：就是因為長相平庸，才讓她得以免除軍旅戰役期間，同袍戰友可能的性侵擾。另一位傳記作者唐那·史波特（Donald Spoto）在有學術水準的《貞德傳》（*Joan*）中，引用當年軍中同袍對她的描述，說她是個漂亮的女孩。不久前，貞德的盔甲被找到了（刺穿的位置都吻合她的傷口），可見她是一位矮小的女子。看起來，她似乎不像電影中的英格麗·褒曼，而有可能在身材上，更像似另一部《聖女貞德》（*Saint Joan*）電影中的女主角金·賽波（Jean Seberg）。

紐約市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有一幅十九世紀末畫家拉帕葉（Jules Bastien-Lepage）所繪的貞德畫像。我在曼哈頓（Manhattan）的公寓，和它僅隔幾條街。此番歐遊歸來，常有機會去欣賞這幅畫作。

畫中，描繪貞德在東雷米（Domrémy）自家的花園裡，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樹籬後面傳來三位聖人的話語——彌格天使，手持利劍，在樹梢上；頭戴白色花環的聖佳琳，雙手合十禱告著；聖麗達，則若隱若現。巨幅畫作的右側，是少女貞德，灰色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左手向前伸出，彷彿在等待指示。一頭黑髮的貞德，雕像般的立著，身上沾滿泥土，氣宇非凡。

然而，並非這幅撼動人心的巨畫，或是這般神奇、卻又似乎不合常理的故事，迷惑了我。貞·拉·普塞爾（Jehanne la Pucelle，貞德的原名）不過是一名不識字的農村少女（她後來受審時，連名字都不會寫，而堅持在筆錄劃個十字，代替簽名）。她不只聽到一位聖人的聲音，這三位聖人都說話指示她，要出來領導法軍，去擊退入侵的英軍。這三位聖人指示她，穿著男人的衣服，成為一名軍人。她照辦了。她離家外出，去尋訪皇太子，在一羣王室侍從貴族的嘲弄聲中，迅即指認出皇太子，跪在他的面前，私下告訴他一個祕密的訊息（此訊息，目前仍真相未明）。而這訊息又是如此地具有說服力，立刻讓這位年輕而又個性軟弱的皇太子相信了她，讓她去領軍作戰，且獲得勝利。對照事成之後，這位皇太子是如何地對她的被俘遭遇漠不關心，可見這個祕密訊息在當時是如何地震懾了他。在奧爾良城解圍的戰役中，她向聖佳琳祈禱改變風向，情況也果真如此。皇太子在蘭斯大教堂，被加冕為法王查理七世，一切都如同貞德事前所言。

不過，這回風又轉方向。善變無常的新國王，在一連串、難以置信的軍事勝利之後，離棄了貞德。功成名就卻換來教會當局的質疑——質疑她所謂「聖人聲音的指示」，而終將她開除教籍。英軍以「異端者」的罪名，將她燒死（傳說，她那顆強壯的心臟，在火焰中仍跳躍著）。

每一位聖人，都有他獨特而吸引信徒的地方。貞德有的是什麼呢？是年紀輕嗎？是作戰的英勇表現嗎？是面對責難和被處決時的勇氣嗎？很多人認為，是她的那份執著，套句聖保祿的話，「願意為了基督的緣故，成為眾人眼中的傻瓜」。就因著來自天上聲音的指示，如此「魯莽地」起而行動，雖已是多少個世紀之後，每當述說這個故事時，依然扣人心弦。



二十年之後，我在紐約市一個耶穌會士掌管的教堂內，主持一個讀書會，其成員都是二十多歲的男女青年教友。每個月有一個晚上，在披薩和汽水的簡便晚餐之後，用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討論過去四週內大家共同閱讀的某一本書。

我喜歡這樣的聚會。藉著這個讀書會，堂區內的青年人能接觸到許多不同類的書籍和作家。閱讀過的書籍包括，靈修類、神學類、小說、傳記、歷史和自傳等，而在聖誕節之前，則選讀某一部福音書。多年來接觸過的作者有，牟敦、沃克·柏石（Walker Percy）、維拉·凱塞（Willa Cather，譯者註：以美國邊境文學著稱的女作家，《總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是她的名著之一）、弗蘭娜瑞·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亨利·盧雲（Henri Nouwen）、桃樂斯·戴、安德烈·杜布斯（Andre Dubus）、隆·

韓森（Ron Hansen）、佳琳·諾瑞斯（Kathleen Norris），以及一些不甚出名但具有才華的作家們。尤其，在像紐約這樣人際關係冷漠的大都市裡，大家能在這樣的聚會中，找到團體的歸屬感。就我個人而言，跟這些青年人相處，就已經相當愉快了。偶爾就閱讀討論的書，提一些自己的觀感，但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聆聽他們的討論以及其教友生活中的感觸。

讀書會的討論過程中，偶爾也會碰觸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思維。有一回，在冗長的《馬爾谷福音》討論中，我注意到平常滿多話的一位女孩，今天似乎格外的沉默，於是邀請她發言。起初，她百般推辭地說，她的發言不當可能會觸犯大家。經再三的敦請，她才吞吞吐吐地說道：

「是這樣子的，我不怎麼喜歡這部福音裡所描述的耶穌！」

大家都笑了（也有些人很震驚）。她提到，在這部福音的某幾個場合，耶穌太過嚴厲了。我委婉地答覆，她強烈的情緒反應，是一種本能的自然現象。她這番直言不諱，倒也引發大家，以誠懇的同理心，去體會當時聽者的心態，而加以討論。

有一次，我指定的當月閱讀是，一位天主教小說作家瑪莉·戈登（Mary Gordon）所寫的《貞德小傳》（*Joan of Arc*），書中特別強調她是女性主義者聖人。許多讀書會的成員，是第一次接觸到貞德。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對她所知無幾，就像當年在巴黎市的廣場上驚鴻一瞥貞德銅像的我一樣。

在討論本書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孩，似乎顯得欲言又止。終於，她發言了：

「讓我有話直說，貞德是一位帶兵打仗的軍人。她憑什麼被稱為聖人？」

這個問題，可得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在腦海中盤算著諸多的解釋——她忠於耶穌基督、祈禱、聖事、教會和教會的聖人等；在天主要她完成一樁似乎不可能的任務時，她相信天主，而在各種危難中，堅定不移，終於達成任務；她激發了法國的貴族們、軍士和農民的信心；因著崇高的理想——解救被包圍的同胞，而忍受折磨；雖然教會折磨她，她仍然愛這個教會；在受審的法官面前，雖歷經人性的脆弱和猶豫，然而卻勇於事後改正；她如同殉道者般地視死如歸，死時口中猶唸著耶穌的名字。

在還未選定說辭之前，一位年輕男士以更簡短且更有智慧的語句，答覆了這位婦女的質疑：

「貞德是聖潔的人，因為她依靠天主。」

提問者滿意了，我更點頭稱是，想像著五百年前，貞德是否用相同的答覆，讓審訊者啞口無言。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註解。對我個人而言，貞德之所以為聖人，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我常自忖，為何對貞德情有獨鍾？也許，因為她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聖人。她的事蹟因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靈上，就如同七年級的那個男孩當年所背誦的那些法文單字，終生牢牢地記住了。也類似當年學習新語言的狀況一般，貞德的事蹟導引我學習了聖人們的言語，諸如：相信（believe）、祈禱（pray）、見證（witness）等動詞；以及因他們的行動而來的名詞，謙遜（humility）、愛德（charity）、熱誠（ardor）等。所以，聖女貞德在我靈性的生命中，占有一席獨特的位置。最早認識的人，總是記得最清楚。

然而，貞德的事蹟，也有許多讓我百思不解之處。她的所作所為，像是一位瘋狂的少女：聽到聖人的聲音、毅然離家、打仗、

為一個沒見過面的人而甘心受死。她的事蹟，比本書所介紹的其他聖人們更要來得「離奇」。亞西西的聖方濟，雖說「行徑怪異」，但對照起來，要比她還更屬於這個世界。今日，人們仍然景仰聖方濟和德蕾莎姆姆的所作所為，然而，貞德則可能顯得瘋狂了一點。

當年，在法國的奧爾良城瞻仰貞德的銅像時，我跟隨天主的意願，還在往下扎根的起步階段：比較經常上教堂、多閱讀了些聖經的故事。當年的我，也是有點瘋狂，有點類似貞德的心態——當然啦，沒有像她那樣，聽到什麼奇異的聲音，只是覺得，這樣地被吸引信教，難以理解，只憑一股信靠天主的意念。信仰是一種似乎能感應到，而同時又似乎渾然不覺的東西。貞德持守著她親耳聽到——而別人卻聽不到——的聲音，在這條道路上堅定地走向天主。對於在信仰道路上的起步者來說，她是一個完美的典範。只知道目標，但對於如何通往的途徑，卻一無所知，而我也是一樣。

就如同當年我的朋友佩琪的遭遇一樣，已然身處在巴黎通往查特城的道路上，卻迷途似地一再尋覓它，我們要尋覓的道路，常常是我們已經發現的道路。

3

心靈劇場

里修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

對於我來說，祈禱是一種心靈的衝騰；是一個向上天單純的瞻仰；是一種在憂苦煎熬或歡樂極喜之中，感恩及愛情的呼喊。總之，祈禱是非常好的事情，是超乎自然律的事情。它擴張了我的靈魂，而使之契合於天主。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
(*The Story of a Soul*)

從有記憶以來，我就是個電影迷。我初領聖體的各樣禮物中，最鍾意的是，爸媽帶我去觀賞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就憑我在主日學背誦〈悔罪經〉的辛苦，這份禮物我是當之無愧的)。上中學時，我和朋友們週五和週六晚上的活動，就是看電影。高中一年級的那個暑假，在附近的電影院找到一份接待員的臨時工作，就可想而知我有多興奮了。何況，瞧瞧它的招牌「大賣場電影院」——大都會郊區生活的兩大享受兼備矣。

我的工作，除了站在戲院的入口處撕票之外，每天下午負責

開門，晚場電影散場後鎖門。很快地，我又自行添加一些額外的工作，包括：和賣糖果點心櫃上的女孩聊天，聊個不停，免費吃糖果；讓我中學的朋友們免費入場；然後，吃更多的糖果，聊更多的天。

好景不常，戲院的副理唐諾先生稽查我的工作後，又添加了一項惱人的任務：到閣樓上一間密不通風的小房間內爆玉米花。戲院內的零食櫃上，標榜所販賣的玉米花都是「現爆的」，事實上，是在一個浴缸般的大鐵盆內一次爆的，而且存放了幾個星期。那是我每週的例行工作：把「牛油」（更精確地說，是某種動物的油脂）放在小爐子上加熱，倒入一大袋的玉米粒，添加黃色的螢光粉末，攪拌均勻，然後爆玉米花，爆好後，倒進那個大浴缸內，濾掉未爆開的玉米粒，最後，把成品倒進一個乾淨的大塑膠袋，儲存起來。

一天上班十個小時，包含爆玉米花的任務在內。在四面白石灰粉及炭渣牆的斗室內爆玉米花，唯一能使我不抓狂的，就是收音機。那一年的夏天，收音機裡播出的每一首熱門音樂的歌詞，我迄今依然記憶猶新。有一天午休時，我來到大賣場內的麥當勞快餐店，腦袋瓜還熱烘烘的，T 恤衫和牛仔褲上，沾滿了油和刺鼻的爆玉米香料的味。還在打量著點餐時，兩位太太從我旁邊走過，其中一位用力嗅了嗅後跟她的朋友說：「海倫啊，妳聞到了爆米花的味道嗎？」「有啊。」接著，她又說了：「這是從哪兒來的味道？我們好像在電影院裡面一樣嘛！」

這份惱人的額外任務，並未降低我的工作興致。比起往年的暑期打工：洗碗盤、搬運桌椅、高爾夫球場小弟、花園除草，這份工作有趣多了。隨時可以看免費的電影，是一大樂趣，雖然，

同一部片子的放映檔期滿長的——從 1970 年代開始，一般是連演數週，甚或幾個月。再好看的電影，就拿《來自外太空的貓咪》（*The Cat from Outer Space*）來說吧，一再重複的觀賞之後，難免令人乏味了。

上了大學，我對於電影，還是一樣的著迷。每逢週末，口袋裡的零用錢不夠用時（通常就是這個狀況），賓州大學校園內的某處地方，總是有這麼一個只須花一、兩塊美金的經典名片欣賞會。我開始接觸到所謂的「獨立製片」和外國語言的影片，就是在這段期間內。能看懂電影海報上的副標題和說明，讓我有一種莫名的喜悅感，過去所學的法文還真能派上用場。大學新鮮人時的宿舍室友布萊德（Brad），對於學習充滿了活力與熱情，曾經拉著我去觀賞了數十部這樣的影片。布萊德一直強調，這些都是精心製作的影片，不是那種商業氣息濃厚的電影。

畢了業，在紐約市的奇異電器公司工作三年之後，被調職到康州的史丹佛市（Stamford, Connecticut）。起初，離開了幾乎每一個街頭上都有電影院的紐約市，頗有些失落感。但是隔沒多久，我就在離史丹佛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家新開的電影院，它專門放映實驗性、獨立製片和經典的影片。

有一次，一則很不尋常的放映預告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目光。一個年輕女子臉孔的黑白照片，浮現在一個簡單的文字上面——小德蘭（Thérèse）。雖然，我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樣的影片——預告片上，隱隱約約地透露出，它帶有一些宗教的意味，我還是說服了一位同事，陪我一起前往觀賞。

這是法國導演亞蘭·卡法里埃（Alain Cavalier）的一部影片，大膽而又直截了當地回顧里修小德蘭一生的行誼。事前，我對這

位十九世紀法國的聖女，一無所知。導演的手法，幾乎完全省略掉實地場景的襯托，把焦點放在少數幾位人物沉默的互動上。它使用一系列簡潔的片段來敘述，輔以簡單字句的旁白說明：德蘭進了隱修院；她們給她穿聖衣會的會衣；在修院中，小德蘭在做著她那簡單的日常工作；修會的姊妹們羞辱她；小德蘭病了；小德蘭快要死了。

我覺得，這部影片簡潔而有力，頗能擄獲觀眾的注意，而片中的主角更是具有震懾力。影片結束時，我已熱淚盈眶。

走出電影院時，我趕緊擦乾眼淚，免得同行的同事發現到。忽然間，他轉過頭來對著我說：「真是白白浪費了這一輩子，無端地受了那麼多的苦難！」

他的這番感想，令我大大的吃了一驚。這是我第一次覺察到，我自己對於宗教方面的感受，與別人的經驗，有著如此大的差異。

更讓我自己吃驚的是，我覺得，我有責任要替小德蘭說幾句公道話。在我和同事之間，進行了一場雖非鏗鏘有力，但熱力十足的討論——關於宗教、受苦、犧牲的價值、信仰在生活中的角色；還有，我們剛看過她一生經歷影片的這個人，所展現出來的榜樣。至於，我為何有如此強烈的感受，我也只知其然，渾然不知其所以然。

作為一個影迷，以透過影片而非書寫形態的傳記閱讀，開始認識這位里修小德蘭，我一點都不覺奇怪。在描述聖人行實的某些凸顯而動人的場景方面，影片有恰如其分的功能，一如數百年前，用卷軸畫和壁畫來表現的手法——在繪畫某聖人的重要事蹟時，用誇大的筆觸，去強調某一些細節，而省略其他無關緊要的部分，以表現其精髓。義大利西西城的聖方濟大教堂內，有一

幅環繞四壁的壁畫，描繪聖方濟一生的幾個重大事蹟：脫光了衣服，全身赤裸立在眾人圍觀的廣場上；重建狀似廢墟的一座教堂；向鳥兒講道，他的死亡。它像極了現代拍電影時所使用的分鏡腳本。對於某些聖人，我偏好觀賞他們的傳記影片，那比文字敘述，更加生動有力。譬如說，認識聖多默·穆安的最佳途徑，就是去觀賞《良相佐國》（*A Man for All Seasons*）的影片。想要了解在中美洲薩爾瓦多殉道的聖薩爾瓦多總主教羅梅洛（Oscar Romero），去觀賞《羅梅洛》（*Romero*）這部影片就能一窺其堂奧。

兩年後，再度有機會與小德蘭相遇，那時我已進入耶穌會，開始第二年的初學。波士頓（Boston）的初學院剛進來三名初學生，其中一人是大衛（David）。大衛渾身是勁，說話有說服力，進初學院之前曾多年在波士頓當建築師，生於波士頓的一個天主教氣氛濃郁的大家族，自幼有著良好的宗教薰陶。

相對於我在成長過程中的宗教培育，大衛令我印象深刻，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他可以稱得上「虔誠的」教友。他在神修上的投入和感染力，令我羨慕不已，友誼也日漸增長。

有一天，大衛談到他對里修小德蘭的「敬禮」：如何地喜愛閱讀她的行誼；她的芳表，是如何地鼓舞了他；常常祈求她的代禱等。言談之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對小德蘭的熱忱，偶爾還帶著情感的意味。只是，我一直摸不著頭緒。

他邊講，我則邊想，里修小德蘭……那個人是誰啊？

我一臉茫然地望著他，理會到我這個反應，大衛從小桌子上取來他的聖經，打開拿出一張祈禱卡片——是一張身穿會衣的年輕修女的黑白照。

好像有一點眼熟哩。

「噢，對了，我想我看過一部有關於她的影片。」

大衛不厭其煩的帶我到初學院的圖書室，找出一本書頁略有捲角的《聖女小德蘭回憶錄》遞給我，「讀完這本書，你就會明瞭為何我如此地喜愛小德蘭」，當天晚上我就開始閱讀。這就是我和這位眾人口中稱為「小花」的小婦人，二度喜相逢的經過。



西元 1873 年 1 月 2 日，法國小鎮阿朗松（Alençon），熱心的天主教徒路易和彩麗·馬爾定夫婦（Louis and Zélie Martin）家中，誕生了一位小女孩，名叫瑪麗·芳濟佳·德蘭·馬爾定（Marie-Françoise-Thérèse Martin）。路易·馬爾定先生是一位製錶商人，早年曾去叩隱修院的大門，但因拉丁文造詣不佳而遭拒；同樣地，彩麗小姐也因被拒於家鄉的仁愛修女會大門之外，轉而去學習蕾絲花邊的織造，用以謀生。夫婦倆對天主的熱愛以及宗教生活的情操，薰陶了他們的孩子。

小德蘭四歲喪母後，舉家遷往里修（Lisieux）。幼時，小德蘭嬌生慣養，集父親和四位姊姊的寵愛於一身，而父親對她更是最為偏愛。大多數的傳記作者認為，小德蘭是一個被寵壞的女孩。

或許，也是因為這種處處維護她的生長環境，小德蘭有著歡愉的個性和出自本性的宗教情操。她在自傳中曾追憶，「我非常愛天主，時常將我的心奉獻給祂」。舉凡宗教上的敬禮，幾乎都吸引她的興致。譬如，依照她自己的描述，姊姊瑟琳（Céline）初領聖體的慶典，「是我一生當中，幾個最美麗的日子之一」。

年方九歲，小德蘭已有進入修會的念頭。當兩位姊姊進了里修本地的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時，她的這份渴望更加強化了。

在得知進修會要年滿十六歲這個條件時，她就趁著陪同父親和堂區教友到羅馬朝聖時蒙教宗接見的機會，精心策畫著請求教宗特准。在面對這位滿腔熱情的法國小女孩的請求時，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只簡短答覆了一句話：「如果那是天主的意思，妳一定能進這個修會的。」

她如此一心一意的企圖心，感動了里修本地的教會當局。羅馬朝聖回來後的幾個月，獲得本地主教的特許——西元 1888 年 4 月 9 日，年僅十五歲的小德蘭，進了里修的聖衣會。

她在隱修院高牆內的生活，短暫而且平凡無奇——傳記作者羅勃·埃斯柏格（Robert Ellsberg）在他的《諸聖略傳》（*All Saints*）中形容的是，「缺少外在張力的戲劇情節」。入會不到一年，即領受了會衣。翌年，正式進入初學階段，同時受派打理飯廳的雜務，兼清掃院內各迴廊。西元 1890 年，宣發貧窮、守貞和服從三個誓願。1891 年，改派為院內小堂更衣所管理員的助理。1893 年，她在院內的祈禱室，完成了一組壁畫，又被改派為，「第二司閹員」——亦即門房的助理。

西元 1896 年耶穌受難瞻禮日的清晨，小德蘭睡醒時發現，滿嘴的鮮血。先前，她曾熱切禱告，希望能獲得外派越南，成為一名傳教士，然而，此刻的小德蘭卻也滿心歡喜，天主即將接她到天堂去了。

事後證明，天主並沒有賞賜給她這種快速而沒有疼痛地上天堂的福分，她還要忍受一年的劇烈病痛。

當年，她又染上了肺結核病。奉院長之命，小德蘭將她的神修歷程寫下來，題名為，「一朵小白花的春日故事，由她自己所寫的，呈獻給可敬的耶穌依搊絲姆姆（Reverend Mother Mary Agnes

of Jesus，譯者註：亦即她的二姊寶琳）」。

這是一本了不起的小書，後來吸引感動了無數的世人，走向耶穌。一個沒有戲劇性情節的生命歷程，它所呈現出的是內心澎湃的心靈劇場。令人訝異的是，小德蘭對於司鐸生涯強而有力的呼喚：「如果我是一名司鐸，我一定要完成最英勇的事功。我覺得，我有十字軍般的勇氣，願為捍衛聖教會而戰死沙場。」在隱修院內，她把自己奉獻給祈禱，奉獻給為天主的各種服務。尤其是，她懇切地為遠方傳教的司鐸們祈禱；因而，在高牆深院內，雙手合十的小修女，竟能和闖蕩五湖四海的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並列為普世傳教士的主保聖人。

看過她描述在隱修院日常生活的自傳，你就會明瞭為何傳記作者佳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稱之為，「行刻苦而不為人所知的大天才」。她自認，沒有心目中那些偉大的聖人聖女的高超德行，因而將那些日常生活上發生的、微小的困難，視為既是天主給的考驗，也是祂所賞賜的禮物。這就是她個人獨特的成聖之道——「既然沒有行大德的能力，我就勤於實踐小德行」。修會中的姊妹偶有對她不敬和羞辱，她則逆來順受，直到病終。愈是對她不友善的修會姊妹，她愈是要打從心眼裡地去愛她；因而，每逢休閒時刻，她總是走到那惱火了她、和她意見不合的姊妹身旁，坐下來聊天。

在修院中，德蘭修女的這番實踐，並不期望的回報，她寫到：「因為我缺少德行修養，去實踐這些微的小事情，我必須作相當大的付出，同時安慰自己，到了末日審判時，一切都會顯露出來了。我常提醒自己：一個人盡了本分，而且嚴格地要求自己，沒有人會知道的；相反地，一旦做得不完美，立刻會露出馬腳。」

終其一生，小德蘭以一個小女孩愛慕天主的情懷，戮力於把這些「微小的」努力奉獻給天主。伴隨著信仰的生活，喜悅和痛苦兩者皆有，小德蘭的自傳可說是個見證。在病體日趨惡化下，自傳的寫作仍進行著，最後的幾個篇章，是在極端痛苦中完成的。西元 1897 年 9 月 30 日，二十四歲的小德蘭去世。她臨終時斷斷續續地呢喃著：「喔……我愛祂……我的天主……我……愛……您！」

即使面臨死亡，這位殷勤不懈的耶穌門徒，仍覺得事有未竟，因而誓言，死後依然會為世人代禱，「我要讓玫瑰花雨從天降下，我要在天堂全心關懷地上的世人」。

死後一年，修會把她的自傳，以刪節的版本印行。起初，僅在加爾默羅聖衣會的各個修道院內傳閱，逐漸地它流出院牆，無數的世人爭相閱讀。「春日故事」的作者，成為普世天主教會最受歡迎的聖人——她的事蹟，擄獲人心；她的芳表，啟迪眾人；她的「神嬰小道」，吸引無數信友仿效。

西元 1925 年，死後僅二十八年，小德蘭就被梵蒂岡正式宣布為聖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Paul II）更在 1997 年宣告她為教會的聖師，意即信仰的導師。迄今，普世教會僅有三位女性獲此「聖師」的殊榮——其他兩位是，聖佳琳和大德蘭。

小德蘭畢生喜愛花園和各式各樣的花兒。茲摘錄一段她的自傳《聖女小德蘭回憶錄》中的章節，聖女借用花園的比喻，來闡釋她的「神嬰小道」的概念：

耶穌不惜把這奧祕親自啓示給我。祂在我的眼前，擺放了一部有關大自然的奇書；我明白了，凡是祂所創

造的花兒都是美麗的；玫瑰的光豔，百合花的潔白，一點都不會掩蓋住小紫羅蘭的馨香，或是雛菊賞心悅目的素樸。我還知道，假如所有的細花纖卉都想變成玫瑰，那麼，大自然將失去它那春日的美景，田野間，也將沒有細小野花的點綴了。

在這個眾靈魂的世界，亦即我主耶穌的花園裡，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天主願意創造那些能比擬玫瑰和百合花的偉大靈魂；但是，他也創造了那些較為平凡的靈魂，他們要甘心樂於成為紫羅蘭或是雛蘭，而當天主往祂的腳下觀看時，能向祂綻放出喜悅。成全完滿，包括了遵行祂的旨意，成為祂所願意的……

正如同太陽普照大地，它照耀高聳的杉樹，同時，也照耀著每一朵小花，宛若整個大地僅只它存在一般。我們的上主也是這樣的，祂個別地關切每一個靈魂，宛若在這個世界上別人都不存在似的。就如同在自然界中，季節依序變換，在一定的時令到來時，就算那最卑微的雛菊，也會吐蕊揚芬，同樣地，世間事物的運行，是為了每一個靈魂的好處。

小德蘭如此的謙遜自持，令普世的基督徒景仰不已，她的榜樣並非遙不可及。畢竟，誰未曾被生命的奧妙折服過，而自覺渺小？誰未曾經歷到人的有限？跟別人相比，誰未曾覺得「矮了一截」？誰沒有受過苦難的折磨？許多人認為，小德蘭是一位能感同身受的聖人。凡夫俗子能和她說上話，與「小花」一起相處很自在。

「小花」這個暱稱，源自她自傳的原始書名：「一朵小白花」。她以上主的花園來比喻人世間，而和周遭光豔照人的眾玫瑰相比，她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朵小花，一朵素樸的小雛菊。她也自稱為「小德蘭」（la petite Thérèse，法文），以別於本修會的前輩聖女大德蘭（Teresa of Ávila）。為後人所熟知的「神嬰小道」，是她逆來順受且持之以恆的一種人生修養，它包含了：以愛天主的心，去從事日常的小事情；是一種跟隨耶穌作為門徒的方法，它強調，在造物主面前，愉悅地謙遜，以及願意接受痛苦。

如果，你認為小德蘭只不過是溫室裡精緻的一朵小花，那就小看了在脆弱的花瓣下面，那顆堅強躍動的心。教宗若望保祿一世（Pope John Paul I）曾這樣形容她：「一條鋼筋。」你想想看，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為貫徹進入修會的決心，如何去籌謀排除阻擋在前面的困難，包括挑戰教會法令有關年齡的條件限制——她到梵蒂岡教宗的面前去申訴。在瀕臨死亡的痛苦病痛之中，她依然禱告著，信仰依然堅定。

說到作為一個基督徒具備的決心和沉著信靠，拿她和前輩同胞的聖女貞德來相比，頗為恰當。她曾在修院院長主保瞻禮的慶祝會上，自導自演這位「奧爾良少女」，還穿著一副臨時製作的紙盔甲道具，一位修院內的姊妹拍下她穿著戲服的照片，她那略帶憂鬱的雙眼，直視著觀眾，手中的寶劍，似乎成了她賴以支撐的拐杖。

完全的無我，和甘心情願承受修院內姊妹們的冒犯，是最典型的小德蘭神修。然而，她之所以被尊為聖，除了因為這類甘心情願受的肉體上的苦難之外，更因為心靈上的積極行動。她在自傳中談到：「我不再去渴望痛苦和死亡，雖然，兩者我還是要的；

但我心嚮往的是，愛。」

聖保祿以身體和各肢體相互配合，來比喻整個的教會團體，而小德蘭大膽地昭告，她要當那顆躍動的心臟。她那種刻苦式的神修，尤其是面對疾病時的心態，在現代世人的眼光中，似乎有些怪異（她生了重病，一想到會馬上死掉，她說道，「我的靈魂滿溢著喜悅」）。可是，她的這種苦行是強烈愛慕天主的情感流露，她渴望把自己奉獻給耶穌。

關於她在病痛時的心態，容我再多加著墨一番。自幼以來小德蘭一直有著能感受到天主與她一起臨在的恩寵。然而，在病痛發作時，她在祈禱中，開始經驗不到天主的臨在，一如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描述的「心靈黑夜」。這個情況，除了其中的一、兩位之外，她刻意地隱瞞修會中的姊妹們，免得她們擔心她遭逢的折磨。她曾向一位姊妹坦言，「妳不會明白，我深陷在如何漆黑的暗夜之中」。偶爾，她腦海中也曾閃過自殺的念頭——她向照顧她的姊妹叫囂，藥不應該放在病床邊上。

加爾默羅會士潘恩神父（Fr. Steven Payne）是一位學有素養的學者。他認為，許多的專家學者相信，小德蘭遭逢的這種試煉，基本上是關乎她所確信的死後永生和天堂，而非懷疑天主的存在。他在給我的信上這麼說：「僅僅從她的話語，很難作分辨，因為她也許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況且，她一心一意地不要讓姊妹們擔心她。可是，如果你仔細地查考整篇的敘述，她談論的是在死亡的另外一邊，是空虛全無的那種感覺。對於小德蘭來說，那是格外嚴酷的一個考驗，因為，她一直強而有力的確信，天堂的存在是個事實。」

縱然在掙扎之中，也曾哭泣而埋怨，她持守著那份信德——

在終生與主為友，因而泉水湧溢的深井之中，她汲取那份對主的信賴。傳記作者佳琳·哈里森在《里修的聖女小德蘭》（*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書中寫道，小德蘭經歷的「心靈黑夜」，或許是她一生當中，最能引發世人深省與共鳴的一個層面，因為在那個層面上，眾多的生靈和她匯集著，「終於，她來到我們中間，和我們一起並列。在此之前，從她出生來到這個世界，一路走來，似乎比一般人更要得天獨厚。她在我們眼中，要能成為聖人，值得相信，全在於此一層面——最後，她也要面對人人免不了的一死，而且成就了它」。



入修會發願時，取名為耶穌聖嬰聖容德蘭（Thérèse de l'Enfant Jésus et de la Sainte Face），世人稱之為里修的聖女小德蘭的小卡片聖像，於今處處可見：身穿咖啡色與白色相間的聖衣會會衣，捧著花團錦簇的玫瑰花和一個十字架，凝視前方。全世界的許多教堂內，有她安詳地站立的塑像，或是繪製在透著天光的彩色玻璃窗上，或是在壁畫上。不同語言文字和版本的小德蘭自傳，在各地陳列、傳閱著。心有靈犀的人們，能和她契合，因為在諸聖之中，她最了解世上凡夫俗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與喜悅。

她的一生——既平凡單純又錯綜複雜，似乎一望可知卻又隱晦不明，狀似童稚卻又很成熟，她謙虛為懷可又勇往直前，滿心喜悅卻狀似憂愁——業已訴說給千百萬的人們，包括我的朋友大衛。當年在康州的那一個電影院，我和她初次相逢，她也跟我訴說過。

雖然小德蘭生命中的某些層面，我還不能接受（譬如，幼時

的宗教狂熱，聽起來似乎有點自命不凡、嬌柔做作，甚至於神經兮兮的；在無私無我的實踐過程中，有時似乎有點兒被虐狂似的）；雖然要在眾人面前承認，我所喜愛的一位聖人，有著小女孩的稚氣和細膩，是有點兒不好意思。然而，最終還是她本質，令我折服。就像歷來的任何一位聖者，小德蘭是她所安身立命的大時代環境的產物——在宗教氣氛極為濃郁的家庭中，被薰陶和撫養長大；十九世紀法國虔誠的修道院生活，培育了她。偶爾，她的某些言語和行動，讓今日的我們覺得困惑，那也就不足為奇了。閃耀在十九世紀的虔誠信仰氛圍中，有如從泥土中躡出來的青翠綠竹苗，這個令人嘖嘖稱奇的個性原型，她克服生命中的萬般難處，給我們捧出了她的「神嬰小道」，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愛」。

我發覺小德蘭是一種陪伴型的臨在，是一位給人加油打氣的姊妹，有耐性，終身信主不渝。和她相處往來，愈是深層交往，愈能教我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尤其她讓我聯想到，在我生命過程中相遇的許多人，他們曾親切體貼地對待我。所以，我願更深入地認識她，和她一起禱告，並向她祈求。



某些時刻，當我在向小德蘭祈禱時，偶爾還會想到那和她初逢的場合。那位朋友的影片觀後感：「真是白白浪費了這一輩子，無端地受了那麼多苦難。」至今依然使我震驚。我真是為她叫屈。

然而，擁抱這番誤解，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在修道院內，她聽到類似的嚴厲批評；姊妹們妒嫉她的年輕；對她的聖潔和德行，有所不解和困惑。

我想像在天堂裡的小德蘭，會以微笑回應這番誤解，回應那些譏笑她過分天真幼稚、過分謙遜、太熱心敬主的人們；她會以微笑回應那些人，他們低估了她神嬰小道的力量；而且她會為他們禱告。

4

真實的自我

多默·牟敦
(Thomas Merton)

我認為，要修德成聖就是實踐自我。因此，努力獲得救贖和成聖，事實上就是去尋求返樸歸真，找到真實的自我。

——多默·牟敦 (Thomas Merton)

《默觀的新種子》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讀大學的時候，我選修了一門「美國詩選」的課，因而認識了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任教的年輕女教授很喜歡他的詩，曾寫過一本惠特曼的傳記，頗受人重視。有一次在課堂上談到，如果有人批評你自相矛盾時，可以引用惠特曼〈自我之歌〉 (Song of Myself) 裡的幾行詩句：

你說我是自相矛盾？

對極了，我是矛盾的，

(我很豐富，我有多樣性的內涵。)

用惠特曼的這幾行詩句，來形容多默·牟敦這個人，還真恰當。他是一個詩人、謎一般的人物、隱修士、藝術家、倡導和平的行動者、天主教的神父、靈修大師、基督徒合一運動促進者、禪（Zen）的實踐者、是一位聖人。

牟敦之所以受人喜愛，正是因為他的諸多矛盾。一位喜愛周遭世界的人，卻選擇成為避居高牆深院內的修道人：隱修士，牟敦·路易神父（Fr. M. Louis, OCSO 遵守嚴規的熙篤隱修會）。一個我行我素、醉心於雲遊四海的旅行者，卻選擇固定在肯塔基州偏僻丘陵地區一座革責瑪尼聖母修道院（Abbey of Our Lady of Gethsemani），而且宣發了「恆常」願，要一輩子住在那裡。一個出於自願，宣誓「服從」的修道人，卻經常和他的長上理論。他喜愛這個修道的聖召，卻又經常在質疑它。熱心地皈依天主教，卻仍著迷於東方的玄祕宗教。一位成名的作家，卻口口聲聲說他嫌惡世俗的頭銜和虛名。曾寫道，願從此擱筆不再寫作，不久後另有一本新書出版了，他又說，衷心喜悅。

這般的矛盾，惠特曼式的多樣性，造就了多默·牟敦，二十世紀天主教會繽紛人物中的一位。《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是他坦率的生平自傳，一直到進入隱修院為止。西元1948年該書出版，造成了出版界的一股旋風，這是見多識廣的牟敦未曾預料的。它將默觀祈禱介紹給數以百萬的讀者，也預告了美國二戰後的一股修道的潮流。他關於和平的論述，似乎在宣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 III）的通諭——《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拉丁文）即將來臨。他一直對現世的生活充滿熱情，有助於重新塑造美國的天主教會，為疲憊沉悶的美國社會，注入一股清流。

他的這本書，也重新塑造了我。

要說《七重山》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當然言過其實。欲知其來龍去脈的原委，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在和多默·牟敦相遇之前，我的生活狀況。



十七歲那一年，我是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大學部的新生。至於，為什麼選讀商學院？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甚至於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沒搞清楚。

最簡單的說法是，高中的時候，我對於未來人生的取向，還拿不定主意。中學裡的許多課程，英文、法文、歷史、藝術等，我都喜歡，成績也不錯，可是，沒有一門能現實到可以當作一輩子的職業。譬如說，我喜歡法文，可是，想不出可以用來從事些什麼營生。

於是，有了讀商的念頭。當時，模模糊糊的想法是，主修商業，將來可以商業的模式來開展任一領域的工作。譬如說，出版業就是英文的商業模式；而經營藝廊或博物館，就是藝術的商業模式。至少，以主修商務的學位，畢業後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我的推理是，因此我就會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這一個理由，我周遭的每一個人，我的父母、朋友們、高中的生涯諮詢顧問都十分認同。

問題是，每當我考量「賺錢過生活」的時候，腦海裡湧現的總是「賺錢」，而非「生活」。至於在商業的世界裡討生活，是怎麼一回事，我則毫無概念。我將會過得充實？令人喜悅？我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那是我打從內心裡想要從事的一份工作？這

些問題，我當時都未曾深思熟慮，為一個十七歲的青少年，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最後，我決定上大學時學商，更精確地說，主修金融。

在華頓商學院修習的課業，雖說不像看一場精彩的電影，或是和朋友歡聚暢飲啤酒那般快活，但幾門功課我都掌握得不錯，譬如，我的會計學得很好。除了是因為幾位教授都非常優秀外，我喜歡會計學的風格——每一項事物都穩妥地契合在一起，像拼圖一樣，把一堆零散的、個別的圖片，整齊而有意義地拼湊在一起。可是，在我的休閒時間裡，我可不願傷這個腦筋，去計算和平衡那些資產負債表，檢查損益收支表，或是不厭其煩地閱讀現金流量報表。

但也有幾門提不起興趣的課。或然率及統計學的教授，是最無趣的老師。在整個一學期的課堂上，他引用相同的一個例子，來解說每一條或然率的定理。他用單調又沒有高低起伏且鼻音濃厚的聲音，面對大講堂內近百名戴眼鏡的商科學生，講授著：「設想一下，在你的面前有兩個大甕，其中一個裝著綠色的球，另一個裝著紅色的球。從這兩個甕中，各取出一個球，然後……」

我實在記不得，他這個甕和球的教學法所要表達的重點，因為通常我是人在椅子上端坐著，腦袋瓜內卻是一片空白，而且很快就進入了補眠的狀態，口水還滴到了桌子的筆記本。整個學期下來，對於他所教的或然率，我幾乎是不知所云。從小學到中學，我的學業成績一直是優異的，偶爾有一門功課得到 B 的成績，都會讓我生氣。然而，生平第一次，我得到了一個 C。這次，我一點都沒生氣，我坦白地向寢室的室友招認：「得到 C，是我咎由自取。倘若教授給我個 D，也不足為奇。」心中自我警惕，將來

千萬不要去碰那些需要用到或然率的工作。

幸好，或然率這門課的遭遇是個特例。我在大學的課業，一般說來表現良好。大學要畢業那一年，在剛開學的工作招聘季中，我好整以暇地精挑細選，那些擺在我面前最好的工作機會。

以華頓商學院在美國企業內的聲譽，要找到一份工作，那是意想不到的容易。大學第四年剛開學，就有上百個大企業公司的招聘負責人，陸續蜂擁到校園內，當場面試。幾個月之內，我就得到了不少條件優厚、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第一輪過濾後，剩下三、四個選項。最終，我選定了奇異公司在紐約的一個企業培訓計畫。

再一次地，我的決定不是出於對未來生涯的省思。套句會計學上的術語，我的抉擇是沿用「普遍接受的原則」。讓我舉個例子，來解釋這個思路。商學院畢業以後，你要做什麼？去面試找工作；在不同的工作機會裡，你會挑選哪一個？薪水最佳的那一份工作。

但沒有人問我更重要的問題，而我自己也未曾想過，那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渴望什麼？天主要你做什麼？



很難精確地指出，在哪一個時間點上，我開始警覺到自己站錯了地方。回顧過往，我只能說，這樣的覺悟是一個逐漸發生的過程，而最初的喜悅隨著時間的消逝逐漸淡去。在這個企業的世界裡打滾多年，幾乎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地工作著，部門的經理們每天以冷漠的態度、機械式地處理事務，而我則在這條枯燥乏味的道路上往前踏步，唯一的目標就是：賺錢。

終於，我覺察出來了，我的工作生涯沒有真實的意義。可是，更嚴重的問題是——我沒法找到一個恰當的出路。

那一個奇妙的夜晚，我迄今仍然歷歷在目。工作忙碌了一整天，大概是晚上九點鐘，我回到了那間和另兩位奇異公司同事合租的公寓，拖著疲憊的身軀，把冰箱內吃剩的披薩丟進微波爐，癱在電視機前的舊沙發上。

手裡握著遙控器，一個一個地跳開老掉牙的喜鬧劇、沉悶的影片和無聊的重播畫面，突然地我轉到了公共電視台的一個人物的記錄片——《牟敦：其人其事》（*Merton: A Film Biography*）。螢光幕上輪番出現了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我還認識，談論牟敦這個人在他們生命歷程上的影響。當時大概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天主教的修道士，更精確地說，是一位「隱修士」（我當時對這個名詞毫無概念），他先前過的是一種大不相同的生活（懶得理他是什麼樣的生活），寫了一本深具影響力的傳記（我從未聽說過）。雖然，這個節目我只看到結尾的幾分鐘，但這些人的感想，已經激起我想多認識這位牟敦先生的意願。另外還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在好幾張靜止的畫面中，他的容貌看起來是這麼的安詳。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尋覓，在書店裡找到一本他的自傳《七重山》。當天晚上，我就開始閱讀。才讀了幾頁，我就被他牢牢地抓住了，從來沒有一本書如此地深獲我心，迄今仍是。如果早認識他，那該有多好啊！

他是如此的開朗、有趣、想像力豐富，是一個可以做好朋友的人。那些使他內心掙扎的原因，和我一樣——驕傲、野心、自私。而我現在質疑的問題，正是他所經歷過的：我生出來是為了什麼？天主是誰？人生的意義何在？在牟敦的身上，似乎充滿了

奇妙的矛盾——一個尋求謙遜的人，卻面臨極其自負的挑戰；熱愛這個世界，而以某一個角度來說，卻選擇躲開它。對我而言，牟敦的這種諸多的自我矛盾，亦即詩人惠特曼所謂的多樣性，正是彰顯了他高深的人性。當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他的人生尋覓過程變成了我的，我急於知道，他的新生命是如何開展出來的。



西元 1915 年 1 月 31 日，多默·牟敦出生在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山區（Pyrenees）一個名叫普拉德（Prades）的小鎮。紐西蘭籍的父親歐文（Owen）是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牟敦在他的自傳中，以自豪的口氣寫道：「我父親畫的跟塞尚（Cézanne，法國名畫家）一樣好，他的畫風抓住了法國南部鄉村風光的精髓，正如塞尚一樣。」美國籍的母親露絲（Ruth），也是藝術家。他們是在巴黎的一個畫室進修時相遇的。

牟敦終其一生都喜愛法國的藝術、語言和文化。他在《七重山》的自傳裡，以頗為感性的語調描述早年生活的鄉土：「那兒有著全世界最美麗的大教堂，迷人的小鎮風光……和最好的大學。」

對這位四海漂泊、沒有根的年輕人來說，在許多方面，法蘭西（France）就是他的家鄉。離開這個國家多年以後，似乎繞了一個大圈子，又返回了原鄉：成為嚴規的熙篤會（The Order of Cistercians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的隱修士，而這個修會是中世紀時創始於法國的熙篤地方（Cîteaux）（英文的 Cistercian 源自熙篤地名的拉丁文 Cistercium）。他的法文造詣更派上了大用場：這位美國肯塔基州革責瑪尼修道院的年輕修道士，受命將法國總院保存的許多古老文件，翻譯成英文。

早年的牟敦，沒有一個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家。以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的童年是不快樂的，母親在他六歲時去世，此後，隨著追尋藝術生涯的父親四處漂泊，不同的城鎮，不同的國家。曾有一段時間，牟敦和他的弟弟若望·保祿（John Paul）被送到外祖父母的家，美國紐約州道斯頓鎮（Douglaston, N. Y.），不久後，又被父親接到中美洲的百慕達（Bermuda）。當父親急於到紐約市去出售他的畫作時，又匆促地將他們託付給父親剛認識不久、百慕達當地的一名女作家（他父親如此草率地將小孩託付給初識友人的行徑，至今仍令我震驚）。後來，父親又把他們兄弟兩帶回法國，住在一個名叫聖安東尼（Saint-Antonin）的小鎮，牟敦就在附近的一所中學讀書。

一年夏天，父親再度外出旅行，把他託付給穆拉（Murat）鎮上，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家庭普里瓦茨（Privats）夫婦。以事後來看，這真是牟敦莫大的福氣。這對老夫婦年輕的姪兒和他們同住，家庭中流露出的誠摯愛心，深深地感動了牟敦。關於和普里瓦茨一家人的居家生活，牟敦在他的自傳中，有一段非常感性的描述：「天主給我那麼多的祝福，是他們為我祈禱的緣故，也許我後來的皈依信教，甚至於修道聖召等的恩寵，都是由於他們為我祈禱。有誰知道呢？終究有一天我會知道的，我們有一天會見到面，而我能當面感謝他們，這個確信，真的是非常美好。」

西元 1929 年，牟敦被送往英國洛特蘭（Rutland）一所名叫歐漢姆（Oakham）的寄宿學校。此時，他的父親因腦瘤而病倒，他在暑假時，前往倫敦的醫院探視。令他吃驚的是，父親病床邊上堆放的近些年來的畫作：「和過去他所熟悉的畫風大相迥異——畫的都是一些身材矮小、表情憤怒、狀似拜占庭東方教會的聖者，

蓄著一撮大鬍子，頭頂上有一圈聖人的光環。」

西元 1931 那一年，他十六歲生日前幾天，他父親過世了。

聰明而又思路清晰的青年牟敦，獲得劍橋大學克雷爾學院（Clare College）的獎學金，開始他的大學生涯。這個地方，比先前的歐漢姆寄宿中學更不如他的意。他在自傳中描述這所大學「陰暗，而且帶有不吉祥的氛圍」。他和「一羣無憂無慮的弟兄們，脖子上圍著五顏六色的圍巾」到處閒逛、消磨時光，他們「可以整個晚上到處亂吼亂叫……如果不是在某一個時間點上，被迫必須回家睡覺的話」。

根據某些傳記作家的說法，在這段時期放浪形骸的牟敦，是一名嬰孩的父親。多年後，在牟敦打算進隱修院時，當年的監護人曾多方尋訪嬰孩和他母親的下落而未果。據信，他們在二次大戰德軍對英國的閃電戰役空襲中身亡。有人說，當年在牟敦的自傳《七重山》出版前，修道院的負責人在審查他的手稿時，唯恐觸犯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微妙的心理禁忌，而刻意刪除了這一段。怪不得，我讀他的傳記時，因為沒有這一段的描述，因而對他所說的，屢次懊悔過去的荒唐行徑，和恐怕因而成為進入隱修院的一項阻礙時，感覺到大惑不解。後來的傳記作者，就一五一十地補上了這段經歷。

依照《七重山》自傳中的說法，幼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多默，是孤寂的、沒有生活目標的，因為沒有知心的朋友。而手足分離、思念父母，導致行為偏差——抽菸、喝酒、呼朋引伴尋歡作樂，尤其愛現。可能在自己渾然不覺之中，一直在尋找什麼東西。不禁令人聯想到，第五世紀時的聖奧斯定在他的《懺悔錄》中，所自述的放蕩青年人，以及近代的桃樂斯·戴在她的書中，所反省

的過去那一段「漫長的孤寂」。

牟敦的監護人警覺到這段荒唐的生活，建議他換個環境，到美國去讀書。「考慮不到五分鐘，我就同意了」，依照自傳的說法。

事後證明，紐約市和這個城裡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更適合這個年輕人的需求。遇到幾位談得來的年輕人（雖然和年輕女子之間建立一種健康的友誼關係，仍需要一段時間），而且彼此的友誼維持了一輩子。在大學裡，他樂於學習，尤其，英文教授范道倫（Mark Van Doren）對他影響最大。他讚譽范教授，對於「聖召」的敏感度很高，具高深的士林派哲學造詣，有助於他日後接受士林哲學的薰陶，「依我的看法，上主巧妙地使用了范道倫教授，作為祂影響我的一個工具」。此話一點不假，如果依照他自傳的描述，恐怕范教授存在這個世界的唯一理由，就是幫助多默·牟敦去了解聖道茂。

讀到牟敦大學生涯的一段敘述時，我差一點被嚇出一身冷汗。牟敦不經意提了一段插曲——自稱善於繪畫卡通漫畫，曾經是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幽默雜誌《小丑》（*Jester*）的藝術主編。這一段話，我反覆讀了兩遍，以確定沒有搞錯。巧的是，大學時期我僅有的課餘喜好（除了抽菸斗和喝啤酒之外），就是畫卡通漫畫，也當上了校園幽默雜誌《什錦盤》（*Punch Bowl*）的藝術主編。雖然這是很小的一個巧合，可是你想想看，長春藤聯盟（Ivy League）各大學幽默雜誌歷來的藝術編輯有幾個是數得出來的。讀完這一段敘述，我已經選邊站好，和多默·牟敦結盟了——他往後的生涯發展，我都舉手贊成。

從自傳看得很清楚，哥大學生牟敦是一個多面向的人物。幾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更加確定了這一點。當時，我在紐約市的

一個堂區，主持一個每月讀書會。指定閱讀《七重山》那天晚上，討論熱烈。整晚沉默不語的一位老婦人，會後找我談話。她說，她的先生在哥大讀書的時候認識牟敦，「我先生讀完這本書後，大吃一驚。因為，就他的記憶所及，牟敦經常外出飲酒，或是和朋友們歡聚。我先生說，他無法相信這本書所敘述牟敦當時的內心狀態」。



以下的兩段話，抄錄自牟敦的另一本書《沒有人是一座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是我在二十六歲那一年閱讀到的。第一段的長篇問句，把我當時的生命軌跡，就此打住，從而推向通往耶穌會士的路子上。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那麼，為什麼一定還要耗用我們的生命，去勉強自己，成為那種根本就不想成為的那種人？如果，我們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正在做的事，發現它和我們受造的目的完成相反，那麼，為什麼還要虛耗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呢？

除非清楚的認識自己，我們無法成為真實的自我。如果放任未經思索和習慣性的行動，驅使我們的靈魂，陷於困惑不解之中，自我認識是不可能的。為認識自我，沒有必要把目前所有的行動都停止下來，以便去反省自我。因為那樣是沒有用的，或許對大多數的人，還會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必須削減活動的總量，到達某種程度，這樣，我們就能安靜地、理智地思考我們的

行動。除非我們了解，為什麼要做目前正在做的那些事情的真實原因，否則，我們就無法開始走上認識自己的過程；我們無法成為自我，除非我們的行動，反映出我們的意願，而此意願又合於周遭的環境。但這就足夠了，我們不必在每一件事上成功。一個人可以是完美的，縱然他的工作努力沒有成果。有時候，一個僅能小有成就的人，比起那似乎大有成就的人，更具有高尚的人格。

此時，牟敦的心中正在激盪的，是一個逐漸展開的、皈依宗教的過程：舊的生命即將轉換成嶄新的另一種新生命，更具體的說，從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轉變成一個全心擁抱天主教會的人。他的轉變是經由幾個途徑產生的：第一個途徑是，心智上逐漸成長的過程，因為他努力尋覓一個信仰的體系，以滿足他本性上的好奇心。先前，范道倫教授已引導他認識了士林哲學，因此，他在偶然閱讀到艾丁·吉爾森（Étienne Gilson）的《中古世紀哲學的精神》（*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時，作者以士林哲學的角度探討天主存在的問題，才能在牟敦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牟敦走向天主的第一條途徑，可說是知識性。

牟敦皈依天主的第二條途徑，是經由感性的層面，尤其是藝術。父母親都是藝術家，自幼對周遭環境的感觸敏銳。很早，天主就藉著感官的世界，跟他說話了。牟敦幼時曾翻閱一本印有許多修道院的畫冊，深深地被它們的美麗所吸引，而「心生嚮往之情」。年長後，遊歷歐洲各地，「醉心於」羅馬城內繁多的拜占庭風格的馬賽克巨型壁畫和其他的宗教藝術。藉此，天主又把他

拉近了一些。他在自傳中寫道：「雖然我完全不知道這些藝術品所描繪的故事內容，我卻已成了一名朝聖者。在不自覺、也沒有特定意願的情況下，我遍訪羅馬城內的聖殿，以近似真正的朝聖者的熱心和切盼，尋訪教堂內的聖壇。」

最後經由他的感性，天主把他拉進來了。和普里瓦茨一家人的親密情感；在羅馬城內一座教堂內渾然不覺的禱告；外祖父即將去世時，在病床邊上他感受到異常的觸動，當即跪下來禱告；經由這些情感的流露，牟敦和天主走得更近了。

牟敦皈依宗教，是逐漸衍生出來的，然而，我當年首次閱讀他自傳的感覺，好像全都在轉瞬間發生的：牟敦發現了士林哲學；在住家附近參與了一台彌撒；再翻幾頁，哇，他受洗成了一名天主教友，就在哥大附近的基督聖體天主堂（Corpus Christi Church）。牟敦這種勇往直前式改變生命的態度，深獲我心。對當時急於逃離美國企業生活的枷鎖而陷於絕望苦惱中的我來說，等於是牟敦告訴了我，該做什麼事，而且能馬上去做。

領洗後的牟敦，生命的改變更加快速，而且具有決定性。大學畢業後，繼續在哥大英文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而且開始考慮司鐸的聖召。先研究哪一個修會適合他：道明會（Dominicans）規定修道士集體住宿，不要；本篤會不合適，因為「以後這一輩子，肯定會被『釘死』在新罕布什州（New Hampshire）某一個貴族式學校內的某一張辦公桌上」；耶穌會麼，「得去適應那些頻繁的活動和服從軍事化例規的格調，這和我的理念不合」。反諷的是，在最終成為一名隱修士之前，他還是經歷了比道明會會院更簡陋的公共宿舍；被「釘死」在固定的地方，比任何一位本篤會士的時間更長久；活動之頻繁和軍事化例規的程度，遠遠超過大部分

的耶穌會士。

聖方濟的規矩，滿合乎他的想法。正巧，他的一位朋友丹·華許（Dan Walsh）和紐約上州北部奧林鎮上聖文德學院（St. Bonaventure College, Olean, N. Y.）的方濟修會很熟悉。因此，拿到哥大碩士學位後，牟敦就到該校任教，並於西元 1939 年 11 月申請加入方濟會。然而，翌年六月，申請被拒。

傳記作家麥可·莫特（Michael Mott）在《牟敦的七座山》（*The Seven Mountains of Thomas Merton*）書中揣測他被拒絕的原因：牟敦曾是一名小孩的父親；最近才領洗皈依天主教；或許是「他本人覺得不合適」。不論原因如何，受挫的牟敦來到紐約市曼哈頓區一座由嘉布遣會（Capuchin，譯者註：聖方濟修會的一支）掌理的教堂，在告解聖事中尋求慰藉。

聽告解的神父異常苛責他。自傳中是這麼描述的：「神父可能研判我是情緒反應過度、性格不穩定、腦筋糊塗，因而開始用嚴厲的語句對我說，我肯定是不合適修道院的生活，更別提當神父了。聽得出來，他在暗示我，不要沉溺於自怨自艾的訴苦，在這裡浪費他的時間，更糟蹋了告解聖事。」淚流滿面的牟敦，走出去，離開了。

牟敦以無比的鎮定和完全的自願，接受了方濟會的這個決定，決定再回到聖文德任教。同時，自行過著宛若修道人一般的生活：在例行的教書之外，定時祈禱，度儉樸的生活。幾個月後，他想在復活節前做一個避靜，於是想到丹·華許曾推薦的一個地方——肯塔基州一個名叫革責瑪尼聖母的隱修院。

他的故事發展到這個時間點，我的脈搏也跟著加速了：我得一直提醒自己，可別跑到書頁的前頭去了！牟敦長期以來一直尋

覓的東西，似乎已經在節骨眼上了。我自己也在納悶，為什麼我有同感。

在一個深夜裡，他抵達了革責瑪尼，修道院的門房來應門。直爽的修道士劈頭就問道：「你是來這裡住嗎？」（Have you come here to stay?譯者註：「stay」也有長久留下來的意思。因此，語帶雙關。）

牟敦回顧當時的感想：「這句問話嚇了我一跳。聽起來，它好像是我自己內心的聲音。」

門房接著問話：「你是怎麼啦？為什麼不能住下來？你結婚過了，或是怎麼的？」

牟敦答道：「噢不，我現在還有一份工作。」

一進到修道院內的大廳，牟敦就清楚地意識到，就是這個地方了：「我感受到夜晚深深的沉靜、安詳和聖善，有如愛一般，更像是平安，迎向我而來。」

「我展臂迎向它，啊，這份寧靜！我已然進入一個固若金湯城堡的寧靜中。這份寧靜，迎向我而來，向我說話，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雄壯。我佇立在空氣清新、極其安靜的房間內，柔和的月光從打開的窗戶照進來，在微暖的深夜中，我清清楚楚的知道，這是誰的地方。啊，榮耀的天主之母！」

牟敦回到家了。

醞釀了幾個月之後，他下定決心來長住了。牟敦認為，修道院是「美國境內所有的推動力的中心」。它即刻且牢牢地擄獲了牟敦。

返回聖文德的牟敦展現從革責瑪尼汲取到的能量，更熱切地師法修道人的生活模式。清晨即起，四十五分鐘的晨禱後，望彌

撒，每天大量的「神修閱讀」。在這個時期，「因著天主的聖寵……」他收到一份「美好的禮物」。經由閱讀，他與聖女小德蘭相遇了，「『小花』真的是一位令人景仰的聖人。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她只不過是一羣老太太幻想出來的、靜默不語、熱心的偶像娃娃。但她不僅是一位聖人，還是位大聖人，最偉大的聖人之一。以前，有眼不識泰山，在這裡向她公開道歉。」

他又熱情洋溢地補充說明：「新發現一位聖人，是一種美好的經驗。在聖者的身上，天主被奧妙地彰顯出來；而諸聖的光環，則各異其趣。」

好像翻閱漫畫書一般，我如是地發現了多默·牟敦。

到了這個地步，該如何走下去，牟敦已經義無反顧。只是，還有一道欄杆，尚待跨越。幾個月之前，美國政府的徵兵處已經判定他的體位不合格（諸多牙齒的毛病）。然而，隨著戰火硝煙迫近，標準降低了，他又收到徵兵處的一封體檢信函。牟敦做了一個決定。依照麥可·莫特的傳記：「如果革責瑪尼不要他，他就認命了，去從軍。但是堅持一個信念：絕不殺人，而是要去服務。」牟敦聽天由命，順服天主的旨意。如果進修會是天主的意思，他就去修道院。否則，他就去從軍。牟敦放棄依自己的意願過生活，一切但聽憑上主的安排。

結局是，在朋友們一片驚訝當中，他辭去聖文德的教職，在西元 1941 年 12 月 10 日走進革責瑪尼的大門，成為一名隱修院的修道士。

自傳的結尾，詳述他進修道院後的生活——他很快就進入初學，獲准穿會衣；學習熙篤隱修院的會規；暫時宣發貧窮、守貞、服從三個誓願；寫詩；參與修道院內豐富的禮儀生活；開始探索

默觀式祈禱的境界；而在一連串的過程中，他找到了畢生渴求的平安。在自傳中，他向上主訴說：「幾個月過去了，祢未曾減少我的企盼之情，而且賜給我平安。我開始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開始明白了。」

《七重山》是一本非常好的書，閱讀完後，我也能品嚐到某些牟敦所感受到的平安。書中的點點滴滴，俱在心頭，彷彿我也回到了家。那一個深夜裡，讀完最後一頁，擱在案頭上，我心已有所屬，這就是我要走的路子——或許，不是一模一樣的路徑，不是隱修士，但非常類似了。

為我來說，牟敦所描繪的宗教生活的圖像，是一份邀請，邀請我去度一個嶄新的生命。隱修院的生活似乎是一個完美的世界——平安、寧靜，充滿了祈禱和人生的各種意義。當時，我質疑這是一個被刻意理想化的畫面（牟敦後來也多少有些承認）。然而，我心知肚明的是，既然我已打定主意逃離目前的困境，任何一條替代的道路，對我都具有吸引力。可是，我也很清楚，基於某種理由，牟敦所描述的生活，已然觸動我的心弦。

那就是所謂的，我的「召叫」。今天眾多的信友們都還認為，去當司鐸或去度修道的生活，是一種另一世界的經驗——聽到聲音或是看到異象。在我來說，「召叫」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吸引、心靈的渴望或是情感的驅動，是一種別無他想的、快樂的執著。一旦起步，沿著這條思緒走下去，一連串早幾年就應該思索的問題就會一一湧現，所有的事情都改變了。

逐一探索塵封心頭的疑問，答案赫然明朗，閱畢《七重山》後不到兩年，我走進了耶穌會的初學院。

每當感覺到困頓無助之時，我常捧讀《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書中，標題叫「慈愛」的那一章。

在我們承認並接受自己的渺小，而把自己完全地交託給天主的時候，看哪，天主離我們多麼的近！出乎人性的預料之外，祂在我們需要扶持的時候，扶持我們，幫助我們做到那看起來似乎不可能的事。現在，讓我們學習去認識祂，不是在抽象的想像中尋覓祂的「臨在」——在那樣的所謂臨在中，我們是以自己的華麗裝飾去打扮祂，而是在希望落空的境界中，甚至於近乎絕望的地步。是在超越絕望的極限之時，達到了完美的希望，因為，在跨越那個極限的邊緣時，我們發現自己，非但沒有墜落深淵，反而是遨翔自若。希望總是在即將絕望之時出現的，因為在那極端危機的剎那，在我們的軟弱中，天主的大能轉瞬間賦予它完美。因此，我們學習以最沉著的心情去期待祂的慈愛，當事情已經瀕臨最危險的地步；面臨危難之時，安靜地尋求祂；確信祂絕不會捨棄我們，縱使我們可能已遭受正義者的斥責，或是被自稱擁有祂的大愛的人們所拒絕。

接續《七重山》敘述牟敦在隱修院初期數年生活的是《約納的標記》（*The Sign of Jonas*）。這是一本更精采的著作。牟敦先前追星般的激情逐漸褪去，沉澱後的心情，更能清晰地描述修道生活的現實。書中選錄的日記，是直到晉鐸之時為止。他說，成為一位神父，是「我之所以生於此世的一個大祕密」。

多默·牟敦（現在是路易神父，Father M. Louis, OCSO）又陸

續寫了好幾本書，關於默觀祈禱的生活、非暴力的意見表達、熙篤隱修院的生活、基督宗教的要理、禪宗等，為全世界數以百萬的讀者，提供了神修上的指導。他也出版詩集。他和修道院外的世界廣泛地聯繫著，與各地的作家、社會運動人士、各宗教的領袖人物通訊往來。他是學生們的導師，也曾擔任革責瑪尼修道院初學生的導師。各界人士到革責瑪尼來拜訪，來請益。他對於現代世界的觀感影響了無數的人。曾經，他有一段情緣，是因病在醫院休養時的一名護士，終於慧劍斬情絲，依然修道。在力爭之下，他被允許不受團體生活的限制，獨居在隱修院內一個單獨的房子內，成為一名獨修型的隱修士。

他持續探索內心世界的生活，更深一層地契合於天主。

多默·牟敦一直是一個矛盾的人物，而正是他的這種矛盾吸引了我。往後退一步，再仔細端詳這個人，你能這麼評論：「是的，這是一位有不同極端個性的人，是一位既驕傲又自誇的修道士。有時候，他根本不聽人家的勸告，過分地全神貫注自我，過於惦記別人的不是。可是，他也是一個聖潔的人。他把自己奉獻給天主，奉獻給教會；他幫助了眾多的人；慷慨地貢獻他的才能、時間和祈禱；對所有遇見的人，他為他們的平安祈福。」如此有血有肉的凡人，能成為一個聖者，給了我很大的希望。尤其，在牟敦的身上，你看到他的過犯，也看到他的聖潔。我想，在天主的眼中，我們不都是這樣的嗎？



最後，還有一樁弔詭的事。多年來，多次與長上爭辯被拒後，終於在西元 1968 年，牟敦獲准暫離修道院，前往亞洲旅行訪問。

在錫蘭（Ceylon，現稱斯里蘭卡 Sri Lanka）的時候，曾去波羅那盧瓦（Polonnaruwa）地方的一座佛寺參訪。在駐足觀賞，成排或坐或立的佛像時，曾有神魂超拔的經驗。他寫道：「在凝神注目這些佛像的時候，突然間我感受到一股力量，將那習以為常、略帶疲倦的瀏覽狀態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內心的透明和清晰的境界，而且異發的明顯可見。那股力量宛若出自眾佛像的內裡。」一個虔誠的天主教修道人士，居然在佛陀的塑像前，樂享了一個神祕的經驗。

幾星期後來到曼谷，在 1968 年 12 月 10 日參加各宗教領袖的大會之後，回到旅館，沐浴時，不小心抓住了一把漏電的電風扇，不幸被電擊身亡。

就這樣，曾宣發恆常誓願，要此生此世常住肯塔基州隱修院的一個人，卻死在半個地球以外的泰國曼谷（Bangkok），被他畢生在矛盾狀態中一直尋覓的那一位接回了永遠的家鄉。



首次閱讀完《七重山》這本書後，我就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參訪革責瑪尼修道院。藉著始料未及的因緣際會，幾年前的一個夏天，終得一償宿願。

五月裡，同會的弟兄凱文（Kevin）在閒談中提到，這個暑假的實習計畫，是去俄亥俄州（Ohio）的一個避靜院，擔任五週的神修指導。聽起來不錯啊，提供依納爵的神操，給避靜者實地、具體地操作。他還提議：「你要不要參加？」

翌日，我打電話給本計畫的負責人比爾（Bill）。他答道，還有名額，而更好的消息是，另一位好朋友戴夫（Dave），也參加

了這個擔任指導神師的計畫。填妥一份申請表後，我也被錄用了。似乎是天主的安排，至少為達成我的宿願，祂助我一臂之力。

登上了往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飛機，我知道那是一個靠近肯塔基州的地方，但不知到底多近。到機場來迎接的是戴夫和瑪莎修女（Sr. Martha）。瑪莎是吳甦樂會（Ursuline）的修女，也是本計畫的負責人之一。

「我們現在的位置，哦……靠近肯塔基州？」我先發問。

瑪莎修女笑著回答：「我們現在就在肯塔基的州界內！」她指了一下路旁的標記牌：「辛辛那提與北肯塔基機場」。

在密爾福（Milford）耶穌會避靜院的日程緊湊，工作忙碌。早上的安排是《神操》的操作、避靜主題道理和神修指導，由凱文、戴夫、我以及瑪莎和比爾，分別主持或搭配。午間，是我們這些主辦者的小組會議。接著，簡便而匆促的午餐，是典型乏善可陳的避靜院伙食。下午是三到四小時的神修指導時間。五點鐘彌撒，其間的講道，由指導神師輪流擔任。

晚餐後是自由時間。凱文、戴夫和我三個人，則愉快地外出欣賞電影，或租錄影帶回來觀賞。盤桓在全美著名的葛萊特（Graeter's）店內，大快朵頤美味的冰淇淋，更是賞心樂事。那一年的夏天，我們是最佳搭擋三人組——個性開朗、善於祈禱、努力工作、極為風趣。

相對於夜晚的悠閒，白天則是如陀螺般四處打轉的一場動亂。有一天早晨，比爾以一副嚴肅的口吻提醒道，如果要成為夠格的好神師，我們必須是默觀的狀態。當天中午，吞嚥完午餐後，我們三人快步衝向避靜的分配任務。就在走道上奔馳的當兒，凱文自嘲了一番：「我們就是這樣默觀的喲！」

翌日，我半開玩笑地對比爾說，我期盼早日返回紐約的工作崗位，比這裡輕鬆多了。

整個大避靜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會有一整天的「休息日」，是當年聖依納爵建構這個《神操》時，刻意放進去的，因為一連三十天的靜默祈禱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甚至於最執著的神操踐行者都會受不了。嗯，真不錯，意思就是我們這些擔任指導神師的實習生，也放假一天。於是，我們三人決定去一趟革責瑪尼。敲定要過夜後，我負責連繫。

隱修院專職訪客接待的負責人說，週末期間，僅住一晚是不接受的，因為他們主辦為期三天的週末避靜，如果答應我們的要求，就會減掉三個名額。他說，要麼你們乾脆也要求三天，事情就簡單了。

戴夫的發言，也說出凱文和我的心聲，「噢，那是怎麼一回事？另一個避靜？我們能否交談？」

大避靜中的一趟放假之旅，愈發顯得是另一個避靜。最後，我們三人還是決定先去了再說，無論在革責瑪尼等著我們的是另一個避靜，或是休閒旅行——一切全交託給天主了。

我很喜歡牟敦所寫的一則禱文，出自他《寧靜中的思索》（*Thoughts in Solitude*）書中，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用它來祈禱，茲抄錄如下：

我主、我的天主，我不知道，我正在往哪裡走。前面的路子我看不見，也不確知它會通往何處。我也不是真正的認識我自己。我自認是在跟隨祢的旨意，但那並不能保證，我事實上是真的在跟隨祢。可是我相信，我

一心一意要悅樂祢的渴望，事實上是真的悅樂了祢。我希望在我現在做的事情上，我確實有這樣的渴望。而在那渴望之外的事，我絕不會去做。我知道，這樣祢必定會引領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縱使我對此毫無所知。因此，我要一直信賴祢，縱然我似乎迷失了方向，陷入了死亡的陰影中。我將不會害怕，因為祢永遠與我同在，祢絕不會離開我而讓我獨自面對我的危難。

一週後，我們三人塞進比爾的老爺車，恭敬地唸了一遍〈旅者之佑聖母禱文〉，上路了（看哪，避靜開始後，我們一天比一天虔誠）。穿過路易斯維爾市區（Louisville），駛進肯塔基州廣闊的鄉村草原，數小時後，即蜿蜒進入此起彼落、一堆饅頭狀的丘陵地區。

過了巴茲鎮（Bardstown）數英里，就能遠遠地看見革責瑪尼聖母修道院高聳的尖塔，在廣闊青翠的大草原襯托下，宛若在綠色海洋中航行的船桅。低矮灰色的圍牆之內，就是修道院的各個建築物，圍牆之外，則是一望無際的鬱鬱蔥蔥，延伸消失在地平線之外。

一出車門，立即感受到四面八方湧來的暑氣逼人。想起《約納的標記》書中，牟敦在1947年8月8日的日記談到這個夏季的修道院景況：「熱啊，黏答答的溽暑，刺痛皮膚的熱，脖子和肩膀上，紅斑處處。只是比理髮時圍上的那悶不透氣的布要好受一點。」

我們將行李搬進客房樓。大門走道的上方巨石的橫梁上，以大寫字母鏤刻著一個斗大的字「平安」（Pax）。走過前院，來到

古老的迴廊式傳統修道院建築的入口。走道上也有一個遵循古老傳統、醒目鏤刻的大字：「唯獨上主」（God Alone）。進到訪客接待的大廳還算涼快，似乎沒有「刺膚之熱」之虞。在櫃台上接待我們的是一位修士，穿著熙篤修會古老傳統、黑白相間的會服。在我眼裡，這身古樸的修道人制服，有著類似聖人遺骸（relic）的神聖意義。每當見到它，一種喜悅感就充滿了我，彷彿自己貼近了這種默觀祈禱的生活，而且和多默·牟敦的真實生命更緊密的連繫住了。

修士取出住宿登記表，「讓我看看，馬丁神父你住這間。」他手指著修院頂樓的一個房間，把鑰匙交給我。

「戴神父，你也在這個樓。」戴夫跟我使了一個臉色，他還沒晉鐸哩，似乎不好意思更正。

「凱文神父啊，不好意思，修道院本部樓沒有空房間了，只好把你放在客房樓，那邊的房間有空調。」

戴夫和我同時轉頭互望，那就是說，我們的房間沒有冷氣。修士又接著說，「客房樓的設備滿好的，房間內有個人浴室。」

「晚禱是五點半，接著六點鐘晚餐。其他的時間表，張貼在小教堂的門外。你們要參加彌撒共祭嗎？」此時，凱文和戴夫乘機澄清，表明只有我是已晉鐸的神父。當然，明早我樂於共祭。

「彌撒是早晨六點十五分，今晚在餐廳填妥一張卡片，明早彌撒前，你要用的白衣（Alb）和披肩領巾（Stole）就會準備好。」我們三人約好，放妥行李後到訪客樓碰面。

和一般避靜院的住房一樣，我這個斯巴達式的房間內，有一張床和一個木桌，例外地，優待一個洗手檯。房門一開熱氣迎面而來，頭頂上的吊扇，似乎已經操勞過度，像飛機的螺旋槳似地

轉著。

下到訪客樓，凱文要跟我換房間：「我想了一下，你是這次的主角，應該由你來住這個冷氣房。」

這番話令我感動，也聯想到許多對我慷慨付出的朋友們，我要時時心存感謝，並且立刻想到：「嗯……如果換牟敦，他會怎麼做？」我就婉謝了他的好意。而且，做一番刻苦，可能是天主的意思哩。

我們兩人一來一往又推託了半天。守在一旁的戴夫看不下去了：「你們兩人都這麼想當聖人，那就讓給我好了。」最後，還是維持不變（數週後，凱文坦言道，雖說戴夫和我熱得睡不著，他卻是冷得睡不著，因為他不會調那台空調機）。

隨後，我們去小教堂參觀。那是一個窄長形的建築，內部的設計簡單，屋頂極高。原始的小教堂設計是華麗的，為符合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精神，院方聘請建築師馬塞·鮑爾（Marcel Breuer）予以簡化。鮑爾拿掉原先裝飾的圓柱和飛簷，露出建材的紅磚結構，塗上一層白漆，搭配在屋頂天花板和祭台後的牆面上斜叉交錯的深色木條。

進入小教堂後，是一小塊的訪客專用區，附有坐椅，由一道低矮的金屬門隔開。門的另一邊，是隱修士們的專屬區。沿著兩邊的牆面，有幾排長條木椅，隔著中間走道相望。碎石地板的盡頭，是一個儉樸的原木祭台，一圈線條簡單的金屬坐椅，圍繞著它。堂內出奇的涼快，還帶著馨香的氣味，彷彿木匠剛工作過。沿著中間的走道，我輕步向前，佇立在祭台前，腦海裡浮現一幅圖像——多默·牟敦就在這個位置上，雙膝跪下，在修道院院長的面前，宣發誓願；還有，後來在被祝聖為司鐸的禮儀上，他全

身匍匐在地，準備迎接他的新身分。

從小堂出來，我們漫步到離訪客樓不遠的墓園。一排又一排，塗上白漆的鐵製十字架，插入一片青草地上。幾分鐘就到達此行目的地——十字架前的一塊銅牌，刻畫著兩行字：「路易·牟敦神父，西元 1968 年 12 月 10 日去世」。

佇立在烈日下，我在自忖，周遭的眾靈是否仍在疑惑，這位牟敦充滿矛盾的一生，和他離奇的死亡方式。（很巧的是，牟敦自傳《七重山》結尾的句子是：「你將成為上主的弟兄，學著去認識浴火者的基督。」）我同時想到我的耶穌會士聖召，該是從此地的革責瑪尼肇端的。

晚禱即將開始，我們趕赴小教堂。約二十位訪客，和我們一樣端坐著。鐘聲響起，不久，修道士們從兩邊的側門，靜默地魚貫而入，手指沾聖水，緩緩地劃一個十字。目睹眾多身穿同一會服的隱修士，再念及多少個寒暑的日子裡，牟敦就是其中的一員，內心油然而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動。藉由他的著作，已然熟悉這個地方，卻仍不敢相信，終有親履斯地的這一天。

他們的祈禱，又是一個驚奇。原先我期待的是某種類似 CD 片上熟悉的國瑞調（Gregorian Chant），或許還有深沉的管風琴伴奏。我聽到的是，六十六個男人，其中多為長者，以平鋪式的曲調，吟唱聖詠。（事後，瑪莎修女開玩笑地說：「本篤會士的歌聲，要比這些隱修士好聽多了。」）話雖如此，他們的吟詠還是非常動人。在我出生之前的好久好久以前，這些修道士就是用這種方式，吟詠祈禱，而在我以後的好久好久，他們將還是這樣地吟詠祈禱。

小教堂門外的院子裡，張貼著週六的各次禱告時間表：

晨曦禱 (Vigils) 3: 15 a. m.

黎明禱 (Lauds) 5: 45 a. m.

晨 禱 (Terce) 7: 30 a. m.

午 禱 (Sext) 12: 15 p. m.

午後禱 (None) 2: 15 p. m.

晚 禱 (Vespers) 5: 30 p. m.

睡前禱 (Compline) 7: 30 p. m.

彌 撒 (Mass) 6: 15 a. m.

晚禱結束，接著晚餐。參加避靜者的用餐處有兩個地方：在大餐廳用餐，須守靜默；小餐廳可以細聲交談。我們三位神操踐行者選擇守靜默。習慣了耶穌會避靜院馬馬虎虎的伙食，修道院的料理，真是美味可口——新鮮的蔬菜、美味的麵包、豐盛的魚料理（週五守小齋，不吃肉類）。起司是我吃過最好的：剛從農莊上新鮮出爐的。牟敦的日記上，隱瞞了革責瑪尼的「起司製造業」，我首次對他有意見。

晚餐後有一個全體避靜者的聚會。一位年長的修道士，慷慨激昂的語調，朗讀耶穌會士兼詩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詩句，聽在我的耳裡，既驚奇又窩心。接著，他還很感性地闡釋一番，並介紹了霍普金斯的生平。

本日的最後一則禱告——睡前禱，亦稱「結束禱」（Compline 即是因「Completes」而得名）。禮儀結束前，眾人（修道士與避靜者）列隊向前，接受院長的夜晚平安祝福。出到小教堂外，我們三人相互揶揄，看誰能參加明天的晨曦禱，是摸黑的三點十五分耶（結果，只有戴夫到場，因為熱得睡不著）。

回到房間，沖了一個涼，又做了一個禱告之後，我決定再回到小教堂。雙眼逐漸調適周遭的漆黑，堂內似乎空無一人，寂靜無比。跪在隔開訪客區的金屬門前面，我還要自己做一個睡前禱。雖然累了一整天，思緒還是不自覺浮現在生命的來時路上。我是怎麼被扯進修道的生涯？回首往事，離開那個不快樂的生活軌道，進入一個喜悅的世界，似乎有一股力量在牽引著我。天主在我生命中的所作所為，真是太奇妙了，祂導引我去的地方，是我先前無法預見的。我想著此刻能在這裡，是多麼的快樂；這個暑假，我從事的是我所喜愛的工作；這麼多的好弟兄，他們激勵我誠實、為我祈禱、給我歡笑。能成為一名耶穌會士，我充滿了感激。滿溢的幸福，哪是我的心所承受得了的。在堂內，我一度淚盈滿眶，心存感激，卻無從完滿地表達。

翌日清晨的黎明禱後，我走進寬敞的更衣所，一位修士遞給我白袍和一條金色的絲質領帶。彌撒中，偶爾分心，瞄著牟敦被祝聖司鐸的那個位置，那是我從書中的老舊照片上，早已熟悉的地方。

週六的早餐，很棒。除了我吃過最好的起司之外，還有我吃過最好的燕麥片。吃過早餐，我們三人越過馬路，在田野間散步。我告訴他們，在這裡我好快樂啊。凱文笑著說：「那我們要把你留在這裡嗎？」

那一天，我們違犯了避靜的規矩，開車到巴滋鎮上瀏覽了一番。十九世紀初期，大批的東歐天主教徒難民來到這附近。因此，在這個肯塔基州的中部地區，許多的小鎮，取名自天主教的聖人——聖瑪利亞、聖方濟、羅雷托（Loretto）。耶穌會士來到巴滋鎮，在鎮中心的地方，辦了一所聖若瑟學院（St. Joseph College）。

這批耶穌會士，後來又遷到紐約，創辦了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

晚禱前，我們及時趕回。晚餐時，我們決定去「可交談」的餐廳。可是，心中還是七上八下的，生怕壞了耶穌會的形象。「但誰會知道呢？」還是自我安慰了一番。

等坐定了，才發現院內兩位修士在那兒招待訪客，真是後悔莫及。凱文輕聲地自嘲一番：「看吧，閒話立刻就會傳開了。整個修道院的修士都會知道，耶穌會士啊，連兩天的靜默都守不住的。」晚餐後的全體聚會上，主題是「靜默的美好禮物」，報應還真快哩。

隨著隱修院的作息三天之後，對這種修道的生活，我開始覺得不合適我。我們好像經常在小教堂內盤桓（當然，這是隱修的重點）。雖然，幾次避靜也都類似這樣，但我還是欣賞「行動」的價值。

翌日的黎明禱結束後，我們背著行李，來到訪客樓。臨別前，我又想起還有一樁心願未了，於是匆匆趕赴牟敦的墳前。

俯視腳下青翠的草地，憶及牟敦與眾不同、複雜難解、左右矛盾的一生。惠特曼詩人在〈自我之歌〉將近末尾時的那兩行詩句，是我所喜愛的，頗能表達我此刻的心聲：

我捨身這坏泥土，且將再起，從摯愛的青草裡。

有朝重返時，在你長靴踏腳之處，尋覓我。

千言萬語，我想向牟敦訴說：促成我的司鐸聖召，除耶穌之外，難做第二人想；但在積極行動的世界裡，他的著作仍繫絆著

我，教我嚮往隱居修道的自若；他矛盾且多樣的生命見證，幫助我醒悟，儘管生命中似乎有些狂放，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勉力成聖；他告訴我，什麼是「真實的自我」，是在天主面前的我，祂所創造的我；縱然此生瑕疵不掩，他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可是，這些說辭，仍未能涵括我全部的感想。只好，用更簡單的一句：「謝啦！」相信，他會明白我的心意，一切盡在不言中。隨即轉身，奔赴久候的友人。

5

愈顯主榮

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他醉心於世俗的虛榮，直到二十六歲。

——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自述小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Loyola*)

我曾投入企業工作，忙忙碌碌了六年，不分日夜，沒有週末。進入波士頓的耶穌會初學院 (Jesuit Novitiate In Boston) 後，生活規律，步調慢了下來，是一個相當可喜的改變。

但這並不表示，作為一個初學生，日程表的活動不充實，或是沒有積極的行動。初學第一年，每週要從事十五個小時的「使徒工作」。我選擇在一所天主教醫院，照顧重症病患。其他的工作還有：擔任會院（會院共有十五位耶穌會士）的廚師，每週一次；每天要望彌撒（當然包含主日彌撒）；個人祈禱，每天至少一小時（不含每天早晨 7:00 的團體祈禱）；分擔會院內的雜務（我的任務是打掃、清潔廚房）；與指導神師面談，每週一次；週日晚間的「信仰分享」聚會（與其他初學生分享個人的神修心

得)；週六上午，全院大掃除，掃廁所是我常被分配到的任務。

該做的事，不算太少，但比起先前在奇異公司的工作，可說是合乎理性，也更合乎人性。為此，我常感謝天主。

每天早上八點鐘開始，一個小時的學習研討會，由初學導師和其助理主持，介紹耶穌會的神修和歷史。第一年培訓的重點在於：認識會祖聖依納爵、初期的耶穌會士們、聖依納爵的《神操》，和耶穌會士的其他靈修（立基於耶穌會的憲章、管理體系以及處事程序等）。

依照這個階段性培訓目標，初學導師要求我們閱讀聖依納爵的《自述小傳》，和歷史學家瑪麗·普塞爾（Mary Purcell）的依納爵傳記《第一個耶穌會士》（*The First Jesuit*），也就不足為奇了。

讀完這兩本書後，我自認，對我們的會祖已經相當了解了。但是令我驚訝的是，還要再讀一本傳記：《聖依納爵：朝聖者的歲月》（*St. Ignatius Loyola: The Pilgrim Years*, by James Brodrick, SJ）。

接下來，還有一本書要讀：《羅耀拉的依納爵：耶穌會的創始人》（*Ignatius of Loyola: Founder of the Jesuits*, by Cándido de Dalmasés SJ）。

最後，唯恐我們遺漏些什麼似地，又補充一本書：《主內諸友》（*Friends in the Lord*, by Javier Osuna, SJ），重點放在聖依納爵和初期的諸位耶穌會士。

此外，初學院強力推薦（如果，有時間的話）閱讀下列的書：

《依納爵與耶穌會的創立》（*Ignatius of Loyol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by André Ravier, SJ）；《耶穌會士：他們的神修理論與實踐》（*The Jesuits: 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

by Joseph de Guibert, SJ)；《依納爵書信選集》(*Letters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by William J. Young, SJ)。

最後的這本英譯書信選集，是一本四百五十頁的巨著。不過，幸虧只選了會祖全部 6,813 封書信的一小部分而已。書的封面介紹文字，號稱依納爵是「有史以來，最勤於寫作書信者之一」。以信的數量來說，是伊拉姆斯（Erasmus，譯者註：略早於依納爵的大學者）或馬丁·路德（Luther）的現有書信集的兩倍，「幾乎」（略帶失望的口氣）和喀爾文（John Calvin）的書信數量一樣。

第一年的初學結束時，我能夠隨心所欲、朗朗上口地背上一段聖依納爵的生平事蹟，那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西元 1491 年依尼高（Iñigo of Loyola），出生於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區（Basque）。青少年時，即出入本地貴族的宮廷，擔任侍從，後來，以「勇敢的戰士」而著稱。在簡短的口述自傳中，他形容自己是，「一個醉心於世俗虛榮的人」，尤其看重自己的外表。似乎曾和一位貴婦人有過交往，至少，他曾炫耀這種愛慕之情。說他是一位公子哥兒，包準沒錯。甚至於謠傳他有過私生子（這一點，事出有因，但迄未查出實證）。在天主教會正式冊封的聖人中，他可能是唯一有正式違警紀錄的聖人——夜間，在公共場所爭吵，意圖傷害他人。

西元 1521 年，在西班牙潘普洛納（Pamplona）的一次戰役中，一顆炮彈擊中了依尼高戰士的腿。這場悲劇，對於伊尼高，是一樁關鍵性的事件——一個新生命，從此處開始。世界上許多描繪他生平事蹟的壁畫，都有這幅場景。譬如，紐約市的聖依納爵天

主堂內，祭台的上方，就有一大幅色彩鮮豔的馬賽克鑲嵌的壁畫，描繪潘普洛納戰役——在中古世紀城堡的護牆城垛上，身穿全副灰色盔甲，內罩天藍色的緊身戰袍，受傷的依尼高，無力地依偎在同袍的臂環中。戰事仍激烈地進行著，敵軍正在攀登搖晃的攻城木梯，依尼高平靜地舉目望天，似乎準備迎接天主給他的新未來。

戰事過後，他被送往長兄的家中休養，亦即在羅耀拉（Loyola）地方的家族古老城堡。斷裂的腿骨，手術後癒合狀況不是很好，「醉心世俗虛榮」的依尼高，非常在意畸形的腿骨，因為突出在緊身褲上，很不美觀。因此，堅持再作一系列的外科整骨手術。劇痛難當，可想而知，但是，他卻令人驚訝地忍受了下來。然而，還是沒能完全復原，終其一生，他走路時依然微跛。

既然躺在床上不能動，依尼高要求家人找幾本「時髦的、風花雪月的騎士英雄小說」來排遣時光。然而，全家上下到處找遍，僅有兩本書：一本是《基督行實》，另一本是通俗版本的諸聖傳記。他「左一遍右一遍的看，對其中所敘述的，感覺到一種吸引力」，連自己都嚇了一跳。在閱覽諸聖的行傳時，不時停下來思考，「如果聖方濟和聖道明能做如此如此的事，或許我也能做些大事」。逐漸地，他又發現到，在腦海想像為天主做了許多大事之後，他的心神感覺到很平安——亦即他後來所謂的「神慰」。在另外一種狀況下，當腦中幻想戰士的生涯，或取悅某貴婦人，他當時感覺很快樂，但事後卻又感覺「枯燥乏味」。

慢慢地，他領悟到，這種欣慰與乾枯的對比，是天主引領他跟隨服務之路的一個方法。他覺察出，平安的感覺，就是天主在拉拔他，再靠近一點。這種體驗，奠定了他日後的神修生活中，對於「分辨」的領悟，那是在個人日常生活中，奮力尋求天主旨

意的一個方法，更是依納爵神操的關鍵概念。

身體康復後，依尼高決定要成為一個朝聖者（A Pilgrim，譯者註：這種行動在中世紀的信仰生活中，深具其意義）。要遠赴巴勒斯坦聖地，看看在那兒能為天主做些什麼服務。他先到西班牙北部蒙賽辣（Montserrat）一所著名的修道院朝聖。在那裡他辦告解，懺悔過錯；卸下騎士的盔甲裝備，換上簡陋粗紡的朝聖者罩袍。離開蒙賽辣，來到附近的一個小鎮茫萊撒（Manresa）。在那裡，以窮苦朝聖者的生活模式——經常祈禱、守齋，行乞求哀矜以度日——住了一段時間。

神修生活中，祈禱日增，卻也歷經情緒上的起伏震盪——低潮時，沮喪到幾乎自殺，終有與主契合的神祕感受。最終，是祈禱讓他確定了天主的召叫。在茫萊撒山洞內數月的苦修，祈禱功力日增。於是，踏上往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朝聖之旅。

在聖地和沿途上，一大串的不順遂，他領悟到，要想在教會中從事一番有意義的事業，他還須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也許還要成為一名司鐸才行。在堅定的求學心切下，他先到西班牙的大學城亞卡拉（Alcalá）、沙拉曼卡（Salamanca），最後，又去了巴黎。由於不會拉丁文，三十歲的依尼高，和眾男童同坐一室，學習拉丁文。

他一生中的這段事蹟，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且非常感動。想像這樣的場景——一個中年男子，坐在窄小的課桌椅上，彎下腰，讀著書。一位曾經炫耀眾人、討好貴婦，頗為自傲的宮廷貴族，卻不得不謙遜地承認，他並不比一個小學童懂得多。

在巴黎的求學期間，依尼高刻苦清貧的穿著，行乞求哀矜度日，幫助窮人，幫助同學們做祈禱，吸引了不少注意的目光。依

納爵式的精神操練——引導人們鍛鍊祈禱、修養本性、效法耶穌，以便更親近天主，亦即後世通稱《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的一本操作手冊，就是在此時最後定稿的。伊尼高帶領新近與他同住的方濟·薩威，做了這個神操。這位室友就是後來著名的外方傳教士，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此時，依尼高也改用（原因，迄今未明）目前大家所熟悉的名字——依納爵。

一個以依納爵為核心人物，緊密團結的「六人小團體」，逐漸成形。他們決定，共同協力為主效命。

至於要做什麼呢？起先，他們決定依循當時許多信友的前例——到耶路撒冷聖地去。如果，因環境限制，這條路子走不通，那麼，他們將去羅馬，尋求教宗的指示，因為教宗最了解普世教會的狀況，會給他們這個小團體，分辨出一條道路來。後來，這批人組成了一個團體，取名為「耶穌的夥伴」（The company of Jesus，拉丁文 *Societas Jesu*），其宗旨為幫助眾人的靈魂。

最初，這個小團體未被正式的接納。有些教會的高層人士質疑，為何不依循傳統形態的修會組織，強調祈禱和苦修，在固定的迴廊式修道院內。但是，依納爵的這批人（批評者嘲弄他們為「Jesuits」——後來，耶穌會士即以此自稱）是要「在這個世界中」工作。人脈廣又精明幹練的依納爵，終能說服教會內部有力人士的支持。

經教宗正式批准，一個以羅馬城為總部的修會——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於焉成立。依納爵開始著手會憲的寫作，以及會務工作的策劃。從這一切的努力中，可以看得出來，依納爵是一位具有雄心壯志，而且意志堅定的人。同時，他又能放開自己，去從事天主的旨意。每當教會高層有人質疑這個新修會時，他毫

不猶豫地奮起抗爭。可是，他常說，要是教宗本人決定解散耶穌會，那麼，只要給他十五分鐘的時間，來祈禱以安撫心情，然後一定遵命照辦。

在我的初學時，聖依納爵所展現出來的，就是耶穌會士的模範生——腦筋靈光、經常祈禱、隨時待命，為天主的旨意而服務。他有做一番大事的強大企圖心——為能彰顯天主更大的榮耀（拉丁文：ad majorem Dei gloriam；英文：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中譯文：愈顯主榮）。耶穌會傳統的「magis」（拉丁文）這個用語，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追求卓越」，為了天主，做得最好、最高程度和最多。常有人說，有依納爵這樣的人，真是天主教會的一大福氣。因為，依納爵把他世俗的野心，轉化成為教會打拚的野心。宮廷貴族的魅力、戰士的堅忍執著、忠誠不渝的本性，集於一身，造就了耶穌會第一任總長，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記得，在初學時期我曾異想天開，這樣的人要是放在企業界裡，其成就可不止於這些而已）。



無可否認，依納爵一生的事蹟，震撼而且啟迪人心，可是，他不像聖女小德蘭或是聖方濟那般地令人可親可近。人們談到他時，常用的形容詞是「聰明能幹、嚴肅、刻苦修行、神祕的」等。這樣的聖人，令人肅然起敬，但總覺得，和他之間有點距離。

會士們當然敬愛會祖，但自認能和「依納爵神父」把臂言歡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在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教書的一位年長的會士，有一次和我聊到「末日審判時，誰能進天堂」的話題時，說道：「耶穌審判的時候，我大概沒什麼問題，可是，

我滿擔心聖依納爵！」

說真的，他不像聖方濟那般有令人愉悅的瘋顛行徑（雖然，為逗樂一位鬱悶的弟兄，他曾即興地跳了一段家鄉的巴斯克舞蹈），或是傻兮兮的可愛表現（雖然，在徹悟後的一次旅途中，他曾詢問自己騎的那匹驢子，要走眼前的哪一條路，才能追趕上先前曾出言侮辱了聖母瑪利亞的那一個回教徒）。他的用字遣辭，不算流暢優雅，沒有好作家的稟賦，比不上與他同時代的聖女大德蘭或是聖本篤，這也是實話。

他的《自述小傳》，是他答詢的口述記錄，某些坦陳奧祕經驗的情節，是相當地觸動人心，但某些段落，則顯得枯燥。甚至於，他那流傳後世的大作《神操》，也不是情感豐富地反思天主的大愛，而是一本供避靜指導神師使用的操作手冊——一整套清楚而具體可行的指令——適宜按部就班地實際操作，僅拿來閱讀，則不甚有趣。1930年代末期，紐約市格林威治村內某一公寓中，年輕的多默·牟敦曾盤腿坐在地板上，照本「操做」了整套的《神操》。依照牟敦自傳中的描述，他本人的經驗感想是多面向的，類似於以精神分析的治療法去自我調整的經驗。

但是，他全神貫注、嘔心瀝血的兩大著作——《神操》和耶穌會的《會憲》（*Constitutions*）發揮了成效，而且已經運作超過四百五十年。依納爵是個講究實際的人，在分辨出天主對他的旨意後，他就下定決心去做。他改變自己的生命；離棄軍旅生涯；訪求受教育的機會；集結志同道合的友人；把自己交託給天主，聽從教宗的指示。他組織、領導、鼓舞那些他口中所說的「最微不足道」耶穌的夥伴們，為他們寫出作為修會組織和運作的會憲、創辦學校、派遣他們外出傳教。

乍看之下，似乎是狂熱的行動，其核心卻是與天主契合的關係，而依納爵本人很難用文字把它表達出來。在他私人日記中，有關每天舉行彌撒的段落旁邊的空白處，畫了許多微小的記號，依照學者們的研究，這些記號代表著，他在做彌撒時，被愛主之情所感動而流淚哭泣的次數和狀況。在生活中的每一個場合，依納爵都能找到天主：在窮人中間、在祈禱中、在同會的弟兄中、在他的工作中；最令人感動的場景是，羅馬總會院的一個陽台，依納爵喜愛在此仰頭靜觀夜空的繁星，經常因讚嘆和愛慕天主而流淚。天主臨在於他生命時的這些情感自然流露，和「冷酷聖人」的刻板印象大相逕庭。

依納爵熱愛天主，勉力成聖的典範，和其他的聖人大不相同。他非著名的大學者，如同奧斯定或聖道茂；也非伯鐸或保祿那樣的殉道者；更不似大德蘭或本篤那般偉大的作家；也不像方濟或小德蘭那般，有可親可愛的個性。但是，他既熱愛天主，又摯愛這個人世間，而且，兩者均表現得可圈可點。



經驗豐富的優秀神師，會指導人們去分辨神恩的所在——亦即何者為天主在你當下生命中的作工，而何者乃是相反祂旨意的引誘。在《自述小傳》中，依納爵描述，他首度了解天主如何在他內心作工的景況——藉著他固有的情感和欲念，輕巧地牽引他靠近祂。這個具有關鍵性的內省，奠定了《神操》的基礎。

當時，遭炮彈重創的依納爵，躺在病床上，尚未決志向主。《自述小傳》的成書，是他向耶穌會的弟兄鞏路易神父（Fr. Luis Gonçalves da Câmara, SJ）口述，集結而成。在口述中，他常自稱

為「他」或「朝聖者」。

在閱讀吾主耶穌的生平和諸聖的行傳時，他不時停下來思索，捫心自問，「假如，我像聖方濟或聖道明那樣做，情形當會如何？」他開始設想許多他認為是好的事情，而且，常設想那既困難又繁重的。然而，在他的腦海想像中，那些事情似乎不怎麼困難。他的每一個思索的念頭，都向他說道，「聖道明做了這個事，我也要；聖方濟做了那個事，我也要做。」這些思緒，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可是，別的事情一打岔，世俗的思想……又回到心頭上了，也盤桓了好一段時間。究竟要去完成嚮往世俗的願望，或是，要去實現腦海中所浮現的那些天主的工作？這兩種極端如何取捨，一直飄轉在他的心頭上。他總是沉思於，浮現在他眼前的那一種，直到心中產生厭煩，才將它推開，轉往別的事情上。

然而，這兩種思緒是有其差別的。在思索俗世的事物時，他樂在其中，而當此思緒疲倦後，把它推到一旁，卻頓覺枯燥乏味且不滿意。可是，當他思索著去耶路撒冷聖地朝聖，赤足步行，只以野生植物充飢，歷經聖人們所遭遇的各式苦難時，心中卻充滿著安慰。甚至於，把這種思緒放置一旁時，他仍感到滿意和快樂。不過，在那時，他並沒有留意到這其間的差異，也未曾刻意地去查考。直到某一個時刻，他的眼睛被張開了一點，他開始訝異於這兩種情況的差異，也開始省思著：為什麼某種思索的經驗，使他煩悶，而另一種卻使他感

到快樂？答案一點一滴地逐漸明朗化了。兩者之所以引發極端的心情差異，乃因其一是出於仇敵，而另一則來自天主。

我和依納爵之間的互動，不是那種個人式的親切關係。就算入會已多年，沐浴在會祖的春風化雨之中，但卻止於遠望瞻仰他，而他也未能和凡夫俗子們打成一片。他常要求更多、更好，甚至於稍嫌嚴厲地鞭策。然而，隨著入會年資的增進，對他的感激之情愈深，終於成為我所喜愛的聖人之一。他那溫文的關懷之意，像似一個自奉甚儉、話又不多的叔父，暗地裡，早已為你預備一筆未來教育的經費。本質上我感激的是，他那種靈修的操練，以及面向這個世界和面向天主的態度。而他那著名的靈修，改變了我的生命，架構了我，如何去看待今日的現實世界。

《神操》，是依納爵歷經多年的實踐檢驗，才最後定稿的：個人的祈禱和輔導他人去實踐祈禱的經驗累積。而依納爵式的神修生活，即淵源於此，更是想要了解整個耶穌會靈修的起點。這是一份送給整個天主教會的大禮物——它使得無數的基督徒，不僅限於耶穌會士，經驗到與天主契合的深度親密關係。可以說，它改變了人的生命。

基本上，《神操》是供避靜指導神師使用的操作手冊，是一個為期四週的架構。在這四個星期中，避靜者專注於天主的大愛；藉著祈禱，以定志跟著基督；默觀耶穌一生的行誼；經驗天主在一切事情上的創造動力。其目的在於，幫助避靜者更親密地認識耶穌；經驗到個人愈來愈多的自由；了解如何善用天主的寵佑，去定志行事。

雖說分為四「週」，但實際操作時，有的一「週」不只七天。因此，耶穌會士常把這個做《神操》的避靜，稱為「三十天的避靜」，或是「大避靜」。通常，耶穌會士一生要做兩次這樣的大避靜——一次在初學期間，另一次在最後的會士陶成階段——第三年培育（tertianship）結束時。



在幾條基本守則的「凡例」之後，《神操》手冊，以「原則與基礎」的導論式說明，開始大避靜的第一週。它開宗明義地宣告：「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與事奉我們的主、天主，藉此以拯救自己的靈魂。」（譯者註：舊式《要理問答》手冊的第一條：「你為什麼生在世上？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為達此目的，吾人當善用世上的事物，而且，不受一切妨礙吾人達此目的諸事物的束縛。以依納爵的術語來說——保持平心（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對待一切受造之物。

依納爵選用的這個字「保持平心」（indifference），它的概念常遭受一般人的誤解。它並非要我們摒棄世物（或人），視之為毫無益處，而是，不要受那些妨礙我們愛天主的人、事、物或生活狀態的羈絆。這種心神上的操練，邀請我去達到個人極致的自由。依納爵這樣的闡釋：「在我們自己這方面，不要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要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要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僅只欲求和選擇，那些能導引我們達成我們受造目的之事和物。」

曾有一位年輕婦人，在聽完這段話後，對我說：「難道不該重視健康，避免疾病嗎？莫非腦筋有問題。」

當然，沒有人會喜歡生病的。但是，按照依納爵的世界觀，不應該如此強烈地去企求健康，以至於對生病的恐懼，妨礙了吾人去跟隨天主。舉個例來解釋，「噢，我不要去醫院探望我的朋友，因為，這樣恐怕我自己會生病。」在此情況下，你就沒有持平心：「健康」變成了某種的「神」，阻礙了你去行善。目標不在於為了要生病的理由，去選擇生病，而在於認知那至高的善，不是你的健康，並在此種自由的心靈狀態下，去有所行動。為我們來說，這種完全的自由，乃是一輩子要努力的目標。

保持平心的這種神修素養，我也一直努力奉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每當警覺到，自己過分地沉陷在某事物時——譬如，講究身體的舒適、企求世俗上的成就、在意於博得朋友的喜愛等，我就提醒自己，要保持平心的態度。

就拿我自身的一個經驗來闡釋吧。我在肯亞從事難民的使徒工作期滿後，依照一般的程序，接著就要去讀神學。可是，我的長上要我再等一年，因為，他認為我還未準備好。

我簡直要瘋了。同期的其他會士弟兄，都按照預定的時程，去讀神學了，唯獨我，被告知再等一年。愈想我就愈在意自己的聲譽，也更猜疑，莫非事有蹊蹺？別人會怎麼想這件事？我是一個失敗者、不是一個好會士。我對長上氣極了，也讓他知道了。

我向在肯亞的神師，坦陳這種不滿的情緒。他安慰我說，不但要忍耐，而且要為此祈禱，以獲得「持平心的恩寵」。他說：「你要求事情都要按照計畫進行，難道你不能保持平心去面對它？事情外表所呈現的，和事實上對你來說是最好的，這兩者，你在意哪一個？或許，天主的時程表，要比你手上的時程表更好些？」

他提醒我，保持平心，這讓我安度了一場雖短暫、但極其強

烈的心靈風暴。事後證明，等待的這一年，我在《美國》雜誌社（*America magazine*）的工作，是我一生當中極為精采、寶貴的時期——我從而滋生作家生涯的夢想，而且，為未來的神學研讀做了更好的準備。

幾年後，有機會跟我的長上回顧當年的這樁事件：「你知道嗎，我終於明白，我真的是必須多等待一年。你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長上微笑以答：「當時我就知道，我沒錯！」

然而，持平心的恩寵，想要得到它，得付出代價。依納爵和他初期的夥伴們，深有體會。西元 1539 年，原擬派遣赴印度葡萄牙殖民地傳教的耶穌會士，突然病倒了。依納爵的好友方濟·薩威，請纓代往。面臨兩難抉擇的依納爵——把好朋友留在身邊，或是派遣到遠方，以「愈顯主榮」，他選擇了後者。

為能真實地保持平心，這真是忍痛踏出的一步。就是這種極度的自由，依納爵捨得放手讓好友遠離，也讓薩威日後成為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從大學同窗開始相知相惜的好友，此生再不得相見。西元 1552 年，傳播福音於印度、日本等地的方濟·薩威病逝於中國海岸線外的上川島。

西元 1541 年，在遠赴印度的前夕，薩威從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寫了一封信給依納爵。我認為，這信是他所寫的信件中最感人的一封信，既流露誠摯的友情，又切盼新使命的奉獻：

除了即將登船出發之外，我沒有其他的消息要告訴你。我們在此告別了，請求我們的主基督，賞賜我們來世團聚見面的恩寵。因為，羅馬城和印度相距是如此的

遙遠，我不知道今生可有機會再度相逢，況且，那極大的收穫，還有待我去努力。

大避靜第一週的前幾天，通常是圍繞在「原則與基礎」這個主題上禱告，不僅是思索保持平心的一個方法，也藉此默想與天主的關係。藉著默觀天主在我們生命歷程上種種的創造行動，去經驗對天主的感恩之情。這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思索大自然的奇妙化工，或者，細數承受自天主的許多恩典，或者，生命中曾經經驗與主相遇的各類狀況。

此處，依納爵介紹了一個簡便而有力的祈禱方式，稱為「良心的省察」，這是使你意識到，天主在你的生命中是活躍地存在的一種方法。翻譯上，有時依西班牙文的原文「examen」，而直譯為「省察」；間或，依拉丁文版本的「conscientia」，而譯為「意識的檢查」。

省察，有五個步驟。首先，祈求天主與你同在。其次，回顧一天當中，你認為應該感激的事，不一定要針對特別、了不起的事：可以是，朋友打來的一個電話；讓你喜悅的一頓飯；一件棘手的工作終於完成了。一些可能微不足道的事，也很重要：一個豔陽天；打個盹後，神清氣爽；乍見一名嬰兒可愛的笑容。把感激之情表達出來，這有助於你，從這些場合中承認天主的臨在。

第三個步驟，回顧整個的一天。此時，你試著去注意到，這一天當中，天主的臨在，尋覓著去意識到，在什麼場合你接受了天主的恩寵（或是，沒有接受它）。我喜歡把這個步驟比擬為，一天生活錄影的重播。當你回顧到，某人對你說了一句很窩心的話，你就可以對自己說：「是呀，天主在這兒。」反之，當回想

到，你對某人大不敬的場景，你就說：「唉呀，我背離了天主。」如此，順勢導向第四個步驟：請求原諒自己的過犯。第五個步驟：請求天主賞賜恩寵，以便第二天能更緊密地跟隨天主。依納爵建議：以一遍〈天主經〉結束這段省察。

省察，是一種簡便的祈禱方式，幫助你去留意，在每天的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情上，留意到天主的臨在。耶穌會士華特·布哈德（Walter Burghardt, SJ）曾這樣說，祈禱是「長時間、充滿愛意地凝視著真實」。而省察，就是這個樣子：是在日常生活的真實中，看見天主的一種方法。依納爵的神操可以總結成一句話：「在一切事情上，找到天主。」而省察，正是活出此理想的一個好方法。



除了這些日常生活上的恩典之外，在大避靜的這個階段，避靜者還可以回顧一下，在生命中的某些特別的奇異恩典：在哪種狀態中，特別能近距離地感受到天主的臨在。依照本篤會士塞巴斯丁·摩爾（Sebastian Moore, OSB）的闡釋，那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渴望。

這類「極致」的經驗，不能單純地以「不可知的範疇」視之。許多人都會碰觸到類似的狀況——通常只是沒有意識到而已。假設，你獨自坐在海邊，欣賞美麗的夕陽西下，突然間，整個人被讚嘆天地化工的美所充滿；或者，與親密戀人的情感交流中，有著某種極深的意識，似乎和所有愛的本源，融洽地契合在一起。在這樣的經驗中，你就是與天主相遇了，以你個人獨特的、極為深刻的方式——不管你是否確知它。

在現代的小說和名人的自傳裡，我們也能找到一些類似的描述。近三十歲時，我正在考慮修道的生活，曾閱讀到英國著名學者兼作家魯益師的自傳《驚喜》（*Surprised by Joy*）。在其中一段可愛的章節中，作者回顧幼時，在花園內的蔓越莓樹叢前一則美好的回憶。他被一種「出自深遠歲月的深處」的渴望所滿溢：

很難找到恰當文字，足夠強而有力，來形容那臨到我身上的感觸……當然，那是一股渴望，但是，渴望什麼呢？……在我還來不及認清，到底是在渴望什麼之前，這股渴望已離去了，整個的驚鴻一瞥已然褪去，世界又返回到那習以為常的原狀，換句話說，它僅只被攪動了一下，那被攪動出來的波瀾，那嚮往某種嚮往的波瀾，已然歸於平靜。

在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中，這樣的景況，也僅發生很少的幾回而已。事發當時，我都未能察覺它的重要性。只有在細細的回顧中，才能恍然大悟。

舉個例來說，在我上小學的時候，經常是騎自行車上學，約略二十分鐘的路程。去上學，一路下坡，令人心曠神怡，回家就是一路辛苦的上坡路了。出家門後，先騎一段鄰居門前的行人道，接著穿越房子背後的巷道，其盡頭是水泥砌出的階梯，我必須下車，推上去。再來學校就遠遠在望了。

橫亙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我非常喜愛的草地。遠方的左手邊，有一排高高的橡樹，右手邊則是學校的棒球場。秋日微寒的清晨，我身穿燈芯絨夾克，踩著我的自行車，馳騁於草地當中的一條崎

軀不平的鄉間小土路上，乾枯的樹葉散布在枯乾的草地上，銀白色的野草碎片，混雜在凝霜之中。冬天寒凍，我徒步上學，草原覆蓋在一片皚皚白雪之中，一步一腳印，濕氣印上黑色的鞋套，伴隨著喘息呼出的霧氣。

一到春天，草坪立即綻放出生命的活力。自行車上的騎士，宛若穿行生物實驗所。肥碩的蚱蜢，在雛菊叢和黑眼花間跳躍著。枝芽花間小蜜蜂嗡嗡；淺藍色的薊草叢裡，蟋蟀奏鳴；穿梭樹枝的是，紅雀鳥和知更。空氣清新，大地歌頌創造的美麗。

某一個溫暖的春日清晨，我在草原的路途上，停下來喘息一會兒。車籃裡，厚重的課本，顛簸中已擠到一邊了，數學課本還差一點迷失在蚱蜢和蟋蟀羣中。十歲的我，雙腳踩地，跨坐在車上，瀏覽周遭的大自然——五顏六色如此的繽紛，如此的活力充沛，生命的氣息如此盎然。眺望草地盡頭的校園，猛然間我感覺，活得好快樂啊。我想擁有看到的這一切，又想變成它的一員。直到今天，我還能清晰地看到那個小男孩，在草原中溫暖的氣息裡，被受造物環繞著。

回首往事，我相信我當時所感受到的，對天主許諾的某種感應：是一種通往無窮喜樂的邀請。在我自己開始做這個《神操》避靜時，這個鮮明記憶浮現了出來。



在這段內心的省思之後，避靜者開始看見，在面對天主的大愛時，自己不願意反應的狀態——換句話說，是看見自己的過犯。有一位神師曾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來闡釋。我們越是承認天主的大愛，它就會像陽光般的照射過來，而我們就會看見，那在陰影

中所顯露出來的自己會犯罪的本性。

在這第一週中，避靜者專注於查考自己的過犯。依納爵提示我們，儘管在祈禱中去要求所需的恩寵。他說到，我們要「乞求祂賞賜恩寵，使我們對所犯的罪過，產生極大、極強烈的痛悔之情」。如此一來，就會發現，無論自己犯了什麼樣的罪、犯了多少、多麼頻繁，天主仍然是愛我們的，因而，心生感激天主之情：我們是「被愛的罪人」。通常，有了這種對於天主無盡大愛的感謝，自然會產生出，對祂的愛要有所反應的渴望。

第二週的主題是，「耶穌君王的召喚」，一個強而有力的默想。想像著，你正在為一位深具魅力的領袖服務，這位英雄敦促我們跟隨他，去從事他的志業，「我吃喝什麼，你就吃喝什麼；跟我穿一樣的衣服……」這是多麼深刻、動人的經驗——你心目中的大英雄，呼喚你的名字，要你跟隨他，豈不是美妙極了？

默想過這對你的意義之後，接著要思考更重要的一件事——跟隨耶穌基督，是否比其他的事更有價值。這個默想是一種雙重的邀請：與基督同在，以及為正義、愛、和平而努力工作。

有了定志跟隨基督的渴望之後，開始來默觀耶穌的一生。依納爵要求我們從基督生命的本源，開始這一連串的默觀。在默想中，避靜者想像，雲端之上的天主聖三如何俯瞰大地，決定「派遣」基督。這是神操中，非常美麗的一個默想，因為，我們從天主的角度來設想，我們默觀這個世界，「去看各類不同的人……是如此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穿著不同、作為也不同；有白種人、黑種人，有人身處和平，有人正在戰爭；有的哭泣著，有的歡笑著；有的人健康，有的人生病；有的正在出生，有的正在死亡」。

我自己在做大避靜時，就覺得這段靜觀式的默想，非常的美

——天主聖三以無比慈愛的目光，看著這個世界。它不僅有助於我們用一種新的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更能因而體會天主派遣祂的兒子，來到這個世界的那種渴望。

接下來，默想耶穌的一生。《神操》這個階段，對我本人極具魅力。我初識一種新的祈禱方式，儘管它有不同的稱呼——「依納爵式的靜觀」，或者「靜觀式的祈禱」，或「想像式的祈禱」。在這種祈禱中，馳騁你的想像力，去與主相遇。藉此，避靜者能經驗到某種獨特的恩寵：渴望更完整地認識耶穌。

在這種依納爵式的靜觀祈禱中，我們設身處地在某一個福音書所描述的場景之中。譬如，在耶穌誕生（Nativity）的事蹟，設想，自己與瑪利亞和若瑟行走在往伯利恆（Bethlehem）的路途上：「藉想像的目光，看見從納匝肋通往伯利恆的道路，距離有多遠，路的寬窄，是平坦的，或起伏崎嶇、穿山越谷；同樣地，再觀看耶穌誕生的地方或山洞，有多大、多小、多矮、多高，有些什麼陳設。」

在這個旅途上，我們可以更設想得多一些：瑪利亞和若瑟看起來怎樣？穿什麼樣的衣服？聽到些什麼聲音？（驢子踩在碎石路面的響聲……遠方有鳥兒吱吱叫……）

也可以異想天開，假想自己是某一個角色。或許，是若瑟的好朋友，跟著一塊兒走，隨時幫忙。在那種情況下，試想一下自己的狀態：穿著如何？陽光溫暖否？旅途困頓、勞累嗎？藉著這類自行添入相關的細節補充，讓你能完全地融入福音的場景之中。

初學期間，我第一次做大避靜時，曾在這個依納爵式的靜觀上遭遇困難。在做避靜之前，指導神師大衛簡短地解說過一番——運用你個人的想像力，把自己融入福音的場景之中，等等。

聽完之後，我直覺的反應是，這是我所聽過最愚蠢的一件事：「我就直話直說吧，你的意思是，要我在腦袋裡，自行描繪一個福音場景的圖像？」

大衛點頭。

「那太荒唐了吧！」

「哪裡荒唐了？」

我說：「全都在我的腦袋中，不是嗎？在我的異想世界裡，這些人，我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大衛回答我：「那也不盡然。」

我呆坐在那兒，滿腦子的疑惑。

神師開口問我：「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相信你的想像力是天主給你的嗎？」

「當然囉！」

「那你不認為，天主會使用你的想像力，在這樣的祈禱中，拉拔你靠近祂？」

我必須承認，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天主能透過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來和我們溝通，那為何就不能經由我們的想像？神師這番溫文的導引，消除了我的疑慮，進而能愉悅地悠遊於一個新型態的祈禱中。

懷疑一旦摒除，成效令我訝異。雖然，過程中有時祈禱有困難或乾澀，但多半時候，我都彷彿身歷其境。我與宗徒們或羣眾們一塊兒，親眼見到一樁奇蹟的發生，聽見耶穌在講道，見證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由於親身伴隨，常有現場情緒的自然湧現，和深刻的領悟，令我震驚。在經驗這種形式的祈禱之前，對於天主願意，而且能夠以如此個人親密的方式和我溝通的這件事，我始

終心存懷疑。現在，這種型態的默想，是我在祈禱中與主相遇的主要方法。

拿一件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為例，來加以說明：不久前的一次十一天避靜中，神師要求我在相同的這個瑪利亞和若瑟相偕遠赴伯利恆的旅途，作一個祈禱。數月前，我遭逢一些難題，焦點在修道生涯中保持貞潔的挑戰。我開始感覺，貞潔的生活是某種「次佳的」生活型態，當然不是說，沒有其賞報，但比不上婚姻生活的滿足感。

頭幾回在這段福音章節上的默觀祈禱，大體上沒有成效。但是逐漸地我能把自己設想成聖家的一個朋友。在他們開始打點這趟辛勞的遠行之時，我決定盡量要在一旁幫忙。我步行到納匝肋的村子上，去備些乾糧和用品——買幾條麵包，裹在一塊乾淨的布內；到廣場的水井旁，把獸皮口袋裝滿清水；在一家店裡，買了一些椰棗（譯者註：中東地區特產，乾燥的甜食點心），塞進衣服口袋裡。能為他們夫婦倆，舉手之勞幫上一些忙，感覺真好。

回到他們的家時，他們正準備要出發了。懷孕的瑪利亞，挺著大肚子，行動遲緩不便，很多事情自己做不來，她多麼需要若瑟和我的幫忙。

出到門外，若瑟把用品安置在小驢的背上，攙扶瑪利亞騎上去。突然，我想到忘記帶打火石了，趕緊跑進屋內去拿。餵驢子喝完水，我們一行人就出發上路了。若瑟略微轉頭，對我說：「你真是幫了大忙」。

我漸能領悟，縱非聖家的一員，我很高興能為他們做一點事，陪著上路，我已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聯想到邀請我進入他們生命的那些人。作為一位獨身的司鐸，他們不僅在領洗、

結婚、葬禮的場合，歡迎我和他們在一起，還以其他更加親密的方式，深入他們的生活當中——傾聽他們在困難中的掙扎；一同慶祝他們成功的喜悅；一起分享食物；看著他們子女的成长過程。在此祈禱中，我內心滿溢著對於守貞誓願和修道生活的感激之情。成為一位耶穌會士以來，這是我首次的領悟，我不再視之為「次佳的選擇」。守貞的生活，是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對我而言，那是一種了不起的生活。

這一切都歸功於聖經一小段章節上的默想。



第三週的避靜，在默想過耶穌的傳道生涯後，依納爵邀請我們，一步一步地踏上耶穌苦難和死亡的苦路——從最後晚餐到埋葬。這一週求的恩寵是：藉此苦路上的陪伴，抒發對耶穌受難的同理心。同時，因設身處地，進而體會祂的受難是愛世人的一個記號；而對跟隨耶穌的人來說，也能體會到，因而受苦受難是免不了的。

在默想基督為世人自我犧牲的大愛時，避靜者也會回憶自己生命過程中，那些苦難的時刻。經常，也會發現自己「要死於」自身的某些部分，因為它們阻擋你更加完全地跟隨基督。

於是，避靜者得以走向很重要的一個保持平心的態度——割捨你生命中某些層面的自由，因為，那些層面阻礙你去跟隨基督。這就是，「死於自我」的自由。以我自己為例，我要割捨的是「驕傲」的層面：我渴望受人歡迎、受人稱讚，甚至於被人需要。這些感受，其自身並非屬於惡，但常能阻礙我們全心全意地跟隨耶穌。譬如，你過分地關注於「要受人歡迎」，在傳揚福音而遇到

要挑戰現實狀況的缺失時，你可能瞻前顧後地不願得罪既得利益者，那麼，它就是傳福音的一個阻礙。打開福音看看，耶穌常「不受人歡迎」，祂傳的福音，也常不受某些人的歡迎。跟隨基督，就要接受遭人愚弄、輕侮的可能，在傳揚祂的訊息時，也有可能受到迫害。

如此這般地，《神操》邀請我們跨出自我利益的門檻，在基督的使命中，與祂結合——甚至於，接受困境和個人的苦難。試看，這個《神操》的經驗，鼓舞了數十位耶穌會士的殉道——聖艾蒙·坎庇恩（St. Edmund Campion，英格蘭，西元 1581 年），聖保祿·三木（St. Paul Miki，日本，西元 1597 年），聖宜善·饒格（St. Issac Jogues，加拿大，西元 1646 年），真福彌格·蒲羅（Blessed Miguel Pro，墨西哥，西元 1927 年），以及 1989 年在中美洲薩爾瓦多殉道的六位耶穌會士等，他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答覆了跟隨基督的召喚。

當我自己做到避靜的最後階段時，很訝異地發現，這個第四週，相對於前二週，天數是如此的短。本週內，依納爵僅建議一個默想——耶穌的復活。要求的恩寵，顯而易見：「歡欣雀躍和喜樂」。

再度地，一個新恩寵導引出一個回覆它的新渴望。在過去的三十天避靜中，默想了天主的大愛、陪伴耶穌四處傳道、見證祂的苦難、經驗祂的復活之後，避靜者急於有所回覆。此時，避靜者認知，天主大愛的行動處處都在。因此，以一個默想——天主的大愛在我生命中的作為，結束整個的《神操》避靜。最後的一個祈禱，把自己奉獻給天主，走進世界中，去活出避靜的果實。



《神操》不僅只是提供給耶穌會士使用，也希望普及到各個層面的基督徒。因為，依納爵相信，天主渴望和每一個人交往、有互動關係。他那開放心胸、肯定生命的神操，就是出自這個信念。

神學家常比喻依納爵的神操，具有「重生的」作用。換句話說，它既承認天主的至高無上，又奠基於凡塵俗世的眾人真實的日常生活經驗上。

它提醒我們，天主在向我們說話，既透過我們的祈禱，也經由我們的情感、意志和身體。天主能透過性的親密、羅曼蒂克的愛情和友誼，和我們溝通。你可以在聖經中、在聖事內，找到天主。天主能向你展示祂的大愛，藉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事、你的配偶、隔壁的鄰居、一位教師、一位神父、一個陌生人，或是一位流浪漢。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從一切的人身上看到天主。

依納爵給我們指出的道路，是要在每天的日常事物中，去尋找天主臨在的記號。而你要許諾自己，經常定時禱告，以期能默觀到這些記號。若沒有祈禱的薰陶，我們常會忽略或忘記天主臨在的那些剎那。我們要平衡祈禱和行動的日常生活。依納爵靈修的目標，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歸納：就是渴望成為一個「能在行動中靜觀」的人，在活動頻繁的生活中，保持一個靜觀的心態。

就是這個神操——既實際又奧妙、既屬於這個塵世又超凡於來世，在我入耶穌會第一年的初學時，把我拉近靠向天主。它幫助我，以新的方法，與主相遇。它打開我的心靈，去用新的祈禱的方法，在天主臨在中孕育我對天主的信靠，把我從多年來一直與主疏離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第一次我感覺到，而且也相信，

天主離我很近。

然而，在我向聖依納爵禱告時，並沒有向聖女小德蘭或多默·牟敦禱告時，那般地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我閱讀他的書信和日記時，也不像一再閱讀《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或《七重山》那般地流連回味美麗的章節字句。我得承認，我和我的會祖之間，沒有那種親密的感覺，就像前文提到的波士頓學院老神父的感受一般。



不久前，我有機會到依納爵的出生地羅耀拉去朝聖。這個機緣，讓我從另一個角度來欣賞他，是一份精神上的禮物。

喬治和我在初學院同期。此次，我們二人受邀擔任露德朝聖團的隨團神師。這是一個為期七天、龐大的朝聖團。歷史悠久的國際性組織馬爾他騎士團（Order of Malta），每年為行動不便的患者（以及，他們的陪同照顧者）舉辦一次。露德位於法國南部，靠近與西班牙邊界的庇里牛斯山脈。西元 1858 年，聖母在此地顯現給一位女孩子。這是我第二次擔任隨團神師。

在露朝朝聖地期間，有一天是自由活動。於是，喬治和我就利用這一天，租了一部車子，越過西班牙邊境，前往西班牙北部的羅耀拉，做一個大朝聖中的小朝聖。朝聖團員中有人知道我們要去，還託我們順便帶回「羅耀拉之水」，據說有助於婦女懷孕。

我們駕車沿著大西洋岸邊的公路南行，越過邊境，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三個小時就到了羅耀拉。在小朝聖的啟程上，天主已經出手幫忙了。

小鎮的中心，有一座華麗的大教堂，剛好有一台巴斯克語彌撒（聖依納爵的母語）即將開始（彌撒後，喬治對我說，好像和

正宗的西班牙語差別很大，聽起來，倒像美國南部的納瓦霍 Navajo 印第安人講的話）。隨後，我們就去參訪鄰近的羅耀拉城堡。

城堡底層有一個觀看拉洋片的小孔鏡箱。一個眼睛貼在小孔上望進去，不到一呎高的彩繪塑膠片，重演依納爵幾個重要事蹟。

其中，有一個場景，雖是透過滿是灰塵的玻璃孔望進去，仍然非常的感人：它描繪年輕的依納爵，正準備好要離開這座家族的城堡，去過一個全新的生活。依納爵也曾經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我好像從來就沒有這麼想過。剎那間，這個驚鴻一瞥的場景，觸動了我的心弦。要捨棄一切，去跟隨天主，依納爵這位年輕人，內心之中當是如何的激盪。

來到最頂的一層，看到一個房間，用一大片玻璃隔出來。我順口問身旁的一位導遊，這是什麼地方？他頭也不回地，就丟給我一句話，「這是（依納爵）皈依的小堂」（譯者註：Conversion 皈依，除了「正式皈依某宗教」之外，另有「大徹大悟」的意思）。

嚇了我一跳，原來這個地方就是我的會祖聖依納爵休養傷口，且經歷大徹大悟的所在。我想都沒想過，當年事情發生的地方，一切未變，至今猶在原處，就在我的眼前。它的牆邊，置放著一個依納爵躺臥病床的塑像，手握一本書，舉目望天，一副昨非今是、定志向主的模樣。上方的木梁上，刻著一行描金的大字——在這裡依尼高向天主投降了。

房內精美木雕的祭台前，一位神父正準備要舉行彌撒。正擔心不方便進去之際，那位法籍神父向我們招手，歡迎我們進去，和他的法籍教友朝聖團一起慶祝。當知道我們是耶穌會士時，更喜出望外地向他的教友們宣布，真是天主的一個好安排。我們一起共祭，還使用我們高中程度的法語讀經。彌撒後，他手搭在我

們兩人的肩膀上，開懷地向他的教友們，用法語說，「這兩位的聖召，是從這個房間開始的」。

我想，我也在喃喃自語，天主啊，我又清楚地看見了你。

隨後，我們來到禮品部，遇見一位西班牙籍的會士弟兄，他個性爽朗，正巧也認得我們在美國會院團體中的一位弟兄。已是午間時分，他好意邀請我們去會院用餐。席間，絞盡腦汁回憶那些初學院放暑假時惡補的西班牙文，大家還是談得很愉快。我更是高興有這一頓飯，口袋裡真的只剩一塊錢歐元了。

飯後，同桌的一位年長弟兄帶我們參觀。這是一個名實相符的避靜大樓，名稱是「靈修中心」。五層樓，每層都有一座小堂，各有不同風格的祈禱方式，其中一座小堂還頗有東方的禪味。參觀完畢，我們就告辭，打道回府。回到露德小鎮，時間剛好——晚餐時刻到了。

這一天的朝聖旅程，事事順遂，許多事情就在恰好的時間點上發生了，不禁想起，經驗天主不是非常難的事。可惜沒機會探詢「羅耀拉之水」。幸好，喬治從大教堂外面的一個噴泉，裝了一瓶水，得意洋洋地宣告：「羅耀拉之水！」晚餐中，向朋友們暢談，這一趟羅耀拉之旅是多麼的完美時，旁邊一位朝聖團的婦人說：「這好像是對你們兩個人耶穌會聖召的一個肯定！」

有時候，天主不僅僅是默默地臨在你的面前，祂還會向你吶喊哩！

如果我未曾經歷過依納爵神操的這番培訓，我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內省領悟，可能不會去注意，天主在我日常生命中的臨在，這個神操鼓勵我，積極地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找天主。當然，這一切全要歸功於依納爵。

縱然，對我的會祖，仍然未有貼心的那種親切感，但感激之情是洋溢的——深切而持久的感激，謝謝這份最美好的禮物；這份靈修的禮物，讓我能在一事物上，看見天主。

6

更甚於往日

伯鐸·雅魯培
(Pedro Arrupe)

我很高興人家說我是一位樂觀者，然而，我的樂觀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它建立在希望的基礎上。何謂樂觀者？就我自己的觀點，我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回答。一個人，他有這樣的信念：天主知道，什麼是對全人類最美好的東西，祂做得到，而且一定會做到。這樣的人，就是一位樂觀者。

——雅魯培神父

(Pedro Arrupe, SJ)

《一位耶穌會士的心靈之旅》

(*One Jesuit's Spiritual Journey*)

我第一次打電話到波士頓耶穌會初學院時，電話的那一頭聲音嘹亮地報著：「雅魯培會院！」(Arrupe House)。我有點迷糊了：「噢……對不起，我想大概撥錯號碼了，嗯，我是要找耶穌會的初學院。」

「就是啊，」我幾乎能看到對方的兩個大眼球正在打轉，「初學院就是在我們雅魯培會院。」

在進耶穌會之前，我哪知道「雅魯培」是什麼。相反的是，在我入會多年後的今天，我反倒奇怪，為什麼他的知名度不高？

伯鐸·雅魯培神父，是我們耶穌會的前任總會長（1965-1983 A.D.）。但不是因為他是全世界眾多耶穌會士的長上，大家就應該認識他，而是，他的一生經歷、他的人格特質和他的榜樣，對現代這個世界上的教友們來說，是具有強大的震懾力，並且息息相關，應該有更多的人，熟悉他的事蹟才對。

我個人認為，他的一生，可說是二十世紀整個天主教會的縮影。

西元 1907 年，雅魯培誕生於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畢爾包城（Bilbao）的一個熱心教友家庭。高中畢業後學醫，先在巴雅多利城（Valladolid），後入馬德里大學醫學院。在醫學生時期，他前往法國露德鎮，短暫停留及實習，親眼目睹見證一個醫學上的奇蹟（一位重症小兒麻痺的年輕人，聖體遊行時，被主教舉揚聖體降福後，從輪椅上站起來，他可以走路了）。之後，他的生命有了戲劇性的轉折。因著數年醫科學生的資歷，得以旁觀在「病癒檢驗所」的公開醫療驗證程序，更證實了他目睹的這個奇蹟。

「我無法向你描述，我當時的感受和內心的狀態，」他回憶當年在露德的這個經驗，「我感覺到，耶穌就在我的身旁。而在感受過祂全能的力量之後，在我周圍的世界似乎變得渺小了。」他返回馬德里後，「教科書從我手上，一本一本掉了下去；以前令我興奮無比的那些功課、那些實驗，如今，似乎顯得如此地空虛……我恍惚於這日漸擾亂我的記憶之中：唯獨那幅景象——在舉揚聖體、劃十字降福中，癱瘓的年輕人，從輪椅上躍起——

直鮮明地存留在我的記憶中和心靈上。」

不久之後，十九歲的醫科學生雅魯培，放棄了學醫的生涯規畫，走進羅耀拉（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故鄉）的耶穌會初學院。他在醫學院的教授們，都大為震驚。

西元 1932 年，西班牙共和政府驅逐境內的耶穌會士，雅魯培被迫流亡海外。他仍繼續陶成學習，先在比利時、荷蘭，後赴美國，而於 1936 年晉鐸，兩年後赴日本傳教，擔任山口縣堂區的本堂神父。

為深入了解他所生活的這個國家，他將自己完全沉浸於日本的文化氛圍和學習之中——學習日文和茶道、插花、書法等文化習俗。他祈禱時，仿倣日本禪宗的盤腿打坐、冥想，而且終身奉行（在羅馬總會長任內，他這種打坐式的祈禱姿勢，著實嚇壞了傳統觀念根深柢固的一些會士們）。

任山口縣本堂神父時，正值日本對外戰爭，他被人懷疑是「西方勢力」的間諜，而遭逮捕，單獨監禁卅五天。十二月寒冬的斗室中，僅有鋪在地上睡覺用的一張草蓆而已。追憶往事時，他說道：「在這段時期內，我學習到很多東西：靜默、單獨、極端的、刻苦式的貧窮、與『心靈貴客』在心中交談等各樣的學問。我想，這是我一生當中，收穫最豐盛的一個月。」

西元 1942 年，雅魯培受命擔任日本耶穌會初學院的神師和院長，而這個長塚初學院，就在廣島市的近郊。1945 年 8 月 6 日廣島被原子彈轟炸後，他立即組織初學生照顧傷患，並將長塚初學院改裝成一座臨時救難醫院。憑著當年醫科學生的培訓，他做了數十例簡單的緊急外科手術。在居留日本十三年後，於 1959 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耶穌會日本省的省會長。

六年後，在羅馬的全體大會中，他被選為耶穌會的總會長。時值梵二大公會議的會期中，整個天主教會巨幅改變的伊始。在這大變動的時代，一位在日本傳教的西班牙籍神父，似乎是總會長的理想人選：他具有國際性的視野和經驗、他在西方和東方都長期居住和工作、他是一位已然觀察到教會的重心勢不可擋地將從西方移向亞洲和非洲的耶穌會士。總而言之，在「本位化」（inculturation，譯者註：普世教會適應各地的本土文化）這個字眼成為流行用語的很早以前，雅魯培神父已經認知它了。

為了響應梵二大公會議，向各修會團體發出的呼籲：自身立足根基的再發現。新上任的「總會長神父」鼓勵全體的弟兄們，把他們的《神操》調適於現今這個世界上；加倍致力於對貧窮者和社會邊緣者的工作；遵循全體大會的決議，推廣「履行正義的信仰」。雅魯培神父強調，正義是福音的基本要件，也因而廣為人們所稱道。在許多為貧窮者工作的會士因工作而殉道之前（譬如，西元1989年，六位耶穌會士，在薩爾瓦多遇害），雅魯培神父已經本能地掌握住這些工作的重要性，同時指出，在面對壓迫貧窮的惡勢力時，所須承擔的風險。在一次有關這個主題的研討會中，他向耶穌會的弟兄們明言（茲以濃縮後的精句來表示）：如果我們選擇這條道路，有些人將會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是否我們全體的會士已經準備好了，來擔負這個重責大任，而且將它實踐到底？已準備好踏上更艱苦的十字架的苦路？如果還沒有準備好，那麼，這些討論除了可能有學術性的價值之外，還能有什麼用處呢？」

雅魯培神父在總會長任期內的成果，頗為可觀。「伯老」（Don Petro，許多人這樣暱稱他）探訪他的讀書修士們以及在學

校和堂區任職、在城市中的貧民窟和窮鄉僻壤、在大學和避靜院、在初學院和養老院各地的會士們。他廣泛的旅行，遍及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受邀對教會、社會人士、教友領袖演說。他的著作和演說，不僅只著重於伸張正義和為貧窮者工作，也鼓舞更多、更廣泛的主題，譬如，宗教生活的更新，基督信友的合一運動，教會的本位化，世俗主義和不信者，福傳和要理講授，知識分子的生活，以及教會擁抱年輕人的需要性。



《雅魯培神父訪問錄》（*One Jesuit's Spiritual Journey: Autobiographical Conversations with Jean-Claude Dietsch, SJ*）是若望格祿·迪吉神父一系列訪談其總會長雅魯培，集結而成的問答式、具有自傳性質的訪談錄。其中有一段敘述，我個人非常的欣賞。雅魯培神父追憶，當年探訪拉丁美洲地區一個非常貧困的貧民窟的狀況。那是一個耶穌會士服務的地方，探訪行程中，他在當地人家一間沒有牆壁、四面通風的小茅屋內舉行彌撒；彌撒進行中，貓、狗等家畜隨意進出。彌撒後，一位信友邀他前往住處，想送一份禮物給他：

一位外貌凶狠、令我望而生畏的彪形大漢對我說道：「請到我家裡來，我想要送給你一件東西。」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是否該答應。一旁的神父對我說道：「神父，你就答應吧！他們都是好人。」我到了他的家——一間隨時會倒塌的木棚屋。他讓我坐在一把破舊搖晃的椅子上，從那兒，我看到一輪落日夕陽。那粗漢對

我說：「先生，看啊，多美的夕陽！」我們就這樣靜默地坐了幾分鐘，太陽下山了。那人接著說：「你的會士們對我們所做的這一切，我不知應該如何來表達感謝。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但是，這個美麗的夕陽，我想你會喜歡的，不是嗎？晚安了，神父。」然後，他緊握了我的手。

告別時，我心裡在想：「我很少遇見這樣的善心人。」我走出這條小巷路時，一位貧苦的婦人上前來，親吻我的手，以一種充滿感情的語氣對我說：「神父，請為我和我的孩子們祈禱。剛才我去參加了那個美好的彌撒，可是彌撒後不能留下來，必須趕回家照料孩子們。我沒有什麼東西可給孩子們吃。請為我祈求天主，請祂一定要幫助我。」說完話，轉頭就奔回家了。

從在貧窮人家中間舉行的這台彌撒，我真的學到了許多的東西。

這和另外一個世界上、有權有勢者的聚會，兩相對照，其差異是多麼的巨大。

在雅魯培神父為窮人服務的諸多創舉中，為回應世界性的難民潮危機，而於西元 1980 年創辦的耶穌會難民服務處（Jesuit Refugee Service），值得提出來特別說明。我進耶穌會四年以後，有機會到肯亞的 JRS 實地服務，更能體會他創辦這個組織的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辯證：在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有耶穌會士，也到處都有難民存在，那麼，為什麼不能把這兩羣人放在一塊兒呢？

任職總會長期間，他身體力行地彰顯「在行動中靜觀」的耶

穌會理念。一位曾在羅馬擔任他機要助理的美籍文生·歐基輔神父（Vincent O'Keefe, SJ）就曾說過：「無論在羅馬總部或外出探訪各地的弟兄們，雅魯培神父總是看起來具有深度內心的安詳，因而能面對一個接一個的不同情況、一個接一個的不同危機，流暢地變換使用不同的語言。」這就是靜觀的結果。歐神父接著又寫道：「外界很容易知道，伯老是否人在羅馬的總會院內。因為，如果他在的話，來自全世界的訪客絡繹不絕，而他的幕僚們則爭相求見，以便草擬中的信件和演說得以定稿。」這就是在行動中的靜觀。

在和其他修會的往來上，雅魯培神父是一位能傾聽別人的意見、也能給他人啟發性見解的領袖人物。天主教各修會總會長聯合會的主席，是三年一任，而他蟬聯五任。在普世的教會內，他也被視為領袖人物。他曾參與西元 1967 至 1980 年間，每一次的國際性主教會議，均代表男女修會團體發言。許多人認為，他是耶穌會的「第二個創會者」。的確，以他的外表來看——削瘦的身材、鷹鉤鼻、炯然有智慧的眼神、微禿的頭頂——極貌似他的巴斯克同鄉、羅耀拉的聖依納爵會祖。

雅魯培神父是多麼受到全世界眾多會士弟兄們的稱許，我很難用適當的言辭來形容。美國的耶穌會士是非常的喜愛他，尤其年輕的一輩。為他們來說，雅魯培神父所戮力從事的社會正義，是那麼的重要、那麼的啟迪人心。在美國許許多多的耶穌會院是以雅魯培來命名的，其受人喜愛的程度，就可見一斑了。我的初學院和讀哲學時所住的會院，都叫雅魯培會院，常引起朋友們的疑問：「是否所有的耶穌會院都叫雅魯培？」

雅魯培神父學問豐富、和氣待人、充滿機智。曾經有兩位美

籍的初學會士遠赴印度服務當地的貧窮人士，路過羅馬時遇見雅魯培神父。總會長跟幕僚打趣說：「他們要繞大半個地球往印度去？教育我們的子弟去認識貧窮，可要花不少的錢哪！」

和一般的教友們往來，他也會讓對方感到自在。曾為耶穌會士的梵蒂岡史學家賀伯維（Peter Hebblethwaite）曾述說一段往事。有一次，雅魯培神父的座車在羅馬的街頭上，出了一個和對方車輛擦撞的小狀況。賀先生夫婦兩人正好步行經過，因此和雅魯培神父在路旁寒暄。當時，賀太太正接洽做神操大避靜的事宜。

賀伯維在《美國》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這段插曲：

雙方的司機正在爭執中。我們停下來打招呼，「這是我內人，瑪格麗特。」雅魯培神父的眼神突然亮了起來，「噢，瑪格麗特，就是妳要跟我們的雅豐索神父（Fr. Herbie Alfonso）做一次神操的大避靜？」沒錯，就是她。於是，一位曾經是耶穌會士的太太，站在羅馬城的街頭上，和總會長神父討論起《神操》來了。而我，被冷落在一旁，無可奈何地撥弄手指頭。我想這在耶穌會的歷史上，也是很獨特的一個時刻吧！

然而，我們伯老並非處處受人歡迎。他戮力行動的社會正義，似乎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味道；有人更難聽地批評說，也有共產主義的影子；因此，引起梵蒂岡某些人士（甚至於，某些耶穌會士）的不滿。他們認為，雅魯培神父過分天真、不切實際、甚至於有走入歧途的危險。這個誤解深深地刺傷了他。每當梵蒂岡官方批評他時、教會內某些輿論責難他時、主教們在會議的公開場

合質詢他時、或是在地的主教挖苦其教區內的耶穌會士是「社會主義者」時，雅魯培神父總是挺身而出，忠實地為他的會士們辯護。（同時，他也常對那些引發爭議的會士們建言：「總要讓我更容易地為你們辯護吧！」）

唯恐修會內的弟兄們誤解他本人對教會當局的態度，伯老刻意地通報全球各地的會院，並附上一幀照片。在照片中，他身穿黑色的會士服，跪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跟前，附註一行摘自自創會文件中的拉丁文字句：Soli Domino ac Ecclesiae Ipsius sponsae, sub Romano Pontifice, Christi in terris Vicario servire（僅只為上主和教會，祂的淨配，服務，受命於羅馬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

西元 1981 年，他七十四歲那一年，因腦溢血中風。由於不能執行職責，他指定文生·歐基輔神父擔任代理，直到下屆大會選出新任總會長時為止。然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不同意這項任命，而代之以另一位會士，作為教宗本人的「代表」。此舉被廣泛地解讀為，教宗批評雅魯培神父的領導，是一個使他個人難堪的舉措。對於臥病中的雅魯培神父來說，這是一記沉痛的打擊。凱文·布爾克神父（Kevin Burke, SJ）在《伯鐸·雅魯培：著作選集》（*Pedro Arrupe: Essential Writings*）中寫道：「獲知這項出人意料之外、干預修會會務管理的消息時，雅魯培神父極度傷心，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步入他生命歷程中最後的、也是最困難的十年，無法行動、只得靜默的十年，在此情此景之中，他必須承受靈修上的極度貧窮和順服。」

回應梵蒂岡的這項措施，依然忠實的雅魯培總會長，指示遍及全球的各地耶穌會士，忠誠地接受教宗的這個決定，一如他本人一般。這個舉動，震驚了眾多的誣蔑者，他們原都懷疑雅魯培

神父會服從聽命；也因而贏得了梵蒂岡對他的好感。整個耶穌會安然地度過了這一場風暴——也仍然持續為貧窮者的工作服務和努力。

伯老因中風癱瘓——半身不遂、日漸難以說話和與人溝通——在羅馬的總會院臥床十年，於西元 1991 年過世。去世的幾天，教宗才首次前往探視。



神學家伊麗沙白·強生（Elizabeth Johnson）在她的書《天主的朋友們與眾先知》（*Friends of God and Prophets*）中，將諸聖歸納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一般教友們所熟悉的，她稱之為「主保型」——信友們向他們祈求恩佑。既然諸聖在天堂裡，和天主長相左右，求他們幫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沒錯，我們是要向天主祈禱。可是，我們也可以請求某位聖人，為我們向天主「代禱」，就好像在自己的家庭中，央求兄姊代為向父母去請求一樣。但她也指出，這一類型在教會的初期，並不強調。

第二種類型是「陪伴型」的聖人，是我們的朋友——在我們要行走的道路上，已是先行者，現在，沿途為我們加油、打氣；在我們這個信仰的大團體中，是可敬的大哥哥、大姊姊，綻放著信仰見證的氛圍。如此的神聖和典範，並非高不可攀，所有的基督信徒，理當如此。保祿的書信中，就有這個含意。

在我個人的生活中，這兩種類型都適用。通常，我把諸聖當作我的夥伴、榜樣，當然更是加油打氣的啦啦隊長。然而，在相當多的時刻，我迫切需要天主的助佑，聖人們就是我求情的對象。

舉個例子來說，在我感到失望或沮喪的時候，我會想到聖女

小德蘭。她深刻地了解，天主的寵佑是如何地在日常生活中作工；而她的榜樣，幫助我更心平氣和地接受當下展現在我眼前的一切。生活的重擔壓得我喘不過氣時，我會請求她的代禱。一位友人去里修朝聖回來，送我一張小德蘭的聖像和禱文卡片，我把它貼在辦公室的牆上。身穿會衣的小德蘭，以她典型的誠懇表情望著我。照片的下方，是她手寫的一行法文禱詞：「我來到加爾默羅修會，是為了拯救靈魂，尤其要為司鐸們祈禱。」她既是我的榜樣，也是我的代禱者。

在我度奉獻生活的過程中，遭遇困難的時候——譬如，要服從長上的某一決定，使我內心煎熬——我就會去找聖依納爵或是牟敦幫忙。我猜想，牟敦對於服從長上的困難有多一些了解（翻閱他的日記，他幾乎每天內心都在掙扎著，要遵守服從長上的誓願）。聖依納爵，則對於耶穌會士的服從了解多一些（雖然，曾有會士批評道：「他哪懂得服從的事啊，他一直都是當老闆的！」）。碰到守貞潔願的困難時，聖磊思·公撒格幫幫我吧！發現過簡樸的生活有困難時，我就求桃樂斯·戴幫忙。遇到有關教會事務上的挑戰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請幫助我。

而毋庸置疑的則是，每當某樣東西遍尋不著時，我絕不會忘記，自幼就被教導的一則祈禱文——向尋找東西的主保聖人聖安道（St. Anthony of Padua），祈求：

聖安道啊，聖安道，
請趕快來呀。
有樣東西不見了，
怎麼找都找不著。

經常，唸完了這段禱文後，找到東西之快速，連我自己都會嚇一跳。

伯鐸·雅魯培常被視為社會福利工作者的主保。從他給耶穌會士的諸多訓示、有關社會正義的演說和經常勸勉人要做一個「為別人而生活的人」的言論中，我深獲鼓舞。他在西元 1977 年耶穌受難瞻禮日的一篇證道，被收錄在《現代信仰中的正義》（*Justice with Faith Today*）書中。其中有一段話，把十字架上耶穌的吶喊，呼應到現今社會中貧窮者的呼號：

「無論你對我最微小的弟兄姊妹、貧苦無助者，做了些什麼事，你就是對我做的。」這些字句，再清楚不過了，絕不會弄錯意思，耶穌把自己和貧窮者認同。耶穌喉嚨裡的渴，是一種真實的渴，直向上天吶喊，一如當日在加爾瓦略山上一樣。耶穌在死亡剎那時的吶喊，今天，重複地在成千上萬個喉嚨裡吶喊著：渴求正義和公平的對待；在乞求麵包裹腹之時，渴求不分膚色的平等尊重、最基本的醫療照顧、棲身之所、教育和自由。

所以，在從事為窮人、社會邊緣人士和孤苦無助者的使徒工作時，我就會祈求他的指點。他死後不久，我正在東非的肯亞從事難民服務，我祈求他的協助。讀神學期間，我在波士頓從事監獄牧靈的工作，我也祈求他的代禱。在某一項畢生最具挑戰性的牧靈工作時，我祈禱他的幫助。



西元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大樓恐怖攻擊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紐約市的《美國》雜誌社工作。兩天之後，我就開始到世貿大樓的遺址上，為在那兒工作的消防隊員、警察和救護工作者，提供牧靈方面的服務。好幾位會士弟兄，也加入了這項服務。

起初的幾天，要想進入這個區域，不是難事：司鐸襯衫上的「羅馬領」，是足供辨識的通行證。約一週後，周邊地區的管制愈來愈嚴格，由警察、國民兵和陸軍，用鐵鏈拉起來的封鎖線，重重管制。

有一天早上，我和一位弟兄來到一個出入口管制站，是由兩位不苟言笑的警察把守著。心想，這下要進去可難囉，於是，我們決定要為此禱告。要找哪一位來代禱呢？當下立刻想到的，就是伯鐸·雅魯培。這不僅因為我們是同修會的弟兄關係，他肯定會照顧我們，也是因為我們想到，他曾有類似的經歷：對當年日本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受難者，他曾如何地投入和照料。我們所面臨的，是同一種型態的牧靈工作：在一個人為的大災難之下，為那些驚惶失措且又悲傷異常的男男女女服務。因此，鮑伯（Bob）和我，佇立在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人來人往的街角上，雙手合十禱告著，身旁不時有警車、消防車鳴著汽笛呼嘯而過。我們同心祈求雅魯培神父的代禱：「請你幫助我們，能進入到那個地方，去做天主的工作。」

當我們走近這兩位警察的管制站時，他們的臉上有了微笑，點了一下頭，跟我們愉快地打了一個招呼。其中一位還曾經在耶穌會辦的波士頓學院就讀過，他請我們倆給他一個降福，當然啦！

安全過關。

從此以後，每次在走向管制站之前，我和同行的弟兄都會向雅魯培神父禱告。而以在現場的工作服務內容來看，祈求他代禱，更顯得再恰當不過了。這樣的祈求代禱，他一次都沒有讓我們失望過。

有一次，我們一行五人要為那兒的救援工作人員舉行一台彌撒。不少東西要隨身帶著：聖爵、盛聖體盤、領聖體用的麵餅、葡萄酒、行祭獻用的披巾等。臨近管制站入口時，我們嚇了一跳，不尋常的一長串排隊行列，都是志願的義工們——有鐵工、醫生、心理輔導員、建築工人、心理醫師、工程師、醫務人員——頭頂上是九月份的烈陽曝曬，大家都耐心排隊、等候著。我上前去探詢原委，一位消毒工作人員搭腔了：「聯邦調查局（FBI）剛剛宣布，這個區域是犯罪的現場，閒雜人等不得擅入。神父啊，看樣子我們大家都別想進去了。」

烈陽炙烤下，又等候了一個小時，我終於按捺不住，走到隊伍的最前頭，向一位把守的國民兵解釋，我們是天主教的司鐸，要進去做彌撒的。說不通，他一副臭臉催促我回去排隊等候。失望而返的我向弟兄們報訊：「我們進不去了。」此時，鮑伯笑著對我說：「當然囉，我們忘了祈求雅魯培神父。」

這次，由我領頭，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祈求雅魯培神父的代禱。幾分鐘後，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我慢慢地走向另外一位把守的警官，請求放行。我跟他說，我們已經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

「當然沒問題啦！」他接著又說，「你們就是要找對人幫忙。」（譯者註：作者的這句話，是一句雙關語。）



西元 1983 年 9 月，耶穌會全體代表大會在羅馬召開，要選出新任的總會長。此時的雅魯培神父已經無法開口說話，因此擬了一份致辭，由他人代讀，「我多麼希望能身處在會場上，和大家一起開會。可是，現在我連面對面的說話都沒辦法。」

在這篇象徵著長達十八年總會長任期結束的書面致辭中，伯老首先感謝天主，接著，向全體的會士們致謝，「如果不是因為大家都服從我這個可憐的總會長，我哪會有什麼成就表現呢」，會士們聽命的美德，在「最近的幾個年頭裡」，更是值得嘉許。他請求年輕一輩的會士們，務必要降服於天主的旨意。對於那些從事使徒工作、事業正達於高峰狀態的會士們，雅魯培神父提醒他們，不要「把自己燃燒殆盡」，要恰如其分地保持均衡，最重要的，不是在工作的本身，而是與天主契合的生命。至於，「和我一般年紀」的年長會士們，他期待大家保持一份開放的心胸。

在議場上許多會士的淚眼中，這篇書面致辭以感性的期許和一篇禱詞作為結尾。這篇膾炙人口的禱詞，乃是引自聖依納爵《神操》的結論。對照他總會長任內的經歷，和目前的身心狀況，這篇禱詞聽起來令人備覺心酸：

對於「受命於羅馬教宗，基督在世的代表，為我們的上主和教會而服務」的本修會，我滿懷希望。願她在這條道路上，依然邁進。願天主降福會內眾弟兄們的美好聖召，為此，我把我的餘生、我的祈禱和我在這個病中所遭受的各樣痛苦，全都奉獻給上主。

至於我自己，我所要求的，還是重複一遍我內心深處的話語：「主啊，請取用和接納——我所有的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解、我全部的意志。上主，我所擁有和負責保管的一切，都是祢的。祢曾把它們交付給我，現在，我奉還於祢。請按照祢的旨意，處理它們。只要祢賞賜給我，祢的大愛和恩寵，我別無所求。」

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位度著深度奉獻生活者的一生事蹟，而其晚年所背負的十字架，不僅在於人身的痛苦，更在於那來自摯愛的教會的誤解。歷盡身心的煎熬，對天主、對教會，他的希望與信仰依舊未曾動搖。就像他經常自嘲的一個說法，「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者」。



吸引我日漸深入去認識伯鐸·雅魯培的機緣，是一張他的祈禱小卡片，時間是在我讀哲學的時候，在那不久前他才過世。卡片的正面，是雅魯培神父的黑白照片，以他生平最喜愛的日式打坐在祈禱著，身著黑色的耶穌會服，雙腿盤坐在四周空無一物的木頭地板上，一雙黑色的皮鞋放置在身旁。

但是，觸動我心的不是這幀照片，而是它背後的一則禱文，是他在中風後不久寫下來的。這則禱文，也被他引用在西元 1983 年耶穌會大會的書面致辭中。在我所讀過的降服於天主的禱文中，這一則是最為感人的：

「更甚於往日，我發現自己是在天主的手中。這是我打從青年時開始，畢生所戮力追尋的。現在，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其

原動力在於要完完全全地與主同在。的確，知道而且感覺得到，自己是如此完整地在天主的手中，那是多麼有深度內涵的靈修經驗啊！」

我曾好長一段時間在思索這個問題：「是什麼東西，能讓一個人有這樣的人生取向？」他寫下這段文字的時間背景是：多年輝煌成就後，竟遭受公然的非難；以及面臨中風後的虛弱病體。他竟然擁有如此開放與信靠的態度，到底有什麼理由呢？在我偶然閱讀到一則有關他的報導後，才豁然了解。在1970年代末期，一位義大利籍的記者訪問他，問了一個問題：「對你而言，耶穌基督是誰？」

可以想像的是，這位見多識廣的記者，可能在期待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諸如，耶穌基督是我的朋友；祂是我的兄長；是我的領袖之類的話。

然而，伯老的回答是：「對我而言，耶穌基督是一切！」



雅魯培有一則默想禱詞廣為流傳，印在便條紙卡片上、大型海報中，甚至於馬克杯上。至於出自何方，是否確為雅魯培所寫的，迄今難以查考。在雅魯培神父的演講或書信集中，都未曾記載這段文字。根據曾任雅魯培總會長機要助理的美籍歐基輔神父的說法，它很可能是某人和雅魯培神父的某次談話後，將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並流傳出去的。這類形的內容，非常吻合雅魯培神父的風格。

世上最實際的事，莫過於找到天主，也就是以一種

全然不悔的方式，深深愛戀，你所愛戀的那一位，那攬住你的想像的，將為一切事物著上色彩。這將決定什麼使你得著力量，在清晨奮起；你怎麼度過每個夜晚，週末又如何安排；你讀什麼樣的書，認識什麼樣的人，什麼會讓你心碎，什麼又會讓你驚奇，充滿了喜樂和感激。若是愛上了，就留在愛裡，這會決定你的一切。



就是這種完全依賴與信靠耶穌基督的絕對心態，讓雅魯培得以持續地滿全他的服從誓願，甚至於在那個極為難堪的狀況下：來自梵蒂岡的、公開的非難。這一點，也是雅魯培最能開示我的所在，他是一個影響我日益深遠的重要人物。

過去數百年的教會歷史中，不乏這樣的例子，許多熱心的教友忠實於教會，卻遭受教會當局的誤解和不公平的對待。並非故作駭人聽聞。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就是個顯著的例子，聖女貞德的遭遇則更為具體，眾所周知。上個世紀內，就有好幾位著名的教會人士，被他們摯愛的教會迫害。舉例來說，梵二大公會議之前，許多高瞻遠矚的神學家，包括頂尖人物的耶穌會士墨瑞（John Courtney Murray, SJ）和道明會士孔加爾神父（Dominican Yves Congar），被教廷當局或修會的長上下令「封口」。

墨瑞神父是美國伍德斯托克學院（Woodstock College）的神學教授，針對教會與國家關係的議題，有非常多的論述著作。他認為，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亦即保障個人有自由權去決定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符合天主教會的訓誨。可是，教廷當局不同意這個論點，因而，他的長上於西元 1954 年命令他，停止有

關這個議題的論述。十年後，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主教（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 Archbishop of New York）邀請他，以專家顧問的身分，陪同前往羅馬，參與梵二大公會議。在那兒，先前被「封嘴」的墨瑞神父，偕同其他的委員們，共同建構了大會正式文件的《宗教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n Religious Freedom*）。它從墨瑞早先的有關著作中，汲取了理論基礎，肯定宗教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在後來的梵二會期中，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邀請墨瑞神父與他共祭彌撒，算是官方正式「平反」、還他一個公道的公開標記。

孔加爾神父的情況，相當類似。這位道明會士，被《天主教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Catholicism*）稱許為：「或許可以說是，梵二大公會議之前，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神學家。」關於教會的議題，他有廣泛的著作，尤其，在有關教會的權威、教會的傳統、一般信友和教會與其他信仰基督的各教派之關係，著墨甚多。由於這種突破性的獨到見解，他成了大受歡迎的教師、演講者和作家。西元 1953 年，他的大作《教會內部改革的真與假》（*True and False Reform in the Church*）突然被教會當局所禁，停止發售。翌年，又進一步限制他，不得擔任教職、公開演講或寫作。然而，事實證明他的著作是梵二大公會議有關文件的重要理論基礎。他受邀參與有關的委員會，他的著作是兩份梵二大會文件《教會憲章》（*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和《大公主義法令》（*Decree on Ecumenism*）的重要取材資料。

孔加爾神父後來被教會當局正式平反的場景，比起上述的墨瑞神父更具有戲劇性的高潮——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西元 1994 年任命他為樞機主教。

當年這兩位神父受到委屈對待時，可能有人會評論他們：「幹麼那麼傻，乖乖聽命保持沉默。」或是奉勸他們：「既然明知自己的著作是在幫助教會，那麼執意地奉行服從的誓願，豈不荒謬！」或者，更直截了當地明言：「乾脆脫離修會，不就可以自由地寫作了麼？」的確，類似的狀況也曾發生過。在那個年代，有類似遭遇的人，有的不當神父了，有的脫離修會，甚至於離開天主教會，自由地去各奔前程了。

墨瑞神父、孔加爾神父以及其他教會的忠僕們，包括雅魯培神父，他們之所以能心甘情願地接受教會當局的決定，乃基於堅守這份確信——聖神會經由他們誓守的服從願，有所作工；藉著他們這種對誓願的奉獻，天主自有祂的奇妙行事作為，縱然，他們所接受的決定，在當時看來，是多麼的不合邏輯、不公平，甚至於是危險的（還真是巧合，孔加爾神父被禁之前，他有一本書名叫《我信聖神》*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我想，這樣的心態，和男女結婚時相互許諾的誓言——無論環境順遂或嚴苛試煉，維護彼此關係的承諾，是有其相類似的嚴肅性。縱然，試煉臨頭之時，情況是如何地棘手難當，或者，以俗世的眼光來看，繼續彼此的婚姻關係，似乎沒有意義，但是他們的婚姻誓言，是天主會對他們忠信的一個標記，是彼此承諾的正確性的一個標記，是一個信靠天主的理由，天主會看顧，會安然地度過試煉期。

多默·牟敦在他的隱修院時期，也有類似的遭遇。當年，他一直害怕隱修院當局會箝制他關於冷戰問題的著作。果真，西元1962年，長上禁止他的書《後基督徒時代的和平》（*Peace in the Post-Christian Era*）的出版，並且命他停止有關戰爭以及和平這方面議題的寫作。牟敦對於長上的這個決定，大為憤怒，並且說到，

它反應了「對於目前的危機（譯者註：冷戰時期）在宗教層面上影響的嚴重性，有著令人訝異的不了解和無知」。這本書中對戰爭的軍事主義的批評，今天已廣為世人所接受，且終於在2004年出版了。

吉姆·佛瑞思特（Jim Forest）是一位致力於和平運動的人，曾收到牟敦寫給他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中也解釋了牟敦本人對於服從誓願的了解與決定。這封信，也被收錄在上述的《後基督徒時代的和平》一書中：

我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我自願選擇了這個狀態，而且，在能改變它的時機來臨時，又自願選擇繼續留在這個狀態中。如果，我是攪動一池春水的一個因素，那也沒辦法了。我不是為了攪動而去攪動，乃是依照我的良心的指示去發言，絕非在追求自身的利益。這表示，我會接受有權者可能加諸於我的限制；然而，我接受的理由，並非基於同意或不同意這種限制的表面上的理由，而是出於對天主的愛，祂運用這類的事情，來達到目前我的眼光所看不到、所不能理解的目的。我確實知道，祂能而且願意，在祂願意的時刻，看顧這些不公正或不明智地施加限制的這些有權者。這些，都是祂的事，而不是我的事。以這個向度來看，我發現「愛」和「服從」，這兩者並不矛盾，而事實上，還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以凌駕和超越這些因未及深思熟慮的命令而產生的限制和武斷。

遭中風折磨的伯鐸·雅魯培，在他的試煉期間，當然已無法動筆，為他的這番「服從」去暢述心懷。何況，內斂型的雅魯培神父哪會有牟敦那般的文筆。雖然，他以更沉穩的修為，履踐服從的誓願，教廷的決定依然是刺痛的——消息傳來時，他不禁淚流滿襟。然而，一如墨瑞神父和孔加爾神父同意「封嘴」，或者，如同牟敦的自述，確知天主在這些狀況中一定會有所作工，只是，他本人「在此時此刻看不見或不了解」，再次表達對已宣發誓願的承諾，雅魯培神父的「在天主手中」的短禱，是他相信天主終將帶來美善，而事實上，對他而言，耶穌基督就是「一切」。

在進入修會之初，我認為「服從」是將宣發的三個誓願中，最容易奉行的事。「貧窮」誓願要求捨棄許多東西，如此簡樸地去過生活，似乎非常困難。當然，我也知道，「貞潔」誓願會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沒有異性伴侶的親密和經常孤寂的生活，將是艱難的。「服從」麼，哪裡算得上是大麻煩事——他們告訴你做什麼，你就去做什麼，那不就好了？一切照規矩辦事。

最近，就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長上指示我，某些議題不要去碰，因恐怕在教會內部還頗有爭議。要忠誠履踐我已宣發的「服從」誓願，於是，牢記在心牟敦的那番話，衷心效法伯鐸·雅魯培的榜樣，我接受了長上的指示。我也懷抱著希望和確信，終究會有一天，得以自由地談論這些議題。

或許，將來時日的演變，我會發現，我自己的良心催促我，必須更公開地去張揚它們，或者，另闢途徑以闡釋之。畢竟，一個已打開明悟的良心具有至高性、尊嚴和不可侵犯性，這是天主教會歷史悠久的傳統。聖道茂有句名言：「寧願不服從教會的訓導，也不願做出相反良心的過犯。」梵二大公會議更是總結了歷

來教會關於此項議題的訓導，而宣稱：「在所有的行動中，人要忠實地順服自己的良心，以便能認識天主……隨之而來的是，人不可被逼迫，以相反他自己良心的狀態而行動。」

大會的宣言接著又說：「良心是一個人最私密的核心所在和至聖所。在那兒，他獨自面對天主，祂的聲音在他內心深處回響著。」

歷來，為了教會的好處，而自認為有責任必須發言，甚至於不惜甘冒風險的諸位聖人、聖女，可以開列出一長串的名單。這是諸聖受到自己良心的催迫所致。譬如，以奧祕者著稱於十四世紀的聖女佳琳（St.Catherine of Siena），就曾在一次教會的危機時，寫信給羅馬的樞機主教們，指責他們是「一叢叢不綻放香味的花朵，更發出一般惡臭，已然熏壞了整個的世界」。當人家詢問她，遙遠數百里外的羅馬城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妳怎麼會知道。她則直率地答道，這股惡臭已經一路飄到了西亞那城內。西元 1374 年，她寫了一封信給流亡在法國亞味儂（Avinon）的教宗國瑞九世（Pope Gregory IX），指示他遷回羅馬城：「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神父啊，起而行吧！」接著，她又說道：「我跟你直話直說！」

聖佳琳無法保持沉默。

相對地來看，墨瑞、孔加爾、牟敦等神父們保持沉默，則不僅是已宣發的「服從」誓願的要求，更是自己良心的指令。對雅魯培神父來說，保持沉默還不夠，他更須含忍地接受教會公開的指責，並且，還要以身作則地指導全體耶穌會士，用愛德來回應此事。

用不著明說，我哪能比得上他們這些人。但是，我知道，天

主會經由這些人的榜樣，在我的身上作工。我確信，我的服從誓願和依恃良心的企求，兩者揉合在一起，將會以某種奧妙的方式，向我自己和他人證明，它們是一個生命的泉源。

我能有如此的信靠，正如伯老的名言，全是因為「對我而言，耶穌基督是一切」。

7

馬薩比耶爾的岩洞內

伯爾納德
(Bernadette Soubirous)

在幾次的顯現之前和之後的時日中，她沒有什麼與眾不同、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只有在顯現事蹟的互動所遺留下來的些許痕跡，以及她的幾封書信中，人們可以察覺到她個性中的強勁張力和靈修的特質，然而，也就是在這些蛛絲馬跡當中，伯爾納德向我們敞開了她的胸懷。

——露絲·哈里斯 (Ruth Harris)

《露德：清新脫俗的身與靈》

(*Lourdes: Body and Spirit in the Secular Age*)

在我耶穌會初學第二年的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信步走進了休閒室，看看那兒的電視播些什麼影片。對一個口袋裡僅有每個月卅五元美金津貼的初學生來說，觀賞電視是休閒時刻的最佳選擇。大型電視機前面，十五把靠背椅一字排開。這般怪異的擺設，還曾被來訪的表弟消遣了一番，是否敝修會對沙發有偏見。

我一進門就嚷嚷：「在演什麼？」

有一位初學生從螢光幕前抬了一下頭，回我的話：「《伯爾納德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我接腔問道：「那是什麼樣的電影？」

這下子，整屋的人都轉過來，呆看著我。其中一位開了口：「快說，你是在開玩笑。」

我楞楞地搖搖頭。

打從進耶穌會初學院之後，我心知肚明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幼以來所學習到的天主教文化，簡直少得可憐。其他的初學生幾乎都在熱心的教友家庭氛圍中成長，諸如，每天望彌撒，參加九日敬禮，飯前謝恩禱告，能分辨無玷之心和聖心之間的區別等。而我，則還在開始強記有多少件聖事。

不僅是有分量的教理內容所知有限，有關天主教的大眾文化，更是一無所知，因此常被他們嘲笑。我想，這次可能又是另一樁的糗事——其他人十歲以前都看過的電影。

那位說話的初學生又開口了：「乖乖地坐下來。沒看過這部片子，你就不要跟人家說你是天主教徒。」

根據法蘭茲·維弗（Franz Werfel）同名的暢銷小說，而拍成的這部電影《伯爾納德之歌》，敘述西元 1858 年發生在法國南部露德小鎮的一連串聖母顯現的事蹟。珍妮弗·瓊斯（Jennifer Jones）飾演伯爾納德，男主角是當地的本堂神父，起初懷疑，終而大力支持她，是由查理·畢福特（Charles Bickford）飾演。說是一部大受天主教徒歡迎的電影，歷久不衰。雖有所刪節，確是一部感人肺腑的電影。原版的真實故事，更是如此。



伯爾納德（Bernadette Soubirous），和家人住在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山麓的露德小鎮。父親的磨坊生意失敗，由於經濟拮据，一家人，包括父母親和四個小孩，不得已棲身一間長和寬都不逾十呎的潮濕斗室之中。不久之前，這間小房還被使用為監禁犯人的牢房，當地人稱之為「黑牢」。

維弗的小說，在開頭的幾頁就清楚地交代了，曾經相當自傲的父親，面對眼前的一幅悲慘景況：「讓他惱怒的，不僅僅是這個醜陋的斗室，更是牆上那裝著鐵條的兩個小窗戶，一大一小，像極了一對斜著眼看人、一副瞧不起人的眼睛。窗外的院子裡，是鄰居們牲口的糞便，堆積如山，熏死人的臭氣，毫不留情地從那對眼睛飄進來。」

十四歲那一年（西元 1858 年）的二月十一日，伯爾納德偕同小妹多納德（Toinette）和一位鄰居，上山去撿柴，因為家中買不起炊煮用的柴火。數月前，她還到鄰村受雇為牧羊女。

她們到小鎮外面，赤足涉過水流湍急的卡芙河（Gave River），上到對岸的一個小山丘，名叫馬薩比耶爾（Massabielle，當地土話的意思是「古老的巨石」）。精研伯爾納德這段見證歷史的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史學家露絲·哈里斯，在她的大作《露德：清新脫俗的身與靈》書中，提醒讀者們注意，今日著名的聖母顯現岩洞，在當年可是非常偏僻的荒郊野外。據記載，十七世紀時，成羣野豬在此地出沒覓食。

兩名同伴涉水過河，到對岸去撿柴時，體弱多病且患有氣喘病的伯爾納德獨自留守。當按捺不住，也想涉水去找同伴時，她

先坐在河邊的石頭上。脫下第一隻腳的長襪時，耳邊聽到一陣颯風的聲音，可是四周沒有什麼動靜。於是，待彎腰脫下另一隻腳上的長襪時，她抬頭往上看。

這次，風吹開了馬薩比耶爾岩洞內壁龕間的一小叢玫瑰花，從那兒露出一道「微弱的光」。依據伯爾納德事後的受訪報告所說，她看見一位年輕的女子，在那光之中，身穿白色的外衣，對著她微笑（關於伯爾納德的這個見證報告，其他的許多報導，包括這部電影，都誤為一位成年的婦女）。

受到驚嚇的伯爾納德，趕緊從口袋中掏出玫瑰念珠來，要劃一個十字聖號。此時，更令她心生恐懼的是，她居然舉不起手來做聖號。對岸的那位年輕女子劃了一個十字聖號之後，她也跟著劃了聖號，並開始禱告。伯爾納德的報告這樣說道：「在我唸完了玫瑰經之後，她作手勢要我過到她那兒去；但是，我不敢去。於是，隔一會兒她就消失了。」

根據她的報告，這是第一次的顯現。就如同後來的幾次顯現一樣，除了她本人之外，在她身旁的人們，沒有一個人能看到、聽到或經驗到任何的事情。

在回家的路上，伯爾納德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她的小妹，並囑咐務必保密。可是，一回到家，小多納德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的母親：「伯爾納德看到一個穿白衣的女孩，在馬薩比耶爾的岩洞內！」她的父母認為，伯爾納德顯然是扯了一個大謊，氣急敗壞之下，把她打了一頓，禁止她再去那個地方。

幾天之後，仍為此事困擾不已的伯爾納德，在向神父告解中，述說了這一親眼目睹的異象。她沉著而且清楚地交代了這個故事，讓神父大吃一驚，因此，請她准許轉述給本堂神父阿貝·培拉瑪

(Abbé Peyramale) 知道。而本堂神父的反應，根據傳記作者赫內·勞倫丁 (René Laurentin) 的《露德的伯爾納德》 (*Bernadette of Lourdes*) 書中所述，本堂神父在目瞪口呆之下，只有喃喃地說道：「我們一定要等一等，再看看。」

鄰居和朋友們都來勸說她的父母，不要禁止她再去那個岩洞。鎮上一位有名望的人，用一番感性的話來說服她的父親：「一位拿著玫瑰念珠的貴婦——那肯定不是什麼壞的事兒。」終於，她的父母點頭了。這回，多了幾個小朋友一起去。

穿白衣的女子，又再度顯現了。伯爾納德開口請求這個異象：「如果你是從天主那兒來的，就留下來，否則，趕緊走開。」唯恐有所閃失，伯爾納德又朝著那顯現的方向灑聖水，而那女子只是微笑著，頭略往前傾。在整個顯現的過程中，伯爾納德的行為舉止，讓身旁的同伴們驚嚇異常——她的臉慘白，身體一動也不動——她們趕緊跑到附近的一個磨坊去求救。氣急敗壞的母親，也從鎮上趕了過來，女兒的舉止令她甚為苦惱，但仍按捺住毆打伯爾納德的衝動。

第三次的顯現，在二月十八日。鎮上許許多多熱衷此事的成人們也來了。有人慫恿伯爾納德，問問那女子是誰。當她拿著紙和筆，上前來詢問她的名字時，這個異象只是微笑著，首次開口，用當地的土話問伯爾納德：「你可不可以一連十五天到這裡來？」

接下來的兩次顯現，更多的羣眾簇擁而來。二月二十一日，第六次的顯現過後，一位心懷疑慮的本地警官，用嚴厲口氣質詢伯爾納德，希望能確定這是一個小孩子的惡作劇。在調查過程中，警官企圖誘導她說，是看到了「童貞瑪利亞」，但是，伯爾納德始終是以堅定的口吻，稱呼她在異象中所見到的那女子為「那

人」。當要求她再多描述細節時，伯爾納德說，那異象穿著「一件白色的外袍，用一條藍色的紗巾束攏著，頭上披著白色的罩巾，腳上各有一朵黃色的玫瑰花」。

從警局留下來的正式筆錄看得出來，是誠實、單純和前後一貫的堅持，這些都讓後來伯爾納德的支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警官做完筆錄，又重唸一遍給伯爾納德聽時，自己加了一句話，「童貞女朝我微笑」。宣讀到這句話時，她立即糾正：「我沒有說『童貞女』。」

對我來說，这一幕最令我折服——伯爾納德不想聳人聽聞地渲染，以造成轟動的印象。幾乎是直到最後的一次顯現，她一直不說，她看到的那個異象是童貞瑪利亞（雖然，鎮上的人們，幾乎從開始就這麼認定）。雖然家境貧窮，她不願意從她的這些經驗中，以任何的方式獲取利益，她拒絕任何人餽贈的禮物。在所有對她的調查作證中，她始終簡單而直截了當地說話，看到了什麼，沒看到什麼；聽見什麼，沒聽見什麼。這個態度，令人不禁憶起中世紀的聖女貞德來，她也是用這種口氣說話——這就是我所經驗到的，你們願意就相信吧！

二月二十五日，伯爾納德又來到了岩洞。這次，雲集的羣眾看到的伯爾納德，不像往常那般似乎是入迷的狀態，而是用手指頭在岩洞內的地面，一直挖著土，從那兒流出一些泉水，她就喝飲那泥水，又把野草塞進嘴內。事後，她是這樣的解說，「她告訴我，去喝泉水，在那裡面洗滌自己。我沒看見什麼水，於是就轉回頭，要朝卡芙河走去。但是，她用手指頭指示我，應該在這個石塊下找水。」至於，吃野草，伯爾納德說，是一個為罪人做補贖的表示。

然而，在旁觀羣眾的眼中，伯爾納德只是在地上挖土和吃野草，因而可能都被嚇壞了，有人喊說：「她發瘋了！」跟著羣眾一起前來的幾位嬌嬌，在被氣走之前，還打了她一下。

在《伯爾納德之歌》這部電影中，她受辱的這個場景，逐漸導引觀眾進入戲劇性的高潮。在圍觀的羣眾散盡之後，只剩下一位男士留下，他坐下來休息。攝影機的鏡頭，把焦點放在他擺在乾燥地面上的一隻手，在它的旁邊，先是幾滴小水滴，接著水滴涓涓，不久，一道小水流形成了。隨著高揚的樂音，一聲吶喊：「看哪！」

事實上，根據勞倫丁的傳記《露德的伯爾納德》書中的描述，有一小撮鎮民留下來，查看伯爾納德挖出泥水的地方，也試著再去挖。愈挖，清水就愈湧了出來。但是，無論如何，這部電影的確彰顯了當天這個事蹟的重點——伯爾納德發掘了這個泉水，它後來成為來露德朝聖的一個焦點。

伯爾納德再度被偵訊，氣憤的警官再三地脅迫她，要她當眾宣稱這只是一場胡鬧劇。然而，她依然堅持所見所言。兩天後，她又到岩洞去，從那個水泉中掬飲。三月一日那天，鎮上一位從樹上摔下而跌壞了一隻手臂的婦人，來到了岩洞內的水泉邊上，把那隻跌壞不能動的手臂浸到水泉裡。過了一會兒，已變形彎曲的幾個手指頭，居然能伸直了，手臂也治好了。這個案例，應屬於露德泉水的第一樁醫治的奇蹟。

人們對於伯爾納德看到異象的故事，愈來愈好奇、熱衷。在岩洞發生的第十五次顯現時，她的身邊簇擁著超過一千五百人的羣眾。這次顯現後，她跑去見本堂阿貝神父，告訴他，這次異象跟她所說的話：「快去，告訴神父們，組隊遊行到這裡來。還要

在這裡蓋一個小聖堂。」

根據勞倫丁在傳記書中的說法，本堂神父聽了以後，簡直嚇壞了。想想看，一個瘋女孩的胡言亂語，要是真的聽從這麼一個荒謬的指示，那該會遭受多大的羞辱啊。因此，謹慎小心的阿貝神父，要求從異象那兒再多得到一些釋疑。他命令伯爾納德，去詢問異象叫什麼名字，還有，就算是一考驗吧，請求異象讓岩洞內野生的玫瑰花叢綻放出花朵來。

在下一次的岩洞顯現時，伯爾納德聽命照問了。然而，異象只是微笑著——沒有花開，也不說名字。回去後，本堂神父再度跟伯爾納德強調：「如果這位貴婦人真的希望要蓋一座小堂，她必須告訴我們她的名字，而且一定要讓那兒的玫瑰開出花朵來。」

三月二十五日的顯現時，仍然沒有玫瑰花，但是給了一個名字。依照伯爾納德的自述，異象雙手合十，說道：「我是始胎無染原罪。」僅只略識粗淺要理的伯爾納德哪裡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她又急忙跑去見神父，生怕忘了這個句子，一路上口中不斷地重複著它。

影片中，描繪這個見面的場景，緊扣著即將來臨的一段問答。飾演本堂神父的查理·畢福特用嚴厲的口吻詢問伯爾納德：「始胎無染原罪。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飾演伯爾納德的珍妮弗·瓊斯搖搖頭。

神父接著跟她解釋（事實上，這些都是在神父寫給主教的報告信函中），這個名字是沒有意義的。

在此刻的四年之前，梵蒂岡教廷才公開宣布，「始胎無染原罪」是教會當信的要理，亦即認定童貞瑪利亞在其母胎中受孕之始，即沒有原罪。但是，說出「我是無原罪」這樣的句子，在文

法上有一點離譜，就好像說：「我是白色」，而正確的說法是「我是白色的」。

因此，這段好萊塢的電影手法，並未偏離故事的真實性。

接下來，還有兩次的顯現。在最後一次顯現之前，警方把岩洞的洞口用圍籬圍住，以免信徒聚攏進入。這一天是七月十六日，加爾默羅山聖母瞻禮日（Feast of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伯爾納德被限制在卡芙河的河岸邊，僅能隔著河眺望對岸的岩洞。這些舉措並未影響她：「我的眼中，沒有看見圍籬，也看不見卡芙河，」她如是地說著，「我好像身處在岩洞中，如同以往的幾次一樣。我只見到聖童貞女。」

這次顯現過後，伯爾納德的生活，有了極大的轉變。讚譽和造訪的人們，接踵而至，絡繹不絕的朝聖者，都想要一睹她的風采。為避免盛名所累，也希望能多接受些教育，西元 1860 年，她進入鎮上一所修女辦的學校。她一直保持著坦率和說話直爽的態度。西元 1861 年畢生首次照相時，攝影師要她擺出在岩洞顯現的表情和姿勢，伯爾納德抗議：「可是，她不在這兒呀！」

五年後，她二十二歲那年，她進了離露德數百英里外的尼維斯鎮（Nevers）上的一個仁愛修女會（Sisters of Charity）。離開家的前夕，她最後一次造訪那可親可愛的岩洞，「我在露德的使命已經結束了」。

在修女院的生涯中，她不願多張揚往事，希望大家不要注意她。只有在兩次不得已的狀況下，她才向修院的姊妹們講述聖童貞女顯現給她的事蹟。平時，長上也囑咐她避開這個話題，以免引起其他姊妹的妒嫉。自幼有氣喘、體弱多病的伯爾納德，無法承擔院內的多項工作，也不會作祈禱，「唉呀，我不知道怎麼做

默想」。

她常保持開朗的心情，生病時亦然，笑臉待人，也常捉弄院內的修女。養病期間，從事繡花工作。有次繡了許多愛心的形狀，她就跟旁人開玩笑說：「如果有人說我沒有良心，請告訴他們，我整天都在做『心』。」

可能在露德時已傳染了肺結核病，此時逐漸發作，不得不臥病在床。左腳又發現一個惡性腫瘤，健康急遽惡化。臨死前，她又再次提到當年顯現的事，「當時發生的事，我都一五一十地說過了。不過，我第一次的說法，是最完整的版本。在後來的重述中，可能有些細節忘記或遺漏了。如果有人要寫下來，愈簡單愈好」。她去世時，年方三十五歲。

她大多數的日子裡，永無止休的被詢問當年的顯現事蹟，要極有耐心地去承受；對於別人給她的餽贈，一貫地婉拒；偶爾，需要面對院內姊妹的妒嫉，雖然，這些都造成不少的困擾，然而，一旦思緒飄回那個岩洞時，她似乎內心就有平安。正如牛津史學家哈里斯的記述：「就像攝影師要求捕捉她在顯現當時的神態時，她從命而為，然而，她的心似乎留在另外的某處。」



按照勞倫丁傳記的記載，下面這段話，是伯爾納德的口述，關於她見到的第一次顯現：

我把手伸進口袋裡，摸到了玫瑰念珠。我要劃一個十字聖號……我無法舉起手到前額來。我被震懾住了，動彈不得，手在發抖。

那異象劃了一個十字聖號。然後，我想再試一次，成功了。一旦劃完了十字聖號，那恐懼的震懾感立即消失了。我跪下來，面對這位美麗的女子，唸著玫瑰經。異象的手指頭也在撥動她自己念珠上的珠子，但是她的嘴唇沒有動。我唸完了玫瑰經，她作勢要我向前去；可是，我不敢。然後，她就這樣消失了。



看完電影《伯爾納德之歌》的十年之後，我在讀神學，一位教授推薦我閱讀露絲·哈里斯寫的這本《露德：清新脫俗的身與靈》。這十年來，除了伯爾納德的每年紀念瞻禮日之外，我壓根沒想過她的事蹟，因而，始終僅有約略的印象。當開始閱讀這本書時，正如當年首次觀賞那部電影一樣，立刻深受吸引。電影所未及敘述的許多故事中的空白，都由這本書填上了。可以說，這本書導引我去認識真實歷史中的伯爾納德。

幾年前的某一天，我的一位慕名而來的讀者，從首都華盛頓（Washington, D. C.）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想要請我吃飯，聊一下。有人請客吃飯，當然歡迎囉，約好他來紐約之前，我們再敲定時間。羅伯（Rob）是一位熱心的教友、好父親、知心的讀者，還是頗有來頭的馬爾他騎士哩！

「你知道馬爾他騎士團嗎？」見面時，他劈頭就問到。我搖搖頭，關於天主教的文化傳統，我所知甚少。羅伯簡單扼要地介紹了一下她的歷史，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天主教慈善團體，她的創立，至少可溯源到第十一世紀。理論上來說，這個雄壯威武的騎士團是一個國際上承認的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議場上，它具有

「永久觀察員」的身分，如同「梵蒂岡」一樣。時至今日，這個國際性團體，不僅重視所屬團員的靈修生活，更多方致力於各項的慈善服務，尤其活躍於天主教辦的各個醫院內。

「其中，有一個大型的活動，是每年一度、七天的露德朝聖之旅。這個朝聖的經驗，令人十分驚訝。不曉得您是否有興趣來擔任隨團的神師？」

我告訴羅伯，事情還真巧，我正在閱讀第二遍哈里斯寫的這本有關露德的傳記，雖然多蒙他的奉承，我沒有答應，因為太忙了。但羅伯說：「我不會死心的，會一再地電話邀請，直到您答應為止。」

他果真說到做到。翌年的夏天，我正在俄亥俄州擔任避靜神師，羅伯又來電話了。在這個指導避靜的時刻，心情總是比較開放的，於是我就答應了。同時他還請我再邀請兩位耶穌會士，一同擔任神師。我的兩位朋友，也很快就答應了——布萊恩（Brian）是在這個避靜院服務的司鐸；而喬治即將晉鐸，就在預定朝聖歸來的一個月之後。

出發露德朝聖之前，我備妥了一本環裝的筆記本，以便隨時記錄朝聖途中的所見所聞和感想。以下，就是我的露德朝聖日誌。

4月28日，星期三

直飛法國露德（Tarbes-Lourdes-Pyrenees International Airport，此國際機場距露德鎮僅數公里）的包機，預定晚上7:00從巴爾的摩／華盛頓國際機場起飛（Baltimor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主辦單位馬爾他騎士團要求他們在起飛前三個小時在機場集合。當我們抵達機場大廳時，那兒已是人山人海，大部分是中、

老年人，有些人胸前還佩掛著過去曾參加過的紀念章（每次的露德朝聖都製作一個特別的紀念章），懸掛在紅緞帶上的金屬紋章，因來往走動而叮噠作響。羣眾中有許多人還是舊識。散布其中的，還有坐著輪椅的殘疾、病患者，也有夫婦懷抱的病童或天生殘疾幼兒。這些人就是哈里斯在傳記中所謂的「病患者」，而這樣的朝聖團主要是為這些人而舉辦的——他們的旅費，完全由馬爾他騎士團贊助，這是一樁了不起的善行。

眾人愉快地登機了。起飛後的第一件事，大家恭唸玫瑰經，由一位主教領頭。而飛行途中，機艙內放映的影片，沒什麼好奇怪的，就是《伯爾納德之歌》。

4月29日，星期四

經過一夜無眠的長途飛行，抵達了露德的國際機場。從機場出來，幾部大巴士駛在細雨霏霏的鄉間道路上，兩旁是又細且高的楊樹，很快就到了住所聖沙維旅舍（Hôtel Saint Sauveur）。露德鎮上所有的旅館和店鋪，好像都以聖人為名。

午飯過後，我們一行約二百五十人，步行到預定舉行彌撒的地點。行進的順序是，坐在輪椅上的「病患者」和陪同的家屬等先行，其他的人在後。我們收到的行前注意事項，關於服裝的建議是，「你的修會制式長衣，可以在任何的時間、任何的場合穿著。尤其，因天冷而在岩洞內舉行彌撒時，更有其用處，而在遊行的場合，那就更不用說了」。於是，我們三位都各自索取到了耶穌會士制式的黑色長衣，今天我們都已經穿上了。一如事前所料，這身黑色的長衣，非但沒有帶來任何的不便，或是讓別人受窘，在這個露德鎮上，它再適合不過了。經過大教堂前的廣場，

我注意到，有穿咖啡色長袍的方濟會士和穿著白色長袍的道明會士，甚至於還發現一位身穿黑、白相間會服的隱修士。當我穿著有白色羅馬領的襯衫時，讓人感覺就是一位司鐸；而此刻的這身黑色長袍，則讓我覺得是個十足的耶穌會士。

在這兒，人們由長袍顏色和式樣，仍能分辨得出它的代表意義。幾天後，遇見一位陌生的朝聖者，迎面過來，跟我們打了一個招呼：「啊，耶穌會士。」

在華麗的大教堂內舉行的彌撒結束後，有人提議，去參訪顯現的岩洞。大教堂建築在巨石狀山丘的頂部，起先我以為還要走一大段的路，哪知道，轉一個彎，經過一長排全是販售白色長蠟燭的店家後，岩洞就在眼前了。位在這座龐然、黑色的大教堂的下方，它的景象早就從聖像的卡片上熟悉的：一個簡樸的祭台，前面是放置蠟燭的鐵欄，上方是曲折的黑色石塊；旁邊有一個壁龕，這就是顯現所在的位置——一尊露德聖母的雕像，四周環繞著那句 1858 年 3 月 25 日對伯爾納德說的話：「我是始胎無染原罪。」

岩洞前方的空地上，豎立著一個「保持安靜」的告示牌，人們在此能明顯地感受到一股安詳的氣氛，而那寧靜似乎是來自馬薩比耶爾岩洞內。我們到時，已有幾百人聚集在那兒。病患者坐在藍色的輪椅上；一位波蘭籍的司鐸，帶領著一羣朝聖者誦唸玫瑰經；一位穿著牛仔褲的年輕背包客，跪在那兒禱告。更多的人在排著隊，要繞洞一圈。我們也跟著排隊，也用手撫摸那平滑而潮濕的岩壁，看到伯爾納德當年用手掘出的那股水泉，非常驚喜。能身歷其境，內心感到無比的奇妙。

在經過聖母態像的下方時，我留意到，在她腳的下方，有一

叢叢各式各樣的小花，宛若中世紀流行的掛毯畫。

吃過晚飯後，我又散步來到了岩洞。買了兩根蠟燭，為家人祈禱，在成排成排的燭火光中，我置放了我的蠟燭，鐵架上已然熏黑的壁上，鏤刻著一個有悠久傳統的字句：「這火焰延續著我的禱告。」必恭必敬地佇立在岩洞前，從袋內掏出一張名單卡片，我一一為他們和他們的意向而禱告。

附近，有一大羣的人正在集結，準備要開始晚間的玫瑰經誦禱遊行。擴音喇叭依次傳出各國的語言——法語、英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波蘭語和德語——解說玫瑰的祈禱和其奧祕，數千人的羣眾，各人手持小蠟燭，上端橙色的火焰，罩在一個印有各式聖母歌曲的小燈籠內，整個遊行隊伍環繞大教堂前橢圓形的走道而行進著。第一端唸完之後，眾人齊唱〈露德聖母歌〉（Lourdes Hymn），嘹亮的歌聲波浪中，也漂浮著我自己對聖母的孝愛之情。身處在如此龐大人羣的美妙之中，令我感動不已。

當第一首〈聖母經〉（Ave Maria）歌聲蕩漾在廣場之上時，數千個朝聖者一同高舉手中的橙色火焰，如此盛大場面的信仰宣示，怎會不令人激動。想想看：這些來自地球上各個不同的角落、不同年齡的眾人，還有必須別人扶持的病患者，齊集於此地，而這個世界，原本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

夜晚，經過一連卅六個小時未曾闔眼，終於困頓想睡了。我和布萊恩一個房間，兩張單人床僅一呎之隔，不巧的是，他打呼的聲音，響徹雲霄。在輾轉反側無眠的一個小時之後，我穿上衣服，走到樓下的大廳再翻閱一遍哈里斯的大作。約莫一個小時之後，再返回房間，呼聲依然如故。

就當作是刻苦的靈修吧，我躺上床，數小時後，清醒依然。

也許這是天主賞賜的一個磨練吧，我又唸了一遍玫瑰經。想想那些病患者，那些行動不便的人，他們的處境比我更難受。我也想到哈里斯書中的描述，在十九世紀末，到露德朝聖，為大多數的朝聖者來說，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旅程。於是，我又唸了一遍玫瑰經。然後，我想通了——要是一位無精打采的神師，只是如同行屍走肉般地整天晃過來晃過去，難道這樣對得起來朝聖的團員嗎？

因此，雖然全身筋疲力盡，仍打起精神，步下樓梯來到大廳的櫃台，另要一間單人房。「對不起，沒空房間了。」值夜班的櫃台先生，以傳統法國式的聳聳肩抱歉地答覆我。

對街上，起碼還有至少十家旅館，走出去問問看。這時，約略清晨四點鐘，下著毛毛的細雨，路面濕滑得很，我的腦袋，幾乎已經不清醒了，跌跌撞撞地走進對街的一間旅館。看似敞開給大街的空蕩大廳，一頭栽進去，撞上了視而不見的玻璃門。

值班的櫃台先生趕緊出來應門。我口齒不清、含含糊糊地吐出了幾個法文字句——是否有空房間，多少錢等。他一副鄙夷的目光瞪著我。突然間，我警覺了過來，我這一副模樣，就好像剛從哪裡找了一晚的樂子回來，身上居然還穿著神父的長袍哩。他斜著眼瞥向對街的一家旅館，把我趕出來了。

天都快亮了，我決定還是先回到原來的旅館，等天亮以後再看看吧，同時，我也向聖伯爾納德禱告，請她幫助我找到一個棲身之地。撫摸著撞痛的前額，我回到了房間，布萊恩的呼聲小多了。天大亮後，又起身出門，總算找到一個不太貴的房間了，謝謝聖伯爾納德，倒頭就睡，著著實實地補足了睡眠。

4月30日，星期五

幾個小時後起身，橫過馬路，回到原來的旅館，和喬治及布萊恩一同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我回來時，經過昨晚遭遇的那間旅社，瞄見值夜班的那位先生站在玻璃門邊看著我。他鬼鬼祟祟地對我笑著，還舉起手指頭搖了一搖，似乎在對我說，「神父啊，昨晚你通宵達旦找樂子的那一碼子事，我可是知道的」。

到此時為止，我們三位神師已經見到過許多的馬爾他騎士成員，以及一同來朝聖的病患者。在露德這裡，「病患者」不帶有任何貶抑的味道，正如朝聖團裡的一位主教所言，「我們每一個人，在某一方面來說，都是一位病患者」。不過，親耳聽到他們訴說患病的種類，還是相當的吃驚：他們之中，有癌症、愛滋病、萊姆式症、癡呆症和天生的殘疾缺陷。午餐時，我和一對來自費城（Philadelphia）的夫婦同桌。這位太太罹患一種我從未聽聞的病——她不到四十歲，走路時步伐不穩，極易導致一連串的疼痛症狀。他們夫婦很清楚這個病的嚴重性，彼此依然友善、快樂和關懷。這位太太跟我說：「噢，我很好啊！來到這兒後，我一直很開心地笑著，好多有趣的事啊！」我很喜歡他們。在去舉行彌撒的路途上，布萊恩和喬治也分享了他們和病患者交往的類似經驗。

當然囉，露德以其水泉曾多次治癒的奇蹟而著名，雖然，伯爾納德見到的異象，從未有這樣的暗示。馬爾他騎士團所舉辦的露德朝聖團，在行前須知的說明中，也奉勸切勿有身體治癒的期待。如眾所周知的，通常，朝聖的效果是心靈上的治癒。但此時此地，我還是要為病患者的身體治癒而禱告，特別是那些我認識的人，不管他身在此地，或是在我的家鄉。

下午的行程安排，是沿著一條小陡坡上舉行拜苦路。每一處苦路的人物，都是真人大小的尺寸，以耀眼的金色描繪製成。寒風細雨中，男女的馬爾他騎士沿途協助這些行動不便的病患者。《人人拜苦路》（*Everyone's Way of the Cross*）的小冊子，人手一本，我先翻閱一下，心想大概仍是些老套的詞句用語。這回我可錯了，其用詞淺顯易讀，禱文極其動人。尤其，當我瞥見一位身體虛弱的老人家，在同伴的攙扶下，行走在又濕又滑的路面上時，在第四處苦路的一段禱文這麼寫著：「主啊，我知道祢要告訴我什麼。親眼望著我們所愛的人的痛苦，更甚於我們自己去承受它。」

今晚的玫瑰經遊行，如同昨晚一樣令人感動。本地的朝聖服務人員，在大隊的人羣中，盯住了我們三位：「你們三位是神父嗎？」我才剛一點頭，他就把我們請出隊伍外，帶到教堂大門口前的階梯上。在那兒，已有多位神父，在為等候的教友們服務告解聖事。此時，眾口齊唱的〈露德聖母〉歌聲，正開始響徹在濕冷的夜空中，我們幾位司鐸都轉頭注目這龐大的羣眾，一位來自英國的神父回過頭來，對我說道：「今晚，普世教會看起來還不錯嘛，不是嗎？」

5月1日，星期六

今早，輪到我們的沐浴時間。巨石岩壁鑿出的長廊上，一長排的木頭椅子上，坐滿了依序等候的病患者及其伴隨人員和朝聖客。我身旁坐的是兩位同來的團員。其中一位年約四十多歲，顯得出奇的沉默，後來我才知道，他罹患一種因萊姆式症而導致的癡呆。石壁上鏤刻著瑪利亞囑咐伯爾納德的那句話：「去飲這水泉，在那兒洗浴。」各種不同語言詠唱的〈聖母經〉歌聲，每隔

幾分鐘就播放一次。

一個小時後，輪到我們了，被召喚進到一小塊地方，四周用藍、白相間條紋的浴簾圍著。進去後，脫掉內衣，坐在塑膠椅上等待著。隔著浴簾，我聽見有人跳進浴池的拍擊水聲，幾秒鐘後，他張個大嘴巴，笑著出現了。我正想觀察，傳說中露德的泉水會「很神奇」地快乾，是否屬實之時，另一端的浴簾打開了，一位面帶微笑的服務員，請我入內。

在這方小斗室中，三位服務員環繞一個凹下的石頭浴池站立著。我讀中學時學習的法語，此刻全派上了用場，我們聊得挺好的。其中一位，用手指了一下旁邊的木製衣架，把我的內褲掛上去，迅即給我圍上一條冰冷的濕毛巾。（午餐時，一位沐浴過的病患者，打趣地說：「我想，他們都把毛巾存放在冰箱內！」）另一位導引我走近浴池邊上，囑咐道，開始為自己需要的治癒而祈禱。在我做十字聖號時，他們也一起低下頭和我一起祈禱。一邊一個人，攙扶著我的手臂，導引我走下浴池的台階，水是冷的，但不會比游泳池的水更冷。「請坐下」，我坐在水中之時，他們仍扶著我的手臂。在這個略顯昏暗的斗室內，浸浴泉水中，身旁有兩位好心的人士扶持著我，外界喧囂的塵世，似乎被隔絕了。接著，他們哦了一聲，扶我站起來，手指一下聖母的雕像，我上前親吻了一下她的腳。然後，一勺清水遞在嘴邊，我喝了下去。

出了浴池，剛站妥，一位志工服務員就要求我降福他們。我身上僅圍一條毛巾，舉手降福，他們三人跪在濕冷的石板上，跟著胸前劃十字聖號。「大概生平第一次給人降福時，沒穿衣服吧？」其中一位這麼打趣著，我們都笑了。

很快地穿好衣服，我趕到馬薩比耶爾岩洞，朝聖團員們正在

那兒舉行彌撒。對了，還有一件事要交代，果不其然，洗浴後的泉水，很快就乾掉了。

下午五點鐘，毛毛細雨中，布萊恩和我步行到附近的一座聖衣會隱修院。簡樸白色小教堂內，低矮的小條椅權充跪凳用，四周極為安靜，是暫離喧聲羣眾，難得的寧靜時刻。才坐下來沒幾分鐘，一個鐘聲響起，十餘位修女們靜靜地魚貫而出，預備要做晚禱。她們坐在祭台的左邊，一塊由高大的鐵欄杆圍著的區域內。看見她們身穿的修會傳統式咖啡色搭配白色的會衣，不禁想到里修的小德蘭。美麗、悅耳的吟詠聲，高亢而清晰，是少女的音調——我想像著，當年小德蘭在她的會院中，每天是否就是這樣的吟唱著？而當這股平緩的詠唱調，充滿整個空間之時，我感覺到小德蘭似乎離我很近，她那股生命的聖潔激盪我心。

5月2日，星期日

在馬薩比耶爾岩洞附近的地下，一座命名為「聖碧岳十世」的聖殿，於西元1958年落成，真難以令人相信，它可以容納兩萬人。整個是水泥建築的結構體，若不是四周沿牆約十英尺高的諸聖壁畫，真會讓人誤會，這是一個橢圓形的巨大地下停車場。前方懸掛著一個巨幅的畫像旗幟，其下方一行法文字，「真福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今早，我們朝聖團，加入馬爾他騎士團每年一度在露德的年會，在此舉行大禮彌撒。

簇擁在更衣所內，有數十位神父們，二十幾位主教，和三位樞機主教。上萬人的隆重進堂遊行，場面是驚人的喜悅。高處好幾個巨幅銀幕上，打出正在詠唱的歌詞，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輪番上陣，以便不同國籍的人士齊聲詠唱。領

聖體時，有人遞給我一隻裝滿聖體的金色聖爵，指示我跟隨在前開導、舉著黃色旗幟的一位義籍青年。他小心翼翼地詢問我，他有一個女朋友在美國，若有需要輔導時，可否打電話給我。隨著黃旗的引導，我步入茫茫人海之中，湧上前來、伸長的手張開著，要接領聖體，似乎在這個世界上的此刻，只有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彌撒後，我和一位方濟會士走出來。一位法籍的朝聖者，要求我聽他的告解，於是，我們就坐在太陽底下的一塊石頭上。他辦完告解後，我抬頭一看，一行小隊伍已經排上了，趕緊招呼那位方濟會神父來幫忙。有一位義籍的朝聖者，在我旁邊坐下來，「義大利語？」我點了點頭，可是，我的義大利文程度太差了，三兩下就不夠用了。在給他赦罪之前，我告訴他，或許我本人沒完全聽懂他的告解，可是，天主全聽懂了。

下午，到露德鎮上逛了一下，想給朋友們買些紀念品。來此之前，我曾聽到會裡弟兄的一些抱怨，說此間店鋪所販售的貨色，多半是以假亂真。我不以為意，為朋友買一份禮物，是表達出我在露德仍記得他們的一番美意。

隨手翻看吊掛的一排玫瑰念珠，一眼就望見那串非常眼熟的念珠，和我二十年前大學剛畢業，來巴黎旅遊時所購買的那串念珠一模一樣。鏈子中央的小金屬牌，正面是瑪利亞，背面一個法文字「Indécrochable」。在那次歐遊歸來的幾年內，我遍查法英字典，這個法文字的意思是「強壯的」或「不會損壞的」。我心裡想，用在聖母的身上，是一個滿不錯的修飾語。

一位女店員過來招呼：「是啊，Indécrochable 就是牢固的意思，你看，珠鏈拉不壞的。」她還試扯了一下，向我證明，「你看，多牢固啊！」

我笑著跟她說，我認為這個字，是用在聖母身上，而非念珠本身，這個字是一種神學上的用語，Immaculée（無染）或Indécrochable（無損）。

這位店員聽完我的解說之後，開心的大笑，立刻又轉述給她的一位助手，而她更是開懷地大笑。「不，這不是一個神學上的用詞，它是一個宣傳上的用語！」這回她用英文來消遣我。

5月3日，星期一

清晨六點半，我們全團開赴伯爾納德的故居，每三十人搭乘一部巴士。沿途，經過數十家的紀念品商店，喬治附耳過來，輕聲笑道：「你看，伯爾納德多麼幸福啊，去完岩洞，返家的路途上，不愁買不到上好的紀念品，可以慰勞自己一下。」沒想到，前座兩位病患婦女聽到了這句話，格格地笑著。

伯爾納德的故居，在一個狹小的巷道旁，至今仍稱為「黑牢」，因為，在她們全家入住之前，它是一間牢房。讓我大吃一驚的是，眼前親眼目睹的斗室，要比《伯爾納德之歌》電影中的那間陋室小太多了。據勞倫丁傳記上的描述，這個斗室內，有兩張床，共睡了六個人。

一位修女事前安排了，在「黑牢」斗室中，舉行一台彌撒，由前幾天才過來加入我們這個朝聖團的華盛頓特區麥卡立樞機主教（Theodore Cardinal McCarrick）主禮。受限於室內空間狹小，本團僅允許病患和他們的隨行者參加。和樞機一起共祭的，除另外一位司鐸外，就是我們三位耶穌會士了。

擠進近三十個人的彌撒即將開始，眾病患引頸望著樞機。緊繃的氣氛，在樞機的開場白中，一掃而空。他說，今天，我們大

家都像沙丁魚一樣的擠在這兒，因為沙丁魚不必站起來，所以，彌撒中不要煩惱要起立的事：大夥兒鬨堂大笑。

昨天，樞機在岩洞旁帶領一個龐大羣眾的聖體遊行；今天面對一小撮人，他也能精闢地講道。對於受苦的意義，他做了一番簡短而動人的禮讚：天主愛我們；在受苦中，天主願意和我們同在，願意藉著人性的耶穌基督，給我們希望。

在我自己的思緒中，我覺得這一切的場景，多麼的不搭調——現在我們齊集於此地，全是因為一位貧窮的十四歲小女孩的緣故。

下午，雨下個不停。在一座哥德式的建築內，我度過了數個小時。門外，一塊白底藍字的告示牌，寫著「告解」。前院裡，有一座跪姿的雕像，是一位十九世紀法國鄉下的本堂神父聖若翰·衛雅（St. John Vianney），以熱心聽告解而著稱（據說，他每天在告解亭的時間超過十八個小時）。屋內，在標示著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荷蘭語及義大利語的小門外，要告解的信友們，坐在靠走道牆邊的木條椅上等候著。似乎德籍的朝聖者占多數，因為，每隔不久，就會探頭，在我這個標示著「英語」的門簾外，一副抱著希望地探詢：「德語？」

5月4日，星期二

明天，我們就要返回美國了。我決定再去浸洗一次。現在，我已經認識了好幾位在裡面服務的志工。坐在長條椅上等候時，我詢問其中的一位是否喜歡這份工作。他神情愉快地回答我，「噢，這不是一份工作！我和在這裡的其他服務員一樣都是義工。如果是來打工的，我就會想，幫一個人要收費一個歐元，搞不好，

還得按照體重來計算，一公斤一歐元哩！」他笑得很開心，「在這裡做義工，對每一位進來的人，我都視之為和我一樣有血有肉的一個人，而非一個數字。」

他說，許多第一次來這兒的朝聖者，顯得有些緊張和擔心，「這是很自然的事。人麼，都可能會生病，也許會著涼，還有人害怕萬一滑進了浴池裡，怎麼辦？」談到他本人，他第一次來這兒的經驗，是某種轉變的震撼。使用英語好像辭不達意，他又回到了法語。「我感覺到，彷彿內心中有一道門打開了」，他把撫在胸前的雙手，往外用力一推，十足戲劇效果的表情，「此後，所有的事兒都和從前不一樣了。」

進到內室，個性開朗的服務員也是我之前見過的，開懷的笑容，朝著我吶喊：「嘿，我的朋友！」另外一位服務員注意到我的會衣長袍：「你是耶穌會士吧？那麼，我們可說是一家人囉。」我正在納悶，他就接著說：「我是波蘭人，我的姓氏是葛斯加（Kostka）。」於是，攙扶著我下水的兩隻手臂，一個是「我的朋友」，另一個是「我的家人」——波蘭聖人達義·葛斯加（St. Stanislaus Kostka）是我們耶穌會的前輩會士，而他家族的後人，當然也就是我的家人囉！

下午，我在旅館房間的浴室內嗽口時，突然心生奇想，要是今天瑪利亞要在浴室這種地方顯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畢竟，當年在岩洞顯現時，那個地方還是野豬羣盤踞、骯髒的荒郊野外。幾分鐘後，我下到旅館的大廳，一位年長的朝聖團員過來找我談話，訴說今早他本人去浸洗時發生的一樁奇事。

雖然長期有病在身，這位長者是一位理智型的人，思路仍然條理清楚（基於個人私密，以下的細節略有改動，但基本架構不

變)。他在哭泣中訴說，今早的浸浴之後，他在男用廁所內聽到一個婦女的聲音說：「你的罪被赦免了。」當時，廁所內空無一人。而女用的浸浴所又相隔很遠。

然後，他想到了一件事。來露德朝聖之前，他就曾經為得到這個恩典而禱告。雖然最近也曾辦過一次告解，但他還是覺得內心有過犯的重壓。我答覆他說，在我們的祈禱中，天主可以用許多的方式來和我們溝通——經由內省、回憶往事或是情感的抒發等方式。雖然，很少人主動地公開分享此類的經驗，但也不是未曾聽聞過。譬如，德蕾莎姆姆生命轉變的那個關鍵性事件，就是類似狀況的告白和呈現。在我跟他提到，剛才我在浴室內那個突生的奇想時，他還真的嚇了一跳。縱然未曾預期它，這個聽到聲音的奇事，並非不合道理的——在朝聖的過程中，以一種清晰而且獨特的方式，獲得一個來自天主的恩寵。再說，你的罪的的確確是已經在告解聖事中被赦免了。

「那個聲音聽起來怎麼樣？」我好奇的問他。

「噢，非常的安詳。」

今天晚上，馬爾他騎士團舉辦了一個臨別餐會。節目安排緊湊，演說、歌唱、臨時排演的幽默短劇和餘興獎品。我得到最佳勇氣服務獎，因為，我曾不憑藉我服裝的權威給人降福。年幼的幾位病患者，包括脊椎側彎者、癌症者、天生缺陷者，合唱了一首短歌，雖然荒腔走板又斷斷續續，卻賺得最多的掌聲和淚水。

餐會上，一位騎士告訴我，那位脊椎側彎的小朋友，是他所遇見最開朗的人。這位小朋友曾跟人家說，回到學校後，班上的同學們可能會很失望，「他們以為，我的背會直了，身子也因此拉高了」。因為，那天早上他去浸洗過了，但變形的身體沒有改

變。他就跟旁邊的人說：「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啊，到了天堂以後，我的背就會直了，也會是個高個子。」

伯爾納德訴說的顯現事蹟，許多的教友難以接受，畢竟，只有她一個人見證而已。當然，露德顯現的事蹟，不像耶穌復活就是一個信條那般，不是一個天主教友當信的道理。

然而，故事本身的美麗和伯爾納德的性格，卻讓我很容易接受它。童貞女傳達出的訊息，既簡短又合理：為過犯做補贖、祈禱和朝聖。無論如何，經歷過這次的露德之行，我更加地信服它，感謝這個地方和這裡所有的人們。

為我個人來說，伯爾納德代表著一個強有力的記號——必須忠實於你個人所見到的異象。打從 1858 年第一次的顯現開始，歷經母親的斥責、朋友的嘲弄、警察的偵訊、教會當局的檢查、直到生命終結都未曾間斷的懷疑目光，伯爾納德始終堅持她一貫的說法。在面臨迫害時，她單純地回覆別人，她看到什麼就說什麼。在忠信這個層面上，她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榜樣；在確信個人經驗的層面上，她是一個見證人；只問事實，而不計後果。以她自己的方式，伯爾納德成為先知性的人物。

耶穌會初學時，首次觀賞到《伯爾納德之歌》電影後，我在往後的許多場合，都會聯想到她。當人們（這樣的人，還不在少數）嘲笑我進耶穌會的選擇，說修道的生活沒有意義；或者，當有人批評，天主教會造成的傷害，要比做過的好事還要多時，我就會想到伯爾納德如何如何。當很多人當著我的面，表達對天主教會的輕蔑和厭惡時；或者，指責司鐸們都有變童症，或性騷擾時，我記得伯爾納德的表現。有些人，當著我的面毫不留情的指控，只有愚夫愚婦、易於受騙的人，才會相信天主時，我想到伯

爾納德的態度。我聯想到尚年幼的伯爾納德定睛注視著岩洞的小壁龕，確信她所親眼目睹的，意志堅定於她所相信的。

在露德朝聖最後一天的清晨，我又來到岩洞。天還未大亮，已經有一台彌撒在那兒舉行著，已有許多的朝聖者在那兒，有人跪在空地上，有人手撫岩壁，有人在唸玫瑰經，有人希望被治癒。從西元 1858 年開始以來，一直就是這個景況。

旭日東昇至大教堂的尖頂之上，鐘樓傳來〈露德聖母〉的清脆音符，而我，行走在廣場上。

8

這份喜悅，與人共享

德蕾莎姆姆
(Mother Teresa)

有些事，你能做到，我沒法做。而我能做的事，你不會做。

讓我們共同攜手，為天主做一些美善的事。

——德蕾莎姆姆
(Mother Teresa)

我是德蕾莎姆姆的仰慕者。認識的人當中，有些曾見過她，簡直羨煞了我。我的父親，就和德蕾莎姆姆握過手。

當時，我在讀大學，父親去東南亞出差，返程時，在日本的一個機場過境轉機。耐著性子坐在機場候機室時，他注意到遠方有一陣騷動：一羣人圍攏聚在一個區域，顯然是在等待某個名人的到來。人羣擠向前去，他突然發現德蕾莎姆姆就在眼前，於是，把手伸長了過去，而她也握住了。那天晚上，媽媽在電話中告訴我：「你爸爸見到了德蕾莎姆姆！他說，她又瘦又矮小。」

過了些時候，我回家，見到了父親，就急切地問他，德蕾莎

握到的是哪一隻手。他就很神氣地把那隻手伸出來。

進耶穌會以後，我遇見許多見過她的人，有的還跟她一起工作過。德蕾莎姆姆在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的家，磁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不分宗教信仰，大家都盼望和這位「低賤者的聖人」相遇。凡見過她的人，都會談論她，關於她那顯而易見的聖潔、直來直往的態度、她冷面笑匠式的幽默。（在當面接受一位富豪的捐款時，她典型的應對句是「還不夠！」）

還有，她那倔強的脾氣，也是出了名的。有一位耶穌會士，就曾向我訴說，他和姆姆，你來我往交鋒的一段往事。這位公共衛生專家的耶穌會士，前往加爾各答做義工。姆姆（大家都這麼稱呼她）特別願意跟司鐸們見面。在他們首次會面交談的場合上，專家神父抓住了這個機會，大談如何改善垂死之家的衛生條件。妳的修女們，應該這樣、這樣的擺放藥品，而不該那樣、那樣的放置；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病患，而非那樣的處理那些事情，應該這樣、這樣，而非那樣、那樣。

姆姆微笑地回答：「那些不是我們的方法。」

我的朋友堅持，不退讓。他說：「依照我的方法來處理事情，真的會更好。畢竟，我可是公共衛生的博士耶。」姆姆還是沉著地回答：「不，那不是我們的方法。」

對於她的這種固執，我的朋友非常憤怒，再次地強調，依照我們專家的看法，這樣做會好很多。姆姆依然重複那句老話，「不，神父啊，那不是我們的方法。」

我的朋友氣得拍桌子：「妳真是太……太不講理了！」

他以自嘲的口吻，倒述這段往事。一位初學的會士打趣地插嘴說：「你居然敢指責我們的活聖人不講理，光這一條罪狀，就

夠你在煉獄裡多待上幾天！」

我首度和德蕾莎姆姆取得連繫，是若干年以後的事。那是我在波士頓讀神學的時候，我有一系列的文章刊登在《美國》雜誌上，大標題是：「我如何能發現天主？」其中還包括，對不同信仰的讀者投書所作的答覆。刊完後幾個月，有一位出版商打電話給我，探詢是否有意集結成一本書出版。但是還需要補充一些內容，多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對這個主題作回應。

因此，我草擬了一份包括宗教界人士、公眾人物、作家等的名單，給他們寫信。很高興，大約一半的人回了信，還有人寫了專文。

在婉拒邀稿的回函中，我最窩心的是一個老舊機器製作、紙質粗糙的白色信封袋。發信的地址是：印度，加爾各答市，波士路，仁愛傳教修女會。

當天在會院負責收發信件的是一位讀書修士提姆（Tim）。他收到這封信後，興奮地朝樓上一直大喊：「嘿，吉姆，你跟德蕾莎姆姆寫信了嗎？」

我衝下樓來，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抽出了半張薄薄的信紙，信封內還附了一張白色的小卡片。提姆站在旁邊，等著我唸這封信。「親愛的詹姆士修士」這封信在開頭語之後，提到我寄給她的信，接著寫道：

天主愛你，因著你可愛的努力，你會引導人們更接近祂的真理和大愛。我當然會在祈禱中記著你這份努力的意向，祈願耶穌使用這本書，為了天主的光榮和祂子女的益處。

可是，我很抱歉地告訴你，我不能如你信上的要求，為這本書寫一篇文章。

希望在你的內心中，常常保持愛耶穌的這份喜悅，也與你周遭的人分享這份喜悅。讓我們一起祈禱。

願天主降福你。

德蕾莎，仁愛傳教會

「哇，那卡片上寫的是什麼？」我把卡片遞給提姆，他唸出來：

靜默的成果是祈禱
祈禱的成果是信仰
信仰的成果是大愛
大愛的成果是服務
服務的成果是平安

德蕾莎姆姆

我很炫耀地把這封信，拿給會院內的每一位弟兄看。其中一位說道：「這不就等於一篇回應你的文章，應該收錄進那本書中。」

如此這般，和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開始結緣了。再往前追溯，在我耶穌會初學時，曾到牙買加（Jamaica）的京士頓（Kingston）實習，與德蕾莎姆姆派遣在那兒工作的修女們，共事了四個月。算上這段機緣，我和德蕾莎姆姆的關係，更拉近了一層。



耶穌會初學期的第一年，我們必須從事一項「第三世界的試驗」（Third World Experiment）。這裡所謂的「試驗」，是耶穌會使用的術語，亦即「經驗」。

快過聖誕節的時候，院方通知我和同班的比爾（Bill），將要去牙買加做這項「試驗」。牙買加是美國東北部耶穌會新英格蘭（New England）會省歷來的服務地區，那兒有好幾個耶穌會掌管的小本堂，以及兩所中學。在牙買加天主教的文化中，耶穌會占有重大的影響，首都京士頓總主教區，當時的總主教也是一位耶穌會士，是本地人士。

派遣初學生到第三世界去體驗，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是要把我們放在貧窮者的生活環境當中，以便有機會親身體驗第三世界的窮苦人家是如何為他們的生活打拚。這也是讓我們明瞭，教會所宣示「優先選擇為窮人」內涵的一種方法。其次，是一種訓練，要我們在不熟悉的環境中，培育出對天主的信賴。第三，幫助我們對於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的了解。最後，藉著親自接觸到普世性的耶穌會的服務工作，而能開闊對於修會生活的視野，眼光不僅停留在美國本土的各種運作上——這種機會，依照初學院神師的說法，是認識「跨國性質的耶穌會」的一個開端。

一位年長且曾長期海外服務過的會士弟兄，對我最後這一項的理由，又添加了一番詮釋。他說道：「你知道嗎，去認識這個國際性修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去發現，原來其他國家的耶穌會士，也和美國的會士一樣，都是些難纏的人物！」

在啟程赴牙買加之前的等待期間，我可沒像上述理由那麼的高尚；我只想到我自己的狀況，不知道會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一想到要去第三世界地區工作，我就嚇壞了。雖然，如今再

回顧往事，清楚地知道，牙買加的工作經驗對我具有改造的性質，然而，重新翻閱當時的日記，不由得想起，當時的心情是多麼的害怕，也因而抹殺了幾許的自得意滿。

也不能全怪我自尋煩惱。前一年去當地「試驗」過的學長們，給我們的腦袋裡，灌滿了他們的恐怖經驗故事。這些故事，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而其他部分，則可能改編過，以顯示他們是多麼的堅強，或者，只是用來嚇唬我們的。

有一位修士說，某一堂區的治安環境不好，常有幫派械鬥的事，有時候，流彈四射，他們這些初學生嚇得趴在神父宿舍的地板上（此言經查證屬實）。另一位說，京士頓城的總會院位在惡名昭彰的貧民區內，因此，會院四周圍起高牆，上面還砌著玻璃碎片，以為嚇阻（此言屬實），武裝警衛不定的巡邏（警衛屬實，但未配備武器）。另一位修士透露，因為當地買不到藥品（顯非事實），所以，他攜帶了一大袋的常用藥品去。

雖然，偶爾有這些負面的事，但正面的事更多著哩，譬如，牙買加的人很熱情、鄉下的風景秀麗、本地的文化非常有特色，況且，我們耶穌會很受歡迎。可是，我還是很擔心，主要的是在疾病方面：要是在那兒生了病，怎麼辦？當地的水質如何，能飲用嗎？食物衛生嗎？有一位讀書修士曾告訴我，他從前在那兒做「試驗」的時候，染患了登革熱症，那是一種被蚊子叮咬而傳染到的疾病，發病時非常疼痛（他後來康復了）。這個故事讓我記憶深刻，他是這麼形容的：「生病的第一個禮拜，你擔憂的是，會不會死掉。第二個禮拜的時候，你擔憂的是，萬一死不掉，怎麼辦。」

啟程赴牙買加的前夕，我獨自坐在初學院起居室的沙發上，

手上捧讀一本聖依納爵的傳記，希望不要去胡思亂想那些自己嚇自己的事。一位年長的會士喬（Joe），手裡端著一杯咖啡，走進來，坐在搖椅上。他經驗豐富，是年輕修士們爭相諮詢的好神師，年近八十歲，仍然熱愛生命，有一副開放的心胸。我非常尊敬他。如果有人要求他嘗試一個新任務，或是一件未曾做過的事，譬如，到一個未曾去過的本堂去做彌撒，或是從事一項未曾經歷過的使徒工作，或者是改變會院內慣常的事務處理方式，甚至於，要他學習做一道新的菜，他總是以他的口頭禪回覆，「為什麼不呢？」

他關心地詢問我：「都準備好啦？」

我坦誠地把近日來的擔憂和煩惱，一五一十地向他訴說了。

至今我還記得那天的場景，喬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耐心地聽我訴說，一邊用手撫著他那灰色的一小撮鬍子，一邊還搖著椅子。

等我說完了話，他才接腔：「那麼，為什麼不能就允許自己可能會生病呢？」

有時候，一句話就能解開心結。他的那句話，正是當下我需要被點醒的話——我必須讓自己成為普通的一般人，而人麼，就難免可能會生病；若生了病，那就去想辦法來處理它。當天晚上，我把這句話，記錄在日記上，還在下面劃了一道紅線條，又用黃色筆加註記號，以便在牙買加服務期間，隨時易於翻閱和提醒。同時，我也寫上自己的感想：「我真的要為能接受自己的心態而禱告，要能做到成為自己，而非在人前戴上一副冒充勇敢的虛假面具，尤其，在我處於焦慮、沮喪、困擾……之時。」

多虧喬的這番座右銘式的指點，我在京士頓四個月的試驗期間，內心能保持相當的平安，但這不是說，在這段期間，事事平安順遂毫無波折。

我和比爾一起住在位於聖喬治高中校園的耶穌會院。的確，它坐落於城內的一個危險的區域內，四周是石砌的圍牆。居住的房間是斯巴達式的，一如前輩們的事先警告：一個木床、一張木桌、平木的地板、窗戶上沒有遮陽的窗簾（抵達的那天，房間的天花板上，還有一個大蜂窩，成羣的黃蜂進進出出）。來此之前的警告，一點不假，夜晚的睡覺，才是最大的挑戰——屋內有蚊子在耳邊嗡嗡地鳴叫；屋外，附近酒吧大力放送的雷鬼音樂（Reggae music，譯者註：西印度羣島的流行音樂，節奏強勁）。震耳欲聾的聲響波浪，和著不知是何人的叫囂、呼喊聲，間或，有幾輪槍響聲，流彈四射。

然而，也有不少事先未曾預料的賞心樂事，平衡了這些缺憾。當時，有幾位年輕的會士，也在城裡工作。和我們住同一會院的，就有三位「試教修士」（Regents，讀神學之前，被派遣出外試教的會士），其中，兩位是本地人，另一位美國籍。還有一位剛晉鐸的神父跟我們同住一個會院。此外，有一位加拿大籍的試教修士，在數英里外的一個本堂工作；一位美籍的試教修士在西印度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附近的一個本堂工作。他們僅比我年長六、七歲，都是我的好夥伴，願意傾聽我的憂慮、誠心地為我加油打氣，在我過分地自尋煩惱時，從旁協助我，讓我得以回過頭來自嘲一番。

來牙買加之前，輔導神師交代我們可以選擇兩項使徒工作，但其中有一項是必選——德蕾莎姆姆的修會所辦的「垂死之家」。

從我們住的會院，到這座垂死之家，中間要步行穿越一大片的貧民區。這是我首次面對面地看到如此窮困人家的生活狀況，雖然，在以後的生涯中，類似的狀況，是愈來愈熟悉。千瘡百孔

的泥土小路，蜿蜒於窄小、水泥牆的鐵皮屋之間。時而，咩咩鳴叫的山羊，穿行其間；瘦弱的狗兒，懶洋洋地倒臥在路邊的排水溝內；間或，一頭大肥豬，在臭氣熏人的垃圾堆內搜尋食物。沿途，水果攤上矮胖的婦人，抽菸（說不定，不是普通的菸草）、笑鬧的年輕男子，瘦弱的兒童，穿著白衣、藍褲或藍裙整齊制服的男女學生。由於住家狹小，他們的生活，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屋外或路邊。早上，我們會碰到有人在路邊漱口。

雖然我們衣著普通，這裡的每一個人好像都認為比爾和我都是「神父」（也許，是因為白皮膚的關係）。路過時，會很禮貌的問候我們：「早安，神父！」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垂死之家，是一幢兩層樓的水泥建築，漆上了鮮豔的白色和藍色油漆，牆上漆著本院名稱的一行小字，「和平之后」（Our Lady Queen of Peace）。一進到院牆內，撲鼻而來的是一股混合的氣味——包括漂白水、尿液、排泄物、食物、奶茶和消毒劑等，立即，而且永恆地牢牢烙印在我的記憶之中。

穿著白色粗布沙麗（Sari，譯者註：一疋長布裹住全身，是印度的一般婦女服裝）鑲藍色邊條修會會服的一位印度籍修女，笑咪咪地出來迎接我們。目睹這身德蕾莎姆姆的會衣，我登時感到目瞪口呆，宛若見到她本人一般，面對她那種獨特的聖潔。

修女們的使命，是照顧京士頓城各個貧民窟內窮困潦倒、嚴重患病及瀕臨死亡之人。每天早上，她們出門去尋找不能自行料理的病患，多次把他們運送回垂死之家，給他們洗澡、換上乾淨的衣服、餵他們吃飯，有一個棲身之所，可以平安的過世。長條形的屋內，一側是男士區，另一側婦女專用，光線明亮，氣氛愉快。屋前，是一個寬敞的院子，修女們在那兒洗滌骯髒的衣物、

床單、毛巾等。

這些修女們總是在動著，就連在溽暑的天氣下也不例外。黎明即起，彌撒後即出門，到附近需要的人家裡照料，幫忙打掃整理狹窄的屋內，然後回家，準備眾人的午餐，下午再度出外工作，做更多、更多的工作，然後回家做晚飯。雖然忙個不停，但是她們似乎總是滿懷喜樂。為什麼會這樣的喜樂呢？有一次，我這樣問她們中的一位。這位修女引用了德蕾莎修女的名言：「因為，我們照顧的對象是耶穌基督本人，祂隱藏在這些痛苦不堪的偽裝之中。」

這些修女們總是引用德蕾莎姆姆的話，「姆姆說……」。她們引用姆姆的話，來解釋為何以某種的風格來做特定的一件事。德蕾莎修女的標準和指導原則，貫徹在這整座屋內。傳記作者凱斯琳·史賓克（Kathryn Spink）在《德蕾莎姆姆傳》（*Mother Teresa*）中寫道：「在神學看法的觀念上以及處事的心態上，德蕾莎姆姆堅定相信，必須嚴格地遵循既定的規則，要講究紀律上的細節規定，內務要整潔，修會的會衣具有標幟性，團體制式祈禱和敬禮的必要性。不僅大原則，她連細節都要求清楚地規範及遵行。」正如歷史悠久的傳統男、女修會團體一般，一位仁愛會的修女，即使跨越了大半個地球，到異地他鄉的另一個分支團體中服務，她仍然會感覺就像在自己的家裡一樣。雖然她不在眼前，德蕾莎姆姆是一個隱形的臨在，行走在修女們當中，指揮著她們。

在諸如清洗衣物等實際具體的操作指示外，具有更深遠影響力的，是她面對照料這些「窮人之中最貧窮的人」（*The Poorest of the Poor*，文句中的「P」，德蕾莎姆姆經常使用英文的大寫字母，以為強調）的心態——此乃一種具有深度的靜觀心態。

她要求她的修女們成為「祈禱專家」，藉著服務基督的窮人們，而達成服務基督的目標。所以這個修會的修女們不僅是社會工作者。更進一步，依照她的闡釋，「是基督的臨在在指導著我們」。她在清理一位癲瘋病人的傷時，曾有一位人士見到了，就說：「給我一百萬美元，我也不會幹這個事。」德蕾莎姆姆立刻回應他：「我也不會。但是，為基督而做，我很樂意。」

傳記作者史賓克在寫給我的信中強調，《瑪竇福音》中的那段章節，是建構了德蕾莎修女的使命的「絕對性重心」。福音中，耶穌所說的那句話，她完完全全地照著字面去遵行：「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譯者註：瑪廿五 40）。史賓克小姐的信上繼續說：

在這句話的基礎上，產生出了這樣的確信：在接觸窮人的身體時，她和她的修女們實實在在地在接觸基督的身體。從窮苦人們受折損的軀體中，基督吶喊著，要被愛，而於此同時，祂又在餅和酒的祭獻中，把自己奉獻出來，作為食物，這樣，祂的窮人就會被餵食。這個奧祕的視野，是德蕾莎姆姆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基礎，她做每一件事時的心態。

和京士頓城內這羣修女一起工作的經驗，有助於我領悟這個仁愛傳教修女會的神修方式，其實說起來，和我們耶穌會的神修，並無二致。既屬奧祕真奇卻又實際可行、既有行動又具默觀、屬此塵世間卻又超凡於來世。如同耶穌會的神修，是植基於聖依納爵的生命和他所處的時代，這個修女會的神修，植基於現在大家

所稱的「加爾各答的真福德蕾莎」。



雅妮·貢薩·波扎修（Agnes Gonxha Bojaxhiu），西元 1910 年出生於阿爾巴尼亞的斯高熱（Skopje, Albania）。父母都是熱心的教友。母親拉納（Drana）曾長年照顧住家附近的一位老婦人，替她炊煮和清理屋內。這位婦女深為酒精中毒所折磨，身上滿是痛瘡。回憶這件往事時，德蕾莎姆姆談論到，這位婦女不僅身受病魔，更苦於心靈的孤獨寂寞。拉納曉諭女兒，要默默地行善：「當妳做一件善事的時候，要默默地做，好像丟一塊石頭到大海中那樣。」

本堂神父是一位耶穌會士，他曾在教堂中提及世界各地天主教傳教士的工作，打動了雅妮幼小的心靈，十二歲時即萌生修道的意願。西元 1928 年 10 月，她十八歲那一年，進了愛爾蘭都柏林市的羅雷托修女會（Loreto Sisters）。三個月之後，瑪利亞·德蕾莎修女（Sr. Mary Teresa，她進入修會後，取用這個名字，以示景仰里修的聖女小德蘭）乘船前往印度。此後，她就一直住在那兒，過了一輩子。

在印度的初期，她過著和會內其他姊妹一樣的生活——在羅雷托修會辦的學校裡教書。這個修會的使命，是藉由教育的途徑，達成脫離貧窮的桎梏。在她首次經驗到當地兒童的家庭生活狀況時，寫到：「不可能再找到更貧窮的了。」西元 1937 年，宣發「貧窮、守貞、服從」的終身誓願。依照羅雷托會的習慣，此後她被稱呼為「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幾年後，在得到神師的同意之後，她又私下宣發了一個誓願——凡天主所要的，都

給予，任何事都不拒絕祂。

西元 1946 年 9 月 10 日，她搭乘長途火車，前往北部山區的大吉嶺（Darjeeling）。過去幾個月學校工作的勞頓，導致她經常病倒，因此長上安排她到印度北部寧靜的山區內，去做一個小避靜，也藉此機會多休養。就是在這趟火車旅程中，她經驗到一個「召叫」，以她自己的話來說——「一個召叫內的召叫」。

雖然在此生當中，她盡量避免直接談論這個經驗（因恐他人被誤導，而不把事情的重點放在天主的身上），然而，在她死後，人們啟動她的列聖品審查程序時，這個火車上的獨特經驗，終於全然呈現世人眼前。

在德蕾莎姆姆寫給神師和本地主教的諸多信函中，她曾透露這個罕見的恩寵經驗——是一種神修學者所謂的「另類的說話」，亦即，她親耳聽到天主在對她說話。在給加爾各答教區總主教斐迪南·培理（Ferdinand Périer, SJ.）的一封信中，她提到天主對她說的話，那句話改變了她的一生：「妳不願意幫忙嗎？」在她的祈禱中，基督直截了當地要求她離開她的修會，去開始那與貧窮人在一起的工作。

如何回應呢？她在祈禱中，傾訴自己的疑慮和害怕。已然是一位快樂的羅雷托修會修女——怎麼要離開修會呢？還有更多的苦難和貧困匱乏，要讓她去目睹和面對；她將會成為「許多人的笑柄」；她將經驗到孤寂、羞辱和未來的不確定感。然而，在祈禱中，她聽到的那個聲音是如此地堅定：「妳要拒絕為我做這個嗎？」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她在祈禱時，沐浴於與天主同在的那份深度親密的悅樂中，這就是聖依納爵所說的「神慰」。和神師

見面討論這個狀況後，她決定先尋求總主教同意她離開修會，出去開創與窮人在一起的志業。在獲得總主教的同意後，她上書羅雷托會的總會長，接著，又寫信向教宗碧岳十二世（Pope Pius XII）申請，而於西元 1948 年 4 月收到羅馬的回函，所請照准。

於是，她開始全心投入嶄新的奉獻生活，這就是現今世人所耳熟能詳的、為貧窮人服務的志業。然而要踏出這第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離開羅雷托修會，是我有生以來最困難的一件事。比較起來，當年要離開家庭和祖國，去過修會的生活，都沒有那麼樣的困難。我的神修培育和工作，都在這個修會，羅雷托修會已是我的一切」。

除了精神上和個人情感上的挑戰之外，更有現實生活的考驗擺在眼前。為要開始為貧窮者的服務，她先去尋求醫療傳教修女會（Medical Mission Sisters）的協助，接受她們的醫療培訓；暫時的棲身之所，尤其刻不容緩，幸蒙貧窮小姊妹修女會（Litter Sisters of the Poor）的收容。安頓之後，她就開始到貧民區內，去教導兒童們識字讀書。身著與窮苦人家婦女相同的粗布做的莎麗，大家蹲在地上，她用細棍在泥土上寫字教課。

不久之後，她在城裡找到了一個小房子，有了第一批響應而來的修女們，加入她的行列。一個為窮人服務的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於焉成立，也聚攏了一羣醫生、護士和天主教友志工們，前來襄助。不久，又找到了一幢房子，緊鄰一座印度寺廟，原供作來此廟進香朝聖者的休息之處，在此處創辦了「無玷聖心之家」（Nirmal Hriday）。

雖然，她們的這番義行善舉，受到不分宗教信仰、大眾人士的歡迎和景仰，但一個外籍的基督徒婦女以及她的夥伴們，難免

引來本地人公然的敵意，尤其，她們明顯地侵犯了印度教徒的地盤。開始有人向她們丟石頭、出言恐嚇，甚至於有一個人企圖殺害德蕾莎姆姆。然而，她們是用愛和更多的服務，來答覆這些敵意。凱斯琳·史賓克的傳記中，記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天，一羣年輕的印度教徒來到無玷聖心之家，為首的一位青年進到裡面去，想要把德蕾莎姆姆趕出來，「可是，他親眼目睹了周遭的這一切，病痛苦難、瘦弱憔悴的貧窮的男、女、老、小，是如何地被人伺候和照料著。他轉過身離開，出到大門外，對同來的這羣抗議者說，要把屋內的那些婦女們趕出去，那不成問題，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你們先回自己的家去，說服你們的母親和姊妹們，來這個地方，接下她們現在所做的服務工作」。

終其一生為窮人服務，以永不止息的行動和熱情——在各地陸續開辦垂死之家、行走世界訪視各地急速擴張的修會團體、促成一個配合工作的男修會。這個男修會的成員，起初，全部是修士，逐漸有司鐸加入。在修女會的架構下，又有各樣的「同工」（Coworkers，譯者註：比一般的義工，做更多的承諾）加入服務的志業。

西元1969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記者馬孔·墨格瑞（Malcolm Muggeridge）製作了一部關於德蕾莎修女和其工作的記錄影片《為天主做的一樁美事》（*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在全國的電視台播出，旋即出版同名的一本書。由一位非天主教友擔任影片的製作，他描繪和拍攝一位深具基督信仰的婦女的所作所為，更激起國際社會人士對德蕾莎修女普遍一致的讚揚和注意。而墨格瑞本人，更在影片的製作過程中，驚訝地發現她的名實相符，因而深受感動，於多年後也皈依信主。墨格瑞的書內，

也記錄了拍攝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在影片拍攝的密集接觸過程中，德蕾莎姆姆注意到，影片導演的權威和全體組員對導演的向心力與順從，因而開示她自己的修女們，也當如此地事奉和聽從天主。

盛名日增，世界各地政府、大學、宗教機構、慈善組織等的尊崇和頒獎，接踵而至。她幾乎是來者不拒，因為，可以利用這些機會，尤其是在發表演說之時，分享她的理念，「它給了我一個機會，能和聽眾談論基督，否則，也許他們沒有機會聽到祂」。她也巧妙地利用她的盛名，在世界各地建立修會的新據點，創辦新的垂死之家，以擴展為窮人服務的工作。

西元 1979 年，德蕾莎姆姆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當人們問她，為何決定親自前往領獎，她答覆道：「我本人不夠資格獲此殊榮，而我個人也不想要這個。但是藉著頒發給我這個獎項，挪威人民已經承認了窮人們的存在，而我是代表他們來這裡的。」

一如她在公開典禮上演說的慣例，她不看講稿，在挪威奧斯陸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slo）的頒獎典禮上作即席的演說。身著白色鑲有藍邊條的粗布製莎麗會衣，這位瘦小而又駝背的老婦人，面對眾賓客侃侃而談，陳述畢生的服務工作、窮人的事蹟、細數反對墮胎的理由，最後，申明天主的大愛：「讓我們在心中保持這份熱愛耶穌的喜悅，並和我們所接觸到的人們，一起分享它。這份投射出去、與人分享的喜悅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擁有基督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沒有理由不快樂。基督在我們的內心中，在我們所遇到的窮人中，在我們所給出去的微笑中，也在我們接受到的微笑中。」



雖然沒有同名的兩位聖女前輩——亞維拉的大德蘭和里修的小德蘭——那般的文采盎然、為文著書，德蕾莎姆姆簡潔有力的經典語句，強力放送給世人，她所要傳達的訊息，卻是毫不遜色。茲摘錄幾則如下：

今天，談論貧窮人家的話題，是很時髦的一件事；不幸的是，人們卻不時興與他們面對面的談話。



在已開發的國家中，有一種人與人之間缺乏親近的貧窮，這是精神的貧窮、孤寂的貧窮、缺少愛的貧窮。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疾病，比它更嚴重。



天主不要求我成為一個成功的人，祂要求我是一個忠信於祂的人。



要成為一位聖人，你必須認真地要求自己成為一位聖人。



終其一生，德蕾莎姆姆未曾考量自己個人的、物質的需求，而以一种認同於基督苦難的心態，來面對與處理那些在她的使徒工作上的各樣艱困。在領受諾貝爾和平獎、停留在挪威的期間，陪同前往的修女們費盡口舌才終於勸服她，至少要穿著一雙毛襪

在腳上，才耐得住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冬季的寒凍天氣。後來，之所以發現她的心臟衰弱，需要隨時、密集地醫療監控它，還是在一次訪美期間，因陪同另一位修女去看病，被眼尖的醫生看出她明顯症狀的結果。

姆姆要求她的修女們勤奮地工作，偶爾，會有嚴厲和要求過分之嫌。在修會成立的初期，她曾寫信給某些修女，表達對其工作上的不滿：「姆姆我能做到徹夜地工作，利用晚間來旅行，以便空出白天的時間來工作。以我這個年紀，和大家吃喝一樣的伙食，一整天地工作著；而妳們，打著與窮人生活在一起的名義，卻享受著懶惰的生活，難道對妳們來說，這不是一種羞辱嗎？」

直到垂暮病弱的生命盡頭，仍然辛勤幹活的德蕾莎修女，忍受背駝與病苦，而於西元 1997 年的八十七歲那一年過世。載送她的遺體前往舉行葬禮彌撒的大教堂的，是一輛印度政府所提供的砲車，它曾載送過馬哈默·甘地（Mahatma Gandhi，譯者註：印度的國父）和賈瓦拉·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譯者註：印度 1947 年獨立為共和國後的首任總統）的遺體，數以萬計的印度加爾各答市民，佇立沿途的街道邊上，向她默哀致敬。普世的眾人，幾乎眾口一致地稱呼她為「活聖人」。然而，也不是沒有詆毀的聲音——有人詆毀她，說她以鍾愛窮人的名義，接受了聲名狼藉的政客和財閥的金錢捐贈。但是，人人心知肚明，她收到的捐贈和她所有的努力，全部指向「窮人中最窮的人」。

她死後六年，仰慕她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將她列品為「加爾各答的真福德蕾莎」（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這是創紀錄的快速。

她生平的事蹟，是眾人耳熟能詳的。但是，其中有一個在信

仰層面上的經歷，卻是她死後才逐漸被揭露出來，讓許多自以為很了解她的人士，大為震驚。我認為，她的這項在生前人未知曉的層面，更發人深省。

這項她生命中的重大祕密，發生的時間，是在那具生命轉折性的大吉嶺火車之旅後不久。在與天主同在極為親近的甜蜜關係之後，德蕾莎姆姆開始經歷到神修生活上的黑夜（spiritual darkness，譯者註：最嚴重程度的「神枯」）。這種「黑夜」的期間，為期相當的長，甚至於，有人斷言，它直到她生命的盡頭。

大吉嶺之旅以後的數個月之內，她在祈禱時，充滿神慰。然而，其後不久她就開始進入一種她所謂的「內在的黑暗」（interior darkness）的神枯狀態之中，那是一種遠離天主的感覺，而這種神枯狀態一直持續，直到她死亡。她寫信向她的一位神師，形容她的「內在的黑暗」——天主似乎不存在、天堂是虛空的，更難受的是，她的苦難付出是沒有意義的。她也向培里總主教吐露：「在我的靈魂內，我僅只感覺到那種極大的痛楚——失落感，天主不要我了，天主不再是唯一、全能的真神，天主不是真正的存在著。」

在她去世以後多年，我才首次閱讀到這個報導，當時我楞住了。負責推動德蕾莎姆姆列聖品程序的，是一位仁愛傳教男修會的布萊恩·柯洛迪殊神父（Fr. Brian Kolodiejchuk），收集許多她的相關文件和私人信函。卡羅·札勒斯基（Carol Zaleski）根據柯神父收集的史料，寫了一篇文章〈德蕾莎姆姆心靈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Mother Teresa），刊登在一本天主教的雜誌《首要之事》（*First Things*）上。從德蕾莎姆姆的這些私人信函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她在和「心靈的黑夜」搏鬥著。所謂的「心靈的黑夜」是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的用語，那是一種在

祈禱時，感到遠離天主和極度的「乾枯」的持續性的經驗。而對德蕾莎姆姆來說，既然已感受到與天主何等的親密，如今卻又被隔離，這種被捨棄的感覺是她困擾、不知所措與痛苦的根源。柯神父說：「據我們所知，德蕾莎姆姆一直處於『漆黑』的信德和完全降服於天主的狀態之中，一直到她死亡。」

札勒斯基在該篇文章的諸多論述中，有一點深得我心：「我們倒是情願看到，她的日子常處在與天主契合的那種神祕而心花怒放的狀態中，這樣，我們這些塵世中的凡夫俗子，就能避免大惑不解的苦思。」

相信大家都這麼想，人們心目中的這位「活聖人」，一定是整天都沐浴在有天主臨在的極其幸福之中。所以，她勞苦終日為窮人服務，做起來要比我們這些人容易多了——因為，我們都欠缺那種來自天主的經常性慰藉與肯定。因而，我可能自己下一個結論，去從事她那樣的工作，我們都不是那塊料。讓那些像德蕾莎姆姆這類的人物來做吧，會更容易做，也更自然而然。現在，事實擺在眼前，要她去做那樣的工作，甚至於度一個基督徒的生活，都不會比你、我來得「更容易些」。對她的難度，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很多人相信，只有我們這羣「可腐朽」的人哪，才會在祈禱時陷於掙扎——祈禱怎麼會這麼的索然無味、乾枯，甚至於無聊；天主聽到了我的禱告嗎？天主關心我嗎？這番努力值得嗎？我們會想，聖人多麼幸福啊，對他們來說，祈禱不難，有甜蜜、有安慰，只要閉上眼睛，那種天主臨在的溫暖感覺，即刻獎賞而來。現在，德蕾莎姆姆現成的例子擺在我們的眼前——就別提其他一長串的諸聖的例子了，看看聖女小德蘭也曾在臨死前經歷了那份

「心靈的黑夜」的嚴峻試煉——明白地顯示出，到頭來聖人們和我們一樣，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要掙扎、要奮鬥，甚至於在我們最不可能懷疑的神修層面上，亦然。有時，他們面臨試煉，還更甚於你我哩！

在神師的指導之下，假以時日，德蕾莎姆姆終能領悟，而視此種痛苦的黑暗，乃是她整體使徒工作中的「神修」，是一種完全認同基督的必經途徑，甚至於，要去體會祂在十字架上時那種被捨棄的感覺。她有一封信上是這麼寫的：「我已經到達能喜歡這種黑夜的地步，因為我相信，它是耶穌在世上時所經歷過的暗夜和痛苦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小、非常小的一部分。」回憶起幼時的家鄉，母親曾多年照顧的那位無依又病苦的老婦人，當時，老婦人那種被遺忘、沒有人要的感受，她現在也經驗到了。在這一點上，她就能夠更加地認同那些在極端苦難中的貧窮人們。

至於，這種神修上的「心靈的黑夜」期間，在德蕾莎修女的生命中，到底持續了多久？被指定撰寫她傳記的凱斯琳·史賓克認為，就現有的文件紀錄來看，還很難論定。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史賓克是這麼說的：「一個人只要和她（德蕾莎修女）在一起很短的時間，就能知道，你在信中很恰當地提到的那份喜悅，絕不是膚淺的、表面的。讓我們觀察一下，每當在耶穌聖體前祈禱之後，她的氣質境界的增長；仔細地瞧瞧，每當她處在那些她視之為基督化身的窮苦人們之中時，她是如何地活力十足；你就不難明瞭，她一定是經常地被那種天主是在經由她而作工的認知所肯定著。」

史賓克對於推動德蕾莎修女列聖品的諸多理由的證據，抱持高度尊重與佩服的態度，但是她也指出，若是不管信函和論述文

字等有其各自特定的上下文，而逕自斷章取義地摘錄出來，作為更具支持性的佐證，是會有誤導的危險。所以，不論這種神修上的試煉期間有多長，是否長達一輩子，那只有德蕾莎姆姆本人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的確有這類的試煉，史賓克給我的信中這樣寫道：「這種靈魂上的黑夜，當時是整個修行過程的一部分。對於她的這個經驗，我沒有懷疑，尤其在從事這番志業的早期，離開已經習慣的舊環境，而踏進不可知未來的茫然失落之中，形單影孤的孑然一身，還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冷言冷語。在她生命後期的情況，也類似。」

我們可以確定，在德蕾莎姆姆畢生的修行過程中，是充滿激烈的掙扎與奮鬥。對我本人來說，這一點是她更為獨特的一項成就，而且是更具有意義的一個榜樣。她的使徒工作，建立在直截了當地與基督親密接觸的基礎之上，然而，無論它延續了多長的時間，是否終生如此，它終將褪去而歸於沉寂，她的這份使徒工作的本身，已然是一份對主忠信的了不起的見證。

她生命中的這個層面，超越其他的層面，深烙我心。而且我發現，無論在述說她的事蹟，寫文章介紹她，對她行敬禮，或是在避靜中引用她作為範例，她的這份聖潔總是最能感動大家的心坎。



當年在牙買加和在當地的仁愛傳教會修女們一起工作時，上述的這些關於德蕾莎姆姆的事，我尚未知曉。當時，我只知道，修女們辛勤地工作，愉快地面對每一個人，她們指示我們兩位在那兒實習的初學會士，跟著她們的示範照做就對了。

我們被指派的工作，是照料男性的院民，替他們洗澡和穿衣

服。平時，修女們雇了一位牙買加籍的老人來負責，女性院民則由她們自己負責照顧。這裡有數十位男性院民，當然他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而我們兩人就是他的助手。

這些工作，看上去都不難做，但都是令一般人卻步的事情，我一直都沒有習慣。

清早，這些老人家就在院子裡排排的坐著，等候洗澡。一個一個地領著進入熱氣騰騰的洗澡房。先要幫他脫衣服，經常，褲子尿濕了，或者，睡覺時沾上了些髒東西，那就不僅只是直截了當地脫掉，我得跪在濕地板上，把褲子解開、拉下、脫掉等等。這項工作，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嚴苛的考驗。

接下來，我要領他到浴池內，這又是一項挑戰。老弱的人需要人家扶持著，緩緩地穩步走在濕滑的地板上。有一位名叫厄則克耳（Ezekiel）的老人是個瞎子，幾乎是被我們兩人抬進浴池的。

然後，我要幫他打開水龍頭，並隨侍在側。有時候，他洗不到的地方，我要用塊布幫他搓洗。厄則克耳老人經常會利用這個時機擤鼻涕，而且，一次一個鼻孔（當然，我得留意，免遭流彈波及）。洗完澡後，給他擦乾，穿上乾淨的衣服，領回他的臥鋪。

等全部的人都洗完了澡，我們已筋疲力盡。此時，要幫著修女們分派麵包和茶。這項工作還算輕鬆自如，藉機也順便寒暄幾句，洗完澡大家都心情滿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內。

做完這項工作後，休息幾分鐘，比爾和我又要接著上工了。要做的都是一些雜事，其中，最不情願做的，就是修剪腳趾甲。我在給某一位老人修剪時，總會聽到有人在大聲嚷嚷，「吉姆修士，吉姆修士，你也過來幫我剪一下吧！」

縱然，我一直憧憬著要成為一位耶穌會的德蕾莎姆姆，渴望

能在一切人的身上發現基督，能在我的使徒工作上持守著理念，可是，在開始從事垂死之家的服務工作時，我發現，它令我噁心和嫌惡。比爾看起來比我好多了，這更增加了我的挫折和失敗感。我是一位耶穌會士，這類非常能展現基督徒精神的難題，應該對我來說不算是困難才對啊！為什麼天主不來幫忙我，教我在這些地方感覺自在呢？我質疑，與窮人在一起的使徒工作，是否我被排除在外呢？

經常，在我準備要認輸放棄的時刻，就會有一位修女笑咪咪地走過來，跟我說了一個笑話；或者，稱讚我的工作表現，德蕾莎姆姆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或者說，你看姆姆多麼喜歡耶穌會士，你知道麼，在她所有的神師中，她最喜歡耶穌會士。當然囉，我可不能讓這些修女修失望。就這樣，她們幫助我平安地度過了前幾個禮拜。之後，我就逐漸能調適這份工作了（雖然，我還是討厭修剪腳趾甲的任務）。終於，這些院民們，我一個個都認識了，而非僅只是在清洗一堆的身體。

這是一個極大的恩寵，這份領悟隨著初學的培育，日益深刻：「貧窮者」、「病患者」、「遊民」不是一種分類的名詞，而是活生生的個人。馬孔·墨格瑞在他《為天主做的一樁美事》的書中，也談到同樣的認知。他在加爾各答的垂死之家拍攝記錄影片時，他本人對病患和垂死者的個人反應，有三個進程。起先，是一種恐懼的震驚，對於眼前目睹的一切、自己的鼻子所嗅到的氣味、親耳聽聞的聲音。然後，逐漸有了同情憐憫之情。到了最後一個進程，這個經驗是他生平未曾有過的——能覺察出，在他眼前的病患和癲瘋病者，「不是可憐的、令人作噁的、被遺棄的，而是可愛的、討人喜歡的，還可以比擬為老朋友或是兄弟姊妹」。

在牙買加服務時，我起先認為，修女們的愉悅表情是一種偽裝，假裝不會嫌惡她們的工作；假以時日之後，我方能認出來，它是多麼的真實。這對我本人以及對那些被服務的窮人們，都深具影響。後來，我更發現它根源於德蕾莎姆姆建立的神修，並非用來遮掩工作困難的工具。她們每天都會努力不懈：在炎熱的天氣下，使用最簡便的工具，為最需要她們的人，長時間地工作著。就是這樣的愉悅，把她們答覆天主召喚的喜悅和服務基督的喜悅，傳遞了出來。

在實際的現實層面上，它更具有效力。為這些一輩子受盡悲慘、被人排斥的窮苦人們來說，修女們對待他們的態度，是一份禮物。德蕾莎修女曾告訴墨格瑞說：「我們要讓他們感覺到，他們是被人所愛的。如果我們帶著一副悲傷的臉孔走到他們的面前，就只會讓他們感覺更加的沮喪。」

簡而言之，這些修女們很高興自己是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一員，也很高興能用這樣的方式來服務天主。德蕾莎姆姆曾寫道：「真正的聖潔，要包括面帶著微笑去承行天主的旨意。」為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實踐的行為準則。但是，內修生活中充滿「心靈的黑夜」試煉的德蕾莎姆姆，相信它會有極大的成效，把它付諸實行。她的修女們，也照樣去做。

而她們的喜悅是具有感染性的。我毫不懷疑，為何她們能吸引眾多的聖召，來加入她們的行列。這也讓我聯想到，當年我剛進入耶穌會初學院時，一位來訪的總會長的評論。一位初學生斗膽地發問，要增加耶穌會的聖召，用什麼方法最好，來訪的總會長神父毫不遲疑地答覆：「喜悅地過你自己的生活！」

牙買加之行將近尾聲。回顧之餘，我心存感謝：在垂死之家

的使徒工作，我終於熬出了個頭緒來；在那些窮苦人當中，有好幾位是相當的了不起；我原先擔心的事——生病——連一次都沒有。最應當感謝的，是有機會認識了這個仁愛傳教修女會，以及目睹親炙她們寶貴的神修方式。在艱難的工作中，她們是喜悅的。她們的這份喜悅——對我來說，是一個偉大的示範及榜樣；對窮苦人們來說，是一個奇妙的禮物——而以姆姆的話來說，是「為天主做的一樁美事」。

9

基督的代表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Pope John XXIII)

一旦你放開一切，真正地放開它，那麼，任何大膽創新的事業，就會變成非常的簡單、非常自然而然。

——安傑羅·龍開禮 (Angelo Roncalli)

西元 1928 年 5 月 5 日

牙買加四個月的「試驗期」過後，我於六月份返回美國，去麻州格羅斯特鎮的東點避靜院開始做我的大避靜。

這是一個幽靜而極適合做避靜的地方——大西洋海邊的大片園林中的一長串樓房，從前，是波士頓一個有錢人家的避暑豪宅，稱為「布萊地」(Blighty)。橡木梁柱架構的起居室，巨型的壁爐是整體視覺的焦點，是晚間做祈禱和默想的好所在。秋冬時節，避靜者都喜歡坐在溫暖的大壁爐前，回顧一下當天的祈禱，安安靜靜地閱讀聖經，或是寫幾則日記的摘要大綱。原來設計的餐廳，鋪著大理石地板，窗外是無遮攔的視野，一直延伸到無邊無際的大海，現在布置成小教堂，供奉耶穌聖體，極適合在此做個人單

獨式的默想。

布萊地的日光浴房，有兩塊大片的落地窗，盡覽宅內的園林；在陶土地磚鋪砌的地板中央位置，置放著一尊精雕細刻的聖母抱子木雕像，原本衣服上鮮亮的玫瑰色與藍色的塗漆，在多年的日光照射下，褪色不少；靠牆邊，羅列著粉紅色和藍色的坐墊，以供默想、祈禱之用。即便是冬日飄雪，這裡還是洋溢著溫暖。

格鎮的避靜院經常客滿，不是豪宅的建築吸引人，而是它四周的環境。它的主樓和兩翼的樓房建築，都坐落在多風的一個岬角上，俯瞰著大西洋。海洋幾乎是環繞著它，在這兒的避靜者會不由地心胸開闊起來。在餐廳吃飯的時候，你不可能不瞥見那大片玻璃窗外的海洋，在大清早的陽光中，海水還是一片灰藍，海面上捕捉龍蝦的小船正在置放鐵籠。下午，海水則略呈混濁色，又見載著漁獲的小船返航。徜徉於園林之中，漫步在小徑上，無處不見海洋，即使在屋內、在就寢時，似乎都能聽到海濤聲。

三十天的大避靜期間，我常佇足在海岸邊的長串巨石塊上。我從屋裡走出去，沿著泥土的小徑，穿越一叢叢的野花、野草，來到海邊聳立著的、灰色略微泛紅的花崗岩崖壁上。我可以在那兒逗留好幾個小時，觀看翻滾的波浪拍擊腳下的崖壁，偶爾，泛起一陣帶鹹味的霧水襲面而來。不遠之處，海鷗在飛翔，間或有一羣野鴨飛越頭頂而過，棲息在避靜院內的泥水塘內。晨間，走入一片濃霧之中，傍晚，欣賞落日餘輝的晚霞。如果遙遠的天邊上開始捲起濃厚而黑的雲層，那就是一場北大西洋風暴即將到來的前奏。不由得聯想到天主的創造天地，和祂如此奇妙的化工。

如此的地貌景觀，對於避靜來說，再合適不過了：是做祈禱的好地方，也孕育出促使人們祈禱的氛圍。

在大避靜開始的時候，初學生的助理神師大衛（David）簡明扼要地和我約法三章。首先，除了每天一次，和他晤談做神修輔導之外，要遵守完全的靜默。其次，每天至少要做三次的祈禱，每次一個小時；為方便實踐，我選擇在每天的三餐之後。第三，不得閱讀——聖人傳記除外，但也僅得在睡前為之。這是和一位新聖人相遇的好機會；在這段期間內，我埋首於理查·莫理斯（Richard Marius）的精采傳記著作《多默·穆安傳》（*Thomas More*，譯者註：英王亨利八世的首相，後遭迫害而殉道，電影《良相佐國》即是他的事蹟）。

守全靜默，我認為是最難遵守的一條規矩。（朋友笑我說，你能守得住三十分鐘的靜默嗎？就別提一連三十天了）。然而，事後證明，不得閱讀才是一大挑戰。對於祈禱安排的要求，我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一路做下來沒什麼問題，但是，想讀一點東西的欲望或是念頭——至少偶爾就浮現出來，導致我感到無聊。大避靜進行到一半時，我向大衛坦言這種感到無聊的罪惡感。在內心中，我開始害怕，大避靜做完後，我沒有足夠的「改變」。

大衛笑著回覆我，要耐下性子來，「你知道嗎，舊的習慣和欲望，都跟著你一起來了。做完大避靜以後，恐怕其中的大部分，還會跟著你走。畢竟，你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哪！重要的是，天主藉著你的那些習慣和欲望，對你做了些什麼」。

有一天晚上，大約十點鐘，我來到圖書室尋寶。這是一間木條裝潢的房間，裡面的家具都是有年歲的。從書架上，我發現一本書——《好教宗若望的風趣和智慧》（*Wit and Wisdom of Good Pope John*）。

這是一本在 1964 年，教宗死後不久出版的書，有些破損，書

頁已泛黃。儘管大衛警告此時不宜沉迷書堆，言猶在耳，但是想要一窺究竟的誘惑，實在難當。僅翻閱幾頁後，我就著迷了：誰知道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如此的風趣？

當然，書內不是每一則故事都令人捧腹。我以前也聽到過一則軼聞，是一位記者問他：「有多少人在梵蒂岡城內工作？」

「噢，大概一半的人罷！」聖座不經意地回答。

書中，令我笑出聲來的（也引起了其他避靜者的噓聲指責），是一則教宗被送往羅馬城內的聖神醫院（Hospital of the Holy Spirit）就診的故事。一位修女走進病房來自我介紹：

「聖父，我是『聖神』的長上。」

「噢，那妳運氣很好啊，我只不過是基督的代表而已！」教宗很愉快地回話。

就是這種半開玩笑式的故事，開始把我拉向若望二十三世。在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職位上，很容易可以擺出一副冷酷而有權威的面孔，他能這麼的幽默感十足，多麼難能可貴。有他作榜樣，我想，基督徒的生活理當如此。

我也聯想到，一則有關耶穌會前任總會長雅魯培神父的故事，是一位朋友轉述給我的。我們會士習慣稱呼總會長為「總會長神父」，或者「總會長」。有一次，他去訪問紐約市的薩威中學（Xavier High School）。這所學校，打從創校之初開始，就有一個專為男學生的軍事訓練性質的社團，類似美國大學裡政府辦理的預備軍官訓練團（ROTC）。當天，全副軍裝的團員們，列隊歡迎總會長的蒞臨。總會長一下車，全體立正，致最敬禮。

雅魯培神父此時轉過頭來，對著我那位朋友說：「現在，我才感覺到自己是個『正牌的』的將軍！」（譯者註：The General 有

「總會長」和「將軍」兩種解釋。)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就是有這類開自己玩笑的幽默感，而對於這樣的教宗，誰會不喜歡呢？他經常拿自己的身高（他個子不高）、耳朵（一副大耳朵）和體重（是滿胖的）來開玩笑，讓圍繞在他四周的人們都感到很自在，有誰會覺得他不和藹可親呢？有一次，他遇見一個名叫安傑羅（Angelo）的小男孩，就跟他嚷嚷說：「我也叫安傑羅耶！」然後一個冷笑，「不過，他們教我改名字了！」

就是因為這份幽默、這種開闊的心胸、寬宏大量以及熱情，讓許多人都喜歡他，稱呼他：「好若望教宗」（Good Pope John）。

然而，聖誕老人式的慈愛形象，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他更是一位經驗老到的外交官、跨教派間交談的老兵、上天賞賜給我們的好牧人、好主教，他把這份龐大的經驗資產一起帶到了教宗的職務上。



西元 1881 年，安傑羅·吉塞普·龍開禮（Angelo Giuseppe Roncalli）誕生於義大利柏加莫城（Bergamo）附近的一個農村家庭，在十三個孩子中，他排行老三。孩童時，安傑羅與母親瑪麗安娜（Marianna）很親近。他學到第一首詩，是關於聖母的，即是來自於母親。至於父親，依照他的日記：「我的父親是一個農夫，成天下田，忙著種地……他至少說得上，為人單純又善良，而我麼，滿腦子壞心思。」

幼年時，父親曾帶他到附近的鎮上，觀看教堂慶典的遊行，而內向型個性的父親，居然把他舉起來，跨坐在父親的肩膀上，

令他高興不已。日後，獲選教宗，坐在轎子寶座上，被人簇擁著抬進聖伯鐸大殿，他在日記上寫下感想：「再一次，我被人抬著……大概七十年之前，在聖伯鐸小鎮（Ponte San Pietro），父親的肩膀抬著我……生命的奧祕在於，要讓天主抬著你，然後，換成你把祂抬著（去給別人）。」

十一歲那年，安傑羅決定去修道當神父，進入柏加莫城的小修院。自幼以來的宗教熱忱，未曾減弱，一直持續著。傳記作者赫勒維（Peter Hebblethwaite）在他寫的《若望二十三世：本世紀的教宗》（*John XXIII: Pope of the Century*）書中，用一句話描述：「他畢生的目標，是當一個聖潔的司鐸。」

西元 1904 年，龍開禮在羅馬晉鐸。數週後，獲羅馬學院頒予聖教神學博士學位。翌年，柏加莫教區的新任主教任命他為祕書。有一次，他偶然發現一批古老的歷史檔案，是活躍於十六世紀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A. D.）的米蘭教區總主教聖嘉祿·鮑榮茂（St. Charles Borromeo, Archbishop of Milan）所遺留。整理編輯這批寶貴檔案資料的心願，促使龍開禮長期依序付諸實現，最後一卷終於西元 1957 年完成。依據傳記作者赫勒維的註解，由於如此地熟稔這批文件，龍開禮清楚地體認到，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意義，不是「與新教徒論戰」（anti-Protestant polemic），而是一個「教會內部的改革」（reforming council）。多年之後，這個歷史的教訓，派上了用場（譯者註：意指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被徵召入伍，先在醫院中擔任勤務人員，隨後，任隨軍司鐸。這次的經驗，對他的影響至深至遠。從未停止聲稱「戰爭是最大的邪惡，而且一直就是」的同時，他

也經驗到，天主臨在於他所服務的士兵們的身旁。戰後的西元 1920 年，在一次面對大眾的公開談話中，他回憶了這段於傷兵和瀕死戰鬥人員中間牧靈的往事：「請不要介意我個人這段傷心的回憶。我常獨自一人在屋內，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像孩子一般地痛哭失聲。親眼目睹這麼多、我們可憐的孩子們就這樣死去了，實在無法控制住我的情緒。」

一戰後，教宗本篤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任命他為教廷傳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主任。在這個角色上，他要為天主教會「傳教區」的需求，提供支援。除了為海外傳教區進行募款活動外，還要鼓勵傳教司鐸的派遣；提醒傳教士，分辨教會使命與民族主義的分際；發動義大利全國的天主教友，為傳教區祈禱。頻繁地來往穿梭義大利的各個教區，以及周旋於各個負責傳教的修會，讓他獲得了普世教會國際觀的視野，這又是日後派上大用場的一樁寶貴經驗。

傳信部工作上的成功，以及他對於整理米蘭教區前輩的檔案的興趣，引起了米蘭總主教拉蒂（Achille Ratti, Archbishop of Milan）的注意。西元 1922 年，拉蒂當選教宗，取名為碧岳十一世（Pope Pius XI）。兩人之間的友誼，開啟了龍開禮進入教廷的服務——西元 1925 年，他被告知，已被任命為赴保加利亞（Bulgaria）的「宗座視察員」（Apostolic visitor）。

龍開禮提出異議，說他從未有過外交經驗，而且，他不便與摯愛的家人分離（兩位未婚的妹妹，與他同住羅馬城內，照顧他的起居，也很依賴他）。但是，在與家人溝通和熱切的祈禱之後，他坦然接受了這項任命。行前，教宗碧岳十一還召見他，與他分享自己當年出使波蘭時，和當地難纏的主教們打交道的經驗。同

時，教宗祝聖他為總主教，駐節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Sofia），這一住就是十年。

這個職務也確實是個苦差事，龍開禮毫不隱諱地在日記上寫到，「保加利亞是我的十字架」。而他心甘情願地接受了，並放開心情，盡量去做事。他的主教盾牌徽章，選用的格言是「服從與和平」（*Obedientia et Pax*），「如果是因服從的需要，我已真心地準備好駐節此地，一直到死。讓別人去浪費他們的時間來臆測，未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別的服務地點會比較好的念頭，只是一個幻想。」

在這個任命之下，他要照顧保加利亞全國境內的六萬兩千名天主教友，在這個以東正教（*Bulgarian Orthodox*）為國教的國家內，屬於少數，教友們散布在窮苦的鄉村中，經常要騎馬或驢才能抵達。同時，還要靈巧地和官方的東正教會往來。到他離任之時，他的不屈不撓、幽默風趣和耐心等，廣為人所稱譽。

這份跨教派溝通往來的經驗，已為他在巴爾幹半島地區贏得「專家」的美譽，因此，順理成章地得到下一個任命——駐伊斯坦堡（*Istanbul*）宗座代表。

在這裡等待這位總主教的，是更多、更複雜的教派（*Christian denominations*）——是同一的基督信仰，但分別屬於各式各樣的教派。首先牧靈的對象，當然是這個廣大轄區內的天主教友——在伊斯坦堡四周的區域內，約有三萬五千名，分別是：法籍、義籍、德籍和奧籍的拉丁禮天主教友（*Latin Catholics*）；亞美尼亞裔（*Armenians*）、加爾丁裔（*Chaldeans*）、敘利亞裔（*Syrians*）、馬龍裔（*Maronites*）、梅凱裔（*Melkites*）、保加利亞裔和希臘裔的東方禮天主教友（*Uniate Catholics*，譯者註：此東方禮受到天主教

會承認並隸屬於羅馬教宗，但其禮儀沿襲自古老的教會習俗）。此外，還要照顧好與境內約十萬名東正教徒的關係；以及，與經常帶著懷疑眼光的土耳其政府（回教徒占大多數的國家）打交道。尤其，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保護在德軍占領下的希臘境內的猶太人，免遭驅逐出境，也是一項考驗。他在日記中稱呼猶太人為「許諾的子女」（children of the promise）。

龍開禮卓越的外交成就，使他於西元 1944 年被教廷任命為駐法國的宗座大使。二戰後的法國天主教會，極需要龍開禮這樣的人來應對處理。他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微妙而棘手的關於「合作者」的主教們所引起的爭論。他們在二戰德軍占領期間，採取與傾納粹的維希臨時政府（Vichy regime）合作的態度（最後，教廷採行審慎地更新地區主教的策略）。接著，是新興起的工人司鐸運動（worker-priest movement，譯者註：司鐸進入工廠，成為一名工人，以實地和其他工人們一起生活的方式，實踐其司鐸的使命）。在此過程中，龍開禮總主教極具技巧地處理了。此時，一種所謂「新神學」（la nouvelle théologie）的研究，蔚然成為一股風氣。著名的學者司鐸，如耶穌會的盧巴克神父（Henri de Lubac）和道明會的孔加爾神父（Yves Congar），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神學觀點強調，要回歸聖經和初期教會教父們的訓導。教廷對此舉有相當多的指責。以上這些，駐節法國的龍開禮大使均以愛心和圓融的機智，妥善地予以處理。

住在法國行使職務，他的法語並未因而流利。有一次在做彌撒時，麥克風發生故障，他不慌不忙地向會眾聲明：「親愛的孩子們，你們聽不到我的聲音，沒關係，我說的話，沒有什麼有趣的，況且，我的法文也不好。我聖潔的母親是一個鄉下人，沒法

讓我早一點學好法文！」

在巴黎的外交圈內，龍開禮大使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不僅因為他代表梵蒂岡教廷，是當然的常任外交使節團團長，更由於他深具外交技巧，以及他的人格、愛心和風趣的個人魅力所致。有一次，在巴黎盛大的外交官宴會上，有人問他：「有這麼多穿低胸禮服的婦女們在場，你是否會覺得受窘？這對你是一個公然的侮辱啊！」

我們的大使龍開禮總主教這麼回答：「是個侮辱？也不盡然。當一位穿著低胸禮服的女士，面向我走過來時，在場的人都不看著她，他們都一致向宗座代表行注目禮，想看看他會怎麼辦！」



自從進修院當修生開始，終其一生龍開禮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在他死後集結出版的《心靈日記》（*Journal of a Soul*），要了解西元 1895 至 1961 年間的天主教歷史，這是一份很可觀的資料文件。而依我自己閱讀過後的感想，它更具神修上的價值，有一扇窗戶被打開了，人們可以透視一位偉大宗教人物的靈魂。他修德養性的神修上的心態，終其一生，幾乎沒有改變。矛盾不解的是，他靈修上的「成長」，奠基於簡單、純樸的虔誠敬主，年輕時即是如此，日後，在職務和權威日增時亦然。

這份虔誠始終基於謙遜、服從和對天主的信靠，而隨著在教廷服務的際遇，其根基只有愈來愈加深。西元 1898 年的一次避靜後數週，他在日記上寫道：「從聖潔的心神操練出來，已經一個月了，我現在在這個修練德行的道路上，到底進步如何？唉呀，可憐的我！」西元 1925 年將被祝聖為主教的準備期中，他寫道：

「我沒有去營求，或是想要這份新的牧靈職務。是上主選擇了我，清楚地顯示出，這是祂的旨意；如果我拒絕了，那為我將是一個嚴重的過犯。所以，祂將會包容我所有的失誤，彌補我的過失，這就足以安慰我，給予我內心的寧靜和信心。」西元 1947 年在巴黎任職教廷大使三年之後，他寫道：「我一無是處的認知感，讓我保有一個好夥伴——它使我全心去信靠天主。」

整部日記中一貫不變的基調，就是這種謙遜和信靠天主的渴望，一如他後來的用語：「被天主抬舉著。」

西元 1952 年，龍開禮總主教接獲通知，即將被任命為樞機主教，並準備接掌義大利威尼斯的宗主教職位。離開巴黎的任所之前，他邀宴在任職其間、前後共八任的法國總理。巴黎人一時譽為美談——只有在教廷大使的屋簷之下，才有可能如此友善地聚集這麼多位立場各異的法國政客於一堂。

威尼斯教區，更以盛大的慶典（全體貢多拉搖船業者，將所有的船重新上漆，以示歡迎。）歡迎這位七十一歲的樞機主教。在進書房的大門上，龍開禮樞機置放了一個醒目的座右銘——牧者與神父（*Pastor et Pater*）——時時提醒自己在這份新職務上要做的努力。這將是此生最後的一份工作了，他是這麼預期的。當有傳言：「他是塊當教宗的材料」時，他在給妹妹瑪利亞的信上對此嗤之以鼻：「當個樞機主教就已經足夠了，誰會希罕什麼呢？」

西元 1958 年，教宗碧岳十二（*Pope Pius XII*）去世，樞機主教團聚集在羅馬的密室要選舉繼任教宗時，他是熱門人選之一。經過十一輪的投票，在 10 月 28 日下午四時五十分，龍開禮樞機獲選為新任的教宗。對於這件一直害怕、不希望發生的事，最後他還是以一貫信靠天主的心態接受了。

在對樞機團的致辭中，他說道：「聽著你們的聲音，我全身顫抖，充滿恐懼。如此的匱乏和渺小的自知之明，已足夠讓我恐慌的了。然而，在這座神聖的羅馬城的教堂內，眼看著天主旨意的記號，在我可敬的樞機弟兄們的選票上顯示出來，我敬謹接受他們的決定。」

樞機主教團的主席上前請示新教宗要如何稱呼，「我要被稱呼為『若望』（John）。我喜歡這個名字，因為，這是我父親的名字，也是我們一家人領洗的鄉下本堂的名字，而且，全世界無數的大教堂，都叫這個名字」。然而，許多以後為他立傳的作者們都提到，這是他在他的教宗任期內諸多創舉的第一項。上一次使用「若望」這個名字的，是十五世紀一位惡名昭彰的「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為教宗縫製正式服裝的專任裁縫，已設想到選後的立即需求，而預先為可能的教宗，預備了兩套白色的教宗長袍——一胖，一瘦。然而，體重兩百零五磅、發福的身軀，遠遠超過裁縫專家的預測。情急之下，運用安全別針和大圓下襬的白色罩衫，才掩飾住新教宗寬廣的肚圍，成功地通過電視台記者巨細靡遺的攝影。他和前任的碧岳十二，是多麼鮮明的對比：碧岳十二是骨瘦如柴、狀似苦行者、沉默寡言；新教宗則圓胖福態、面貌和藹、快人快語。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步行到俯瞰聖伯鐸廣場（St. Peter's Square）的陽台上，微笑地接受廣場上欣喜若狂的羣眾歡呼。

當天的日記上，他追念早年的親人：「今天，全世界記載和談論的，沒有別的，只是我：關於我這個人和我的名字。噢，我親愛的母親、父親、安傑羅爺爺，還有親愛的沙威里歐叔父，你們現在在哪裡？帶給你們的這份榮譽，是如何到來的呢？請繼續

不斷地為我祈禱。」

新教宗就任之初的作風，在和他的前任對照之下，更顯得突出：不再是面孔嚴厲的叔叔，新教宗更像一位慈祥的祖父。在見多識廣之下，更能走出梵蒂岡的城牆，他更了解如何與外面的世界來往。新教宗的第一個聖誕節，訪問了羅馬城內的耶穌聖嬰（Bambino Gesù）兒童醫院，也恢復了巡訪天軍（Regina Coeli）監獄的傳統。在監獄中，有一位囚犯問他：「我能得到寬恕嗎？」教宗上前緊緊地擁抱他。教宗高高在上，宛若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之中，世人早就習以為常之際，若望教宗的出訪活動，大受世人矚目。但對於安傑羅·龍開禮來說，這只不過是他身為「牧者與神父」的本分該做的事。

曾在羅馬念書的一位耶穌會士龍若望（John Long, SJ），跟我講述了教宗往訪宗座東方學院（Pontifical Oriental Institute）時的一則軼事。在學院大廳內，教宗坐在他那寶座式的椅上，面對聚集的一百二十名學生，宣讀預先準備好的講稿（龍神父瞥見，教宗的腳還碰不著地板哩）。一板一眼的演說稿宣讀完畢後，遞交身旁的助理，換個舒適的坐姿後，教宗接著說：「官式的部分結束了，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吧！」

西元1959年，就任教宗僅三個月，在與幾位樞機共祭的一台彌撒之後，若望向他們宣布，他決定要召開一個為普世天主教會的大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l），他的理由是，要「讓一些新鮮的空氣」進到教會裡來，以鼓勵教會跟上時代的腳步。這個突如其來的宣布，讓他的聽眾不知所措，似乎也包括他自己。他後來闡釋道：「所以生出召開大公會議這樣的概念，並非由於長期默想考量的結果，乃因它來到了我們的面前，如同出乎意料之外

的春日的花朵綻放了一般。」對於這次大公會議的性質，教宗展望的不是一個「定義教理」的大公會議，要去處理神學闡釋的教義，或去譴責悖逆背離者；而是一個有關「牧靈的」大公會議，將著墨於教會與現代世界的關係。

許多梵蒂岡的觀察家們都曾預言，年邁的新任教宗不過是個「過渡性」的教宗，將延續前任的繼定政策，以待下一任更年輕的來接手。傳記作者羅勃·埃斯柏格在他的《諸聖》書中寫道，以某種意義來說，這個「過渡」的說法也沒有錯，他使整個的教會，從一個舊的紀元，過渡到一個新的紀元——從對現代的世界抱持著懷疑的心態，過渡到以開放的胸懷和樂觀進取的精神，去尋求與這個現代的世界打交道。

有些主教們私下表示憤怒和不滿——到底教會在什麼地方錯了，需要來改變？有權有勢的紐約總教區史培爾曼樞機主教曾寫信給友人：「上一次的大公會議是一百年前召開的，他才就任教宗三個月，怎麼就敢再召開一次？若望教宗太急躁、太衝動了。」

類似的說法和評論，教宗本人聽到太多了，尤其來自羅馬教廷的內部和憂心忡忡的樞機及主教們。在西元 1962 年 10 月 11 日梵二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開幕典禮的演說中，他答覆這些悲觀的想法，和對現代的世界抱持恐懼心態的教會內部人士。面對聖伯鐸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內，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兩千五百名主教和來賓們，他說道：

有些人具有滿腔的宗教熱情，卻沒有權衡事理的秉賦。可惜，有時候我們必須傾聽他們的聲音。在現代的世界中，他們看到的只有謊言和毀滅，其他一無是處

……我們覺得，不能同意這些愁鬱的先知預言者。在現代的事和物的秩序中，全能的上主正在引導我們，走向一種人際關係的新秩序，藉著人們的努力，甚至於超越人們的期待，這個新秩序被導引走向天主更高遠、高深莫測設計的滿全；一切的東西，甚至於人們的差異不同，都導向為教會更大的好處。

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是二十世紀宗教界的一件大事。來自全世界、聚會於羅馬城的，除了樞機主教、總主教和主教等神職人員之外，還包括學有素養的一般教友和修女代表在場與會，更具創意的，是邀請基督宗教的其他教派，和其他世界性大宗教的代表列席。前後共三年的各個會期內，廣泛地針對許多不同性質的議題：與其他基督宗派的關係；宗教自由；與猶太民族的關係；在現代世界中的教會；教會禮儀等。

雖然教宗在位為期不長，他對於上述這些理念的推動，卻不遺餘力，諸如，所有基督信友的合一，社會正義，人權和世界的和平。他在西元 1963 年所發表的《和平於世》通諭，孕育於先前的古巴危機期間（若望教宗幕後協調，對化解此危機出力不少）。這是歷來的首次，不僅以教會內的信友為對象，也面向全世界心懷善意的人們，所發表的教宗通諭，它強調人的尊嚴，乃是任何的道德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為尋求解讀「這個時代的訊號」，在《和平於世》這個通諭中，靜觀整個世界，若望教宗認為，有許多正向的發展值得嘉許，其中包括：工人要求公道的薪資、婦女要求有尊嚴和尊重的對待、帝國主義不合時宜的信念愈來愈被世人廣泛地接受。據傳紀作家

赫勒維的說法，這些觀察全都反映出「自我解放以及自由化的心態」。

基本人權，乃是天主所創造的宇宙，在其「奇妙的秩序法則」中所自然流露出來的；為保障和推動這個理念，《和平於世》通諭也強調，必須明文形諸於「人權法案」、國家的憲法和「依法治理」的社會中。他也談到「普世共通的善」，和戮力於此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體系的工作。他肯定，「依照每一個人的良心，去崇拜天主」，是每一個人的權利。這一點，在教會內是個創舉，過去，教會的訓導不是這麼說的。

尤其，在此核子時代的危險世代中，教宗極力呼籲和平：「在原子能深具毀滅力的世紀中，宣稱戰爭乃是修補被侵犯的正義的一種合宜的手段，是不再有意義的了。」在此日益複雜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交談與和解才是可行的辦法，這也是梵二大公會議的宣言。

在此通諭中，若望教宗反映出梵二會期中與會神長們的工作努力；他和這些神長們，都看到聖神在現代的世界內作著工，他也呼籲教會內的團體，對此有所呼應。

在教宗身旁的工作同仁，都能覺察到，他有一股強勁的決心，要發表這篇通諭，作為梵二大公會議進行中的指導方針。此時，他已經知道，他所召開的這個大公會議，他將無緣見到它最終的結束。西元 1962 年的 9 月份，他被診斷出罹患胃癌。

在人世間的最後幾個月是痛苦的，他日漸消瘦，終至臥床不起。他曾向一位來訪的友人訴衷情：「我這份使徒工作的祕密，都在我床頭對面的十字架上。這樣，我睡醒時，一睜開眼就看到它，進入睡眠前，也能望見它；長夜漫漫的時刻中，我能跟它說

話。我凝視著它，就這樣地看著它。那張開的手臂，一直是我教宗生涯的涵義：基督是為了所有的人，所有一切的人而死的。沒有人被排除在祂的大愛和祂的寬恕之外。」

西元 1963 年 6 月 3 日，安傑羅·龍開禮辭世，普世同哀。我的一位朋友，當時坐在羅馬城內的一輛計程車上，收音機正在報導若望教宗去世的消息，含著眼淚的計程車司機轉過頭來，跟我的朋友說道：「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也是我們的教宗」（譯者註：義大利語「Papa」，有「教宗」和「爸爸」兩種意思）。



大避靜結束之後，我決定要去多認識這位安傑羅·龍開禮，已讀過的這本有關他的趣聞軼事是不夠的，逐漸地，我又閱讀完了他的《心靈日記》，以及赫勒維所寫的傳記《若望二十三：本世紀的教宗》。

隨著時光的流轉，我體察到，吸引我的不僅是他的風趣、論述、熱愛教會之情，甚至於後來功成名就的大事，更是他那更基礎的本質——他的愛心，愛主愛人。在所有的聖人當中，這位慈祥的老人家似乎是可親可愛的一位。他一直是可愛的人子，可愛的弟兄，可愛的司鐸，可愛的主教，可愛的教宗。他身上放射出基督徒的愛心。如此眾多的人嚮往他，又有何奇怪？



亨利·費斯噶（Henri Fesquet）彙編的《好教宗若望的風趣和智慧》，於西元 1964 年出版。其中有幾則故事我很喜歡，茲略作精簡，以便和讀者在此分享：

擔任教廷駐法大使的龍開禮總主教，是一位「重量級」的人。他有一次去參加法蘭西研究院（French Academy）的一個學術會議。會議結束時，龍開禮大使發表致詞：「這是一個美麗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我們也都聽到了許多美麗的言談。美中不足的是，這裡的坐椅僅能容納半個大使。」



有一天，行走在羅馬的街頭上，若望教宗聽到人羣中，有一位婦人向同行的友人評論教宗發福的身材：「天哪，他真是個胖子！」教宗回過頭來，親切地對那位婦人說：「可是，夫人啊，妳明明知道，樞機們的密室選舉不是選美大會呀！」



在他宣布要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的那天晚上，他百感交集，夜不成眠。最後，他找到了一個解決之道，於是自問又自答：「喬萬尼（Giovanni 是「若望」的義大利文用字）啊，你為什麼睡不著呢？到底是教宗，還是聖神，在掌管這個教會？是聖神，對吧？那不就得了，你喬萬尼，快去睡覺吧！」



梵二大公會議籌備期間，教廷負責人員最先草擬出的會議綱要，格外地充斥著對現代的神學家和聖經學者的敵意。教宗閱讀完後，取來一把尺，在草案上量了又量，然後對著一位籌備委員直嚷嚷：「快來看！在這份

綱要上，使用『譴責』的字詞，加起來總共有三十公分長。」



就任教宗之初，他收到一位年輕人布魯諾（Bruno）的來信，希望能指點生涯規劃，「親愛的教宗，我還猶豫未決——要當警察好呢，還是當教宗好呢？您的意見如何？」

教宗回信給他說：「小布魯諾啊，如果你想聽聽我的意見，那就去當警察好了，因為，那需要一段時間的學習，不能馬上就當的。至於，當教宗麼，你以後就會明白了。任何人都能當教宗，而我就是個現成的例子。如果你有機會到羅馬來，歡迎來看我，我會很高興和你多談一些關於這方面的事」。



我知道，若望教宗會教導我許多關於愛德的事，其中要特別指明一件事：「貞潔」（Chastity）。

在修會的修道生活中，最不容易向外界人士解釋的一個層面，就是貞潔。美國一般大眾的刻板印象裡，一提到神父，就是嚴峻、懷有敵意、老古板的司鐸；而說到修女，則是一副苦瓜臉、性格壓抑的老修女，兩者都和「性」沾不上邊，也與塵世間的愛情以及各類的人際關係，不相往來。人們甚至於，批評他們的腦筋有問題。

在此，讓我先把「貞潔」和「獨身」兩個不同的概念名詞，做一番詮釋，雖然兩者經常被混淆著使用。貞潔意指恰當地、懷

有愛心地去使用「性」，而在這個意義上，人人皆當如此。吉諾維西神父（Vincent J. Genovesi, SJ）寫了一本書《愛的追尋》（*In Pursuit of Love*）討論人類的性事，書中有一段關於「貞潔」的省思：

一個貞潔的人，他的生活要在實體上和外在的表達上呈現出：他的「性」是在愛德的掌控之中，體貼對方，而且意識到對方的存在。貞潔是一種「性」的誠實，也就是說，貞潔有這樣的涵義：我們有實體上的關係，它真實地表達出個人承諾的程度，而且與對方共享之……

因此，貞潔是對所有的人來說的，而不僅只是單身者……

貞潔絕非在某一層面上反對「性」，它允許個人在追求悅樂上的努力，以及「願意把此種努力放在為他人服務和為基督徒價值觀的服務上」。

簡而言之，貞潔是一種「能接受愛和給予愛的能力」。

「獨身」（*Celibacy*）則略有不同。純技術上來說，獨身是天主教司鐸不得結婚的禁令，而這個禁令，天主教會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下令取消的。事實上，初期教會前三百年的歷史中，教會內沒有這個限制，當時的許多司鐸也同時過著婚姻生活。

在另一方面來說，「貞潔」是加入修會的修道生活的男女人士，出於自由意志所選擇的一個生活方式。一提到神父、修士、修女，天主教內一般的信友通常也會將「貞潔」和「獨身」這兩種概念混為一談——他們由於宗教上的承諾，因而不結婚——事

實上，關於這兩者的神修也頗為近似。

雖然，在電影和一般人的笑談中，常有揶揄這類的獨身者，嘲笑為固執和嚴峻的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認，無論對信徒或非信徒而言，歷史上有許多這類的獨身男女，是可親又可敬的。信手拈來幾個例子，亞西西的聖方濟、德蕾莎姆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有誰能否認他們的可親可愛？再說，納匝肋的耶穌，也是一個沒有結婚的獨身者，有誰會懷疑他的可親可愛？

耶穌的所言所行，證明了所以獨身的終極目標，乃是為了去愛人——以盡可能深層的愛，去盡可能地愛更多的人。對於獨身持負面看法的人，可能只想到禁慾、沒有性關係等的層面而已。貞潔與獨身的核心目標，是增強去愛的能量。

獨身生活並非為所有的人，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人被召叫去度婚姻的生活，與自己的配偶有性的親密，有小孩，有家庭生活。對他們來說，貞潔的生活，其首要的方式，是全心地愛自己的配偶、小孩，聚焦在某種專屬的愛，但並不意味著，不愛自己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只是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家庭上。

對於宣發過誓願的修道男女來說，則情況正好相反。去宣發貞潔的誓願，這樣你就能盡可能完整地把自己給予天主，也讓自己有條件盡可能去愛更多的人。宣發這個誓願，還有一個更具體而實際的理由：盡可能完全地讓自己能去從事使徒工作。因此，也是一種仿效耶穌的方式。以愛的方式來說，它與婚姻生活，沒有「更好」或「不好」的比較，兩者只是單純的不同罷了。其他的教派中，有人能兼顧婚姻生活和使徒工作，也單純的是另一種答覆召叫的生活方式。

對於我本人和其他在修會的修道人士來說，貞潔是去實踐愛

德的最佳方式，而以我的經驗來看，也最適合我。因為，它帶給我最大的喜悅，也似乎是天主要我發揮最大功效的方式。

獨身的生活是一門藝術，需要在不間斷的實踐中去造化。就如同一個人，不是在結婚儀式之時，即能學習到成為一個好丈夫或好妻子；同樣地，我也不是在晉鐸之時，即已習得如何做一個良好的獨身者，在初發誓願時，甚至於未能全然地了解貞潔的意義。以一種健康的、整合的方式，在此誓願中生活、成長，是需要時間的。修會的初學院和培育司鐸的修道院，其設置的理由之一，也在於此——類似於「訂婚」之於正式結婚的作用，個人可以在此地的一段時間中，權衡自己是否合適。

這個培育過程的一部分，是去發現什麼適合你，什麼不適合你；了解到「性」在你生活上的作用方式，因而尋找出支持你度獨身生活的途徑。在我來說，它來得直截了當：我經驗到天主的大愛，主要是藉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我在牧靈服務的人們，即便如此，要把它做好，我必須要有積極的祈禱生活。我發現，要是我在祈禱中經驗到天主臨在的親密，那就很容易去經驗與他人在一起的親密。

有時候，我會被這種人際間接觸的愛所深深地觸動：在和堂區內的信友們、同會的弟兄們、外界的朋友們、我的家人、專業人士，來尋求我神修輔導、諮商和告解的人等的互動中。有些時日，我整天悅悅然地深覺自己何其幸福。和同會的弟兄們共聚餐桌上，分享彼此的辛勞和喜悅，就如同會祖聖依納爵所言，我們是「主內的朋友」；在神修輔導時，傾聽對方的吐露，常訝異上主在那人身上的作為，何等奇妙；就因為我是一位神父，才得以和對方分享其生命上某些部分；和我才滿六歲的姪兒相處，他的

笑容和稚語，多麼美善、充滿未來的希望。

最近，我在紐約市一個耶穌會管理的堂區，做將臨期的主日彌撒。當教友們列隊前來恭領聖體時，我站立在中央走道最前方的祭台邊上，在富麗堂皇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內，大型管風琴的吟奏聲中，面對著一個接一個前來的教友們，許多人都是我認識的，點頭微笑地從我的手中領受聖體，我有一種歸屬感，我屬於他們。多麼美好的一種生活啊！

在我來說，以上的種種都構成貞潔和獨身的一部分。

這個守貞潔的身分，也讓那些來尋求我協助的人們放心，因為，他們知道，我已做了承諾要來愛他們，在先決的條件上，已排除會利用他們、會指使他們、或是別有用心的不良企圖。拿最近在我身上發生的例子來做說明。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都和紐約市的一家戲劇表演公司一起工作。他們打算製作一齣探索耶穌和猶達斯（Judas，譯者註：福音書中記載出賣耶穌的那名門徒）之間關係的戲劇。起先，是劇本的寫作者向我請益，研究這個角色。接著，又受託協助扮演猶達斯的那位演員的角色揣摩。逐漸地，我的商談和諮詢對象擴及導演和全體的劇組演員。在寒冬的月份中，我們大家在外百老匯的一個戲院內，圍坐在一個大長桌邊，長時間地討論四部福音書、耶穌、猶達斯，以及相關的一些概念，諸如，過犯、恩寵、絕望、希望等等。多麼美好的對話，和一般教友間的對話，大不相同。

這一羣人的生活圈，和我們一般人大不相同，他們生活在劇場文化的世界中。開始相處時，他們都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雖然，其中有幾位是教友）。慢慢地，我能覺察到，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也知道我是一位守貞潔誓願的獨身者，

因此，他們知道，我之所以出現在那個地方，除了要幫助他們和愛他們之外，不為了別的任何理由。結果，有些人很自在地願意和我分享他們生命中私密的部分，在遭逢重大壓力、困難和悲傷時，願意向我敞開心靈。

他們的這份信賴，為我是一份很大的禮物，不僅幫助我成為他們的朋友，以真實的意義來說，也讓我能去愛他們。每當我走進他們的化妝室內，總是有許多坐在那兒的男女演員，起身來和我擁抱或親吻行禮。在公開演出的第一個晚上，雖然已親歷十幾次的彩排，眼望著每一位我都認識的演員，在舞台上使出渾身解數地賣力演出，給觀眾們新奇又興奮的感受，我仍然發覺，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在他們演藝奉獻的歡欣中，與有榮焉。

在那裡，不僅是我去愛他們，我也了解到，已被他們所愛。演出的檔期將盡尾聲，心底有個聲音提醒我，不要纏著他們的那份愛，不要緊抓著不放。固然，期盼落幕後，仍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維繫著友誼。但是，它必須是自由地給予，也必須是自由地接受。如此酸、甜、苦、辣兼而有之的重要教訓，在我度奉獻生活的修道生涯中，一再地學習到。在學校教書的會內弟兄們，也都有類似的經驗，他們曾和我分享，「對我來說，在每個學年結束時，也是和你一樣的心情，你必須自由地接受，來自學生們的那份愛，但切記，不可緊抓著不放」。這也提醒了我，門徒們在耶穌復活以後遭逢的一番經驗。他們是多麼地渴望，耶穌能永遠和他們住在一起，而祂的答覆是：「不要纏著我不放。」

這種愛與被愛的自由，是一個很大的福氣。戲劇首演的幾天，在化妝間內受到演員們溫情的問候、行禮之後，我站在那兒環視之餘，不禁百感交集——從前的陌生人，如今成了朋友，是

何等的因緣？莫非，這就是守貞潔誓願的賜福？

記得我曾觀賞過巨幅拜占庭畫風、用各種顏色的小片馬賽克磁磚拼湊成的基督的面貌圖（譯者註：或可譯為「耶穌的千種面貌圖」）。我想，我和天主之間的關係，也可用這幅圖畫來比擬。每一位我喜愛的人，和每一位喜愛我的人，都是這幅花紋細膩精緻圖案中的一塊亮麗的磁磚片，而只有在我退後幾步的凝思靜觀之時，才能見到全部、整體的圖像，而基督的形象才於焉清晰。



偶爾，在獨身生活的過程中，也有可能陷於情網。此乃人之常情，是血肉之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分一般人或是守獨身者。如果你願意做一個可親可愛的人，你就難免會碰上這類的「危機」。耶穌作為完完全全的一個人，亦復如此，當祂掏心掏肺地把自己給與他人之時，也敞開了自己，去接受他人的愛。在祂基本的人性中，祂和任何一個血肉之軀的人一樣，有可能陷入情網，也會讓對方陷入情網。而祂的回應是貞潔地去愛人和被愛。

進入初學院幾個月後，有一次我的導師跟我說，作為一位耶穌會士，我大概一定會自己或讓對方陷入情網。當時，我害怕極了。

然而，他的開示，我永誌難忘：「作為一位耶穌會士，如果你沒有陷入過情網，那一定是你有問題。因為，這是一種人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作為一個基督徒，愛是最重要的構成要件。因此，關鍵在於，陷入情網時，你是如何處理的。」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已經宣發修道誓願的獨身者，在此種情況下，你要如何回應？你的選擇是什麼？選項之一，可能你發現無法依照誓願再繼續如此生活下去，因而必須離開修會。另一項

選擇，你重新再確認對誓願的承諾，因而以一種妥善的方式，離開你的親密的對象。

初學導師不幸言中了，它在我身上發生了一次：我的整個人，從頭到腳，栽了進去，雖然，我曾下定決心，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初學結束後的幾年，我的初戀冒出來了。那種愛意之深，和感覺到的熱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整個人被淹沒了。凡是戀愛過的人，都能了解這種暈眩期。幾週以來，一直告訴自己，就是這個人，可以共度餘生。患了相思病的人，除了吃和睡之外，什麼也做不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害怕，是否這就是要離開耶穌會的一個記號。

在這個大騷亂中，我決定尋求神修導師的指點，他是一位有智慧的長者。我向他傾訴，而他則靜靜地傾聽我淚眼嗚咽的述說。他的回覆，完全和我初學導師的說法一樣：「陷入情網，是作為一個血肉之軀的人極為美好的一部分，或許，是你所能做的事當中，最符合人性的一件事。它表示，你是一個可親可愛的人。對一位耶穌會士或是一位神父來說，那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因此，你可以自由地離開耶穌會，去追求這份愛情，或者，你也可以自由地選擇繼續留在耶穌會中，而結束彼此的這份愛情關係。」

經過了更加懇切的多次祈禱、接受導師的神修指導以及與朋友們（包括會士弟兄和外界的朋友）的諮詢之後，我開始能看得更清楚——雖然已經陷入了情網，但是，我仍然想要保持我的誓願和承諾，作一名耶穌會士。縱然，要離開修會的誘惑甚巨，但是，回首來時路，我發覺到，自己一直是這麼的快樂，乃因過著耶穌會士的生活的緣故。

最終，這個暈眩的經驗，也讓我增長不少智慧——心和腦的

作用，有所不同。它也提供我透視人性條件的內省與見識，讓我日後能善用在為他人的諮商工作上。以某種意義來說，它有助於讓我成為更完整的一個人。

維持獨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愈是可親可愛，你本人或是對方，都愈容易陷入情網。著迷了、迷戀了、陷入了情網等一般常人都會遭遇的狀況，曾誓願獨身的男女，也不會例外。

更難的是，在貞潔、獨身的生活中，孤寂是難免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朋友，不論你和家人是多麼的親近，你的修會團體是多麼的支撐著你，多麼滿意你的使徒工作，到了夜晚，你要孤單的上床睡覺。沒有一個知心伴侶可以和你一起，分享好消息、做你傷心痛哭的肩膀、勞累終日後可以寄望的一個溫情擁抱，真是情何以堪。

對於一個單身、沒有性關係的生活形態，更欠缺社會上一般大眾文化的支持。美國社會對於訂婚、結婚、生兒育女等，雖常有揶揄，然而，對於此種獨身的生活，卻充斥著笑話、不屑的眼光和毫不掩飾的敵視。西元 2002 年，美國天主教會內爆發性醜聞的危機時，最常聽到的批評就是：「好啦，教士獨身啊，你看，現在發生了這種事情。因為，獨身制度違反自然規律嘛！」一般的人相信，沒有「性」的生活，是怪異的、不健康的，是一種病態。這幾乎是一個無法攀越的刻板印象和成見。

在此欠缺社會文化支持的情況下，對度獨身生活者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當屬：自我培養與他人親密的友誼關係；面對自身工作的健康的心態；經常接受神修輔導；祈禱。獨身生活一如其他的生活狀態——婚姻生活、單人生活、離婚後的調適、宣發誓願者的生活、被授予聖職者的生活（譯者註：泛指司鐸、牧師或其他

教派的神職人員)——需要放心思上去，需要自行努力。

對我而言，孤寂是最難受的，如同在專屬情感關係中的當事人，欠缺了性的關係和性的親密時的難過一般。然而，犧牲是獨身生活境界的核心，如同任何一種彼此相互許諾的親密關係一樣。在此，我想引用某位神學家的說法，將它稱呼為「天主所鑿的一個洞孔」(God-shaped hole)——在你內心的這個空間，只有天主才能填滿。這就是為何說，專注於與天主的親密來往關係，是度獨身生活者的一個絕對的基礎要件，因為這樣子，天主就會給你一種不同的愛，而這份愛會讓你把它彰顯在你的使徒工作上，你的人際關係上，以及你的祈禱之中。



我認為，這就是安傑羅·龍開禮足堪擔當獨身生活理念之絕佳範例的一個理由——因為，他本人經歷到天主的愛。他了解，一個積極而有活力的祈禱生活的絕對必要性，以及與主的親密關係幫助他能愛得如此美好。1959年，在擔任教宗後的一次年度避靜中，他在日記上寫道：「這個視野，這個屬於整個世界的感覺，會給予我現今奉行的每日祈禱生活，一個新的脈動——誦唸大日課、彌撒聖祭、唸玫瑰經祈禱、到至聖所內瞻仰耶穌，方式雖異，禮儀或有不同，都是在親近、信賴地與耶穌結合在一起。」他與耶穌的關係，讓他能成為最有愛心、最慈祥的人。他友善令人可以親近，非常有人性而且風趣，熱情且關懷，總是可親可愛的。

若望教宗的貞潔榜樣是耶穌，因為他愛心的榜樣是耶穌。在西元1931年的日記中，他寫道：「在所有的事情當中，第一的要務，就是我必須努力，讓我的內在生命和外表的態度，都能表達

出耶穌的形象——出自於內心的溫和與卑微。」

「願天主幫助我」，是本則日記的結語。

檢視他的一生事蹟，與我大大的不同。他是上一個世代的人，地域不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他的職責、關切和付出，都是我遠所不及的。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可能是他的翻版。一如他和我是如此的不同，他和我被召叫成聖的途徑也會大相迥異。

但是，有一件事，是他和我共同分享的：渴望成為一位好司鐸、好基督徒，尤其是一位可親可愛的人。我希望，能自由地去愛和被愛。我希望，能在天主所賞賜的友誼、愛、親切和人際的親密關係、性等的凡塵俗世中，自由地去生活，且能忠於我的誓願。我希望，常能接受和欣賞從別人那裡給我的那份愛，但不會企圖緊抓著不放。

就像大家一樣，我希望成為一個可親可愛的人。

願天主也幫助我。

10

在她的世界內生活

桃樂斯·戴
(Dorothy Day)

我們都嘗過漫長孤寂的難耐，而我們也都學習到，
愛是唯一的解藥。這份愛，來自與人的相處之中。

——桃樂斯·戴 (Dorothy Day)

《漫長的孤寂》(*The Long Loneliness*)

我第一次看到她在自傳封面上的照片時，就忍不住想要去多認識她。一個瘦弱的婦人，跨出一片樹林，滿頭銀髮上戴著一頂深色的小帽，一眼就看得出來是一般高中女生戴的那種，在跳蚤市場或軍用品商店裡都買得到的。時序深秋，或已是初冬，因為天空整個都是灰暗的，樹枝光禿禿一片，腳踩的泥土地上，枯葉遍地。她雙手插進老舊的粗花呢大衣口袋裡，大衣的前襟敞開著，大衣釦子好像掉了一顆，大衣裡面是一件暗色、樸素的洋裝。她面上的表情異常的奇特，雙唇緊閉，低著頭而雙眼微閉，顯然是在思考什麼重大的事情。

似乎不可思議，我第一眼看到這幀在書皮上的照片，就心生

一股衝動，急著想要去多了解她，也要像她一樣——唉，這個人我還根本不知道是誰哩！照片的本身，似乎已經透露出一個令人稱羨的生活方式。我在意的，不是外表看起來如何、如何，是否度著一個簡樸的生活方式，或是擔心我的舉止、行動，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會如何如何。我要的是，對自己生活的方向，有一種肯定而有把握的感覺。我想要，結合積極進取與收心靜觀於一體，活出在自己的生命中（從照片上看來，似乎她已確知人生的方向，而之所以來這片樹林，是為了做一個祈禱）。因此，我想要像她一樣。

我和一位聖人的首次接觸，通常是透過一個形象——聖人的一幀照片、一幅馬賽克畫像或是教堂內的巨幅壁畫。這類的形象，是深涵寓意的，或是凸顯的象徵意義。在我來說，有時比日後閱讀傳記時，更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寫意的照片，在其穿著上傳遞出某種訊息，從其面容上透視到其靈魂的某個層面，在其眼神的凝視中也能讀到些什麼。

傳記作者凱斯琳·哈里森在她的《聖女小德蘭》一書中，曾就小德蘭在她短暫生命末期所拍攝的一幀照片，作了一番的詮釋：「她看起來，是很開心的，拘謹的小嘴似乎強忍著不要笑了出來，而那愉悅的眼神，似乎在訴說著她即將欣然往赴、揭曉那奇妙奧祕的盛會。」

哈里森小姐更稱奇另一幀照片：「她那狀似回顧我們注目她的眼神，仍然專注在那條在她面前延伸下去、猶如水波反射豔陽般閃爍的小徑上——此景榮耀地昭告眾人，小德蘭已是獲選的一員。」

這兩幀照片是如此豐富地向凱斯琳·哈里森訴說著小德蘭的

形象。為不明內情的局外人，不過是某不知名的修女不惹眼的兩張照片罷了。然而，在信友仰慕者的眼中，此種聖人精髓的呈現，只要目光一接觸，即刻能知悉聖人想要傳遞給我們的訊息。這樣的照片，可以說是一種聖像（icon）了。

桃樂斯·戴是一個聰明、機智、為理想而奮鬥、為人正直、慈祥、工作勤奮的人，這就是那幀封面照片給我的印象。日後閱讀她的傳記，更加肯定了最初的這個印象。



西元 1897 年，桃樂斯誕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Brooklyn）內一個聖公會（Episcopal）的家庭。幼年時，舉家搬遷芝加哥（Chicago）。父親是新聞從業人員，經常需要找一份好工作。她在就讀伊利諾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時，立志寫作的生涯，同時也關懷當時激烈的政治議題，諸如，貧窮、急遽的社會變遷、勞工組織等，不過，顯然地對宗教沒什麼興趣。透析事理、精密立論是她寫作的特色（也是她的思想上的特色）。在她的自傳《漫長的孤寂》中，回顧了這個時期的她：「當時，我認為宗教只會妨礙我的工作。我覺得，它真的是人民的鴉片菸，所以，我硬下心腸，不去管它。那是一個自己知道而且故意的過程。」

大學沒有畢業，她就前往紐約，去從事記者的職業生涯。一頭栽進紐約市內格林威治村那種波希米亞式的世界，為激進的社運小報《呼喚》（*The Call*）和《羣眾》（*The Masses*）撰稿，採訪相關的議題，諸如，社會主義運動、工人至上主義、國際工人聯盟、「飢餓暴動」、失業、市政廳前的抗議遊行、童工法案等。

「我在紐約市見過托洛斯基（Trotsky，譯者註：蘇聯共產革命早期

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他還未回去蘇聯。」她這樣記載著。在首都華盛頓的一次爭取婦女投票權的遊行中，她被捕下獄。

這個短暫的牢獄禁錮，反倒沉澱出了一個歷久而不衰的思維。在此拘留期間，她目睹受監人犯所受的不人道待遇，而和一起被下獄的婦運同志，共同發起了一項在獄中的絕食抗議行動。此舉深化了她認同社會上為數更多的一羣弱勢者：貧窮者與被剝削者。在《漫長的孤寂》書中，她回顧了在這段監禁期內的反思，她自身的過犯型態，和那個廣大世界中人們的受苦受難以及邪惡，是脫不了關係的，依照依納爵神操的用詞語句，桃樂斯是正處在《神操》的第一週的默想。

三十天以後將重獲自由，這對我將毫無意義可言。我將再不會有自由了。不能自由，是因為得知，對於全世界所有禁錮在鐵窗後的男、女、老、少，固然他們因犯罪而被監禁、受懲處、孤獨和受苦，然而，對於這些人所犯的這些罪，我們大家都有責任……

難道這是過分地誇張了？沒有多少人像我們（譯者註：獄中絕食抗議者）這般，整整的六天六夜，平躺在陰冷、黑暗和飢餓中，而內心卻仍然澎湃著這個世界以及我等乃是其中一部分的思緒。

桃樂斯的聰明才智，以及她益發地關懷社會正義，把她帶進紐約市一羣活躍的知識分子和社運人士的圈子中。這羣人包括愛瑪·戈曼（Emma Goldman），若望·巴索斯（John Dos Passos），麥克·伊斯曼（Max Eastman）、若望·雷德（John Reed）和尤金·

歐尼爾（Eugene O'Neill）。也是在這段時期內，她和一個名叫福斯特·貝特漢（Forster Batterham）的男子發生戀情，進而成為有實而沒有名分的夫妻，住在紐約市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一幢老舊的房子中。

西元1926年她懷孕了，這件事很自然地導引她產生一個宗教的皈依。懷孕喚起了她的覺醒：對於創造的領悟，以及要與天主發展出關係的渴望。此時，以生活上的各個層面來說，均非順遂。幾年前認識而同居的這個男子，是她在市內的一所醫院工作時認識的。曾經懷孕後不久，又流產了。關於這段情節，她很少公開地談論，只在私下和少數好友曾談到（她有一本小說《第十一個貞女》*The Eleventh Virgin*，書中女主角流產一事，似乎是一個影射）。歷經為時數年的戀情、酗酒的一段時光，短暫的放蕩形骸（曾夜宿某一廉價的旅館，被誤認為流鶯而遭逮捕）之後，桃樂斯幡然覺醒，視自己是一名被寬恕的悔過者。再度懷孕幫助她感受到天主給她的寬恕，祂清洗了她的過犯，她的生命得以重新開始。在這滿心感謝的沃土中，信德的種子發芽了。

「我每天祈禱，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是如何開始的。」她這麼寫道。在懷孕期間，她取出了多年前收藏的《師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中文版由光啟文化印行），開始捧讀。

該書是根據十五世紀的一個手抄本譯的，在教會內流傳已久，供信友們熱心敬主之用。一位傳記作者特別指出：桃樂斯從年輕時代開始收集了不少書籍，在她日後的生命上大大地派上了用場，諸如，《聖詠集》（*The Psalms*），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托爾斯泰（Tolstoy）、狄更斯（Dickens）、詹姆斯（James）等名家的著作。根據保祿·艾禮（Paul Elie）在他的《拯救

自己》（*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書中是這樣描述的：「閱讀了《師主篇》之後，她未來生命的取向已然明確——在宗教領域戮力。」在此過程中，她也決定要讓她即將出生的嬰兒受洗。

在她史坦頓島的住家附近，有一位仁愛修女會的亞羅西亞修女（Sr. Aloysia）主持一所「未婚媽媽之家」。修女的簡樸生活方式，令她心儀。有一天，亞羅西亞修女單刀直入地問她：「如果你自己不先成為一名天主教徒，將來你如何能教養妳的小孩成為天主教徒？」話說得有理，在女兒塔瑪·德肋莎（Tamar Teresa）出生領洗後，她也加入了天主教會。

雖然桃樂斯·戴從小就未和天主教會看過接觸，然而，以她一貫的生活態度和對理念的執著追尋來說，天主教會為她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歸宿。她在奮力不懈地追尋諸多「理念」的同時，也尋找一個系統化的倫理法則，用以支撐這些社會所需的回應，甚至於英勇的行動。曾和她一起打拚的激進派友人的圈子內，是有一種彼此照顧的「團體之愛」和「兄弟手足之情」，但是，在背後支撐的哲學基礎，欠缺如同天主教的教義那樣，有前後一貫、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體系。

引領她走進天主教的大門，還有另一個理由：天主教會對於貧窮者和外來移民者的認同感，實在令她窩心。在那段格林威治村的日子裡，她常走進附近的一個天主教堂聖若瑟堂（St. Joseph's Church），在那兒不僅有她鍾愛的貧窮者，更瀰漫著祈禱的氛圍。最後，她選擇的是一條對天主謙遜和服從的道路，完全是天主教傳統的神修方式，如邁向至聖之路。桃樂斯對貧窮者的關愛、與天主共融的渴望、道德體系的追尋、希望度著謙遜與服從的生活，全都緊密地結合在天主教會中。

天主教會滿足了她的人生理想和與主契合的新生命，如同多默·牟敦的情況一樣，因為這個龐大而神祕的教會，充滿自信，明確認識在此塵世中的定位。

福斯特這位男士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對任何有組織的機構，包括有組織的宗教，全無興趣。「無法跟他談論宗教的事，一道高牆已然隔開了我倆。」她悲傷地寫道。女兒塔瑪受洗當天，是彼此關係的緊張時刻。儀式一結束，他就離開，出海去捕捉龍蝦。晚餐時，又是一場爭執。一年後，兩人終於分手。為了皈依天主教，她付出了一個大代價。

桃樂斯擁抱天主教會之後的種種，並非一帆風順、事事順遂。天主教會是貧窮者的樂園，是不錯的，但是，它對於造成貧窮的根源或制度上的原因，似乎視若無睹。她一直在思索、質問著：難道共產主義者是僅有的、願意去幫助貧窮者的人嗎？在私下裡，她不停地思索著，可有一條途徑能把社會正義和她新認識的天主教結合在一起。

西元 1932 年，答案終於出現了。她遇見一位來自法國的彼得·莫瑞（Peter Maurin），因而碰撞出了一個智慧的火花。莫瑞自稱是法國的農夫，上過學，是一所修士辦的學校。桃樂斯鍾意與他來往、請益，「他是一個可以整天和你講個不停的人」，而他的世界觀是世上的人們並非工業化機器運轉的奴隸，而是能夠共同參與美好生命的創造。她在《漫長的孤寂》書中描寫這個人：

莫瑞很樂意看到人們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情，和構思偉大的夢想。他要人們伸出雙手，擁抱自己的弟兄們，因為他知道，找到天主、找到至善境界最穩當的途徑，

就是經由自己的弟兄們。他希望這番的努力，終究能達到更佳的物質生活條件，以滿足人們的需求，進而有能力，以各種的方式去愛和敬拜天主。

而這個烏托邦式的視野，其基礎在於聖經的福音。因此，莫瑞的這番認知，深深地擄獲了桃樂斯·戴，而經常讚譽他是她的導師。彼得·莫瑞鼓勵她，發揮新聞方面的才幹，去創辦一份報紙，以便把工人們團結在它的旗下，並能從福音的視野，對悲慘的社會現狀提出批判、指點迷津。西元 1933 年的國際勞工日（5 月 1 日，也是工人的主保聖若瑟的瞻禮日）《天主教工人報》（*Catholic Worker*）創刊了。

每份報紙售價一美分（至今仍是）。發行首日，全美共售出兩萬五千份。到本年底為止，發行量已達每日十萬份。

報紙發行後，桃樂斯和莫瑞又在紐約市為貧窮者開辦了「待客之家」（*Houses of hospitality*）。這些中心，在經濟大蕭條期間，為成千的窮困者提供免費的食物和住宿。接著，他們又為貧窮者開辦一種社區型的「合作農場」。「如此眾多的陌生人羣體生活在一起，多麼罕見！」她在《漫長的孤寂》中如此描述。雖然，日後的事實證明，「合作農場」的理念實踐，難以在別的地方複製，但「待客之家」則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美遍地生根，後來，更運作成為效果卓著的「天主教工人聯盟運動」（*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數十年來，她都以自家住所為辦公室，有一羣經常性的義工，一起工作著。她在各地「天主教工人之家」（*Catholic Worker house*，譯者註：由上述的「待客之家」轉型）和在紐約上州（*Upstate*

New York) 的「合作農場」的工作與生活型態迥異，但都興致盎然。她廣泛地旅行、視察全美各據點。她是一名新聞從業人，撰寫文章、編輯報紙，同時，在她的眾多跟隨者面前，經由她的臨在和祈禱，以身作則作他們的榜樣。

在各地的天主教工人之家服務的志工們，每天的例行工作是忙碌的。清晨起床後，就要開始準備免費供應的午餐，屆時，將擁入成羣貧窮的男女，志工們在供餐服務之餘，還要和他們話家常。下午，清洗碗盤後，各自辦公——跑郵局、付清帳款、整理帳冊、清掃屋內，還要外出設法募得食物。黃昏時，晚禱時間和晚餐服務，大批的人羣將在門口排隊，又會是一陣的忙亂。晚間，終能鎖上大門。每週五的晚上，是公共論壇時間，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參加。某些具有條件的中心，還有每日的彌撒，以服務大眾。

跟隨桃樂斯·戴、多年從事義工服務者當中，羅勃·埃斯柏格值得在此一提。他曾著有《諸聖傳》一書。各地的青年志工羣，有許多人是大學生，埃斯柏格就是其中之一。在1970年代，他從波士頓的哈佛大學休學，以五年的時間，在紐約市的「天主教工人之家」服務，因而對桃樂斯的言行舉止知之甚深。我曾問他，和桃樂斯一起工作的感想如何，「很有趣啊」，這個回答嚇了我一跳。我讀過許多有關她的傳記和報導，但始終無法確定她的人格特質。在印象中，她是個有祈禱氣氛的人，樂善好施、辛勤工作，但似乎性情冷峻，是個抑鬱型的人物，尤其是自傳的封面照片也傳遞這樣的訊息。

「桃樂斯是個風趣的人，她善於說故事，常告訴我們一些她自己的趣事。」埃斯柏格這樣形容她。我記得法國小說家利昂·布洛（Léon Bloy）有一個說法：喜悅乃是聖神一個明確的記號。

各式各樣的人們，從工人之家的年輕志工到鄰近社區內年長的流浪者，她都能和他們喜樂地相處自如，不是表面功夫的敷衍，而是真誠以待，能欣賞各人不同的才華、秉賦。然而，她也是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遇到生活上的難題，偶爾也不免灰心洩氣，甚而動怒。還有，依照埃斯柏格的說法，她不喜歡人家「崇拜」她，也不讓別人有機會以傳奇人物來對待她。

總之，她待人熱情易於親近。埃斯柏格很愉快地回憶道：「她是真誠地對待我。」她喜歡什麼？「噢，桃樂斯喜歡閱讀，而且興趣廣泛，從古典小說到偵探小說，無不可讀。偶爾也看看電視。」那她看什麼節目呢？「經典劇場。」我聽了後不禁笑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位聖賢會喜歡看電視節目。

終其一生，桃樂斯·戴出於自願地度著一個貧窮、儉樸的生活。穿著的是別人捐獻給天主教工人之家的衣服，出門旅行搭乘巴士等大眾交通工具，而個人的需用品，則盡量地少量。這是一種有尊嚴和自由的貧窮，出於自我的抉擇；這和在貧困的枷鎖下，被奴役的窮苦大眾的貧窮，是不一樣的。後者，非出於自願，而是在不公義和壓迫之下的一種狀態，是需要加以矯正的、制度性罪過的記號。

由於對福音訓誨的一貫了解，桃樂斯鼓吹和平，不遺餘力。「山中聖訓」的訊息，導引她對於採行非暴力手段（Nonviolence），有著不可動搖的承諾。她這種非暴力的心態和從事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的意願，淵源於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時期（譯者註：譬如，印度的甘地在爭取獨立時的運動），一直延續到冷戰和美國的越戰時期。

鼓吹和平行動的結果，是她遭人槍傷、被政府逮捕下獄和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跟蹤與調查。這些都不能阻擋住她，「僕人是不能大於他的主人」（譯者註：瑪十 24），是她經常引用的話。批評的聲浪，也來自教會內曾最支持她的人們。雖說，他們極力稱揚她那為貧窮者的工作和努力，卻發現這種和平主義是一顆難以吞嚥的苦藥，尤其，正當美國的對外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之時。這也未能動搖她。在進入 1960 年代，美國社會公開的抗議活動愈來愈普遍時，桃樂斯·戴以言以行的見證，已然是新世代鼓吹社會正義的標竿。

七十六歲那一年（西元 1973 年），她參加了「農場工人聯合會」（United Farm Workers）為支持西撒·查維茲（Cesar Chavez）和外籍勞工的權益，而舉辦的一個盛大的集會，因而被捕下獄。當場拍攝的一幀黑白照片，震撼人心——一位嬌小瘦弱的灰髮老婦人，身著二手的老舊洋裝，坐在一張折疊椅上，昂首凝視在她身前聳立的兩名魁梧高大的武裝警察。它刻畫出，一輩子的一個承諾、基督徒的尊嚴和福音訓誨的絕對正確性。



她的自傳《漫長的孤寂》於西元 1952 年出版。對於和平主義的批評，這位著名的和平主義者，用一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為例子，來加以闡釋和回覆。那是一個典型的桃樂斯·戴的作風：直言不諱、誠實不欺、根據事實，而且，非常的基督徒。

如果一個拿著武器的狂躁分子要攻擊你、你的小孩和你的母親時，你會怎麼辦？這類的事件，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當然要制止住他，但是，切不可殺害他，必

要時拘禁他，完整的愛德將會驅散恐懼、克服仇恨。聽起來，又是一篇陳腔濫調。然而，經驗可以為它作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次，一個帶著凶器的狂躁者闖進屋內，企圖要殺害我們的一位編輯亞瑟·席漢（Arthur Sheehan）。這個狂漢子在一戰的戰役中曾受過傷。在幾乎打斷我的手腕之前，他已在屋內攻擊了好幾個人，當時，我在廚房內聽著收音機。他手拿著一把切麵包的大長刀，另一隻手拿著一個十字架，口口聲聲嚷嚷著要殺掉亞瑟。我和另一位婦人抓住他，迫使他放下了刀子。不久，他掙脫了，又抓起一個盛滿青菜的大鐵桶，擲向亞瑟，牆壁被敲擊出一個大洞來。我們又制住了他，讓亞瑟逃走。我們報了警，並要求警察把這位哈利（Harry）先生送到醫院去觀察。但是，因為我們不願對哈利提出控訴，因此，第二天醫院就放他出來了。後來，我們說服他們，要求把他留置在醫院的精神病隔離病房三十天。他們照做了，三十天後又放他出來。在後來的整個二戰期間，他依然是每天來我們的屋外排隊，取用免費的餐食。又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聽說，他在一家油輪公司找到了工作，出海去了。

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如果我們不是使用這種合乎道德的手段，而是硬來的話，那就會有暴力的結局，反而會產生出更大的麻煩。



儘管她奉行的諸多理念，是非常的激進，她在信仰上的虔誠，

卻是出奇的傳統。西元 1960 年，她寫了一本關於聖女小德蘭的小冊子，而小德蘭所倡導、為愛主而做瑣碎小事的神嬰小道，更為她的窮人事奉志業增廣了面向。始終對天主教會忠誠，但作為一位新聞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桃樂斯也批評教會的缺失和她的自我設限，尤其，在有關社會正義的議題上。這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常引用二十世紀一位神學家羅曼洛·瓜爾迪尼（Romano Guardini）的名言：「教會是一個十字架，今天的基督被釘在上面。」

跟她的好友多默·牟敦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偶有爭執），桃樂斯悅樂於深度的祈禱生活中，有過與主偕同的神祕經驗。而且，她認為，不是上天獨厚於她，凡諸信友，有為者亦若是。

對於祈禱，她也持著廣義的觀點。「難道天主定下了一套祈禱的方式，要我們每一個人都照著做？」自問之後，她又直截了當地自答：「我懷疑。」她認為，人們可以藉著在生活上的見證祈禱，友誼的悅樂中、付出給別人的愛中、從別人身上領受到的愛中，無一不是祈禱。疾病和歲月不饒人，晚年的桃樂斯行動日漸不便、歸於平淡，終於固守在斗室之中。在這個時刻，她的名言是：「我的工作就是祈禱。」西元 1980 年 11 月 29 日，她與世長辭。

在諸多的價值觀上，桃樂斯·戴可說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為活出福音的訓誨——與貧窮人在一起的重要性；作為促進和平的一個方式——非暴力手段的價值；在教會生活中，羣體協同在一起的重要性。對於那些自我矮化或過分自責，認為自己在上帝面前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的人們來說，她更是一個正面形象的代言人。她年輕時在性行為上的偶爾濫交、墮過胎、與男友福斯特吵吵鬧鬧的關係等，反倒促使她更積極地去尋找人生的意義。就

如同牟敦的狀況一般，過去種種的不是，反倒成了正向的一個動力，驅使她發現天主的恩寵世界。行走在最為崎嶇路途上的朝聖者，有時候，最是蒙神祝福，主恩滿被。

幾年前，我在幫忙一個堂區教友的避靜時，桃樂斯生命中的這個層面也啟發了我。那是在紐約市北郊的避靜院，避靜的主題是「與諸聖同禱」。

與我一起共同擔任神修指導的，是一位人生閱歷豐富的家庭主婦。她以感性的語句，述說她心目中的大英雄桃樂斯·戴。在她動人陳述的結論時，挑明了這一個層面：「想想看，如果桃樂斯·戴曾有過這樣的念頭：我曾墮過胎，不曉得天主會怎樣處置我？那麼，她所有的那些美好的事奉，如何能成就呢？」



我在耶穌會第一年的初學期間，有許多全新的經驗，令我欣喜不已：譬如發現祈禱，以及基督徒的神修；從事為窮人服務的工作，以及在宗教氣氛濃郁的修道團體中過生活；初逢教會的禮儀年瞻禮日的喜悅；更不用提，認識了不少關於聖人的事。

進到初學院的每一個初學生，似乎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聖人或聖賢。旁人通常不難察覺出來，偶爾，他會直截了當的告訴你。察覺的過程，常常是在細微末節上，譬如：日常的談話中，某一個聖人的名字常被提到；或是，某人在他喜愛的聖人的瞻禮慶日時，顯得格外的高興；再者，也許在小聖堂內翻閱聖經時，某位聖人的卡片會不經意地掉落地上。

我進初學院的幾週後，有一天，早我一年進入初學的喬治就介紹我認識桃樂斯·戴。喬治對她相當地崇拜，時常談到她對貧

窮者的事工，對社會正義不遺餘力的倡導，以及簡樸的生活方式。九月裡的一個晚上，我陪他到波士頓市中心的一所天主教工人之家，參加每週五晚上的例會。這樣的研討會，他們通稱為「思想澄清」聚會，乍聽之下，似乎有點毛派或馬克思的味道，至少，是個挺嚇人的用詞。但是，有機會去親眼目睹耳聞已久的這些志工們的種種：為波士頓本地街友的事工，為社會正義的努力（全美和國際上的）以及他們所過的非常簡樸的生活等，這對一個年輕的耶穌會初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會有所啟發和領悟。當晚，大家討論的，是在當時中美洲爆發的衝突事件中，採取非暴力手段的必要性。

當晚，回到會院後，喬治就把他自己的那本《漫長的孤寂》借給我閱讀，還附了一句警告：「不要搞丟了噢，否則，我會殺了你！」

我趁勢回敬了一句：「這就是非暴力啊？」

這本書我擱置了一些時日，因為還有很多必讀的功課。事實上，它在我的書桌上躺了好幾個月，偶爾，我也拿起來翻一下。每次瞥見封面上的這位老太太，似乎她也在問我：「喂，你什麼時候要開始讀我這本書啊？」直到翌年，我才好好地將她的這本自傳閱讀完畢。

元月份，我們這些第二年的初學生，要到會院外的世界，去做一個「長期試驗」——為期四個月的使徒工作計畫。在初學階段，有好幾個這樣的「試驗」要完成，諸如，醫院服務、遊民之家服務、到第三世界的服務等。

耶穌會在紐約市的下東區，為社區內的貧窮家庭子弟辦了一所主誕男子中學（Nativity Mission School），在一幢曾是廉價的市

民公寓大樓內。關於這所學校，我聽說過，應該滿適合我的，而初學導師也同意了我的申請。

在該校任教的老師。許多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或者是耶穌會志工團（**Jesuit Volunteer Corps.**）的成員，他們教學熱忱，其奉獻精神，尤其令我佩服。學校的上課時間，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三點，中間有短暫的午休和午飯時間。下午放學後，學生都留下來自習，或接受個別的課業輔導，因為，大多數的學生，家住在狹窄的廉價公寓，環境嘈雜，不能專心做功課。學生吃完晚飯後，又回到教室自習。晚上十點鐘，學校要鎖門了，累了一整天的教師還要開著小巴士，載送那些遠途或社區不安全的學生們回家。

課堂教學、個別輔導以及對學生們整體的關懷和注意，全部加起來的總和，就是耶穌會所謂的「全人關懷」。主誕中學的學生們所接受到的，就是這種絕佳的教育。難怪他們的父母——許多是來自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墨西哥（**Mexico**）、厄瓜多爾（**Ecuador**）和越南（**Vietnam**）等地的新移民——對這個學校特別的感謝。學校的畢業生，大多數繼續讀高中，有些還上了大學，其中有幾位讀的是全美頂尖的學校。

二月份一個冰冷的夜晚，爬上了床，我終於正式開始閱讀喬治借給我的這本書。翻讀了幾章之後，我發現桃樂斯·戴創辦的第一所「待客之家」就在下東區，距離這個學校僅幾條街。

第二天早上，我跟會院裡的神父提到了我的這個新發現，他似乎嫌我少見多怪似地笑著回答：「當然啦，你不知道啊？她就是在我們這附近的社區內從事奉獻事工的呀！你現在住的地方，就是她的那個世界！」

隨後，我獨自漫步到兩條街外的那座天主教工人之家，佇立

在寒風中，望著它。在 1960 年代的中期，這個地方先是成立了專為男士的「聖若瑟之家」，到了 1970 年代的初期，才又成立另一所專為婦女的「瑪利亞之家」，兩幢房子都是不惹眼的紅褐色砂岩建築。房屋外，找不到記載這些輝煌歷史的標示牌，我原先以為，至少也會鑲著一塊銅牌，寫著類似「桃樂斯·戴，天主教工人運動創始人，曾居住此房內」之類的字句。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標示牌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兩幢房子仍在運作著當年的理念：為貧窮者服務，提供下東區的遊民們（男和女）飲食和住宿。屋外的人行道上，一長列的貧窮者正在排著隊，這不就是最佳的告示牌和記號。

很快地，本院的老會士們就跟我說了幾則她的往事。她經常到這座主誕堂（Nativity Parish）來參加每天下午五點十五分的彌撒。「有人說，她是一個難纏的怪老太婆，真是一派胡言。」一位會士這麼跟我說。另一位回憶了和桃樂斯的一則感恩故事：在他司鐸生涯的一段焦慮和痛苦的時刻，曾經當面向她請教，桃樂斯傾聽後，緊握住他的手，很堅定地答覆：「你的人生意義，就是當一個好司鐸。」我記得，當時聽完這則故事後，內心自忖著，如果桃樂斯這樣跟我說，那些聖召上的疑慮，立即會煙消雲散了。

不僅只是身歷其境讓我想到了桃樂斯·戴，更由於目睹周遭這些教師們的奉獻事工——在清苦、斯巴達式的環境條件下鎮日地工作，以教會的名義而奉獻及服務，接受的薪資報酬極不相稱於他們的付出，為了貧窮者全心地服務。

尤其，在這個傍晚的彌撒中，我想起了這位了不起的女士。

白日將盡時分，在學校內的這座小聖堂即將開始彌撒。木製的跪凳老舊又有些破損，環繞著一座簡樸的木製祭台，上面鋪著

一塊白布；牆上鑲有若瑟及瑪利亞的木雕像。每天下午五點十五分的彌撒，前來參加的，不僅有學校的教職員，附近的一些教友也來，偶有過路者和街頭的遊民前來。有兩位老婦人是熟面孔，其中一位，每天都為「我的兒子、亞歷山大、神父」祈禱。天冷時，溫暖的小堂內，彌撒的氣氛格外的動人，感覺大家是如此的接近、親密，不僅是和成天一起工作的教師們，和陌生的遊民也有同感。

在學校的「試驗」即將結束，桃樂斯的自傳也閱讀到了尾聲。在此，她指出，「漫長的孤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的那種需求與渴望的感覺。要如何對症下藥呢？其實很簡單，她說，「親密互動的團體」。於是，我聯想到了這裡的教師們、學生們、學生的家長……和我同住一個會院的弟兄們；在「聖若瑟之家」和「瑪利亞之家」的那些人，以及每日前往的街頭遊民；還有，遠在波士頓我的初學院，以及城內天主教工人之家的那羣志工。我告訴自己：是的，她說的沒錯！



桃樂斯·戴於西元 1980 年逝世後，宗教界和一般的社會人士都發表言論稱譽她和追悼她。天主教的歷史學家大衛·歐布萊恩（David O'Brien）在《公益》雜誌（*Commonweal*）上為文稱揚她，是美國天主教會史上「最具有影響力、最令人感興趣、最傑出的人物」。但如同埃斯柏格所指出的，她生前對這類稱譽她為傳奇人物的說法，感到不自在，「不要稱我為聖人，我還不想這麼容易就被排除在大眾之外」。

梵蒂岡教廷方面已在進行對她列聖品的考量，她會有點生氣

吧！在某一個角度來觀察，她是屬於傳統型的聖人。她主張自願自發性的貧窮，和締造和平的必要，一如當年亞西西的聖方濟的所作所為。她的召叫，在於直接地事奉窮人，並解除他們的苦難，就像德蕾莎姆姆一般。她的祈禱生活，支撐了、活躍了她的一番善行義工，類似於聖女小德蘭。就像伯鐸宗徒一樣，她沒有讓她的軟弱和過犯阻擋住她，去答覆天主的召叫。

然而，她更像是一個非傳統型的聖人。她的貧窮者服務事工，還包括了對於導致這類貧困現象的社會和政治的體系，做出嚴厲的批判。回顧她的一生，此乃因她的新聞從業生涯所致。她能敏銳地觀察到社會百態，知道金錢的來龍和去脈（她接受金錢的捐贈時，常會拒絕那些疑似來自剝削貧窮者而來的款項）。她不僅和社會上的邊緣人站在一起，也挺身而出，抗議那些制度上和體系上的肇因。她是具有那種，依照埃斯柏格的說法，政治型的聖潔（Political kind of holiness），而在這一點上，許多熱心的基督徒卻難以接受。

對於這一個層面，我倒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從她的著作裡，我發現她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非常切合實際，而她對所以造成這類貧窮困境的評論，至今猶讓人感到鞭辟入裏。在佩服她敏銳的、政治上的分析和論述之外，我更對於她本人為貧窮所做的個人式的見證，感到極大的興趣。自從閱讀過她的自傳後，她生命上最平凡的那個層面，對我而言，反倒是最具意義的。從未宣發過貧窮的誓願，她過的生活，比我還要簡樸。在我這樣一位耶穌會士的眼中，她這般的生活見證，既是懸在眼前的標竿，更是來自背後的鞭策。宛若，她就在我的身旁叮囑著：「你真的有必要買這件東西嗎？在你的生活中，真的有需要再多擁有一件東西嗎？這

個錢，用在窮人的身上，會不會更好些？」還有，「你的事奉對窮人有益處嗎？你在祈禱中記得他們嗎？你有多愛他們？」她時時刻刻喚醒我內心中的那份渴望——要生活儉樸，要為窮人奉獻事工，就像當年納匝勒的耶穌一樣。

我的目光，又再度回到《漫長的孤寂》封面上的那幀照片上。讓我們想想看，這個浮華的世界告訴我們的是：從我們購買的東西、我們的穿著、住的房子、吃什麼樣的東西、開什麼樣的車子、到那裡去度假，可以決定我們是怎麼樣的人。低下頭來，雙手插進別人曾穿過的大衣口袋內的桃樂斯·戴，彷彿從頭上取下了她的針織小便帽，對著我搖搖手：「那全是一派胡言！」然後，走開了，去做她的事了。僅僅就這一個理由，我想，她是一位聖人。

對桃樂斯·戴下這樣一個斬釘截鐵式肯定斷言的，可不只我一個人而已。她晚年時，固定居住在紐約市的下東區內，也就是本文所提到耶穌會主誕中學內那座教堂所轄的本堂區內。幾個月前，我有機會和當時在那兒服務的一位老神父（耶穌會士）談論她的事。讓我吃驚的，是那位老神父說，桃樂斯·戴的殯葬彌撒就是在那一座小教堂內舉行的。怪異的是在彌撒進行中，一個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電燈泡，突然爆掉了。彌撒後，抬著棺木的一行人走到鄰近的第二大道上時，一個街頭遊民衝過街道、穿越人羣，雙手抓著棺木慟哭。

殯葬彌撒的那天早上，這位老神父在學校上完課時，面對全班的學生說了一句話，可能桃樂斯·戴不會喜歡聽的：

「今天，你們要到聖堂去，去看看一位聖人的葬禮。」

11

因為，我是罪人

伯鐸
(Peter)

以血肉之軀的人的層面來觀察（這也是他後來各樣展現的起點），伯鐸是我們要如何走向天主的一個極為凸顯且又極為坦率的實例。這個模式，極其令人驚訝，為許多的人來說，更是一個極大的震撼，甚至於，是一種失望。然而，它清楚地擺明了，不是由於我們做得對，才得以走向天主，而是，因為我們做錯了。

——理查·羅爾 (Richard Rohr)
《心靈弟兄》(Soul Brothers)

耶穌會初學兩年期滿，該要宣發誓願——貧窮、守貞和服從。在特別為此而舉行的彌撒中，長上舉揚聖體，誓願人在他面前跪下，宣讀一篇從聖依納爵時代流傳下來的誓詞，新加入的耶穌會士向天主誓言。

「誓願日」是一位耶穌會士在其修道生活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不僅是因為他向天主作了一輩子的承諾，也因要在眾

人——同會的弟兄們、家人和朋友們——面前，公開地作此承諾。此後，他不再是一名初學生，在自己的姓名後面，可以加上 SJ（Society of Jesus，耶穌會），但還要繼續讀哲學和神學等等。

就如同修道生涯的每一個重要階段一般，伴隨「誓願日」而來的，是一長串源遠流長的傳統。在我這個初學院裡，第一年的初學生要負責安排當天彌撒的各項細節。所以，我第一年初學的八月的大日子裡，導師囑咐我備妥了彌撒用品：一個聖體碟，一個聖爵，一片盛聖體的白巾，兩面方巾。

這些專有名詞，在天主教會是有悠久歷史的，哪裡是我這種自幼並非在濃厚的天主教文化氣氛中長大的人所能懂得的，乍聽之下，目瞪口呆地望著他。導師立即察覺我的窘境，又用通俗用語說了一遍：「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小的平碟子，一個杯子，一塊白墊布，兩片擦拭布。」

另一個傳統，是選用一個「誓願聖名」。有些美籍的會士在宣發誓願時，希望在自己原來的姓和名中間，再加上一個特別的、有意義的名字——通常是一位聖人的名字，以表示特別崇敬該聖人，以及效法之意，類似在領受堅振聖事時，特別選取一個聖名一樣。在美國馬利蘭州（Maryland）的耶穌會省，有些初學生會選用「瑪利亞」，因為聖母瑪利亞是該會省的主保聖人（譯者註：美國馬利蘭州，即是因 Mary 而得名）。

我的學長喬治，即援引此例，希望取用「桃樂斯·戴」為誓願聖名，但是初學導師否決了他的這個念頭。喬治抗議說，我的聖召就是受了這位婦女的影響而來的。然而，導師卻不為所動。數年後，在讀哲學時，有人送他一隻白鼬鼠當寵物。喬治把它飼養在會院內，裝在一個小鐵籠裡，給牠取名「桃樂斯·戴」。「至

少要有一個取用這個名字。」這是喬治的說詞。

雖然，對於選用誓願聖名一事，也有人不願多此一舉，以免顯得太張揚，或是覺得沒必要。我本人倒是不反對，多一個聖人為我代禱不是更好，為什麼要放棄這個機會？何況上一次有機會選用聖名，是在二十年前領堅振時。當年，我才九歲，是父母代行的，選用「多默」乃是為紀念外祖父。

因此，我覺得屆時自己一定要選用誓願聖名，只是，要選哪一位聖人，尚待決定。



在我要宣發誓願的幾個星期之前，我和同期初學的比爾（Bill），到麻州格羅斯特鎮（Gloucester）的耶穌會避靜院，做一個為期八天的避靜。兩年忙碌課程的初學期後，我們兩人都期待，這會是一個時時遠眺大西洋、輕鬆而愉快的八天。

但是，天主另有祂自己的想法。

避靜開始的第一天，一個小時的祈禱過後，突然一股鋪天蓋地的疑雲籠罩著我——當真要去宣發這個誓願嗎？雖然兩年初學生活，令人非常滿意，但是，此刻我卻開始迷惘——難道真的要割捨過去種種，而成為一位耶穌會士？在初學的兩年期間，本來就有足夠的機會，細細地考量此事，然而，似乎就在格羅斯特的此刻，我所有的擔憂，一次大爆發了——宛若打開了潘朵拉的魔盒。

一些我一直鎖在內心，未加理會的問題，傾巢而出：我好像很容易陷入情網，怎可能保持獨身呢？我非常在意穩定的、安全的生活環境，我能接受派任遠方的任務嗎？自己是如此地自私自利、看重自己身體上和情感上的優渥舒適，我如何能去幫助別人

呢？當我仍然企盼別人的注意和讚美時，我如何能成為一位謙虛的耶穌會士呢？這麼多的不合聖潔而且有過犯的態度，諸如驕傲、野心、自私等，仍主宰著我的生活之時，我怎麼期待自己成為一個好的司鐸？

第二天，我原原本本的向我的避靜神師坦陳內心的這番掙扎。他是一位年輕的神父，很有耐性。我原本預想他的答覆會是：「那你應該慎重的考慮清楚，是否合適留下來。」

相反地，傾聽完了我的述說，他一點都沒有顯出驚慌失措的樣子。他要我先回去，默想《若望福音》上的一段章節——耶穌復活後，在提庇黎雅岸邊顯現給伯鐸的景況。耶穌詢問伯鐸：「你愛我嗎？」而被問的這個人，就在幾天前還否認過祂。

我心裡在想，要在這個節骨眼上默想這段福音，似乎有點奇怪——莫非，神師認為我不夠愛耶穌？但是，我知道，在避靜當中，最好不要去質疑聖神的行事作風。這樁表面上看起來，是奇怪的「功課」，事後證明，的確正是我所需要祈禱默想的內容。

當晚，在小聖堂內，我默想自己是伯鐸，與耶穌一起站在沙灘上。在想像中，幾艘破舊漁船的後方，一抹夕陽即將西沉，沙灘上，補網的漁夫們大聲地交談著，耳邊傳來敲擊沙灘、有韻律的波濤聲，微風吹撫我的臉頰，空氣中似乎帶點鹹味。在大西洋濱的格羅斯特，要做這樣的一番默想，一點都不難。

難的是，和耶穌分享我內心的這番掙扎。在日記中，我寫道：「我可以很清楚地靜觀，自己和耶穌一起站在提庇黎雅湖（Lake Tiberias）的岸邊上，『祢願意我成為耶穌會士嗎？我有這麼多的缺點，怎麼可能成為會士呢？』然而，我完全得不到祂的回答。真是非常的挫折！」

當晚，我帶著滿懷的困惑和失落上床睡覺。奇怪哩，天主為什麼不回答我的這些問題？避靜八天很快就會過去，宣發誓願的日子，幾個禮拜後就要到來，屆時，我個人的這些「局限」，祂要如何拿掉呢？

第二天早上，在祈禱時我停止發問了，設法靜下心來，傾聽天主。這個時候，我立即覺察到，自己全身籠罩在一片寧靜之中。我愈是為我的聖召禱告，愈是能想像自己和耶穌一起在海邊，而且愈是覺得我被召叫來成為一名耶穌會士，不是先要清除掉那些缺點、那些局限、那些心態和狀況，而是偕同著俱往，說不定我的召叫還是因為那些不完美哩。天主召叫的是全部整個的我——雖然，有些部分我不滿意——去和祂在一起。

在這樣的光照之下，我開始思索伯鐸這位宗徒。過去兩年來，藉著每日彌撒的讀經，逐步地了解門徒們跟隨耶穌的進程，也因此更認識了伯鐸。我思索後的發現，自己也嚇了一跳。雖然不是神學上的一個新的見解，但對我而言，卻是前所未聞的，那就是：伯鐸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門徒，他和其他的宗徒一樣，徹頭徹尾是一個血肉之軀的常人。



在加里肋亞海邊召收首批門徒之時，納匝肋人耶穌可能已經先打好了主意。聖經學者威廉·巴克萊（William Barclay）在關於《瑪竇福音》的論述中，談到宗徒們：「他們不是學者，沒有財富、影響力或社會背景，他們也不是窮人，僅只是一般的平凡人，為生活而工作著，而且可以預言，任何一個未來都不會有什麼大出息。耶穌所召叫的，就是這樣普普通通的一般人。」

巴克萊的觀察更指出，耶穌揀選漁夫們作為他首批的門徒，是認定了他們的特質，將會使他們成為優良的「漁人的漁夫」。首先，好漁夫有耐性等待魚兒來吃餌。一個好的傳道人，也要學習等待結果的出現，如果，他們來吃「餌」的話。好漁夫一定會堅持不懈地撒網捕魚，即使有時看起來成功率不高。傳福音者亦然，要準備好一試再試。漁夫要有奮鬥的勇氣——他要隨時面對海面上突然的風暴，甚至於船艙受損，乃至於沉沒。同樣地，傳道者需要有勇氣，因為，把真理告訴別人的時候，總是有風險的。

漁夫要眼光敏銳，看準時機拋竿或撒網。同樣地，「明智的傳道人知道，什麼時候是開口說話的好時機，而什麼時候該要保持沉默」。捕什麼魚，用什麼樣的餌，漁夫不會只用一種餌，來對付所有的情況。同樣地，廣傳福音之時，不能只用一種方式，去面對所有的人。最後，漁夫不會嚇跑魚兒，同樣地，明智的基督徒向人介紹基督時，也當隱藏在祂的身後。

耶穌招收這批門徒時，是預期他們能發揮這些特長。然而祂也留意到，這些被揀選的人，也會犯錯，而後世歷代的門徒們也是一樣，諸如：憤怒、困惑、驕傲、自私，尤其是懷疑。跟著一起來到耶穌跟前的是他們自身原有的、身體上、情感上、精神上的局限。他們都是血肉之軀的人。

依據福音的記載，伯鐸等宗徒們，整天和耶穌長相左右，但也顯示出令人想不透的遲鈍。一而再、再而三地親眼目睹，一個又一個的奇蹟——死者復活了、羣眾被餵飽了、病人治癒了、癱瘓者行走了、瞎眼的看見了、罪被赦免了、暴風巨浪平息了——然而，宗徒們卻從根本上誤解了基督以及祂的使命。

我在兩年的初學期中詳讀完了四部福音書，不難去想像這樣

的一位伯鐸——耶穌的夥伴、宗徒之長、初期教會的領袖、傳統上的首任教宗——經常對自己說：「我真是一個失敗者！」

多年之後，在我讀神學時的課堂上，新約聖經的教授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圖表，標題為，「人格特質的神學透視」。在圖表的上端，由左到右，分列著三部對觀性的福音書（Synoptic Gospels）：《瑪竇福音》（*Matthew*）——《馬爾谷福音》（*Mark*）——《路加福音》（*Luke*）。在圖表的左邊，由上到下分別排列三個名詞：耶穌——宗徒——基督徒的生活。在這樣結構的空格表上，依照這三個名詞在每部福音書中的呈現，教授在每一個空格上，分別填寫一個簡短的敘述字句。

在《馬爾谷福音》欄目下方的「宗徒」空格內，教授是這麼寫的！「傻子和懦夫」；而在《瑪竇福音》的欄目下方，則寫著：「小信德的人」。

在所有的這類描述的狀況中，伯鐸總是同輩中之最。他總是在把事情弄對了以後，再又把它弄錯。譬如，在《馬爾谷福音》中，耶穌問門徒們：「你們說我是誰？」有人說：「厄里亞。」有人說：「洗者若翰？」都沒有滿意的答案，而伯鐸脫口即出：「祢是基督！」

答的是不錯呀。可是，當後來耶穌告訴他們，他必須面對苦難時，伯鐸開始指責耶穌——這個人，伯鐸剛才還宣稱是默西亞哩。於是，福音書上有了這段眾所周知的責斥：「撒殫，退到我後面去！」耶穌並不是說伯鐸是撒殫，而是指出，誘惑人不接受基督將受苦難這個真實性，並非出於天主。我們想像一下，被耶穌責斥後，伯鐸一定是一副畏畏縮縮的模樣，不得不為他感到難過。

耶穌在巴勒斯坦的傳道期間，伯鐸隨侍在側，而且獲選為領

導。然而，在耶穌被逮捕之後，在節骨眼的時刻，他三次否認祂——一如耶穌事前的預言。在此事之後，大感羞愧的伯鐸，回想起來，耶穌早已知道他會背叛祂，豈不更是如同火中加炭，更覺無地自容。

這位耶穌召叫他「牧養我的羊羣」——羽翼漸豐的基督徒團體——的伯鐸，是一位帶有瑕疵的血肉之人（「刻法」Cephas和「伯鐸」Peter，都是耶穌給他取的別名，均有「石塊」的意思，吻合他個性上有稜有角的層面）。打從一開始成為門徒，伯鐸對於自身的過犯和軟弱，就非常的敏感。《路加福音》曾描述這樣一個場景。耶穌在伯鐸及其同伴們的面前，行了一個奇蹟，當時伯鐸就自己覺得羞愧不堪當，而對耶穌說：「主，請祢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五8）。

這並非虛情假意的謙遜。這是面對面地站立在神聖的奧祕前面的這位伯鐸，明白地表示，他已經清晰地明瞭自身的過犯和局限的直率話語。這是一個人面對出類拔萃的優秀者時，極其自然的一種反應。具有如此的明悟，也是基督徒神修進程的重心——這是一個謙遜的記號；與天主開展真實關係的起點。這也就是，為什麼聖依納爵的《神操》，在做大避靜的最初一開始，就要求祈禱「內在性的認知自己的過犯……和行為上的不當」的緣故。

任何人只要展讀幾篇福音上的故事，就會遇上所謂的「歷史上的伯鐸」——他任性而為、疑心甚重、理不清狀況，是個衝動型的人物。耶穌非常愛他，近乎溺愛；經常寬恕他，甚至容忍他的懦弱表現（在祂被捕、被釘的時期）；而且始終如一地信任他。聖經學者推論，耶穌復活後，三次詢問伯鐸，「你愛我嗎？」乃是為了要平衡伯鐸的三次否認祂。

伯鐸在最偉大的聖人的行列之中，乃因他的人性、他的短處、他的懷疑，更重要的，是他對這些都心知肚明。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明白自身的過犯以及基督能救贖他的大愛——才能夠領導剛誕生的教會，以及引領別人走向耶穌。而他的軟弱，正是他的能力所在。



以下引錄的一段《路加福音》的章節，我認為，適足以顯示伯鐸的謙遜之處。

有一次，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羣眾擁到祂前要聽天主的道理。祂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漁夫下了船正在洗網。祂上了其中一隻屬於西滿的船，請他把船稍微划開，離開陸地；耶穌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羣眾。一講完了，就對西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西滿回答說：「老師，我們已整夜勞苦，毫無所獲；但我要遵照祢的話撒網。」他們照樣辦了，網了許多魚，網險些破裂了。他們遂招呼別隻船上的同伴來協助他們。他們來到，裝滿了兩隻船，以致船也幾乎下沉。西滿伯鐸一見這事，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主，請祢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們所捕的魚，都驚駭起來；他的夥伴，即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樣驚駭。耶穌對西滿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他們把船划到岸邊，就捨棄一切，跟隨了祂。

(路五 1-11)



明白了伯鐸在人性上的道理，就是給了自己一個釋放性的內省。因為，如果天主是個別地召叫我們每一個人，祂所召叫的，是一個秉賦和缺失均集於一身的人。更常由於這類的缺失和生命中的遺憾，我們更進一步地被拉近天主。

基於這些理由，我最後還是選定伯鐸，作為我的誓願聖名。他會提醒我，天主是以何種的方式愛著我。

人人都應當如此地點醒自己：天主愛的是整個的我——包含我的有限，也包含會犯過的傾向。當然，天主常呼喚我們，要悔改、離開犯罪的行為；解除那阻礙我們更進一步地跟隨祂和接近祂的繫絆。而在此同時，天主一直在邀請我們，跟隨祂——而這位跟隨祂的人，對於人的本性和祂的寬恕，都有自知之明。

耶穌會總會章（General Congrega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中，有一段文字是如此這般地定義耶穌會士：「成為一位耶穌會士要怎樣呢？他要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而被召叫去成為耶穌的一位夥伴。」成為一名基督徒，亦復如此——是一個「被愛的罪人」。

很難相信，天主是這麼慷慨地愛著我們。我們常誤以為，天主就像我們的行事作風一樣，愛的方式也和我們人一樣——是有條件的。天主的愛是如何的豐富、如何的深，遠超乎我們的認知。祂願意成為一個人，且依照人一樣的死亡，就是一個記號。另外一個難以相信天主慷慨大愛的原因，就是我們看到了自己的有限，卻難於接受它。我們多麼希望自己不是這個樣子，如果我們是比

現在更聖潔，也許就會值得天主來愛我們。

然而，天主所要的，就是要我們成為自己，而依照多默·牟敦的說法，就是成為「真實的自我」。成聖的道路，在某些層面上來說，就是努力成為自己的道路。

不久之前，一位年輕的男士在神修輔導中，向我坦言，其內心的憂愁乃是因為明悟了自己本身的過犯——太重視自我、渴望賺大錢、驕傲等。這是教會的教父們所稱的「良心不安」——帶罪之身，怎能蒙天主垂愛。

我跟他很熟，所以就反問他，是否愛他那個三歲的小兒子——喧鬧不聽話、魯莽又衝動。他使勁地點頭。我順勢接著問：「你愛你兒子的時候，是否也包括他不完美在內的整個人？」「就因為有那些不完美，我才更愛他哩！」這話說在突如其來的眼淚中。我想，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我本想明說，這也就是天主愛我們的方式。但是，我打住了，他的表情已經告訴了我，他明白了。

此外，不相信天主這種無條件的愛，有可能會導致我們在修德上的怠惰。我們可能會不理睬成為真正門徒的召喚，而狡辯說，我不完美、沒有秉賦、只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罷了，哪裡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門徒，「我不像德蕾莎姆姆、桃樂斯·戴，或是，若望二十三世教宗那般的有德行，我只是非常平凡的一個人，對天主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全身都是缺點，天主的事，沒有一樣做得來，因此，我什麼都不必做。使用自己的人性作為藉口，不去跟隨天主，因而不去答覆天主對自己的召叫，以及對他人的責任。

更進一步地說，通常也就正是因著我們自身的有限，甚至於，

易於犯過的傾向，把我們更拉向天主，更能成為一個好門徒。這一點，我在讀神學的期間，特別有所領悟。



初學之後的第十年，我開始讀神學。這是晉鐸前的最後一個養成階段，學校位於麻州劍橋市的衛斯頓耶穌會神學院（Weston 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Cambridge, MA.）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工作實習培訓，我非常期待這次的學習。我想像著，自己快樂地沉浸在新舊約的經書、神學和教會歷史的研習之中。

學校讀書生活的前幾個月，完全如同事前的期盼：課堂上，學有素養的教授講授美好的課業，以及滿屋子聚精會神的學生。我熱衷學習，一直在考慮要繼續深造博士學程，最好是聖經學。我開始憧憬著一幅美麗的未來——舒適地坐在一張大書桌後的椅子上，一杯咖啡在手，收音機播放著曼妙的古典音樂，書香滿室，書架上擺滿了各類的聖經評論著作、教父的論述，有希臘文的、希伯來文的、拉丁文的……總而言之，完全沉浸在天主的話語之中。多美好的未來人生啊！

幾個月之後，我開始感覺到，我的手掌和手腕有些疼痛。猜想是由於打字使用過度的緣故，於是，減少花在電腦前的時間。可是，疼痛依然。

朋友們提供各樣的建議：盡量不要打字、不要太用功、多做些伸展雙手的運動、多運動、多休息。都很有道理，也都試了，還是愈來愈疼痛——常常夜間睡覺時痛醒；簡單的動作，都有困難；終於於，完全無法打字或寫字。

神學的研習生涯才剛開始，就發生這樣的事；無法打字，又

不能抄筆記，怎麼當個學生呢？我開始擔心了。

學校的醫生給我安排不同的專科醫師做檢查。因此，利用課間的空檔，走訪了十幾位專家——神經醫學、風濕病、整型外科以及專門醫治手的專家。而X-光、MRI掃描、核磁共振等一長串的機器檢查，更是少不了。折騰了好一陣子下來，疼痛的狀況更嚴重（會院內，還有人開玩笑說，「你看的是哪一個醫生，蒙古大夫啊？」）。我還去看了頸椎醫師（有一位醫生的建議），也去做了按摩治療（因為又一位醫生說，可能手部的肌肉太緊了），還試了針灸療法（試試看嘛，又沒有副作用）。最後，仍然沒有一個清楚、明確的診斷。

接下來的幾個月，情況更糟。新約福音內記載，耶穌治好了一個患血漏病的婦人。這個婦人，十二年來患血漏症，把全部家產都花在醫生身上，卻沒有一個能治好她。我在想，難道我也要等待十二年，才獲得治癒？

這不是一個要人命的病，但的確是一個試煉的經驗，眼前該做的事都沒法做，更別提那企盼中的美好遠景了。雙手的不適，不僅當下放鬆不下心情，更讓人害怕未來。更窘困的是，我一直是個好學生，而且引以為傲。為此，我頻頻禱告，卻毫無頭緒。諸般的這些事情，天主您在哪兒呢？

更切中難題的核心是，我該怎麼辦？接受我的這個「有限」，休學去，忘掉晉鐸這回事？或者，接受它，只顧勇往直前，不要想太多？內心的煎熬，不僅在於手的疼痛，也不僅是完成不了課業的挫折感，更在於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眼前的狀況。

最後，我下定決心，要完成課業。教授們也都能體諒，讓我以口試代替筆試。同學們已經習慣了把課堂抄寫的筆記借給我。

然而，這個蠻橫的怪病，阻擋在我的路途上，有什麼意義嗎？我從未止歇地一直在思索，尋求有所明悟。

讀神學的第二年，我選修了一門課：「痛苦與救贖」。在課堂上，我們討論聖經中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的解釋，「我們為何要受痛苦？」我們陸續地討論：舊約中的——哀歌的《聖詠》、《約伯傳》、《依撒意亞先知書》中有關「受苦的僕人」的章節；以及新約中的摘錄——有關耶穌的受苦、受難、聖保祿書信中關於「十字架」意義的默想。我們也研習聖經中關於痛苦的解釋的歷史沿革：痛苦是對一個人犯罪的懲罰；它是一種淨化的作用；它使我們能參與基督的生命；在一個不完美的塵世中，它是人性上制約的一部分；它讓我們能「填滿」基督苦難未填滿的一個「空白」等等。

這些解釋，雖說有部分能說明我的狀況，但總體上，未能令我心服。

此外，我也閱讀了許多神學家的有關著作。其中，最有幫助的，是桃樂斯·索耶（Dorothee Soelle）。在她所寫的《痛苦》（*Suffering*）一書中，描寫一個基督徒應當如何面對它的三個進程。首先，要接受痛苦這個「事實」。其次，你要「死於自我」——釋放自己想要控制未來，或者想要全盤否認痛苦的那個自己。最後，你會經驗到對天主的一種新的接納，它會取代以前的「自我之愛」。

引用德籍神祕家艾克哈（Meister Eckhart）的內省領悟，索耶提供了一種面對痛苦的心態——更加聚焦於天主的愛，而少些去理會那些折磨，但並非否認痛苦的事實。她的方式，不是斯多噶派的痛苦命定論，或單純地忍受痛苦，而是肯定它，痛苦乃是接

受一個完整人生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痛苦的承認與接受（不是歡迎它，而是接受這個事實的存在），會打開我們的心胸，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經驗天主。

索耶的概念，在知識的層面上，言之成理。然而，實務上，卻幫不上我的忙。我自己眼前的這個痛苦經驗，如何能讓我以一種新的方式與主相遇？我絲毫沒有經歷到那種接納痛苦的感受。一想到雙手上的疼痛，我所感覺到的，只是憤怒。

「我不要這個十字架！」我向神師坦言。他聽完後，只提醒我，如果是我想要的十字架，那它就不是一個十字架了。

我雙手的疼痛未曾消退，只是程度上好多了，我得以完成學業。綜合物理治療、按摩和運動，幫助我能駕馭它，每天可以打字半個小時。繼續深造的渴望，則必須放棄，更遑論聖經學博士的美夢了。縱然內心不服這個事實，我知道，這已經是索耶所謂「死於自我」的一個部分。三年修業期滿，在畢業典禮的慶祝彌撒中，我和大夥共聚一堂時，我仍在思索著，這一連串痛心事件的目的何在。

我的生命中這個部分的意義，以及它是如何適時適所地鑲嵌進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尚須時日才得以揭曉。



晉鐸後，我被派往《美國》雜誌社，擔任助理編輯的職務。在讀神學時開始發生的、極為惱人的雙手的疼痛，依然如影隨形，每幾個月就會嚴重地發作一次，使我整個人陷入萬念俱灰的深淵之中。在一次發作時，情緒顯得特別的低落，我覺得非常不對勁，因此決定找神師諮商一下。傑夫是紐約市下東區主誕天主堂的本

堂神父，那是我多年前當初學生時去實習的那所中學的所在。

到達傑夫的神父宿舍，還沒坐定，我就一古腦地向他傾洩我的苦惱，抱怨手痛這回事，六年來給我造成了多少的不便和憤怒。為了這個疼痛，我必須花不少時間和心思來伺候它——每天做伸張雙手、游泳和其他的運動；在疼痛的精神耗蝕之下，不得不過度地注意自我；不能如意地長時間寫作而產生的挫折感；為什麼別人不會這樣，而偏偏是我，那太不公平了，等等。

獨白式的哀歌，嘮嘮叨叨了好一陣子，非但心頭不覺得輕鬆，反倒是更加地陷入在一陣絕望之中。

傑夫傾聽了我的抱怨後，稍停了一會兒，就問道：「天主有在其中什麼地方嗎？」

「沒有，一點都沒有！」我不假顏色地立即回答。

然後，幾乎是自願自的又繼續說了下去，說的主要是自己的感想。

「我在想，這份疼痛讓我能，因為寫出的東西而感恩。感謝天主的恩寵和賜予的健康——雖是如此的短暫——我才能寫出這些文字來。因為我在寫作的條件上如此地受限，這份疼痛讓我更留意我所要寫的東西。」

傑夫點了點頭。

「也許，我也變得更耐性了。我沒法子一下子就做完一件事，需要分天、分次、一件一件地做完。既然不能事先預定寫作的大計畫，或是到處嚷嚷要寫些什麼大部頭的東西——因為，全看明天的雙手是否仍然聽候使喚——也就省了那些在寫作上令人頭大、不知所措的煩惱。因此，我也可能比從前更留意那些身體有所不便的人——坐著輪椅的、拄著拐杖的、殘疾的人們。」

「還有呢？」傑夫適時地搭腔幫襯。

「我也更加地意識到，要依靠天主。因為，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在想，以後比較不會忘記，凡事要依靠天主。我也在想，這份疼痛使我成為一個更有同情心的人。」

以上全都是真心話，但是，我不相信，居然是出自我的口。

傑夫很狡猾地對我一笑：「天主真的不在其中任何的一個地方？」

我也跟著笑了出來。突然間，豁然開朗，真相大白。在我此番的疼痛之中，天主臨在著。在我自己還沒搞清楚的時候，我可能已經歷了「死於自我」的階段。過去這幾年的經歷，已然引導我產生出一種開放的心態。索耶的內省高見，終於對我有了意義。

傑夫突然問我：「還記得嗎，在你初學結束做大避靜的時候，不是有祈禱，要求能謙遜自持？」

「噢，我當然記得，要求那樣的神恩，是做大避靜的基礎。」

「好啦，現在你的狀況就是一種謙遜，」傑夫又接著闡釋，「謙遜，來自於明知自己無能為力去改變事情，而且發現只能依靠天主。」

我抗議道：「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那種謙遜呀！」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要的那種是，別人見到我的時候會感嘆，『哇塞，這麼謙遜的人啊！這小子真了不起！』」

傑夫笑了。

我也又自嘲了一番：「我要的是，可以拿出來驕傲的那種謙遜。」



傑夫四兩撥千金般的指導，確實令我受益匪淺，幫助我發現天主的臨在，在這小小而漫長的試煉之中。如果不是被迫必須面對這些困難，我不可能以這種方式與主相遇。當諸事順遂之時，人們常會忘記信靠天主的必要性。至少，我本人就是如此。這是「驕傲」的一種微妙的形態——一切事情都能自己來，如此這般的進行，人生美滿——天主於我何益乎？通常，是當我們身處低潮期（事情不如我意），發現自己相當的脆弱之時，才會去依靠天主。在面對生命的難題時，才會記得，原來，人是受外在環境制約的動物。連自己生命能活下來這樣的事，都有賴於天主的仁慈。

這就是為何「謙遜」乃是神修之核心的道理。因為，身處在不得已的地方時，我們常能與主相遇。

大多數人都已習慣凡事靠自己，因而忽略了，最終是要依靠天主的。這是在富裕的社會文化中，一個關鍵性的弱點。在充裕自足的環境狀態下，很難提醒人們要依靠天主，除非在遭受痛苦的時刻，譬如，生病或死亡。德籍神學家若翰·巴蒂斯·梅茨（Johannes Baptist Metz）在一本廣受推崇的小冊子《精神的貧窮》（*Poverty of Spirit*）中論述著：「我們太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遠離真實的自我。我們那可憐的無限感，所產生出深具威脅性的虛無，以及無限的貧乏，驅使我們像無頭的蒼蠅一般，心思全擺在日常生活各項擔憂之中。」不僅是因為財富和衣食無缺的關係，我們無法把心思關注在本性的、精神的貧窮上，更由於，我們故意避而不談。因為，如果承認這個事實，那麼，我們自己所營造的這個世界就要塌掉了，如此一來，迫使我們需要再做一番大幅度

的調整。

因此，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在物質上貧窮的環境狀態中，比較有可能提醒我們，本質上具有的那種依賴天主之情，因為在實際的生活中，有種無力感。若干年前，我曾在肯亞的奈洛比從事耶穌會難民服務。那時，我發現，難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經常提到天主。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他們常說，「感謝天主！」有一位貧窮的婦人，在我們的計畫支持下做點小生意，在談到當天生意上的一些挫折，似乎運氣太差，但她仍口口聲聲說：「天主真好！」

我反問她：「為什麼天主那麼好？」

她微笑著回顧當天發生的一連串的大、小事的細節，細數其中天主的恩典，一直到我點頭為止。許多人就是這樣的，在貧窮的時候，更能欣賞天主的臨在，因為更能體會到，依靠天主的效能。天主是如此地接近窮人，乃是因為窮人先接近了天主。

此外，我也發現到，尤其是在我們急於擺脫的那些狀態中，天主來與我們相遇。在此，我並非指，在我們的人格上導致我們犯罪的那個部分，而是指，讓我受窘困、受挫折、甚至於受羞辱的自身的某一個部分——這個自身的部分，我們多麼希望掩蓋起來不讓外人知曉，也費時費力地設法把它藏起來。然而，也就是在這些我們覺得最脆弱的部分，最能向天主敞開胸懷。舉例來說，我有許多同性戀（男性或女性）的朋友，他們向我坦言，接受天主以他們現在這個狀態愛著他們的這個事實，是他們發現天主的主要途徑之一，正如聖詠作者的吟詠：「因為，我是如此擔驚受怕又是如此美妙地受造的。」先前被人排斥為不可愛的同一所在，成了天主在他們生命中的活躍之處。聖詠一百一十八篇有如是之言：「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倒成了屋角的基石。」



人生的某些重大遭遇上，譬如，生了重病、家庭遭逢不幸、或個人的重大挫折，會讓人不得不承認，要依靠天主。幾年前的感恩節時，我父親被診斷出得了肺癌，醫生估計還有九個月的存活。雖然是生長在天主教的家庭，也在教會的中、小學校受的教育，父親的信仰，並不是很熱心。小的時候，他會開車送我和妹妹去望主日彌撒，他自己則坐在車子裡看報紙，等著接我們回家。「我望過的彌撒已經夠多了，等以後你們年紀夠大時，也可以偷個懶。」幾乎是他的一個老掉牙的笑話。

幾個月之內，他的身體狀況急速地惡化，從化療到放射線治療，從臥床在家到護理之家的安寧照顧，終至過世。在這個過程中，他愈來愈常談到天主——甚至於，和我談天主，這是從小到大未有過的事。我的父親開始找尋那些他覺得在這一一生中得罪過的人，覺得必須要和他們和解；他思索並且談論，哪些人他希望能天堂再度相會；朋友們送的聖像，他開始珍藏起來；臨死之前，他要求做和好聖事，也領受了臨終傅油。

我在波士頓的神學教授珍妮斯修女（Sr. Janice）成了他的好朋友，常打電話向她諮詢。他們兩人，是在我父親生病的四年前，在波士頓我的晉鐸典禮上認識的。她是我的父母親所熟識的第一位修女，非常慷慨而可親。我父親對她的印象特別的好，每次在談話中提到她，都會說，「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偶爾，關於我家庭的事情，我還是先從珍修女的口中得知，而不是從妹妹或外甥那裡先知道。

在父親的病中，珍修女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他。父親臨終的

前一個月，珍修女還遠從波士頓到費城的醫院去看望他，談了一個多小時，在我感謝珍修女時，也跟她提到，我能感覺到，父親的信仰是愈來愈熱心。

「是的，面對死亡能讓人更回到他的本性。」珍修女這樣回答我。

我懂得她的意思。當我同樣的話，跟家裡的一些朋友提到時，很多人只是禮貌地微笑回應我，似乎在說，「噢，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撐罷了！那不過是最後不得已的撒手鐮。」但是，我自己的心裡很明白，父親是愈來愈回到了他的自我，愈來愈注意到，要依靠天主。我願意這樣認為，在臨死之時，他已經完全地成為他自己了，也和天主完全地契合了。

在《精神的貧窮》書中，梅茨是這樣說的：「當戴著的面具掉下來了，人的本性核心就會顯露出來，立刻地，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在本性上，我們是屬神的，而宗教是我們與生俱來、上天的祕密贈禮。」這就是我的父親走在他人人生盡頭時的歷程。如果，我們願意向它敞開胸懷，不也就是我們的生命過程中，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正是伯鐸的有限，導引了他，更加地親近耶穌，當然，他具有許多的天生秉賦，諸如，直爽、可靠、勤勞等，使他能成為一個好門徒，最終，成了耶穌的朋友。

伯鐸絕對不是一個完美的人，若是一個完美的人，他也許根本不願放下他的漁網去跟隨耶穌（嘿，捕魚的事我幹得挺好的，什麼都不缺，幹麼要去跟隨祢？）一個完美的人，可能絕對不會

否認耶穌，從而，就可能絕對不能體會需要寬恕的人性渴望。一個完美的人，可能絕對不會和其他的門徒起衝突，從而，就可能無法體會和解的需要。一個完美的人，可能絕對不會明瞭，他是如何真正地、迫切地需要耶穌，從而，無法體會到這項真理是做一個好門徒的基本條件。

伯鐸和其他的門徒們一樣，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是，以他的謙遜，他承認，絕對要依靠天主。至少對我本人而言，由於這一個理由，他是最人性化的一位聖人，也是最可愛的聖人中的一位。

有時，我自己在思量著，是否不是因為不重視那些不完美之處，而更是因為有了這些不完美，耶穌才選擇了伯鐸。伯鐸明知自己的有限，而導引了他清楚地認識，他必須依靠天主，這也使他發自內心地感激耶穌對他的愛；同時，也明悟這樣的道理：天主能經由任何人而行事作為，不論這個人是多麼的人性化。這樣一個訊息滿好的，可以傳承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我雙手的疼痛，還是沒放過我，每天打字仍然無法超過半個小時。可是，現在有所不同的是，每當疼痛發作時，我就憶及讀神學時的經驗和心得，以及和傑夫諮商時的領悟。同時，也記起伯鐸——他在精神上的貧窮，是如何地能引領他去跟隨基督。對於在人性上的缺失及有限作努力掙扎中的每一個人，伯鐸是一個好榜樣。他在跟隨耶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而耶穌又是多麼地愛他、信任他和包容寬恕他。就連他最嚴重的一些缺失，也能最終被天主拿來做非常妥善的使用。尤其，我是多麼的高興，在我宣發誓願之日，伯鐸的名字被鑲嵌在我的姓名之中。

12

信仰與理智

聖道茂（舊譯多瑪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要在一個清楚定義的範圍之內，去設定我們想要達成的目的，那麼，首先我們就必須查明神聖信理的本質和其領域。

——聖道茂（St. Thomas Aquinas）
《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傳說中，來自義大利阿奎納鎮（Aquino）的道茂弟兄（Friar Tommaso）是一個龐然大漢，道明會修道院內眾弟兄一起用餐的大長桌，要鋸掉一大塊，才能讓道茂弟兄塞坐進去，自行取用食物。有關的各樣記載中，最含蓄的說法是，道茂的體重遠超乎一般的常人。

英籍傳記作者查斯特敦（G. K. Chesterton）在他的《聖道茂傳》（*Saint Thomas Aquinas*）書中，有一則生動活潑的描述。他把道茂拿來和聖方濟，做個對比（譯者註：聖方濟也是義大利人，他在西元 1226 年去世時，道茂才剛誕生）。如果，這兩位托鉢僧人，穿

著各自的修會會服，從我們面前不遠的小山坡走下來，他們外形的對比，將充滿喜劇性的笑果。方濟，「瘦弱而活潑的矮個子；像一條繩子那麼的瘦；精力充沛，有如弓的弦一般，而其行動，則恰似射出去的箭一般的快速。再看看道茂，宛若一條龐然、沉重的大公牛，行動遲緩而安靜；溫文、隨和、不太愛和別人往來；生性害羞，乃至於讓人感覺他不謙遜。」

對於道茂這種卡通漫畫式的描繪，是有許多存疑之處。在我讀神學時，一位教道德神學的教授即曾指出，道茂是一位經常遊走四方的人——縱橫歐洲各地，那不勒斯（Naples）、羅馬、巴黎以及其他的城市，多次來回行走。當年的旅行，都要靠雙腳徒步，而龐然的體重，會是一大難題。尤其，身為道明會士（譯者註：道明會與方濟會，幾乎是同時，但分別創立的，均屬於四方雲遊、托鉢行乞的修會），有刻苦的會規下，徒步旅行乃是不可免的要求。

四方行走、見識日增、神修屢有創見。聖道茂被譽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天主教哲學家 and 神學家。士林派哲學（Scholasticism）和多瑪斯神學（Thomistic theology），企圖經由人類的理智去了解天主的境界，進而得到了一個基礎性的命題見解——「聖寵完美本性」（*grace perfects nature*）。他是士林哲學者中最偉大的一位，而聖道茂的一生，更是活生生地見證了那個命題見解。



依照《巴氏諸聖略傳》（*Butler's Lives of the Saints*）的記載，南義大利阿奎納鎮的伯爵，是有著顯赫的貴族血統。道茂的父親藍多夫（Landulf）是一位騎士，母親狄奧多拉（Theodora）是諾曼

人（Norman）的後裔。

道茂出生的正確日期，未有明確記載，但西元 1225 年出生於阿奎納鎮外的羅卡塞加城堡（Roccasecca）是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他是四兄弟中最年幼的，另外也有幾位姊妹（巴氏在傳記中，明確地指出四位兄弟，但似乎對於姊妹的數目沒有興趣）。年幼時，居住在城堡中同一臥房的一個姊妹，某夜於睡夢中被閃電擊斃。這個陰影在他終生如影隨形，因此每逢暴風雨閃電之時，道茂總是躲進教堂之內（結果，他成了類似狀況威脅下，人們祈求的主保聖人）。

道茂五歲時，父母把他送到著名的加西諾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e Cassino，譯者註：本篤修會、修道院的發祥地，係聖本篤〔480-543 A.D.〕所創辦），希望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時，培育他修道的氣氛，或許有朝一日，能成為這座歷史悠久的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屆時，也可以增添這個家族的光彩和財富。他一直在這所修道院受教育，直到十三歲那年被轉送至那不勒斯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在這所大學的氛圍中，道茂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發生了興趣，並研讀著名的回教學者亞維洛斯（Averroës，譯者註：此學者出身於當時占領西班牙的阿拉伯王國的科多巴城 Córdoba, Spain）關於亞里斯多德的權威論述。此時，他也首度接觸道明會，時常到他們的修道院中去祈禱。

不久之後，道茂就決定加入這個道明會。反倒是修會方面勸他再多等待些時日，直到十九歲那年，他才領受會衣。

消息傳來，在家鄉的父母對此舉大為不滿，他們滿心期待的，是愛子進入加西諾山的本篤修道院。在天主教諸聖的歷史上，類似的父母憤怒的狀況，不勝枚舉。當磊思·公撒格（Aloysius Gon-

zaga) 宣布要加入耶穌會之時，他的父親卡斯提利歐 (Castiglione) 的侯爵，威脅要鞭打他。聖方濟，棄絕祖產的繼承權而決心修道之時，他的父親——當地一位富有的紡織品商人——深覺顏面無光。

因此，道茂的母親來到那不勒斯，要勸說愛子回心轉意。在她抵達之前，修會方面已先遣調道茂到羅馬城的會院。狄奧多拉追蹤而往，道明會的總會長又帶領他等一行人，踏上往義大利北部波隆那 (Bologna) 的路途。

上演的是一幕各顯神通、你來我往的尋人劇。對愛子頑冥不化、一味抗拒的盛怒，加上厭倦了這種長途跋涉式的追蹤，適巧，道茂的幾個哥哥正好在附近的托斯卡尼 (Tuscany) 地方，於皇帝的軍隊中服役，狄奧多拉派人通知道茂的兄長們，務必將他帶回來。

有一天，道茂一行人在錫耶納 (Siena) 附近地方休息的時候，兄長們攔截到他。首先，兄長們要求他脫去道明會衣，未果，即強押他回到家鄉的羅卡塞加城堡，不久後，又送往兩英里外的聖喬凡尼山城堡 (Castle of Monte San Giovanni) 軟禁。唯一能前來探望的，是他的一個妹妹瑪洛達 (Marotta)。家人之所以派她前來，因為瑪洛達是個眷慕世俗的女子，不可能會熱心地和哥哥一起祈禱。道茂終日閱讀聖經，研讀神學家彼得·隆巴 (Peter Lombard) 所編輯的初期教會聖父的文選。

後來，很顯然地，這個家族已經決心放棄期待道茂加入本篤修道院的美景，乾脆也一併阻礙他離家修道的意願。因此，安排了一名美貌的交際花去勾引他。然而，每次當這位美女剛踏進他的房間，他就舉起一個火把來，趕她出去。

西元 1245 年，道茂被軟禁了兩年之後，家族人士按捺不住，

終於投降了，放他走了。道茂立刻返回道明會的修道院，先被派往巴黎學習，一年後轉往科隆（Cologne，現今德國境內）。

在科隆讀書的同窗之中，道茂顯得鶴立雞羣——安靜、謙遜、笨重。在查斯特敦的傳記中形容他，是如此地「呆頭呆腦」，以至於教授們都認為他是一個蠢材。大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被闖掉的西西里啞公牛」。有一天上課時，一位好心的同學自告奮勇代替他解說課業。解釋一段大家都弄不懂的章節時，在同學的驚訝中，道茂既明白又清楚地解釋了它的內容和細節。

時隔不久，有一位同學撿到道茂不慎遺失的一份筆記，送交老師亞爾伯·馬努斯（Albertus Magnus，亦即聖人大雅伯）。第二天，教完課時，這位名重一方的教授當眾宣告：「我們都嘲笑道茂弟兄是一頭啞牛，但是我鄭重地告訴你們，這頭牛的咆哮之聲，將響徹這塊大地，直達地極。」在這段研習期間，西元 1252 年之前的某一時刻，道茂被祝聖為司鐸。

後來，他返回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任教，並出版了首部著作（譯者註：手抄版本。活版印刷術遲至西元 1455 年才發明）——是關於哲學和神學的論述，大多為註解聖經和彼得·隆巴的神學作品。四年後，他獲頒博士學位，開始了名教授的神學和哲學的講授生涯。西元 1259 年至 1268 年期間，他返回義大利，分別在那不勒斯城、歐維托（Orvieto）、維特保（Viterbo）和羅馬等地停留，教授道明會的弟兄們。此時期內，他撰寫了一部《護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為天主教的教義提供學術上的論辯。

值此士林哲學運動（Scholastic movement）萌生、茁壯之際，他的聰明才智被人公認，他的學術造詣和教導，廣受需求。他致

力於擴大自己對現世領域內各家論述的認知，以及對於天主奧祕的探索。道茂的獨到之處，在於對亞里斯多德哲學體系的卓越見解。在此之前，亞氏的哲學是否能使用在基督的神學探討上，教會內的一般人士多持懷疑的態度。因此，目前大家都使用這個誇張的辭句來評論道茂的這項成就——至少，在我研習哲學時的課堂上——道茂「給亞里斯多德付洗了」（baptized Aristotle）。

前些時候，我曾請教紐約福特漢姆大學哲學系主任若瑟·柯特思基神父（Joseph Koterski, SJ），為何聖道茂在哲學史上是如此的重要。畢竟，他的許多神學和哲學的見解，在當時是具有革命性的創舉，卻普遍為學者們所接受，而且流傳後代。

柯特思基神父是這樣解釋的。如同當時其他的士林派哲學家一樣，道茂明白，信仰和理智，不僅是兩條不同的認知途徑，而且，兩者彼此有高度的互補性。有時，藉著提供替代的途徑，以獲得相同的認知，因而兩者彼此有強化的效果；有時，此路不通，而彼路通；兩者之間絕不會產生矛盾之處。而當理智的途徑和信仰的途徑，似乎彼此顯出矛盾之時，士林派的哲學家就會在命題的內容中找尋解決之道，直到他們認為已經找出了妥善的方法讓兩者調和，因而證明了所謂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看起來而已。

依照柯特思基神父的解釋，聖道茂是解決此類難題的主流派中的高手。十三世紀的神學家聖安生（St. Anselm）總結這個中古世紀哲學思想的悠久潮流，凝成一句格言——「信仰尋求被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柯特思基神父接著就做了一個結論：「道茂之所以在同儕的學者羣中顯得特別的卓越，並非在於調和信仰與理智兩者的論證，而是他進行此種論證的獨特方法，以及在此番的努力中，他應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道茂不訴諸權威（當時，大多數的神學家是如此的），而是闡述一種更為嚴謹，幾乎是科學的論證方法，用來探討神學。他用的方法是，提出問題和答案，預先設想反對的意見，仔細地推敲證據，最後，提供一個總結。

我在讀哲學時，極為欣賞聖道茂著作中的這一個層面，迄今猶是。他讓人可以坦率地研討天主的境界，以及思索宗教上的議題。很多關於宗教和神修方面的著作，都使用生澀難懂的語言，而且不明確表態地呈現給讀者，好像它是作者寶貴的珍藏，必須遮遮掩掩地拿出來給人看似的。我自己在閱讀到某些神、哲學的著作時，就有這樣的感覺，似乎作者有所顧忌，唯恐使用更簡單的語言，會讓他書中的概念顯得缺少創意，或不夠明智。

納匝肋的耶穌，可不是這樣的人：祂對門徒們，是有話直說，嘴巴說出的話，就是心裡的意思；聽者若是不明瞭，他就用簡單的寓言或故事，來闡釋天主的國。聖道茂亦然，他摒棄空洞的口號，讓讀者簡明清楚的了解。

西元 1266 年，聖道茂在羅馬開始撰寫他那部傳世的鉅著《神學大全》，其目的在於，廣泛地、系統化地檢驗各項神學上的問題，並分門別類地整理、羅列出來。將難以理解的各項神學議題，以此種方式呈現出來，是一種革命性的創舉。道茂使用簡明的方式：首先，指出一個坦率的問題（譬如，「天主是否存在？」），然後，列出合理的反對意見（譬如，「天主似乎不存在，因為……」），最後，用一目了然的格式回應原始的問題和反對的見解。這個總結的標準格式為：「我回覆」，譬如，我回覆：天主的存在，可以下列的五個方法來證明……

西元 1268 年至 1272 年，他在巴黎大學講授神學，同時，撰

寫聖經的註解，並繼續《神學大全》的寫作。他採行答問式的教學法，只要是在神哲學的領域內，不拘任何問題，而他也花費大量的時間做準備。因此大受學生們的歡迎，他的大講堂經常爆滿。據說，他曾雇用了三位抄寫員，同時賣力地分別記錄他的口述——他在房中踱著方步，一面思考、一面口述，真是一位十三世紀的「多難題同步處理的快槍手」。

這位極為聰明而且能幹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極為熱心、有深度的祈禱者，經常樂享與主契合的神祕經驗。他的謙遜和熱心是人們所樂道的。他的一位朋友評論道：「他那令人稱羨的成就，與其說出自天生的秉賦，倒不如說，是他祈禱的效果。」理查·麥布萊恩在他的《諸聖行傳》書中寫道：「他所從事的教職，和他的使徒工作，只不過是把他靜觀祈禱的心得，貢獻出來給別人罷了。對他來說，在所有出於愛德的行動中，靜觀祈禱是屬於最高的一個層次。」

嚴肅的神哲學論述之餘，在教會傳統中流傳久遠的多首美麗的詩歌，也是出自於他。傳記中作者查斯特敦有一段很感性的描述：「偶爾，他也寫作幾首讚美曲的聖歌，恰似人們工作忙碌後休假的心態一般。」

譬如，他所寫的聖歌〈請眾讚美〉（*Pange lingua*）和〈皇皇聖體〉（*Tantum ergo*），在拉丁文的聖歌集中，是頗為受人歡迎的（譯者註：這兩首聖歌經常在聖體降福時詠唱），這和他給一般人的冷酷、苦修型的學者形象，大有天壤之別。



我在讀哲學的時候，曾閱讀《神學大全》中關於天主存在的

那些論證。當時，我很興奮，總算可以用來「說服」我那些不信基督的朋友們了。雖然，對這些不信者（Atheist 指「不相信有天主」，而 Agnostic 泛指「不可知論者」），這五種論證尚不足以決定性地「證明」天主的存在（可能，只有他們自己遇到的經驗，才辦得到），然而，用來思索天主是如何地存在於一切事物的核心，那絕對綽綽有餘了。其中，我覺得最具有說服力的論證，當屬「從動能上來看」（From motion）這一段章節——它推論，並且追溯到，一定有一個最原始的推動者，讓其他的一切事物動起來。但是最美麗的一段論證，我覺得是「從設計上來看」（From design），茲抄錄如下：

第五個論證，採自宇宙萬物運作。我們觀察萬事萬物，看到那些不具有知識的事物，譬如，自然界的有形物，都各自朝著它的目的而運作著；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其運作總是，或幾乎總是，在相同的一個過程上，以求達到最佳的效果。所以，就是這麼的簡單、明白，它們之所以能達到其目的，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具有內在的設計。現在，無論哪一種不具有知識的事物，它無法往其目的去運作，除非有某一個具有知識和智能的存在，去指示它。舉例來說，箭無法運作到目標靶上，除非有射手指示它。所以，一定有某種具智能的存有者存在著，而藉著祂，所有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被指示著，去達成各自的目的。而這個存有者，就是天主。



對道茂的著作，發出嚴厲批評的聲浪者，也不是沒有。西元 1270 年，巴黎的主教，他也是巴黎大學的總管，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審查關於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各類評論，當然也包括了道茂的著作。該委員會從道茂的著作中，找出一長串應受譴責的錯誤和命題見解，而這份清單，在他死後三年的西元 1277 年，又有所修正和增添。

西元 1272 年，道茂返回義大利，在那不勒斯講授聖經，並繼續撰寫《神學大全》的第三部分。由於體力日衰，全書的最後完稿，是由他的弟子完成的。西元 1274 年，教宗國瑞十世（Pope Gregory X）徵召他出席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Second Council of Lyons，今法國境內）時，他已疾病纏身。

赴里昂的旅途，顯然他是騎著一頭驢子（為苦修型的道明會士而言，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例外，乃因他病體虛弱之故）。在路途中，他的頭不慎撞到從路邊突出的一條樹幹上，先被送往客棧中，經他央求後，才轉送至附近的一座修道院。

在被送往福塞諾瓦的熙篤會隱修院（Cistercian Abbey of Fossanova）的路途上，他的病況一度惡化。隱修院的院長讓出自己的臥室，供他休養，他復原了一陣子。慕名而至的隱修士們，央求道茂給他們授課。他先是婉拒，後來禁不起他們一再的請求，遂給他們講授舊約中的《雅歌》（*Song of Songs*），這是熙篤會草創初期的前輩名人克萊弗的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極其喜愛的。不久，他的病況再度惡化。

在辦完告解聖事，和自修道院院長的手中領受了臨終傅油聖

事之後，道茂去世了，年方五十歲。根據傳說，他的授業恩師兼好友聖人大雅伯，在同一天，曾當眾落淚並訴說，他在祈禱中感覺到，道茂在當天去世了。

羅馬教廷於西元 1323 年，將他正式列品為聖人，並於西元 1567 年公開昭告他為「教會的聖師」（Doctor of the church），這是信仰導師的尊榮。在教會的傳統中，也稱他為「天神聖師」（Angelic Doctor），這是因為他長期地、而且經典式地論述天神乃是純精神的實質。西元 1879 年，教宗在《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通諭中極為推崇聖道茂的神學，並指定為神學院的正統教學，因而預告了道茂式神學的重現光彩。

這位聖人之所以吸引我，不在於他神、哲學的學術成就。更好說，精闢的論證固然不錯，他精采的為人風範，更深得我心。在查斯特敦的《聖道茂傳》中，我發現到他的這番精采風範。名重士林的博學大師，是如此地謙遜。這位終其一生研究天主的人，真的和天主那麼的接近。這位非常忙碌的大學者，會抽出空來，寫一首詩，或一首讚美曲。這位滿身行動的人，他的生命更深耕於祈禱之中。

自從入耶穌會以來，我遇見過許多這樣的人——既執著於學問的本身，又能將善行和愛心融貫於其中。我的老師們，就有許多是這一類的人物。他們不僅在課堂上教授我基督的訊息，更以其自身的生活予以見證。而他們都喜愛這位聖道茂，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樣的風範恩師中，我要特別提到一位女士。如果不是因為她的緣故，我也許無從得知聖道茂這個人、他的《神學大全》、甚至於「哲學」這回事。



初學階段結束後，依照耶穌會的規矩，立即要開始讀哲學。我被指定到芝加哥的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去研習。我的初學班只有兩個人，所以，我非常期待這個能和更多的年輕會士們相遇的機會。何況，我從未去過芝加哥，能有機會在那兒生活一段時間，更令人盼望。

然而，不盼望的卻是研讀哲學這回事。我在大學時主修商業，沒有直接關連的課程，全被排除在外。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內的課程諮詢顧問——照理說，對於知識的天地，應該是位頗有見識的人——給我的建議是，選修任何一門人文方面的課程，對一位主修商業的學生來說，完全是浪費時間，「哪一家公司會在意，你是否修習過藝術史或哲學？」現在再回顧，我還沒遇到過比這更差勁的建議。

在大學時期，我所接受到的所謂的「人文教育」，不過是輕鬆容易地閱讀報紙上的金融版。如今，即將埋首於深奧難懂的哲學書籍，怎能不心生惶恐。

初抵羅耀拉大學遇到的許多年輕會士們，他們也有著相同的惶恐。幸虧，眼見前一期的學長們，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心情才安定不少。學長們似乎都提到，其中有一位教授，上課時的授課技巧非常好，有若當你在哲學的大海洋中航行之時，能給予你妥善地導航，避開阻擋在航路上的礁石和淺灘。如果她開的課你有興趣，儘管選修就對了。

剛到學校的那一週，有一位學長指點得更為簡明和扼要。「在讀哲學的期間，我奉勸你要記住『兩個字』。」說完後還頓了一

下——啊，多麼戲劇化的演說。我心裡在想，大概是指「用功讀書」（Study hard），或者「常祈禱」（Pray always），沒料到，他接著說：「這兩個字就是『弗蘭西修女』（Sister French）。」

路易絲·弗蘭西修女（Sr. Louis French）屬於真福童貞瑪利亞仁愛修女會（Sisters of Char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是羅耀拉大學的資深教授。一屆又一屆的耶穌會士「哲學家」（我們當時是被人這麼稱呼的），在她的課堂上，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她所開的課中，有一門是「古代哲學導讀」（介紹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各家哲學）；另一門是「古典現代哲學」（從笛卡耳 Descartes、伯克萊 Berkeley、休姆 Hume、康德 Kant 以迄現代各大哲學家及思潮）；還有一門就是「聖道茂及其哲學」。

在此之前，我和「修女」這類的女性修道人士，沒有什麼深入的往來過。孩童時期，在本堂的主日學，曾遇見過幾位修女。此外，就是在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和《飛天修女》（*The Flying Nun*）裡面見過。波士頓的初學院期間，也只是偶爾撞見幾位修女，照面打個招呼而已。因此，對於修女，我還是停留在好萊塢電影式的刻板印象，和一般的美國民眾一樣——修女富有同情心，當然不用說啦；可是，有一點點舉止笨拙；教育程度不高；思想有些怪異；外表看起來，傻乎乎的。

自從受業於弗蘭西修女的門下，以上的形容詞，除富有同情心之外，全部改觀。她是聖路易大學的哲學博士。她在羅耀拉的教學生涯，既悠久又為人所稱道。至於教書的年歲有多長久，沒有人知道，不過我們經常拿一句話來開她的玩笑——「弗蘭西修女教亞里斯多德」，那可是一句雙關語。她很聰明，記性又好，能把最拗口、最讓人腦筋打結的哲學論證，清清楚楚地交代給年

輕的學子們，就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她的課程上完了，你也全都明瞭了。這就是前期學長們把她傳誦給我們的原因。

她講授課業的方法，極為類似聖道茂，使用簡明、坦率的辭句，來講解哲學，輔以手邊上日常見到的例子。她某些在教學上的舉例，在學生們的口中，已成了經典的傳說。譬如，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第一因」（first cause）——使宇宙事物運行的最源頭的行動或存在——的概念。為了讓我們在腦海中有個具體的形象去了解這個概念，她教我們用想像力去設想一下——全班的同學站成一個圓圈，「你要等到背後有人拍一下你的肩膀時，你才去拍一下在你前面一位的肩膀。想想看，將會發生怎樣的情況？」於是，大家都安靜下來設想，「我們大家都會等待著，直到有一個人來拍我的肩膀。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人，他拍了別人的肩膀，但是沒有被別人拍肩。」這就是「第一因」，或是「原動者」。

弗蘭西修女本人，更是令我佩服的理由，是她態度溫和、有耐性、會照顧人。在我遇到棘手的哲學概念，搞不清楚且理還亂、既焦急又毫無頭緒之時，她總是一再地重複那句老話，「你已經知道了嘛！」好一副慈祥祖母的口吻，哄人般的鼓勵。在你的眼前，她已經做了一個見證——你可以依靠她。不管在亞里斯多德，或是在柏拉圖，或是康德的世界裡，你是如何的迷了路，你總是可以相信她的話：「一切都將迎刃而解！」兩年的哲學研習結束前，是綜合各門功課的畢業會考。她陪伴緊張兮兮的考生們準備功課，在一旁加油打氣，「你答得很好，明天的考試一定沒有問題！」

綜合性的畢業考試中，有一個階段是口試。有三位主考的教

授，其中一位質問我，請解釋亞里斯多德第一因的概念。我喃喃地說出：「未曾被拍肩的拍肩者」之時，弗蘭西修女這位主考教授立刻說：「答得很好。」在其他兩位教授相視而望的不解之中，已經接著下一個考題了。

沒料想到，在羅耀拉大學的兩年哲學生涯，是我此生最快樂的時光之一。全美各地、年輕新進的耶穌會士齊聚一堂，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更要感謝像弗蘭西修女這樣優秀的教師，如此艱深難懂的學問也能令人全神貫注，終於於登堂入室。從前，我根本不會去想，或是無從想像的問題，逐一的有了答案，似乎讓我感覺心胸和視野開闊了不少。我們能證明天主的存在嗎？一個人要如何合乎倫理規範去生活？我如何知道，什麼是真實的？為何我們有自由意志？如何去「認知」某種事物？我最喜歡的一個有關宇宙論的問題：為什麼有某事物的存在，而非空無一物？那也就是說，那位「未曾被拍肩膀的拍肩者」，來自何方？（試試看，邀請你那些不信神的朋友們，試著回答以上的問題。）

兩年的哲學生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讀書。有時候在感覺上，這兩年的光陰，似乎除了讀書之外，沒幹別的事。閱讀過的一些書籍，我也都喜愛：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聖奧斯定的《懺悔錄》（*Confessions*）、笛卡耳的《沉思錄》（*Meditations*）、康德的《純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尼采（Nietzsche）的《道德的譜系溯源》（*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雖然，沒有康德，我也能活得很好，然而，令我吃驚的是，我居然發現，哲學要比會計或金融學有趣的多了。

讀哲學第一年的時候，我選修了一門「古希臘文」的課。不消多時，我就手握《若望福音》朗誦起來——這可是聖若望手寫的希臘文原版耶！多神奇啊，我可以閱讀希臘文的作品，還能口唸出來——約兩千年前，福音書就是這樣地朗誦的——而且，我懂它的意思！若不是通過了教育的學習，哪會有這樣的滿足感。

除了第一年剛開始時的一些顛簸之外，同班的會士弟兄們也都樂在此種學習之中。在日常的生活上，有時候還把在哲學上的心得拿來彼此開玩笑，「你不要哲學過了頭，否則，像笛卡耳那樣懷疑起你自己的存在，那就麻煩了」。我的朋友大衛，在閱讀《神學大全》上，花了不少工夫，偶爾，他也仿效聖道茂在書中的「註冊商標」，來回答眾人的詢問。

「嘿，大衛啊，今晚的電影是幾點鐘開演？」

「『我回覆』……7：00，9：30 和 10：45。」



讀哲學第一年的暑假，我和其他兩位讀書修士決定先選修一些第二年的課。我們選的是弗蘭西修女的「哲學名著選讀」。我們問弗蘭西修女，應該選哪一位哲學家作為主題，「那還用說，當然是聖道茂囉！」她毫不遲疑地回答。於是，在悶熱的芝加哥夏日裡，彼得（Peter）、羅斯（Ross）和我三個人鎮日埋首於《神學大全》的浩瀚書海中（譯者註：這是大部頭的書。聞道出版社有中文譯本，全書十九冊，內含索引、導讀各一冊），焦點則放在關於天主的篇章。在弗蘭西修女的指導之下，我們摘要記錄相關的章節，一頁又一頁的活頁筆記本，寫得滿滿的；閱讀的重點，放在聖道茂招牌式的提出問題、反對意見以及「我回覆」的篇章上；課堂

上的心得討論；為了多方了解，查斯特敦的《聖道茂傳》是我們的必讀書籍。

某一次，在弗蘭西修女研究室的聚會討論時，我突然心生感慨——這位和氣又善良的修道人，是真正地身體力行了聖安生總結士林哲學的那句名言：「信仰尋求被理解」。天主是如此這般地經由人的理智，而吸引了我們這些人來了解祂的超越性；受高等教育、博學多聞，是可以和愛德及謙遜同時並存的。首次，我能親眼目睹，心智的豐富生命和虔誠的信仰生命，兩者並不悖離。尤其要感謝弗蘭西修女的是，我開始能了解聖道茂在他的鉅著《神學大全》裡的那句話：「只有當我們身處在某種東西之中，並且分享了它的堂奧，我們才能夠為它作見證。」啊！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份禮物。



時至今日的理性時代，道茂更加堪當眾人的榜樣，因為，他用理性的心態來面對那些複雜的神學議題。他認為，神學乃是從天主那兒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是為達成天主所要的目的。既然，理性是天主所給予我們世人的禮物，我們就應當善用它，藉著更美好地去了解祂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來達到為天主服務的目的。

此外，我們的這位理性者，也是一位神祕家。他晚年時，受命在那不勒斯創辦道明會的學術研究中心，同時，也藉此避開當時巴黎學術圈嚴詞批判他的軒然大波。有一次，在聖尼閣瞻禮日（Feast of St. Nicholas）的彌撒祭獻時，他見到一個異象。在此異象中，他畢生的重要神學創作，都透視了出來——包括《神學大全》、邏輯學、演說集、論證、辯論和一些文字。自此以後，他

放下了筆，停止寫作。

「對照於我在異象中所看到的和那些顯示給我的，我這一生中所寫的東西，看起來不過是一把乾草罷了。」他當眾如是地宣稱。

13

為了基督， 我成了別人眼中的瘋子

聖方濟
(Francis of Assisi)

你們去傳福音吧！必要時，才使用言語。

——聖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在芝加哥讀哲學的期間，我還有一段經歷——和街頭上的幫派少年來往。

乍聽之下，似乎有點不搭調，但就陶成一位耶穌會士的培訓計畫而言，卻非屬不尋常的事。我們這些「讀書修士」(scholastics，譯者註：耶穌會慣稱在此階段會內的修生們。請注意，英文名稱若用大寫，其意思則專指「士林派的哲學家」)，在研讀哲學的課餘期間內，必須每週挪出十至十五個小時，從事一項可自行選定的使徒工作。專心研讀哲學，絕對是這個階段的重點，然而，每週的這項使徒工作，卻能提醒我們，所有這些會士培訓的終極目標是：在外界廣大的人羣中，為主服務。套用前任總會長雅魯培神

父的話來說——我們要成為「為他人而活的人」。埋首書堆、浸潤於和康德、海德格等等一大串哲人的交往之中，就顯得遠離了外面的世界。因此，這份使徒工作就會把我們再拉回到這個世界裡來。尤其，對這些被哲學的玄奧搞得頭大心慌的學子們來說，這項校外的實地工作，有助於恢復他們的神志，以顯得正常些。

要在這樣的大城市裡從事一項使徒工作，可挑的選項多多矣。初抵羅耀拉大學的第一個月內，忙著打聽和探詢可能的選項，而前期的學長們更是熱心提供經驗。羅斯修士在第一年從事的，是去某醫院照料嬰兒，而他們的母親，都因嗑藥成癮，被關禁在政府的勒戒所中；第二年，他轉到一個占地數英畝的大型療養中心服務，而該中心專責照顧行動不便的殘障和智障者。另外，有些學長在大學宿舍擔任輔導員，提供大學生各類的諮詢服務、課業輔導和校園牧靈工作。還有些人到遊民之家、就業輔導中心，或是，到供應免費餐食的「湯廚」（譯者註：類於「施粥站」的慈善服務）去幫忙。

我很快就選定了我的使徒工作。毫無疑問，它是一項最有刺激性、最令人好奇，而且，最「酷」的使徒工作。過去的幾年內，也有好幾位讀書修士選擇這項工作——去參與芝加哥半傳奇的一位人物「畢修士」（Brother Bill）的工作。多年來，畢修士一直在芝加哥市區內惡名昭彰的幾個低收入戶住宅社區，從事街頭幫派青少年的牧靈工作。每年有一到兩位讀書修士，去參與他的這項工作。倒不是因為名額的限制，而是少有人願意甘冒工作環境上的重大危險。在讀書修士們的生活圈中，流傳著不少的故事：有親臨芝加哥市內治安和環境均屬最差的低收入戶住宅社區者；也有耳聞目睹敵對幫派之間的火拚、在槍林彈雨中進退失據者；以

及畢修士本人頗具戲劇性的宗教上的「悔改」（Conversion，譯者註：英文的這個字，雖有「皈依」信教的意思，但尤其指，昨非今是地徹悟，因而全心全意地為天主服務的意思），致使他目前在內城區從事這項牧靈與和平的使徒工作的傳奇故事。

流傳的故事當中，有一件頗令人印象深刻。曾有一位讀書修士，差一點點就被流彈射殺——他身穿的那件耶穌會士長袍上，遺留下一個彈孔破洞的痕跡。在芝加哥這些內城住宅社區做訪問工作時，畢修士要求參與他工作的讀書修士，務必穿著黑長袍的傳統會服——這是眾所公認的外在標幟，足以保護修士的人身安全。畢修士本人，則穿著一件「瘋狂改良型式」的方濟修會的傳統式樣的長袍（譯者註：這件長袍是淺藍色的牛仔布料，補釘處處，畢修士並非方濟會士）。在我們住的會院裡，曾有人展示那件有彈孔痕跡的會衣給我看，而且，很驕傲地指著長袖上的破洞。他說，穿這件會衣的讀書修士遇上了幫派的火拚，及時蹲伏在地，而後逃離了現場。

是否真的是彈孔，事實的真相容或有待爭議。曾有位修士聽完這個故事後，笑道：「饒了我吧！或許是香菸頭燒出的破洞耶。」無論如何，這可不是一項傳統形態的使徒工作。

我當然不會希望被流彈波及，但值得更加肯定的，是有機會幫助眾多「在危機中」的年輕人，我很想從事這項工作，在和長上諮商並得到首肯後，我打了一個電話給畢修士。

電話中簡短的探詢之後，畢修士也答應了：「OK啦，把弟！」（Buddy，譯者註：好夥伴的暱稱）。後來我才發現，他對每一個人都稱呼「把弟」。「下禮拜我來接你，記得要穿長袍會衣喇。」

雖然，放下電話後，我未曾到處張揚這樁事，我內心卻是暗

喜——終於找到一個好理由，可以穿著耶穌會傳統的黑色長袍會衣了。即將首度穿著某種制服的新奇感，當然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我個人的喜好。幾乎從聖依納爵創會的年代開始，直到1960年代的某年為止，這個傳統的黑長袍，一直是個獨特的、耶穌會士的外在標幟，它也展現出耶穌會的過去和現在之間明顯可見的連繫。許多教區神父們穿著的黑長袍，是前襟開釦式的，從領口直到下襠有著一長串的釦子。耶穌會士的則是套頭式的寬鬆長袍，再用一條本色的布帶束上腰，因而有了這個綽號：「黑色長線條」（long black line）。

這個耶穌會士的傳統標幟，在當時顯然違反了聖依納爵的心意。因為，在耶穌會的《會憲》裡指明，「沒有獨特的會衣」——在哪裡服務，就和當地的神職人員或修道人士穿著相同的制服。從我入初學開始，就一直納悶著，為何要放棄這項傳統。我認為，首先，就不必每天傷腦筋，該穿什麼衣服，或是還要添購哪些衣服。其次，如同神學家所指出的，這是一個價值觀的「標記」。制式的會衣，是一位修會的修道人的承諾和其使命的外在可見的標幟——如同警察的制服或醫生的白袍一般。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在街頭上、搭地鐵或公車時——這是對周遭世人擺明著：在這個世上，還是有許許多多的男女人士，獻身於貧窮、守貞和服從的宗教生活。

再者，修會的制式會衣，把穿著者（以及，他所遇到的眾人）與其修會的歷史和傳統連繫了起來。我首次踏進一座熙篤修會的隱修院時，看到修道士們穿著黑、白相間的悠久傳統會服，魚貫地進入聖堂時，內心即湧出一股莫名的感動。他們不必向我開口明說：「我們是一羣隱修士，宣發了『恆常』（Stability，譯者註：

即恆常居留在此修道院範圍之內)的聖願，經常在祈禱著。看見這件會衣，你會聯想到你的英雄偶像——多默·牟敦——他也是穿著這同一式樣的會衣。這會衣是我們承諾的記號。」不言而喻，一切都展現在會衣上。

還有一個理由，穿著長袍的會衣，我自己覺得「很酷」。

雖然已經不是規定必穿的制服，在羅耀拉大學的耶穌會本部會院內，在沾滿灰塵的藏衣櫃內，仍然不難找到一件合身的傳統式長袍會衣。

一個微風徐徐、九月天的午後，我要開始上工了。在我平常穿著的馬球短衫和黑長褲外，罩上這件黑長袍，院內一位年長的神父很有耐心地教導我，如何繫上那條本布的腰帶。

站在房間內的鏡子前面，前前後後地調整身上這件尚未熟悉的衣服，此時，我的思緒飄向了前輩的勇士們。聖宜善·饒格(Isaac Jogues)，是一位勇敢的耶穌會士，在北美洲的大湖區殉道的，是我喜愛的聖人之一。十七世紀時，他從法國遠渡重洋，來到現今紐約州與加拿大交界的印第安土著區域傳教，終於於被土著所殺害(《黑袍》*Black Robe* 這部電影，大致上是根據他和夥伴們的事蹟所拍攝的)。在我每天路過的大學內的教堂，其花崗岩的外牆上，一英尺高的大字，鏤刻著這些在北美殉道的耶穌會士的姓名——宜善·饒格、若望·卜瑞伯(Brébeuf)、佳播·拉勒蒙(Lalemant)、諾衛·沙巴尼(Chabanel)、賀內·谷比(Goupi)、若望·拉蘭德(De la Lande)、安道·達尼爾(Daniel)、查理·賈尼葉(Garnier)。在聖堂內祭台的後側方牆面上，是一個巨幅、栩栩如生、彩色的馬賽克壁畫，真人尺寸的八位殉道者，肩並肩地站立在那兒，金色小磁磚圍成的光環，頂在每一

位的頭上。其中，有幾位穿著休倫族（Hurons）印第安人的服裝，大多數的，還是跟我身上一模一樣的黑長袍會衣。

畢修士和他的那部破車，已在會院外等候我多時。見面的招呼，仍是他的招牌用語：「嘿，把弟！」汽車的前座上，還有一位志願者，位在另一會院的讀書修士戴夫（Dave），是美籍黑人。畢修士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不是架在鼻梁上那副超大型的眼鏡，也不是頭上稀疏的灰髮，或是粗壯的身材，而是他那一身獨特的會衣式的制服。只要是從事和這些街頭的幫派青少年有關的工作，他就是這身的打扮——一襲長袍和連身帽，是方濟會士的款式，它的衣料是，水洗能褪色的藍牛仔布，是一塊塊碎布綴縫而成的百衲服。曾有一位讀書修士打趣的形容它：「好像李維牛仔布（Levi's）工廠爆炸後，碎布片全沾到他身上了。」

在首度上工的路途上，畢修士概略地作了自我介紹。從芝加哥郊區一所耶穌會的羅耀拉高中（Loyola Academy）畢業後，他進入聖母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主修英文和哲學，大學畢業後，又在該校念了一個心理諮商的碩士學位。接下來的十五年，他在芝加哥的天主教普愛會（Catholic Charities）服務，任職心理輔導。這些年的生活，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普通一般人的工作生涯——工作是愉快的；常要節省著用錢，不要超過每月的薪資；偶爾，和朋友們喝喝小酒；跟女孩子約會等等。西元 1980 年那一年，他有兩個待遇優渥、新的工作機會——一個是醫院的心理治療師，另一個是航空公司的員工訓練部主任。

在考慮的期間，他開車路過一座教堂，就進去了，心裡想，這真是一個祈禱、求主幫忙做抉擇的好地方。照他的說法，進入聖堂以後，除了裡面的一幅畫中耶穌的面容之外，其他的景象，

都逐漸模糊了。在畢修士所說的「異象」中，耶穌說話了：「愛，除此以外，你不可以做其他的事。」接著，他又聽到了一個聲音說：「我會帶領，你要跟隨。」而且，重複了三次。另外還聽到一個聲音：「絕不要害怕，全心依靠。」他跟我們說，當時，他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害怕的。

幾個月以後，他隨手翻開了一頁聖經，看到這幾個字句：「你在路途上不要攜帶任何的東西。」兩個小時之後，他又隨手翻開了一頁聖經，還是相同的話，但是在另一篇的章節上。第二天，他取出聖經，小心翼翼地翻開聖保祿的書信，他確定這裡面不會有那幾個字眼。結果，卻仍然是相同的字句。他去找一位神父諮商，得到的答覆是：「這個意思就是，你要放棄你所擁有的東西。」

一點都不奇怪，畢爾並不把這回事當真，用他自己的形容詞來說，「全是一派胡言」。當天晚上，他回到他爸媽的家裡，隨手翻開一本藝術畫冊，看見其中有一頁是一本介紹四部福音書的封面畫，那張畫的標題是：「你在路途上不要攜帶任何的東西」。

諸如此類的事件，又發生了好幾次，畢爾開始為此而跪下來禱告，「『七』是一個幸運的數字，所以，如果第七次，你還是這樣的顯示給我，那我就聽你的了，放棄我所擁有的東西。」當他第七次翻開聖經，在和以往都不相同頁碼的章節上，又遇見了相同的字句。很顯然地，這是一個來自天主的邀請，畢爾下定決心，放棄所擁有的東西，搬到一位朋友住家的地下室，席地而睡，僅以舊紙箱為墊。

於是，畢爾又回到了從前天主教普愛會的工作崗位上，而且，每週一整天在聖瑪拉基天主堂（St. Malachy Church）當義工。在該天主堂的轄區內，有兩個芝加哥全市最貧窮、治安最差的低收入

戶住宅社區——霍姆斯（Henry Horner Homes）和洛氏花園（Rockwell Gardens）。幾個月之後，本堂神父詢問畢爾，是否願意擔任堂區的青少年牧靈工作，「在這個地方，意思就是，要和街頭幫派的青少年們打交道」。於是，如此這般地，畢爾開創了他的使徒工作。

西元 1983 年的 6 月 1 日，這位有著超炫行頭的男子，開始行走在霍姆斯社區內兩個敵對幫派——門徒幫（Gangster Disciples）和惡老大派（Vice Lords）——的徒眾之中。第二天，門徒幫召集了它的徒眾開會，商討是否要作掉這個小子。會議的結果，他們公認畢修士是個好人，所以，在這個地盤上可以來去自如、為所欲為，而且，門徒幫還要保護他——誰若傷了他，就是本幫的仇敵。畢修士在領情之餘，也開示他們，所有的眾人皆兄弟也，就算有人加害於他，那人也是他的弟兄，更應該去愛他。

畢修士滿懷熱情地投入他的工作。哪裡發生了槍戰，他即刻趕到現場，空手徒步走進炮火之中，站立在那兒，直到雙方停止射擊，一切都歸於平靜為止（譯者註：多年前，美國《時代雜誌》和《讀者文摘》均曾專文報導此事，其標題即是：He walks into gunfire）。如果槍戰發生時，他身在芝加哥城北方數英里外的伊凡斯敦鎮（Evanston）的住宅，那麼他就會立即穿上那件招牌的百衲袍，開始為這件事禱告，跳上那部破車子，奔赴現場。有時候，火拚中的憤怒小子會向他吼叫：「畢修士，快閃開，不要擋在中間！」受傷的幫派青少年，他會去醫院探望；他的「把弟」的葬禮，已經參加數十次了，還要去安慰家人。他常邀這些混幫派的青少年，坐著他的破車去遊車河；帶領一夥人到聖母大學的校園內，去踢足球、比賽籃球等。通常，他總是花時間和他們在一起。近些年

來，他開始帶領耶穌會的讀書修士，來實習他的這番使徒工作。

當天下午，在去程車上，我問畢修士，該做些什麼事。他只回答了簡短的一句話：「愛他們。」

傍晚，回到會院晚餐時，我和院內眾弟兄分享今天的故事。有一位讀書修士的立即反應，似乎也說中了我內心的疑慮：「聽起來，他像個瘋子一樣嘛！」當天下午打從上了他的車子開始，我心裡就一直嘀咕著：「難道我這一整年的使徒工作，就是要跟這位大蠢蛋一起混嗎？」

晚餐桌上，另一位年長的神父笑著應對這一席話：「要搞清楚啊，你稱呼誰是瘋子？」他提醒我們，畢修士的這段經歷，雖然似乎有點光怪陸離，可是，想想看歷來的聖人們的事蹟，不都有相似之處。在我這學期的「中古哲學」課程上，聖奧斯定的《懺悔錄》是一本指定閱讀的書。像聖奧斯定這般崇尚理性和哲學的大聖人，不也是經常以隨手翻閱聖經的方式，去尋求天主的指引（當時放蕩不羈的青年奧斯定翻閱到的聖經，是聖保祿書信的一段話——似乎就是在對他說話——「你應該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再掛念本性的事，以及滿足私慾」）。

老神父接著又說道，同樣的道理，畢修士擁有基督從一幅圖上說話的經驗，也能類比歷史上先聖們的感人畫面：聖方濟，就曾經在半廢棄的聖達勉天主堂（San Damiano Church）祈禱時，聽到十字苦架上的耶穌對他說話：「修補我的教堂」（譯者註：Church的另一個意思是「教會」）。

老神父做了一個結論：「如果，畢修士是個瘋子，那麼，聖奧斯定和聖方濟也是。或許，他們都是吧！」

我再回想一下畢修士，他那身怪異的行頭、瘋狂的行徑，似

乎是永不妥協地在締造和平；他對於「異象」的說法；他狀似作弄人的「愛他們」的口號；愈想就愈覺得，他真的好好像聖方濟一般。我同意老神父的說法，如果，畢修士的行徑瘋狂，那麼，他就瘋得像聖方濟一般，而這般的瘋狂，正是我所希望與之為伍的。

到目前為止，我對聖方濟的所知有限。只知道，他是義大利亞西城的人；放棄了父親的豐富財產繼承權；創立了方濟修會；喜愛大自然；愛唱歌，還寫過幾首歌；無疑地，他死的時候很快樂。

以我當時對這位全世界最有名的聖人的了解，我想他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好像在今日的美國社會中的某些人——嗑了藥以後，頭腦不清楚了，但言語上頗為友善的嬉皮人士——他會跟鳥說話。然而，就如同傳記作者勞倫斯·肯寧翰在他寫的《亞西西的方濟》（*Francis of Assisi*）書中的澄清，這幅光景，是「後世的人們，因為目睹遍布各地花園中的方濟塑像，常有鳥兒歇息在他的肩膀上，從而穿鑿附會出來的傳說」。是的，如果傳言屬實，那麼，方濟是一位心情開朗而有趣的人物，當然毫無疑問，可是，也就不值得大書特書了。

傳說故事，絕不可扭曲了真實的人生，關於聖方濟的這個傳說，就是現成的一個好例子。為那些誠心探索的人們，在聖方濟的真實生命中，真的會一再地發現令人驚奇的事蹟。不同宗教的人士，或甚至於無宗教信仰者，都希望把方濟這樣的人據為己有，肯寧翰在傳記中強調，方濟可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天主教徒，而且有深度的信仰。正值發動十字軍攻打巴勒斯坦聖地之際，他毫不猶豫地往中東去會見回教的蘇丹王，希望能締造和平。晚年之時，受病痛折磨之苦，包括嚴重的眼疾，而某些他的方濟會子弟們卻背離他，因為，他們認為方濟所倡導而且力行的極端貧窮，難以

實踐在生活上。一反眾所公認的溫順形象，他在盛怒之中，爬上那些弟兄們住房的房頂上，試圖要拆掉這個房子，因為，他認為他們沒有遵行所宣發的貧窮誓願。

綜觀方濟短暫的一生（他四十五歲時去世），他的諸般舉止行動，混淆了支持者以及貶抑者的觀感——見解不同的雙方，時而為之大惑不解、時而為之生氣，甚至於憤怒。他真實的人生事蹟，吾人知之甚詳，是許多歷來穿鑿附會的傳奇故事所無法掩蓋的。



方濟的父親伯鐸（Pietro di Bernardone，譯者註：Bernardone是當時地方人士對「擁有店舖者」的稱呼），是一位富有的布料商人——記住這個背景，對於了解方濟後來的所作所為，是很重要的。方濟出生後受洗時，取名為「喬萬尼」（Giovanni），俟父親從法國辦貨返回後，又給他取名叫「法蘭西斯科」（Francesco），因為伯鐸對法蘭西（亦即今日的法國地方）的東西非常喜好。深為父母所溺愛的年輕人法蘭西斯科，生活放蕩，成天和狐羣狗黨的朋友們廝混。依照傳記作者的說法，他是一位瀟灑而且慷慨的年輕人，受到人們的喜歡，雖然，他喜歡惡作劇以及奢華的生活享受。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在他寫作的方濟傳記中，就是這樣形容他：「由於這種深具魅力的瀟灑性格，這批年輕人，唯法蘭西斯科的馬首是瞻，其他的都是小事，不必計較了。」

二十歲那一年，方濟參加了亞西西城和附近的一個貝魯士城（Perugia）的戰爭，因而被俘入獄。身陷獄中，他仍然樂天知命，一派言笑自若，但是，因生病，身體衰弱不少。一年後，被釋放返家，此後，方濟決心要成為一位騎士。在嚮往新生活而且預備

要出征之際，他購置了一副昂貴的行頭——全套的盔甲，外帶一個炫耀的披風，披風上還繡有金線的花紋。這些花費，當然還是如同以往一樣，都是由父親支付的。據說，第二天，他遇見了一位落難的貴族。於是，毫不猶豫地把全套的新行頭，全部轉送給那個人。這樁行為在第十三世紀的當時，可是一件極為高貴的善行義舉，因為，它不僅是濟貧，而且也解除了這位落難貴族的羞辱。

遠征的一行人，從亞西西城出發，兩天後來到思伯雷特（Spolito）地方。在夜間睡覺時，方濟做了一個夢，有來自天上的聲音敦促他，「要為主人，而非一般人服務」，並且，要他返回亞西西城。方濟聽從且照做了。自此以後，舊日的亞西西的飲宴作樂生活，方濟日覺無趣。漸漸地他開始過著一個簡樸的生活，祈禱日多，也給貧困者行哀矜（alms，譯者註：意即施捨錢或物）。

有一天，方濟在城外的近郊騎馬時，遇見了一個癩病人（譯者註：如聖經所載，癩病人隔離在城外居住。此種病人，在當時並不罕見）。自幼時開始，方濟每次遇見癩病人，就會感到害怕。但是，這次遇見這個癩病人的景況，似乎全然地改變了他；而先前在思伯雷特的夢境，也導引他相信了，他的生命已然在改變之中。於是，他下了馬，給了這個癩病人一個銅錢，並且，親吻了癩病人的手，然後騎上馬，繼續旅程。



《聖方濟花絮集》（*The Little Flower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收集彙編了許多有關聖方濟的小故事，既可愛又有趣。其中，有些故事很顯然地，是穿鑿附會的傳說。然而卻都能鮮明地呈現出他許多重要的人格特質——溫和的精神、喜愛大自然、渴望和平。

有一則故事，是方濟向一羣飛燕傳道，因為牠們吱吱的叫聲打擾了彌撒的進行。另一則，是關於古比歐之狼（The wolf of Gubbio），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隻兇猛的狼嚇壞了城內的人們，大家都因此不敢走出到城門外去。善心大發的方濟，決定去和他的「狼弟兄」談一談，希望能締造和平。《聖方濟花絮集》上是這樣說的：

聽完了聖方濟的這番話，狼擺動了身子和尾巴，眨了一下眼睛，又點了個頭，表示接受了他的說法，而且會遵守它。於是，聖方濟又開口跟牠說：「狼弟兄啊！既然你答應了要締造這個和平，而且會遵守諾言，我就向你保證，只要你還活著，我就會讓城裡的人定時的餵養你，以免你餓著了。因為，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以前所做的那些壞事，全都是出於飢餓的緣故。但是，看在我求你幫忙的情分上，我要你答應，從今起，絕不再傷害任何人或任何動物。你願意保證嗎？」狼點了一下頭，表示了牠的保證……然後，聖方濟伸手向前要接受牠的效忠（譯者註：在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臣屬對領主要表示效忠），狼也舉起牠的右前爪，以友誼的信任心態，放進聖方濟的手中，完成了一個效忠的印記。然後，聖方濟說：「狼弟兄啊！我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命令你現在跟我來，在彼此的信賴中，讓我們一起去，以天主之名，和大家締造這個和平。」狼跟著聖方濟走了，像一隻溫順的綿羊般，眾市民見到了，都非常驚喜。

狼果真是一直遵守牠的諾言。古比歐的居民，都歡迎狼的來訪，「好像熟悉的鄰居們串門子一般」，也

「周到地餵養牠」。狼弟兄死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哀悼，因為牠讓市民們憶起「聖方濟的德行和聖潔」。



《救贖》（*Salvation*）一書的作者法拉麗·馬丁（Velerie Martin），以感性動人的筆調、倒敘時光的手法，來描述聖方濟的事蹟——以他的死亡做為開場白，一直回溯到他在馬背上和癩病人在城外相遇的奇緣。尤其，這段結尾，是他的生命轉折的起點——這位年輕人，從此永不回頭地捨棄了財富的人生，悔改而一心向主——是作者史詩般追溯往事的高峰，值得長篇地援引她的一段原文，來與讀者分享：

法蘭西斯科緩緩地掏出一個銀幣，慎重其事地放在那張開的手掌之中，那枚仍然微溫錢幣的銀白，閃耀著。他試圖擠出一段應付的辭句，也許是一句打趣的話語，這樣，他就能回到他所熟悉的世界。但是，就算他再掙扎，他的腦筋已然明白，此刻，那個世界已經離他遠去了，他再也不能回頭了。之前瀰漫的煙霧，籠罩著他的視線，忐忑著他的思緒，現在，他走出了煙幕，發現了源頭，站在熊熊烈火的前面。小心翼翼地，他握住那隻癩病人的手，輕輕地舉向他的嘴唇，轉瞬間，洶湧滿嘴的甘甜，此味不似人間，只應天上有，滾燙的甘甜，灌入了喉嚨，奪眶而出的熱淚，潤濕了嘴邊上那隻面目全非的手。風聲呼嘯而過，冷風冽冽地吹凍了臉頰。這陣吹自未來的強風，席捲了他的一切以及在此之

前所有的東西。這是他渴望期盼的，但又擔心害怕，眼前的路好走嗎？

從此刻以後，方濟開始走訪病患，把更多的金錢施捨給窮人，甚至於剝下身上的衣服。有一天下午，仍然徘徊在何去何從的人生路途上的方濟，行走在亞西西的城外，途經一座年久失修、半倒塌的聖達勉教堂。

在教堂內，注目著巨大的十字架，他開始默想耶穌的苦難與死亡，痛哭自己的滿身過犯。突然間，他聽到從十字架上傳來耶穌的聲音：「法蘭西斯科，快去修補我的房子！難道你沒有看見，它在倒塌嗎？」這個聲音，又重複了兩次。

就像多少個世紀以後，在芝加哥某教堂內的畢修士一樣，方濟目瞪口呆。然而，待回神之後，方濟理所當然的直覺是，眼前的聖達勉教堂，的確是該修補了。方濟從父親的貨倉內，偷出了一疋鮮紅色的衣料用布，運到外地去出售了，將所得的款項，交給了達勉堂的司鐸，而且，要求神父讓他住下來，協助修補的工作。

事後軍師的我們，當然現在都已經知曉了，天主要方濟修補的，不單只是一座教堂的建築，而是整個的教會。

方濟的穿著和行徑，嚇壞了亞西西的民眾。僅著一件粗糙而且滿綴補丁的苦行者罩袍，四處行走乞食果腹，更讓家人引以為羞，盛怒的父親，把方濟抓回家中，上了腳鐐，監禁在房內。後來，還是母親偷偷地放他回去，他仍回到達勉教堂。父親一怒之下，告上法庭（譯者註：依照中世紀時的法律規定，具有「補贖者」身分的方濟，乃隸屬天主教教會法庭的管轄，因而不受一般市民法庭的審判）。

西元 1206 年 4 月 10 日，亞西西城內的一個大廣場上，方濟站在圍觀羣眾和主教的面前。面對方濟的父親的指控，主持法庭審理的亞西西城主教告訴方濟，現在，要歸還身上所有的錢給他父親，未來，則要全心依靠天主。方濟，以他慣常的、遵照話語字面上的意思而行事的風格，不僅允諾、照做了，而且又另添加上，「我穿的這身衣服，也是屬於他的，也會歸還給他」。

說完這話，方濟剝光了身上穿的衣服，放到父親的腳前，赤裸裸地站立在廣場上。

這個畫面，直到今日，仍然令人震驚不已。大受感動的主教，將方濟擁抱在懷，用他的外氈將方濟裹住。這個場景，具有完整的象徵意義：方濟脫去了對俗世上父親的忠誠，從此被裹在教會的保護中。他將自己完全交託在天主的手中，割捨了年輕人的驕傲，擁抱極端的貧窮，像基督一般。「貧窮姊妹」將是他的「世界上最美麗、最高貴的新娘，肖似基督」。他此後的所作所為，以當時的術語來形容，是一個公開的補贖者。

此舉更深層的意義，依照傳記作者朱利安·格林的說法：「當眾否認這個舉動的本身，以中世紀的習俗和心態而言，是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表示。從此，在方濟的名下，一無所有，和家庭劃清了界線，沒有繼承權。」



畢修士的使徒工作，也是獻身於相同的人羣——社會的邊緣人。那天的下午，就在他的車內，畢爾如數家珍式地跟我們介紹，門徒幫和惡老大派的徒眾如何如何，哪些人有了什麼樣的麻煩——某人關進了監獄，某人和朋友有了麻煩，誰在吸毒、嗑藥，

誰昨晚挨了子彈。

在老舊的大別克（Buick）車的後座上，左手邊是一望無際的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往右看則是襯托在芝加哥市摩天大樓羣中的天際線，眼前正奔馳在湖濱大道（Lake shore drive）上，我聽著、聽著，不由得開始煩惱了，這可不是一樁等閒的小事。忽又自我激勵一番，我這一身的穿著——耶穌會士的黑長袍會衣——不就是為了要去從事與幫派小子來往的使徒工作嗎？還沒聽完任務的簡報，你就嚇壞了？

幾分鐘之後，車子就轉出快速道，進了市區街路，不久後，車子停在滿地垃圾的停車場，鄰近的就是惡名昭彰的霍姆斯低收入住宅社區。我們人還沒出到車外，就被盯上了。其中的一個年輕人吼叫著：「喂，畢修士，來幹啥啊？」

畢爾跟他們回話：「嘿，這兩位是我的朋友，吉姆和戴夫。」圍攏過來的這一堆年輕人，看起來都不是好惹的，分別和他們握了一下手，就站在一旁，聽他們和畢爾說話。他們交談的內容，大致上可歸類為幾種形態：友誼型的（詢問彼此的家庭近況），禮貌型的（問候、詢問新來的這兩個傢伙），開心型的（取笑畢修士和我倆的會衣長袍），嚴肅型的（最近誰中彈了，誰受傷進醫院，誰的媽媽病了，誰失業了，誰還在找工作）。

一會兒的功夫，聊完了，這夥人就散了。我們三人走進社區內的大樓，到一名幫派青年的家裡去。雖然，我也曾經歷過不少類似的窮人家的居住環境，但是眼前這座公寓大樓的條件，依然讓我震驚。硬地板的電梯內，尿騷味十足；煤渣地磚的長廊上，污穢不堪；靠天井的一邊是透空的（有鐵絲網擋著）；刺耳的噪音，在圍牆內回響不斷；高分貝的電視機、音響；叫囂和爭吵的

人聲；丟擲鐵罐的乒乓聲；嬰兒的哭叫聲。在這種環境裡，居家過生活，有多難啊，遑論養兒育女了。

進到這個年輕人的公寓內（嚴格地說，是他媽媽的公寓），坐在尚稱乾淨的褪了色的沙發上，人手一杯咖啡，我們靜聽這個年輕人的麻煩事。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迄今仍找不到工作。媽媽和姊姊都在工作，而媽媽還多打一份工，才能維持生計。父親不知去向。類似的故事，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一聽、再聽，一再地重複著。幾乎所有這些故事的收尾，都是畢修士答應，一定會設法幫忙。

事實上，畢爾也幫不上什麼大忙，多半只是陪伴著他們，就如同他的口頭禪「愛他們」一般——以各式各樣的不同形態。有好幾次，在芝加哥冷冽的冬日裡，我們開畢爾的大別克，載著幾個幫派小子去兜風——這是一項大受歡迎的娛樂節目。十二月的某一個陽光普照的好日子，我們搭載了幾個年輕人，穿過市區，來到密西根湖邊，突然間，其中一個小子開口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湖！」這個小子，生於斯，長於斯耶。

這些幫派小子們逐漸習慣了戴夫和我的出現。他們通常稱呼我們兩個人「黑袍子」。歷史的轉折，也真是有趣——十七世紀時，北美洲的印第安土著，就是使用相同的這個名詞，來稱呼直善·饒格和他的夥伴們。他們會詢問我們的生活狀況，從美國的哪裡來的，學校裡的生活如何等。經常，還會冒出這樣一個測試性的問題：「到這兒來，你害不害怕？」

第一個學期末的時候，我安排了一個小型的接待會——邀請三位年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到我的會院裡晚餐。我們開車去接他們，經由湖濱大道快速路，來到羅耀拉大學校園內的耶穌會院。

他們好奇地詢問，我們的生活狀況；進到小教堂內，也知道要靜默；看到我們餐桌上預備的食物，他們開懷地大笑了。雖然，我跟他們說，這裡住了三十個人，他們仍然詫異這麼大量的食物。會院內的弟兄們，當然個個都對他們三個人彬彬有禮，盡量讓他們感到自在。可是，這幾個年輕人還是放不開，只好我們六個人另闢一桌吃飯。

當晚，會院裡有一位來自非洲烏干達的訪客，是盧岡加兄弟會（**Brothers of Charles Lwanga**，以十九世紀烏干達的一位殉道聖人而命名的）的修士。遇到了一位來自非洲的客人，令這三位芝加哥佬開了眼界。聽到訪客用濃厚東非口音的英語問候時，他們更禁不住地笑了出來。結果，居然還是由我來居間作翻譯。

「噢，那你住在茅草屋頂的泥土屋內囉？去獵過獅子？」

烏干達的修士微笑著回答他們：「我住在首都坎帕拉（**Kampala**），那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離獅子出沒的地方很遠。」

這三個年輕人都笑了，可是，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

戴夫和我，每週上工兩次，都是畢爾開車來接我們。大會院內，大老遠就能聽見他那輛大別克老舊車，停在街邊上、引擎仍然空轉的隆隆聲響。逐漸地，戴夫和我都習慣了這份工作，和畢爾之間的互動良好，與幫派小子們相處時，也能談笑自如。遇到下雨或下雪的日子，他們很少在社區外面閒逛，我們三個人就坐在畢爾的大別克裡等候，畢爾也會聊些最近幾天發生的狀況。我喜歡聽他述說親身經歷的那些故事，而他也很樂意有人跟他作伴一起工作。會院的長上說：「你們適時地給他一些建議，不也是使徒工作的一部分。」

突發性的狀況是常有的事。十一月裡，一個豔陽天的午後，

我們正在霍姆斯社區和一個傢伙聊天，畢爾匆忙過來，催我們要立刻上路了，因為有人通知他，附近的一個地方剛爆發了一個幫派的拚鬥。跳上他的大別克，火速出發，幾分鐘後，畢爾慢了下來，頻頻地探頭出去，似乎是在偵察那個麻煩地點。到了某一個街角，畢爾下了車，他似乎本能地知道往哪裡走。他迅速地走向集結在一個公車站牌附近的一小撮人。靠近時，我才看清楚，有些人手上拿著鐵鏈或木棍。畢爾快言快語地跟他們說話，告訴他們說，我們三個人會站在他們兩派敵對人馬的中間。就在那個剎那，我才發現，對街的街角上有另一夥人——亞裔的美籍年輕人，同樣地拿著鐵鏈和棍木棒。是否有槍呢？我不知道。

我的心裡開始發毛了——噢，兄弟啊，我們在這裡幹麼啊？

我們現在的行徑，不就是相當於當年十字軍東征，巴勒斯坦的戰火正熾熱之時，聖方濟隻身往訪蘇丹國王，或者，如同桃樂斯·戴挺身而出，在街頭上抗議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殺戮。還可以比擬的，是耶穌被置放在行淫時被捉到的娼婦以及等著看熱鬧的羣眾之間。也就是說，用我們的血肉之軀，作為一個和平的標記——我們試圖要把基督所倡導的和解與互諒的訊息，具體地化為一個行動。

我當然害怕。一個身穿牛仔百衲長袍的大塊頭，和另一個身著老舊黑長袍會衣的瘦小子，站在芝加哥市內一條街道的中央，他們是不是發瘋了？然而，我也知道，這是一件對的事情。畢爾說：「現在，我們一起來禱告。」

佇立街心忐忑不安地呆站了不到幾分鐘，遠方的兩派人馬，愈走愈接近，開始互用髒話叫陣、咆哮數落。不經意地，一個空的汽水罐飛過了我們的頭頂，在街邊落下。另一邊回敬的空玻璃

瓶，呼嘯而過摔碎了。兩邊的叫囂聲，愈來愈大。

漸漸地，喊叫聲七零八落，終歸於平靜，似乎，兩派人馬各自離去了。畢爾和我，站在馬路的中央，四周出奇的平靜，大白天裡，居然沒有車子經過。畢修士這時候給了我一個微笑：「我們給了他們，不開戰的一個藉口。有我在這兒站著，離開戰場，雙方都不會丟臉。」

會院的晚餐桌上，我報告了下午的這個驚魂的歷險記。有一位讀書修士評論道：「他腦筋有問題。」

也許是吧！可是，畢爾很清楚的知道，他在幹什麼。無論如何，他走進這樣的戰火之中，已經有幾十次了。就如同他一再的闡釋，他這種非暴力式的臨在現場，提供了敵對的雙方都迫切需要的一個下台階，因而避免了一場流血的衝突。對於這些城市內社會邊緣人物的困境求生，一般的美國人，或是指責，或是漠不關心。對照之下，畢爾的瘋狂行徑，似乎更有積極的意義。何況，這個瘋子的作為，可能已拯救了許多的人命——他那些「把弟」的性命。



如同聖保祿所說的，「為了基督的緣故，我成了別人眼中的瘋子」這類的人物，我倒是還遇見過幾位。這些人的風格，就像聖方濟一樣，具有一種魅力和一股傻勁。離開芝加哥的幾年後，我在肯亞的工作期間曾密切合作的德籍道明會修女路易絲（Sr. Luise），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肯亞奈洛比城內的 JRS（耶穌會難民服務）辦公室，路易絲修女負責獎學金的項目。這只是她有頭銜的一個職務而已。她

了不起的地方是，為流亡到肯亞的蘇丹難民，創辦了一個「中途之家」。至於資金的來源？她有一個私人的募款聯絡網，非常瑣碎而龐大，還有來自國際機構的支持。當時，蘇丹的內戰激烈，南部的難民蜂擁至肯亞境內的難民營，其中也有許多人繼續前來奈洛比討生活。路易絲修女就為這些人找住宿的地方、找工作、找食物。曾有一羣難民跟我說，在他們逃離蘇丹鄉下的家園時，就有人跟他們說，去找「路易絲修女」就對了。

路易絲修女住在奈洛比城的北方幾公里外的一個小鎮猶加（Juja），曾邀我往訪。那是猶加鎮中心的一幢公寓，擠滿了蘇丹難民。她載著我的小汽車一停下來，就有幾十個小朋友衝出來迎接她。就如同畢修士的大別克破車和身上獨特的衣服，在芝加哥的低收入戶社區是個明顯可認的特殊標記一樣，路易絲修女小巧的汽車和她樸素的道明會會衣（藍色的頭巾和藍色的裙子），在這裡也是一個明顯的標記。孩子們熱情地拉著她的手，走進屋內。露天的院子裡，媽媽們正在洗衣服，或烹煮食物、照顧嬰孩。我們進來的時候，大家都起身，跟路易絲修女揮手致意。

要擔負起照顧這麼多難民的責任，人家都說，路易絲修女發瘋了。這裡，簡直就是一個小型的蘇丹人社區嘛。我離開奈洛比的幾年後，聽說有土匪闖進來，打傷了她，她的一隻手臂折斷了，這可是快八十歲的老太太耶，她還是繼續留下來。她用她瘋狂傻勁拯救難民的性命，就像畢修士一樣，就像聖方濟一樣，而那股傻勁直接出自於福音的訓誨。



悔改後的方濟，仿倣耶穌的榜樣過生活，依照傳記作者勞倫

斯·肯寧翰的說法，把自己的生命「當作一份禮物奉獻給別人」。

西元 1208 年的春天，在一次的彌撒中，方濟聽到在福音中，耶穌要祂的門徒們，「在路途上，你不要攜帶任何的東西」。他認為，這是一個針對他個人召叫的吩咐，因而，從此不再穿鞋子或是持木杖，僅只穿著有連身帽的粗布長衣，用一根繩子束上腰——這就是現今大家所熟悉的方濟修會的會服。這位志願的貧窮者，他的證道，強而有力。一年之內，陸續地共有十二個人過來跟隨他，一起過這樣的生活，彼此互稱為「小兄弟」（Fratres Minores，註：拉丁文），這是方濟會士（Franciscans）的起源。

西元 1210 年，方濟赴羅馬城，向教宗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申請成立一個新的修會。教宗的一些顧問們斥責他，說他的修會章程過於簡單，而所強調的極端貧窮，太過於理想化，幾乎是無法具體地實踐。然而，教宗本人對站在他面前的方濟印象深刻，當面就批准了。

回到亞西西城，方濟和眾小兄弟們居住在城外的一座小教堂。以此為根據地，他們結伴外出，宣道勸人悔改，行乞求哀矜以濟貧，從事體力勞動以謀生。西元 1212 年，遵奉方濟的宗旨和指導的佳蘭女修會（Poor Ladies of San Damiano，今日簡稱為 Poor Clares）成立了。當時佳蘭（Clare）是亞西西城的一位年輕女子，與方濟熟識，仰慕並願意效法方濟，而方濟的親自為她削髮，也表示接受她，成為一名「貧窮女士」。

西元 1219 年，正值十字軍東征巴勒斯坦，方濟來到中東，求見蘇丹王馬力克·阿爾·卡米爾（Malik al-Kamil）。在「聖戰」（sacred violence，譯者註：強迫性的「皈依」行動）的概念流行的年代裡（甚至於教會的領導們也接受它），這是方濟表達他的非暴

力、締造和平與和解的理念的一個具體行動。如同畢修士在芝加哥的幫派槍戰中，以自己的肉身企圖消弭暴力的精神，方濟置身於這般的險境，試圖以己身為謀求和平的工具。他希望能感化蘇丹，可能不切實際，然而，蘇丹王確曾出諸善意地傾聽了他的一席話。據說，蘇丹王還曾向他坦言：「你所傳的宗教確實很美，我也想皈依。但是，我不能這麼做，否則，我們兩個人都會沒命的。」

方濟返回義大利後，眼見修會人數日增，覺得自己不適合領導這樣一個龐大的團體，因而，請另一位弟兄接任。

晚年時，方濟的健康日益惡化（有嚴重的眼疾和肺病），多半的時間是在祈禱中度過的。在拉維納山（Mount La Verna）的一次避靜中，方濟有了一個神祕的經驗。在熱切默想苦難時，方濟領受到五傷的印記，亦即如同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的傷口之處——雙手、雙腳和肋旁。這是教會歷史上，有記錄的第一次發生。可能怕太過分招搖，他經常以會衣和鞋、襪來遮掩住五傷。

雖然，疾病和痛楚纏身，眼疾和五傷的傷口尤烈，但是，他仍能興致盎然地寫作了一長篇的〈太陽弟兄的禮讚〉（*Canticle of Brother Sun*，或譯〈太陽歌〉），表達他畢生對於天主創造的宇宙萬事萬物的熱愛。

臨終時，他要求把自己放在一塊光禿禿的泥土地上，並穿上老舊的會衣。西元1226年10月3日，迎接到了他的「死亡弟兄」。翌日，不顧他與罪犯同葬的要求，弟兄們莊嚴地抬著他的遺體，遊行回到亞西西城內的教堂，並在教堂內安葬。西元1230年，在他被羅馬教廷正式列品聖人的兩年之後，一座新的聖方濟大教堂落成了，遺體遷葬該堂內，以迄於今。



我在芝加哥參與畢修士的使徒工作時，對於聖方濟的事蹟，所知甚少。結束了兩年在肯亞的難民服務工作，返回美國的途中，在羅馬停留了一下，該地會院的弟兄敦促我，務必把握這個機會去一趟亞西西城。

從羅馬搭乘巴士就可以到達亞西西，路程不算遠。在這個小小的山城裡，處處可見到各地來的朝聖者，腳踏狹窄的石板路上，立足方濟曾同樣站立過的地方，內心激盪著與有榮焉的聖潔感。整個的亞西西城，感覺就像是一個大教堂，就連腳上踩的石板塊狹路，似乎都很聖潔。在幾個小時的短暫停留中，我在聖方濟大教堂花的時間最多。在教堂內，細細地巡禮那環繞牆上的巨幅壁畫，是名畫家喬托（Giotto）所繪，方濟一生中的各個重要歷程，盡在其中。另外，還有一幅方濟的全身畫，真人的尺寸大小，他的腳幾乎是踩在地板上，是希瑪布（Cimabue）所繪。一邊品味著壁畫，一邊想像著若與聖方濟四目相對，當會如何。

在方濟墓地旁禱告，是我更重要的一件事。它在更下一層樓的一個小教堂內，四周環繞著木製的跪凳，供朝聖者祈禱和瞻仰，還可以前去觸摸石棺的邊緣。

一回到羅馬，我就開始尋覓他的各式傳記來閱讀。不同的作者，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和描述他：雅利安·豪思（Adrian House）專重在事實的說明；尼可斯·卡贊沙吉斯（Nikos Kazantzakis），以活潑的筆調，述說這位活力十足的人；查斯特敦，描繪他可親可愛的一面；法拉麗·馬丁，則是如同史詩般的獨白和吟誦；勞倫斯·肯寧翰，對這位眾所皆知的大聖人，多著墨在

神學的意義上。前面曾提過的《聖方濟花絮集》，收集了許多小故事，而其中可能有些是誇大其實的傳說。朱利安·格林的傳記內，有真實事蹟的記錄，也有傳說故事，也有神學意義的解說，還有方濟個人的經驗，英文版是法文，書名為 *Frère François*，英文譯本使用 *God's Fool*（《天主的傻子》），我喜歡這本書，我更喜歡它的英文版書名。



離開芝加哥後，我就再沒機會見到畢修士。路易絲修女前些時到美國來，在紐約停留期間，我曾去拜訪她。一別十年，她也老多了（快八十歲），胖了一點，腳步遲緩了（膝蓋有毛病），依然活力十足。

她帶領一羣即將安頓在美國的蘇丹難民。她的說法是，「他們不會使用飛機上的廁所，所以，我就跟著來了。」她的機票和旅費，是業已安頓在美國多年的前蘇丹難民集資支付的。這些人，多是她從前幫助來美國讀書，畢業後留在美國就業的。走訪幾個大城後，她回到紐約，住宿在一座道明會的修道院中。我去拜訪她，聊了一些旅途上的趣事。閒談中，我提到一個當年在奈洛比時就想提的問題：「妳如何有這般的精力，做那麼多的事？」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噢，都是大家祈禱的功勞。」

臨別時，在擁抱道別後，她突然問我：「我們以後還會見面嗎？」

我懂她的意思，但不知所措。她年歲已高，還能再來美國嗎？而我呢，還有機會再去肯亞一趟嗎？只好禮貌性的簡答：「當然囉。」

她笑了，再擁抱一次道別，她轉頭進門去了，修道院的大門闔上了。不知如何地又憶及那端美麗的禱辭——天主，在每一個世代，祢都興起了能為祢服務的聖人、聖女們。

何其有幸，我就親身遇上了其中的幾位。

14

平凡的生活

大聖若瑟
(Joseph)

這個人不是木匠的兒子嗎？

《瑪竇福音》十三 55

讀完哲學之後，耶穌會的讀書修士要去從事兩到三年的全職使徒工作。在等待和長上一起「分辨」我該何去何從之時，我的心目中已經有了兩個選項。第一個選項，是我在初學階段曾去實習過的紐約市「主誕使徒中心」（Nativity Mission Center），就是那所為低收入家庭的男子中學的所在地。另一個選項則冠冕堂皇多了——國外戰亂地區的「耶穌會難民服務處」。

關於 JRS，我曾閱讀過很多的相關資料，那是耶穌會的前任總會長伯鐸·雅魯培神父，於西元 1908 年創辦的一個國際性機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組織：在極端絕望的環境狀況中，為流離失所的難民們服務；立下了一個耶穌會士在生活上與工作上的範例——與所在教區內神父們的、跨修會間的以及與一般教友的合作，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去實踐度簡樸生活的承諾；保持

工作的機動性——難民的需要到哪裡，我們的服務就到哪裡。這正是符合一位耶穌會士的本分。

幾週的為此禱告和省思之後，我仍然猶豫未決。對於這兩個選項的工作，我都很自在也沒有偏好——用耶穌會的術語來說，我秉持著「平心」的心態。英文的「indifference」（平心），在一般人的用法上，語帶負面的口氣，可是在聖依納爵的《神操》中，卻是一個極其珍貴的概念。保持不偏不倚的平心，是讓一個人有一種自由的心態，走向最被需要的地方，去從事最佳的工作——亦即開放自己的心，去尋求天主的旨意，順從地到祂所引領的地方去。持平心，就如同隨時準備好了一樣，是耶穌會士生活的一個目標。儘管，有時候，「持平心」可能是一個滿遙遠的目標。

在我這分辨何去何從的時日裡，一位會士弟兄曾對我開玩笑地說：「噢，正在持平心？那你就樂在其中吧！」

幾個月之後，在哲學的課程結束之際，我去和長上諮商，並坦言這兩項工作我都能接受。

長上故意地瞪著我發問：「噢，你持平心？」

既已掌握住了「平心」這個字詞的意義，我試探性地點了個頭。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 JRS 吧！」

「是噢？」我嚇了一跳。我以為這類的決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怎麼兩句話就敲定了。

「當然囉，如果你真的是保持了平心的態度，那麼，去從事 JRS 的工作，對你是一樁好事，也可以吸取在他鄉異地工作的寶貴經驗。就目前你的這兩個選項看來，難民服務很顯然地是更加迫切。何況，在海外一段時間，對一位會士的培訓來說，將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我現在回想到，當時的這位長上，曾經在

巴西服務多年，就經常述說那段時光，是他畢生最快樂的日子之一。）

我楞了一下，心想，這下要離家到海外去工作兩年耶，又不得地沒那麼的「平心」了。

長上為這次的談話收尾了：「那麼，你要不要去查一下，哪個地方的 JRS 最需要你，然後再來找我談一下？」

話已成真的震撼，逐日褪去，而對 JRS 的期盼，亦與日俱增。研究的結論，是東非洲肯亞的 JRS 最需要我，所以，訂妥機票後（這一趟飛行的時間是二十六個小時，直飛目的地），開始準備行囊，備妥大量的防蚊藥水（事後證明，完全派不上用場，反倒更吸引蚊子來叮），回家和父母道別（他們可沒有那麼「持平心」）。在肯亞的首都奈洛比城的 JRS 服務處，我將幫助流亡至該地的難民們，開展「創造盈收效益的活動」（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也就是足以養家糊口的小生意。



我到奈洛比安定下來幾個月後，一位衣索比亞籍的耶穌會士葛羅姆神父（Fr. Groum）來訪。他是離奈洛比數小時車程外，坦尚尼亞的阿魯沙城（Arusha, Tanzania）耶穌會初學院的副院長。他為人隨和且又健談，在我的心情尚處於低潮的時候，請我到奈城的衣索比亞餐廳吃飯，並且很有耐心地跟我解說這些菜餚，也因此奠定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基礎。

葛神父離別之前，請我幫他一個小忙。離開我住的會院不遠的地方，有一座耶穌小姊妹修會（Little sisters of Jesus）的會院，裡面有兩位衣索比亞籍的修女。葛神父給她們兩位帶來了一本安

哈利文（Amharic-language）的聖經，可是他自己一直沒空過去。我介不介意有空時帶過去？小意思，交給我吧！

臨走之前，葛神父還把那修女院的方向，特別指給我看。等我去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就在他請我吃飯的那一家衣索比亞餐廳的正對面，可是房子被門口高大的黑色鐵門完全遮住了。

這本製作精緻、鑲金字體、黑色封面的安哈利文聖經，在我桌子上擺了一個禮拜。想到兩位沒有本國語聖經可供閱讀的小修女，可能正在急切盼望等待著，終於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下定決心，要辦妥這個小忙（事實上，這裡幾乎每一天早晨都是陽光普照）。

踏上會院前的泥土路，不久就來到了耶穌小姊妹會的會院。高大的圍牆，環繞住她們的住所，我用力拍打大門口的黑色鐵門。不久，就聽到了一陣唏噓的腳步聲，來應門的是一位非洲籍的女子，身著所謂的瑪利亞色調（Marian colors）的服裝——淺藍色的上衣、深藍色的裙子、寶藍色的頭巾——全身唯一的非藍色服飾，就是腳上那一雙淺綠色的拖鞋。

「噢，修士，歡迎光臨。很高興你來了，請進。」

她笑咪咪的問候語，讓我又驚又喜——她怎麼知道我要來。葛神父說她們會院裡沒有電話，她是從何得知的。這麼熱情的歡迎，也讓人憶起古老的《聖本篤會規》（*Rule of St. Benedict*，譯者註：西方拉丁教會修道院制度奠基者聖本篤，所制定的一套修道院的守則）內，有一行這樣的文字：「所有到修道院來的訪客，都應當視同基督本人一般的受歡迎。」

跟隨著小修女走在鋪著礫石的小徑上，我發現她們住的小平房，是立在花園的中央。剛走到涼爽而有遮蔭的門廊，門就開了。

會院內的九位修女——分別來自馬爾他（Malta）、坦尚尼亞、奈及利亞（Nigeria）和衣索比亞，她們的長上是法籍的莫尼加修女（Sr. Monique）——齊集門口歡迎我。

在我奉上這本聖經時，她們用誇張的語句稱讚我——這是一樁偉大的愛德行動（還包括我徒步行走的那幾百公尺）——真令人不敢當。

衣索比亞籍的艾卡拉瑪利安修女（Sr. Askalemariam，照她的解釋，是 Gift of Mary「瑪利亞的禮物」的意思）帶著我參觀這個小會院。起居室很小，擺滿了木製家具。往後走，是食物儲藏室，兼做廚房，一面牆上的木製釘板上，掛著各式的廚具，小煤油爐上正在煮東西，滋滋作響。另外的，是幾間臥房，兩到三位修女合住一間，是男士的禁地。九個人住在這般狹小的空間，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生活條件如此地簡陋，令我吃驚。

屋後方是一個小院子，有一間簡陋、木頭結構、鐵皮屋頂的小房子，是修女們祈禱用的小教堂。小屋旁有一棵高大濃蔭的樹，不時落下幾顆漿果，敲在鐵皮屋頂上叮噠作響。小教堂內，四周環繞著木條椅，中央是木製的祭台，一尊燒陶製作、不上釉、蟻臥著的嬰兒耶穌，置放在祭台前。艾修女解說，她們在羅馬的母院，燒製這類修會標幟式的陶塑像，出售給外人，以籌募修會的基金。

再回到起居室，修女們已備好一壺茶和一盤點心，並央求我多坐一會兒，多聊一下。盛情難卻，大家的話題都在我身上：難民服務的工作如何；耶穌會的生活如何；我在美國的父母、我的健康、此地適應嗎，等等，足足聊了一個小時。她們對一位來訪的陌生人，真誠的關切，溢於言表，令我吃驚且又非常感動。

尤其，她們的喜樂，是我前所未見的。我覺得她們似乎笑個不停——開自己的玩笑、外出學習的趣事（大部分的修女在附近的一所神學院進修）、彼此的怪毛病、穿著，甚至於也拿長上開玩笑。當大夥兒揶揄她的法式料理時，莫尼加修女笑得更是開心（我發現，有些非洲籍的修女，認為法式烹飪挺神奇的）。而喜樂是會傳染的，我自己都輕鬆不少。

告辭時，莫尼加修女握著我的手，慎重其事地說道：「修士啊！你一定要常來看我們噢。」喜樂之所，為何不來。我真的是常來——大概一個月來一次，只是打招呼、喝杯茶，有時還留下來一起晚餐。



這是我和耶穌小姊妹會的首次接觸。這個非常獨特的修會，是德蓮·胡丹修女（Magdeleine Hutin）於西元 1939 年，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創辦的。當初原立的宗旨是，成員要過一種簡樸、靜觀的修會生活，同時，要為沙哈拉沙漠（Sahara）中的游牧部落服務。這種修道模式，是受到查理·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的啟發。富高是一位法國的貴族和軍人，在西元 1886 年捨棄了優渥的生活方式，從此度著極端貧窮的生活。

富高的神修基礎，很單純地放在「納匝肋時期的耶穌」這個概念上——這是在耶穌於約旦河受洗禮之前，尚未開始招收弟子們；亦即，外出傳道生涯之前的耶穌——祂是在本鄉從事木匠的窮人。耶穌這段時期的生活，傳統上稱之為「淡泊的平凡生活」，相對於後來三年積極宣講、走遍猶太全境的傳道生涯，那是一段長達約三十年的隱居式的生活。對於富高來說，仿效耶穌的隱居

式生活因而成聖的道路，就在阿爾及利亞的沙漠中，為杜阿來（Tuareg）族的游牧部落服務。

富高希望能成立一個新的修會，在貧窮人的行列中生活和工作，並以納匝肋的木匠耶穌作為榜樣。他也希望能把基督的信仰，帶給沙漠中游牧的部落。而要達到這兩個目標，口傳福音要放在身體力行的生活見證之後。在這一點上，他酷似聖方濟的說法：「去傳揚福音吧！必要時，才使用言語。」

雖受到了在地人們的愛戴，富高於西元 1916 年被塞努斯族（Senussi）叛軍中的一小撮狂熱分子所殺害，未能目睹到他的跟隨者。然而，他的著作和他的榜樣，卻因他的死亡而更廣為人知。於是，赫內·巴洛姆（René Voillaume）於西元 1933 年創辦了「耶穌小兄弟會」（Little Brothers of Jesus）；數年後，德蓮·胡丹創辦了這個「耶穌小姊妹會」。

這兩個修會發揚光大了富高的遺志，藉著和這個世界的人們在一起工作的方式，實踐納匝肋耶穌式的生活。

這當然言之成理。可是，當初莫尼加院長修女向我解說，她們修會在修德成聖的道路上所秉持的這種神修方式時，我著實嚇了一跳——小姊妹修女們典型的工作，是從事瑣碎的體力勞動——工廠內的作業員、醫院內的勤務、農場上的工人等。這種選擇，是天主教會內許多人不願意去從事，或者是疏忽了的，但是，她們卻喜樂地去從事。這就意味著，現今奈洛比這個會院裡殷勤研習中的年輕修女們，將來可能是工廠或農場裡的女工，或者是醫院內的雜工。

起初，我對這種修道生活的觀念，抱持著不以為然的態度，尤其是，和我們耶穌會的神修模式相差得太遠了。在和她們的來

往頻繁了以後，我發現這種過著日常生活的觀念，是滿有道理的。畢竟，耶穌在世上時的大半輩子，不也是這樣過的？世間如此眾多的人們，就是在從事這樣的工作，為什麼不能在這類體力的勞動中去體驗天主？再仔細地比較一下，聖依納爵的「在一切事上，發現天主」的理念，和這些小姊妹們的修道神修，似乎相差得不遠矣。她們強調貧窮，也和依納爵在《神操》中的訓導類似——一個人要希望去跟隨貧窮的基督，不僅僅因為貧窮的本身是美善的，更因為，這是耶穌在世時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富高留下來的日記中，有許多的片段是騁馳在默觀的想像中——納匝肋的耶穌，是如何地跟他說話，給了他什麼意見或啟發。羅勃·埃斯柏格編輯的《富高文集》（*Charles de Foucauld*）中，有一段美麗的敘述，是用耶穌口氣說的：

在被獻於主堂和逃難埃及之後，我回到了納匝肋。我的童年和青春期，就是在那兒度過的，一直到三十歲。再度地提醒你，我過這樣的生活，是為了你的緣故，是為了愛你的緣故。我這段生命有什麼意義？那是為了教導你。這三十年來，我一直不停地教導你，不是用言語，而是用我的靜默和榜樣。我要教導你的是什麼？主要的是，若要為善待人——偉大的善、無限度的善、神聖的美善——不必使用言語、不用說教、不小题大作，而僅只以靜默和給別人立好榜樣，那是可能辦到的。何種的榜樣呢？專注在面向天主的日常庶務責任

上，且以愛心去完成它；善待所有的人；在聖潔中，去完成家務雜事：那是一種貧窮、低下、謙讓、與世無爭的榜樣——在上主之內的一種平凡生活的淡泊、一種祈禱、做補贖、謙讓的生活，完完全全地消失於上主之內，深深地埋藏在祂之中。我在教導你，靠著你雙手的勞動去過生活。這樣，你就不會成為他人的負擔，且有餘力濟助貧窮人家。我賦予這樣的生活方式，以一種無可比擬的美麗——它之所以這般的美麗，是因為它是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個複製品。



和這些小姊妹們來往日久，也閱讀過了關於富高的傳記，我就更加地佩服耶穌的這種隱居式的生活。「歷史上的耶穌」開始吸引了我的注意——耶穌生長在西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地方，祂在傳道前的養成期，又是如何的狀況。在我們奈洛比會院的圖書室內，有一本雅伯·諾蘭（Albert Nolan）寫的小冊子《在基督宗教以前的耶穌》（*Jesus before Christianity*），概略地分別描述了耶穌誕生時期、在納匝肋生活時期和傳道時期的巴勒斯坦的歷史背景。

耶穌這種隱居式的生活，很快就進入了我的祈禱領域。耶穌在那些年的歲月，提供一個默想者極大的、馳騁想像的空間，因為福音的作者們，對於這段時期的耶穌著墨甚少。

這是多麼奇妙而又令人難以抗拒的念頭。我自己提出了一大堆的問題，以供我來沉思默想：青年的耶穌是何等的模樣？在納匝肋的日常生活，是何種的模式？祂有哪些朋友？曾戀愛過嗎？曾為種種事情而歡笑？祂如何能領悟到祂的召叫——去從事這份

獨特的傳道？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耶穌行動的福傳使命上面，反反覆覆地思索和默想，今日此番的經驗，讓我覺察到，我對耶穌生命的大部分過程——納匝肋的木匠生涯——所知甚少。

逐漸地，這項探索導引我走向一個更關鍵性的人物——若瑟。



就如同對於教會初期的許多聖人一樣，我們對於大聖若瑟的事蹟，所知甚少，四部福音書中，總共也只有幾行字的記載。他是歷史上著名的達味王（King David）的後裔，和納匝肋的一位年輕女子瑪利亞訂了婚，可是，後來發現她懷孕了。依照《瑪竇福音》的記載，若瑟「是個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而打算暗地裡解除婚約。若瑟的寬容和同情心，全然地溢於言表。

但這不是天主的計畫。如同聖經舊約的《創世紀》裡托夢給另一位若瑟一般，天主在夢中給這位納匝肋的木匠，顯示了祂救恩的計畫。在夢中，一位上主的天使讓若瑟參與了瑪利亞的奧祕：「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在她身內孕育的嬰孩，是出於聖神。」在瑪利亞的兒子誕生後，同樣地又是這位天使，在夢中告訴若瑟：「起來，帶著嬰兒和祂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祂殺掉。」若瑟聽從了。

關於孩童耶穌的事蹟，則僅有幾則簡短的敘述。耶穌十二歲時，去耶路撒冷過節慶，留在聖殿中和經師們在一起。此外，我們僅只知道，祂成長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路加福音》用一句話，概括地敘述了耶穌十八年的歲月，「孩子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

這是若瑟的時刻了。撫養他的兒子——更精確地說，替別人照顧這個兒子——教導祂學做木匠（《瑪竇福音》和《馬爾谷福音》的希臘文原文使用的Tekton這個字，可廣泛地譯為「手藝者」或「木工者」，但傳統上，是指「木匠」）。在若瑟的工作坊裡，耶穌一定會學到，認識這門手藝所需的各式材料——哪些木料適合做桌椅，而哪些又適合於種地用的犁和軛。這位若瑟師父肯定會教好這個小徒弟，如何使用木槌去釘合，如何在厚木板上鑽洞，如何刨平稜稜角角的木料等等。

那不用說，師傅一定會傳承做一個好木匠必須具備的價值觀：要有耐性（要等待木料乾透之後，才能使用），要有判斷的眼光（使用的鉛垂線是否筆直），要誠實（價格公道），有恆心毅力（桌面要砂磨得均勻平整）等。年輕人耶穌和師傅若瑟，一起勞動、製作，貢獻成果給納匝肋本地和附近鄉下的人們。我們也不難想像，耶穌在學徒生涯中所領悟到的這些價值觀，如何在日後的傳道生涯中都能好好地發揮。如同神學家若望·郝義（John Haughey, SJ）的說法，若瑟幫忙塑造了「這個世界的救贖所最需要的一個工具」。

作為父親，若瑟是耶穌的宗教信仰的啟蒙導師之一：經書中先聖先賢事蹟的講述；猶太人傳統的祈禱文的誦唸；聆聽鎮上的經師、長老的宗教訓誨。講論天主的事之時，肯定要答覆青少年耶穌的諸多詢問。耶穌能領悟到和天父的關係，不僅若瑟的身教有貢獻，他的言教可能也居功不少。若瑟的信仰，為耶穌的信仰奠定了基礎。

依照福音的記載來看，耶穌開始外出傳教時，若瑟已經消失了。加納的婚宴，是耶穌傳道生涯的起點，很顯然地，若瑟未在

賓客之中。傳統的看法是，此時若瑟已逝世，至於是何時則無從得知。

若干年前，在紐約市的聖若望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的一個藝術作品展覽場上，我觀賞過一幅畫作，標題為〈若瑟之死〉，這是一個相當罕見的主題。這巨幅的畫像，是西班牙著名畫家法蘭西斯科·戈亞（Francisco Goya）所繪病重的若瑟躺在床上；約莫十六、七歲模樣的青年人耶穌，臉上沒有鬍鬚，穿著一身紅色的長袍，站在床邊，注視著若瑟；瑪利亞則在床前。這是一幅罕有的聖家畫像，捕捉了對若瑟早逝的哀傷。

在天主教的傳統上，若瑟被視為「善終」（Happy death）的主保聖人。理察·羅爾（Richard Rohr）在《心靈弟兄》（*Soul Brothers*）一書中，是這樣闡釋的：「在那個時刻，若瑟怎麼會不快樂呢？他聽從了天主托夢給他的指示——就如同他的先祖若瑟一樣（譯者註：《創世紀》卅五章），這個夢帶他遠赴埃及。現在，他肯定，他即將被帶到一個新的家鄉去，第三度地從頭開始去安頓下來。」真是很公道的一個說法。可是，為耶穌和瑪利亞，卻不是一個快樂的時刻。他們多麼希望若瑟能耳聞目睹愛子在以色列全境的傳道；在傳道生涯的苦惱和痛苦之時，多麼希望能有若瑟的諮詢顧問；在耶穌的苦難和死亡之時，瑪利亞多麼渴望有若瑟在旁邊支持她。

無論如何，這就是若瑟不為人所知的、平凡的日常生活。

若瑟這一生的平凡和如此的不為人所知，給了我許多的啟示。在極簡短的幾則福音書的記載中，若瑟自己都未曾發言，他過著一個默默地為上主服務的生活，幾乎不為外人所知曉。這是一種謙遜的生活，也反映在奈洛比城的眾多人們身上——在當地的肯

亞人身上，也在耶穌小姊妹會的修女們身上。

若瑟這般的生活，也反映在那些我所服務的難民身上。在奈洛比的 JRS 工作，我常有機會去拜訪他們居住的陋室——更好說是「窩居」。有一次，我去拜訪一位婦女。這位婦女在我們的資助下，買了一台小型縫紉機，這樣她就可以用來幫人家縫補衣服，賺點家用錢。她的「窩居」是一間陰暗的斗室，所有的家當一目了然——一張破舊的床墊，供四個小孩睡覺用；一個燒飯的小煤油爐；一個裝滿了水的塑膠桶；一紙箱的衣服。誰人能比這位婦女更不為人所知？誰會知道這個貧民窟內的小窩居？而她，辛勤地踩著這台小型縫紉機，全家人的生活全都靠它了。和她類似的這些難民們，逃離了家園，親友離散、身無分文、有一餐沒一餐的為生活打拚著，看不見未來，全然地淹沒在無邊的苦海之中，這個世界無視於他們。

而這種平凡且不為人所知的生活，也反映在世界的另一端，在許多富足社會中人們的身上。某一位中年的未婚婦人，全心照顧年老的母親，她所付出的犧牲，不是鄰居們全看得到的。某一家庭慈愛的父母親，畢生照顧患有自閉症的兒子，他們內心的疼痛，不是朋友們全然能了解的。城市內的某地，一位單親媽媽，要做兩份工作才能支付孩子們的教育費用、養家糊口，在日班工作的同事們，哪能知道她那疲憊的身軀，還在從事另一份夜班的工作。為愛他人以及為他人服務的，不凡而不為人所知的日常生活的事例，不勝枚舉。為了天主的緣故，這些人日復一日地付出著。

我很訝異地發現，在我的四周有許多這樣的人們，以一顆喜樂的心，擁抱這份平凡的服務人生。在耶穌會初學第一年的時候，我曾參與一所醫院的志工服務。美國麻州劍橋市的尤維爾醫院

(Youville Hospital)，專門奉獻於照顧重症的病患，是天主教會內一個很小的修會——灰衣修女(Grey Nuns)——所創辦的。那兒收容了各種的長期重症病患——癌症、癡呆症、退化性肌肉萎縮症等。其中，有不少病患是年輕人——譬如，因汽車或摩托車的車禍，而造成的腦部嚴重受損。有一位母親，每天到醫院來探視她二十歲的兒子，餵他吃飯，朗讀書報給他聽，坐在他的床邊上。在這所很少人知道的醫院內，這又是一樁完全不為外人所知的平凡生活。一個冬日的午後，我進到這間病房時，這位媽媽正在細心地給她的兒子梳頭，她開心地笑著問我：「他今天看起來是不是很帥？」

這種不為人所知的生活，格外地感動我，因為，相對之下，我喜好表現、希望廣為人知的欲望，顯得有多麼的自私。我們現今社會的文化，表揚大膽地展現、大聲地公開宣示、標新立異的寫作。我發現，我自己也是這樣的，經常想要成就一些事情，讓大家都看到。做了一件善事，那還不夠，一定要別人知道，是我做了這件善事，這樣才行。如此這般地下來，我發現這種渴求盛名的胃口，是相反了耶穌的訓誨。祂在《瑪竇福音》中是這樣說的：「當你施捨時，不要教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熱中於盛名的渴求，當然是驕傲的外在表現，而驕傲不會尋求平淡無奇的不為人所知，也不會走向行動不為人所知的謙遜，它只會想邀得別人的奉承。如此地一路走下去，驕傲成了一個具有破壞性的心態，因為，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盛名的渴求，是無止無境無休的，是無法滿足的，因而，無可避免地終將導致失望，而且將陷於其中。所以，我們要抗拒驕傲。然而，謙遜的小

徑，知易而難行。近代神修大師亨利·盧雲神父（Henri Nouwen）有一句頗恰當的勵志說辭——人們要奮力去尋求這種自由，他的行事作為，乃是「此塵世所不知，然而，卻一切都看在天主的眼裡」。

我一直在想，是否行動愈是隱藏而不為人所知，那麼，在天主的眼中就更加地寶貴。有一則傳說故事，是關於某一位雕刻大師的。在中古世紀，某一座興建中的大教堂內，這位老人家滿懷愛慕之情，在精雕細琢一座聖母像。他花不少的時間，在打磨和整理聖母像的長袍背面上的線條和褶紋。有人就問他，幹麼要在雕像的背面下那麼多的工夫？這座雕像是要豎立在一個陰暗的壁龕裡（niche，類似在牆壁上挖出一個洞穴），它的背部是朝著牆壁，肯定不會有人去把它翻過來看的。

這位雕刻大師的回答是，天主會看它。

我期待自己會有這樣的情懷，不過，現在的我，還差得遠哩。

不過，在平凡生活中聖潔的實例，我倒是親眼目睹過不少。在讀哲學時所住的會院裡，有一次，我和一位可敬的老神父同坐在一張晚餐桌上。有一位打掃清潔的婦人，手拿一塊抹布，面帶微笑地和我們打了一個招呼，走過去了。她是一位東歐來的移民，每週到會院來工作一天。

等她遠去了，老神父才跟我述說她的故事：「你知道嗎？她在我們會院工作了十年，從來沒有抱怨過，她把三個孩子都培養到了大學畢業。她常常是這樣的心情愉快，對我很有禮貌。」停了好一會兒，似乎在思索什麼，他才又接著說：「哪一天我們都來到天堂的大門口，我可以肯定的說，在一長排等候的隊伍中，她一定是排在我前面很遠、很遠的位置上。」



在我結束了奈洛比的工作，要離開的前夕，耶穌小姊妹會的修女們，為我辦了一個惜別餐會。如此簡單的食物，少許的烹具，卻是豐盛的一頓晚餐，尤其是誠摯的笑語不斷，是她們這個團體的特色，也是我所熟悉的。雖有離愁與流連不捨之情，但那是一個令人喜樂的夜晚。

碗盤清洗過後，院長莫尼加修女邀請大家一起禱告，為我祈禱。在她們靜默下來，低著頭時，我知道我早已經從這羣修女們的身上，得到了一份特別的祝福——她們在簡樸的貧窮中，度著一個平凡而不為人知的生活；她們的親身榜樣，彰顯著她們所要傳遞給人的福音；她們豐盈的歡笑，向我展現了基督徒喜樂的價值。

這時候，莫尼加修女用安靜的語調，開始了這個禱告：「請祢降福吉姆修士，他教導我們如何簡樸地生活。」

聽到了這句在我預料之外、未經事先排練過、而且愧不敢當的恭維，這回，終於輪到我，笑了出來。

15

他們信靠天主

烏干達的眾殉道者
(The Ugandan Martyrs)

信靠上主的人，一無所缺。

——史瓦希利族 (Swahili) 的諺語

我厭惡在商業世界裡打滾的日子，因而離開它，進入了耶穌會。然而，反諷的是，在東非兩年的難民服務工作中，我卻大量地借重了這些過去的商業經驗。原來以為永遠要拋在腦後的東西，反而成為有用的寶貝。

在「耶穌會難民服務處」內，我的工作範圍基本上是，幫助已經定居在肯亞奈洛比的各國難民，亦即所謂的城市難民，開展自立自養生活的小生意計畫。

我剛到肯亞的時候，JRS 已經在幫助十幾個這樣的小生意，包括：衣索比亞人經營的住家小吃攤；盧安達婦女們編織草籃的合作社；烏干達男子開設的木工作坊。我跟著一位既友善又有幹勁的奧地利籍中年婦女志工一起工作。這項計畫的運作，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只要填妥一份表格，申請的難民就能得到一筆

小額的資助款，去購買材料或簡單的設備：木匠去買木料；小吃攤可買塑膠杯盤；編籃的婦女去買草繩。

烏塔（Uta）小姐和我定期巡訪這些在貧民區內的自家住處開展的小生意——給他們出些意見和點子、鼓勵一番、幫忙解決問題，基本上，要確保申請的計畫順利進行著。這個項目發展得很快，兩年後我要離開肯亞時，已在運作中的，有六十餘個小生意計畫。

通常，我要花很多的時間，給這些小生意人提供有關銷售、經營管理，尤其是記帳等的諮詢。我更訝異天主的奇妙安排——祂把我過去的商业教育和經驗，放在這麼一個能發揮的善事上。還有，不少難民來自法語系的非洲國家，譬如，剛果（Congo）、盧安達、蒲隆地（Burundi）。如此這般，我在中學幾年所學的法文，全派上了用場。有時候，我在想是否天主早就這樣子一路預定好了？我和我的神師提到了這一點，他微笑了一下，引了一句老話答覆我：「天主能把斷言、殘句拼湊成一個佳話」（*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rooked lines*，譯者註：英美人士的諺語，多源於其語言和文化的歷史背景，類似中文的成語，須深入了解，方能意會其表達的精髓所在。*crooked*，有彎曲的和狡詐的兩種解釋；而 *line*，此處應解為一行的字句）。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小生意，是各式的紡織品加工合作社，而其成員幾乎涵蓋東非洲各個國家的婦女。她們一有空路過我們的辦事處，就會留下一件樣品——帶有濃厚本地鮮豔色彩的印花布所做的洋裝；綴上獅子、斑馬等繡花圖案的童裝；臘染的、豔麗的長疋的布捲；零頭碎布綴縫而成漂亮的百衲被子。來訪的許多外籍志工，常稱讚這些精巧的工藝品。於是，這間小小的辦公

室逐漸變成了一個難民的手工藝品商場。

有一位精明的烏干達籍難民婦女艾麗斯·納維兒（Alice Nabwire）就經營了一家合作社。若干年前，她逃難到這裡，目前和兩名同胞婦女，在貧民區內開了一間洋裝裁縫店。她的小店離我們的會院不遠，我常過去走動，時間一久大家成了朋友。雖然在這個世界上最貧困城市之一的貧民區內討生活，難免常要面對艱難，艾麗斯始終保持著樂觀。她工作勤奮，是個精明的生意人。要跟她購買一件衣服，她總會想辦法要我買兩件（而我也經常被她說動）。在她身上，反映出我所喜愛的一段保祿書信的章節：「我們在各方面受磨難，卻沒有被困住；絕了路，卻沒有絕望……被打倒，卻沒有喪亡。」

艾麗斯有一份特別的幽默感，而且洞悉此地難民生活的百態。有一回，我跟她提到有一位烏干達婦人，決定要用我的名字給她的新生兒命名。對我而言，這表示認同我的工作努力和成果，以及一份個人的榮耀。前些天，這位婦女還把嬰兒抱來辦公室給我瞧哩。艾麗斯只點了一下頭。我接著說，嬰兒領洗還是好幾個月以後的事。

「詹修士，嬰兒領洗時要穿的禮服，誰要出錢買呢？」

「噢，我想是他母親吧！」

艾麗斯又點了一下頭，沒說什麼。

幾天以後，嬰兒的媽來辦公室邀請我參加嬰兒的受洗禮。然後，她說，沒錢給嬰兒買一件禮服。另外，她還想按著習俗，給來觀禮的親友辦一個歡迎茶會，可是找不到地方。當然，我提議自掏腰包給嬰兒買件禮服，也建議她，可以在耶穌會院的客廳辦歡迎會。歡喜的母親，千謝萬謝自不在話下。到了領洗的日子，

我和她的眾親友齊聚在本地的教堂內，興奮地看著神父小心翼翼地倒水在一位名叫詹姆士·馬丁·納開比（James Martin Nakoye）的嬰兒的額頭上。觀禮後，十餘位親友歡慶於耶穌會院內，暢飲芬達汽水，分食餅乾和蛋糕。

隔一個禮拜，又有一位婦女來訪，她用「詹姆士·馬丁」給她的新生兒命了名。

我到艾麗斯店裡走動的時候，提到了這件事。她開始一前一後不停地搖頭，以一副開導一個腦筋遲鈍者的口氣說：「詹姆士修士呀，像這樣既掏鈔票買禮服又免費辦歡迎會的，難道你看不出來，過不了多久，奈洛比城裡面就會有一大票名叫詹姆士·馬丁的新生嬰兒嗎？」



辦公室兼售的難民的手工藝製品，大受歡迎。烏塔小姐和我決定要開一家專賣的店鋪，這樣才能滿足接踵而來的觀光客、外僑和本地有錢的肯亞人的需求。商品項目，則從紡織品加工擴及木雕品、手編籃、繪畫和草蓆等其他難民小生意的產品。幾週的尋覓後，我們租下了康格米（Kangemi）貧民區外圍、耶穌會管理的教堂所屬的一間小平房。幸虧，這些有錢的顧客不必穿越那個貧民區，否則，一定會被那兒的生活條件給嚇壞了。

店鋪一開張，生意就興隆不已。頭六個月的營業額，即超過五萬美金，在東非，這可不是個小數字。賺的錢，用來進更多的貨和補助一些新的小生意計畫，當然皆大歡喜。店鋪裡面，提供了一個角落，給難民朋友們彼此往來見面、打聽消息和不定時舉辦免費培訓班（我任教的「實用商業技能簡介」應該是其中最重

要的課程；然而，事實證明，一位蘇丹籍老太太傳授的「編籃技藝」，才是最受歡迎的課程）。

我們知道，要吸引顧客上門，還得做一些市場行銷。首先，要給這間店鋪取個好名字。我認為，用非洲本土聖人的名字是個好主意。烏塔小姐卻有些猶豫。

問問看這些難民們怎麼說。畢竟，這個店鋪是為他們而開設的。有一天早上，我和門外等著進來辦事的一羣人坐下來聊了一下。店門口有一個寬敞的迴廊，上面搭蓋了一大片的遮陽板，在赤道烈日的照射下，這是個陰涼的好地方。訂製的木條椅（由我們難民小生意計畫的木匠所承製的），是這些難民朋友們閒暇時喜歡逗留的地方。旁觀這些不同族羣的男男女女坐在迴廊上，似乎很悠閒地彼此互通訊息，交換各自做生意的門道，彼此看顧幼童，互相鼓勵、安慰和歡笑著，我有一股窩心的感覺。想想看，要是他們仍在本國的原居地，彼此之間還都嫌惡著呢！

我先拋出了話題：烏塔小姐和我都認為，該給這間店鋪取個響亮的好名字，以廣招顧客。

大家都說，這是個好主意。

我接著問，用一個非洲聖人的名字，好不好？

幾個星期前，本地的教會雜誌上刊登了一篇烏干達殉道聖人的簡介，十九世紀末一羣巴干達族（Baganda）的男子和青年人被他們的國王殺害了。這些人都是在殉道前不久才領洗的。

「季齊多（Kizito）這個名字怎麼樣？」我試探著發問。季齊多是受難的一羣人中年紀最小的，死的時候才十四歲。我也曾聽說，在奈洛比城內有幾個青年團體，奉季齊多為主保聖人。我本人也喜歡這個名字——容易記住，更重要的是對西方人的顧客來

說，發這個音不成問題。

製作百衲被子的三位烏干達婦女，立刻笑著點點頭：「太好了！季齊多是個好名字。」

我注意到，另外一條椅子上的一位蘇丹籍婦女在抗議：「詹修士，用『巴希塔』會更好。」約瑟芬·巴希塔（Josephine Bakhita）原是一個奴隸，後來成了嘉諾撒會的修女（Canossian Sisters），最近被教廷列品為「真福」。

烏干達婦女們一起皺了一下眉頭，這好像也是一種反對的記號。我開始警覺到，選用任何一個非洲國家的聖人，都會得罪其他國家的難民們。為避免製造分裂，趕緊打消了這個念頭。

本地人史瓦希利族語言的一個簡單的名詞，可能更好。於是，我趕緊翻查字典。

「莫萬加沙」（Mwangaza）是「光」的意思。耶穌會院裡的弟兄好意提醒我：「在我們奈洛比城內有一個會院，就是這個名字。」

「杜馬衣尼」（Tumaini）是「希望」。也不成，附近一座修女院已經用了。

「赫奇馬」（Hekima）代表「智慧」。它是奈洛比城內耶穌會的神學院。

我找到「信德」這個字——「伊瑪尼」（Imani），很有光環哩！可是，烏塔小姐解釋給我聽，肯亞的執政黨經常以此命名公共建築物。好用的字，哪兒去找呀？

最後，一位難民朋友建議了更單純的一個字：「用米克儂（Mikono）怎麼樣？」這是「一雙手」的意思。既簡短又好記，而且，這個發音，西方人聽起來滿順耳的。幾天後，我又跟大家

提起了這個話題。

「為什麼要取『雙手』這個店名？」我耐心地解釋，這個字彰顯了我們店裡賣的東西是雙手的成果，而且，我們大家要手牽手一起努力。其中一個人說道：「噢，那很好！」

米克農中心（Mikono Centre），這個店鋪的新招牌，也不是人人都滿意。「用烏干達聖人的名字，會更恰當。」有一位烏干達婦女，在往後日子裡一直向我嘟囔著。她說，應該取名為「季齊多中心」，因為聖季齊多代禱的力量非常強，而我們錯失了這個機會。

這是我第一回合領教到，殉道聖人對於東非各地基督徒的重要性。



包括英國聖公會（Anglican）和天主教在內的基督徒傳教士，於十九世紀末開始深入非洲的內陸地區。北非阿爾及爾和迦太基總主教區的法籍樞機主教拉威烈（Cardinal Charles Lavigerie, Archbishop of Algiers and Carthage）所創辦的「白衣司鐸傳教會」（White Fathers，因均穿著白色長袍的會服，故一般人如此稱呼他們），是第一批建立傳教據點的天主教傳教士。早在西元 1878 年，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賦予他開拓赤道非洲地區的傳教使命之時，拉威烈總主教已仿效阿拉伯駱駝商隊的模式，每年一次進行深入中非洲地區的福傳之旅。

西元 1879 年，在現今烏干達的國境內，一個固定的傳教站已經建立起來了。巴干達族是當地人口眾多且勢力龐大的一個族羣。因此，備受歐洲傳教士的矚目。英籍作家萊思（Edward Rice）在

他為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深入中非地區、著名的探險家和語言學家波頓爵士所寫的傳記《波頓探險隊長》（*Captain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中，即曾描述這個巴干達族，是非洲中部地區最富饒和文明最先進的族羣之一，「歐洲人訝異於他們所呈現出一種古老文明的餘韻、組織完善的行政系統和處理政務的風範，有著相當優雅的藝術和建築，以及非凡的手工技術」。然而，依照萊思的說法，這個文明也有陰暗的一面——巴干達族的統治者和人民，以「超乎一般性的殘暴的種族特性」而著稱。

當時，巴干達族國王莫得沙（Mutesa）的事蹟，更能凸顯這種殘暴的特性。他在西元 1860 年即位，為了確保他的王位，他所有的兄弟一共六十人，全部被活埋。然而，對於入境來的外籍傳教士，他的態度大致上可稱為「友善的」。基本上，他允許人民有宗教上的自由——並不排斥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和回教。新進來的各個傳教團體，也都看準了宮廷的巨大影響力。因而，竭盡努力設法去歸化宮廷內的各領導階層。國王自己則刻意保持距離，直到 1884 年去世為止，他始終是偏向本地的傳統宗教。

巴干達族的信友皈依基督宗教，就要揚棄傳統的宗教，也意味著，在某些方面，要過一種有別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基於宗教信仰的訓誨，有一系列新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價值標準，因而有新的人生取向。於是，這些信友團體，就成了族人眼中的叛徒，是危險的一羣人。在莫得沙統治期間，並未釀成實際的衝突。

他的兒子莫萬加（Mwanga）即位之後，情況有了劇烈的轉變。年輕時，他對基督徒傳教士們頗有好感。然而，即位後，態度立即改變。傳統上，國王是整個王國內威望和權力的中心所在，他有權任意處置他的臣民。有一句巴干達族人的俗話說：「螞蟻

的女王，以她的臣民為食。」傳教士的出現，嚴重地削弱了他對於基督徒臣民的權威。莫萬加有變童癖，皈依基督的年輕男子，抗拒他這種不當的性要求，也惹怒了他。於是，他決定嚴懲傳教士和其信友，以禁絕境內的基督宗教。

西元 1885 年一月份，三名聖公會的信友——魯加拉瑪（Joseph Rugarama）、卡庫巴（Mark Kakumba）和賽萬加（Noah Serwanga）——遭處死刑，先肢解，後焚燒。同年的十月份，甫入境的聖公會主教韓寧敦（James Hannington of Anglican Bishop）和他的整個駱駝車隊，慘遭殺害。穆卡沙（Joseph Mukasa）是國王的首席幕僚，也是一位新近領洗的天主教友，在莫萬加面前直言國王的處置不當，未依照傳統的習俗給韓寧敦主教等人有辯解的機會，而逕予處決。國王以此為忤逆，穆卡沙在 1885 年 11 月 15 日被斬首示眾，成為非洲大陸第一位天主教的黑人殉道者。

王宮的侍從總管盧岡加（Charles Lwanga）前此一直跟著白衣司鐸研習要理，在此番腥風血雨中，接續穆卡沙陪伴宮內青年望教友的責任。穆卡沙受難的當晚，他就帶著這幾位望教友來到教堂，在盧德神父（Fr. Siméon Lourdel）手中，一起接受了洗禮。其中，年紀最輕的是十四歲的季齊多。

在奈洛比城東非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East Africa）任教的白衣司鐸會士（他們正式的名稱是「非洲傳教會」Missionaries of Africa）夏特神父（Fr. Aylward Shorter）給我講述了這段傳奇。依照他的說法，盛怒中的國王翌日即傳喚所有的隨從人員到王宮集合。國王事先已經得知，他的宮廷內有一名隨從莫華夫（Mwafu），跟著另一名隨從賽布華沃（Denis Sebuggwawo）在研習教理。因此，要求侍從們公開地表態。除了三名基督徒（包括

天主教友和英國聖公會的教友)外，全體宣誓效忠國王。志得意滿之餘，國王延遲了對這三個侍從的處決。盧岡加——秉持一種類似聖多默·穆安面對英王亨利八世的態度——表達對巴干達王國的效忠，願意為國王不惜一死；但是，並未公開揚棄宗教信仰。

二月份，一場大火燒燬了王宮，莫萬加被迫遷居維多利亞湖邊的臨時寓所。在那兒，盧岡加刻意地保護幾名隨從免受國王不當的性需索。在取得境內多位酋長的默認後，莫萬加蓄意發動另一波殺害巴干達境內基督徒的行動。在這段期間，盧岡加祕密地給五位望教的隨從付了洗。

5月26日，所有的王家侍從齊集王宮，要抉擇自己的命運。從這個時間點開始，烏干達殉道者的故事，類似在羅馬帝國迫害下的初期天主教會。屢次要求晉見國王而未果，盧德神父被迫成了殉道事蹟的見證人。這些基督徒侍從公開宣示，甚至於願意為信仰而死。因此，莫萬加國王判令他們——十六名天主教徒和十名聖公會的教友——步行到八英里外的那莫剛果(Namugongo)，受火刑焚死。在繩索、鑰銬和押解奴隸的木軛的網綁下，赴刑場的眾殉道者默然而無畏地行經盧德神父的面前。這些事蹟，日後他都親自為他們作了證。

在那莫剛果又監禁了一個禮拜。這段期間內，眾殉道者聚在一起禱告，合唱讚美詩；背誦晨禱和晚禱，進食前和飯後謝恩禱告，公唸三鐘經(Angelus)和玫瑰經(Rosary)。6月3日，在眾人面前，盧岡加第一個被處刑。身子緊緊的裹在草蓆內，脖子上架著木軛，被擲在熊熊的柴堆上。據說，盧岡加以喊叫聲震嚇執刑的劊子手：「你們用火燒我，我感覺到的是用水澆在我身上！」臨死前，他大叫了一聲，「卡通達」(Katonda)，意即「我的天

主」。

他的夥伴們，都是被以相同的方式處死。夏特神父是這麼說著：「在火焰高昇的時候，人們聽見他們禱告和彼此勉勵的聲音。」小季齊多的訣別語是：「朋友們，再見了。我們要上路了。」

在那莫剛果殉道的基督徒，一共有四十五位——廿二位天主教徒和廿三位聖公會教友。

這個事蹟，再次地呼應了初期教會的殉道者，更彰顯了第三世紀護教者戴爾都良（Tertullian）的經典名句：「屢次，你們鑿除了我們，然而，我們的數目卻不斷地增加；教友的鮮血成了新生命的種子。」白衣司鐸們被驅逐出境，巴干達族的教友們接手福傳的事業，要理問答譯成本地的盧干達語文，信仰的薪火祕密地傳遞著，彼此互相鼓勵堅持下去。莫萬加國王死後，白衣司鐸們重返，他們訝異地發現，有五百名受洗的基督徒和上千位的望教友，在等待著他們。

西元1964年，在梵二大公會議召開期間，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隆重地將這廿二位天主教殉道者全部列品為聖人。五年後，作為首次來訪次沙哈拉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教宗，他在那莫剛果親手為紀念盧岡加和他殉道夥伴們的大殿奠基。1975年6月3日，大教堂落成，當天就是教會禮儀年曆上的烏干達殉道者瞻禮日。



米克儂小鋪的售貨業務，一開始就非常成功。第一個聖誕節假期的業績，更是令人鼓舞——售出了將近半數的庫存貨品。在奈洛比城，它已打響了名號。然而，工作的疲累，是必然的代價。

需要大量的補貨，大家都知道。上門來推銷的難民工作坊業者，摩肩接踵，有時候，同時有幾十名男男女女的業者，攜帶來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擠爆了店門外等候的迴廊。

在 JRS 工作多年的烏塔小姐，決定離職返國，來接手的是一位年輕而勤勞的德籍耶穌會士麥可（Michael）。有一天，在洽談了整整五十位供貨業者後（真的是有記錄可供查證），麥可突然提議，我們或許該休假一個禮拜，到烏干達去旅行。在烏干達北部難民營服務的 JRS 同仁，曾多次相邀往訪。實地的訪察經驗，會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難民們，來到奈洛比之前的一些遭遇。而我本人也希望藉此機會，能參訪那莫剛果的殉道者紀念教堂。於是，洽購了奈洛比開往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火車票。有人會安排我們搭乘為傳教士服務的五人座小飛機，再轉到靠蘇丹邊境、在烏干達北部的難民營。

一個禮拜後，我們擠進了肯亞鐵道局的列車，緩緩地駛經奈洛比的幾個貧民區，蜿蜒地越過肯亞高原，行經烏干達金佳鎮（Jinja）著名的尼羅河發源地；終於，在疲憊的廿六個小時之後，抵達了坎帕拉。

長期暴虐獨裁的統治者伊迪·阿敏（Idi Amin），和他被推翻後繼之而來的血腥殘酷的內戰，烙印在烏干達全境的斑痕，隨處可見，坎帕拉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這個灰濛濛城市的火車站，彈痕累累，斑駁的外牆上仍見證著機槍的掃射。

三位駕車來接的耶穌會弟兄，載著我們穿越塵土飛揚的街道，到了薩威會院。那兒住著我們的十五位會士，他們在坎帕拉城內從事不同的使徒工作。其中一位是醫生，在馬克爾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的愛滋病（AIDS）中心有門診，也從事病理的研究。

兩位初學修士，在幾百公尺外的恩山比亞愛滋病專科醫院（Nsambya Hospital）服務。就算我未曾聽聞愛滋病是如何吞噬了大量的烏干達人口，坎帕拉城裡幾乎每一個街角都有製作販售棺材店鋪的景象，也會說明這一切。簡易的木棺沿著街道旁堆高，甚至有一疊十個的。

飛往北方難民營的前一天，一位會士弟兄給我們安排了去那莫剛果的行程。擠進他的小吉普車，我們駛往數公里外的殉道者紀念教堂。他為我們介紹說，來自非洲大陸各個角落的許多耶穌會士都曾來過此地。每年6月3日紀念這批殉道者的瞻禮日，總有數百位從烏干達各地徒步來此地朝聖的信友，甚至還有遠自肯亞和坦尚尼亞的朝聖者。慶典日的各項活動，每年由烏干達的十八個教區輪流主辦。其他的日子，也有許多為青年團體和傳教機構舉辦的活動，每年吸引了數千名烏干達的天主教友來朝聖。雖然那莫剛果仍是個小鎮，卻有好幾所天主教學校和教堂。在義大利創辦的康伯尼男女修會（Comboni Missionaries and Sisters），在此地各有一所初學院。

烏干達殉道者紀念大教堂（The Basilica Church of the Ugandan Martyrs）是一座仿本地傳統型式的建築——用木材和土磚建構的巨大圓錐形的棚屋式樣，輔以金屬的支撐架，屋頂的中間是一個圓帽般的金屬蓋，突出了在中央位置上一個大型的十字架。整體上給人的感覺，彷彿是一艘龐大的太空船降落在青草翠綠的烏干達丘陵上。附近，有一座露天劇場，環繞著一泓湖水，是特別為1969年來訪的教宗保祿六世的彌撒慶典而蓋的。

教堂的各個木門上，細膩地鏤刻出，當年這些殉道者受審和受刑的諸多場景。內部則陳設簡樸而空盪，涼爽而通風。廿二尊

受難者的彩色雕像陳列在旁。麥可和我在跪凳上，向盧岡加和他的受難夥伴們祈禱。就在這個當年受難的幾乎同一個位置上，然而此刻的我，內心似乎未有觸動。難道是因為這個太大且又太現代化的空間，阻隔了我和這些十九世紀殉道者之間的連繫？

幾公里以外，另有一座聖公會的紀念堂。在那兒，我卻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情緒。比較起來，坐落在空曠草原上、粉刷白牆的小教堂是非常的簡樸。教堂外一大片空地的中央，有一堵圓形的矮牆，圍繞一個小淺坑。

趁著他們在教堂內參觀時，我走進了這堵牆。淺坑的底部，是殉道者受難場景的泥塑複製。一個又一個真人大小的受難者緊綁在草蓆和木條內，一個人堆在另一個人的上面，睜大著雙眼直瞪著我。

雖然，事前也曾略聞他們的事蹟，然而，現場重建的再呈現效果，強烈地震撼了我。這一幕直指人心，發人深省——殉道者受難而死，通常在聖像上是以縹緲或美麗的方式呈現，在事實上，它是令人毛骨悚然、內心驚怕、且忍受著身體上的屈辱的。在這兒，我深深地體驗到他們的犧牲，活生生地覺察到他們的英靈。就在這個剎那，我感覺到和他們一起向上主祈禱。



幾個星期後，我特地到奈洛比市中心的一家天主教書店逛了一下。緊鄰著主教座堂，這個書店誇稱書籍齊全，有各樣史瓦希利語和英文的版本，也兼售教會用的文物和錄音卡帶。在這裡，你很容易遇見外籍的志工朋友們，彼此可以交換些最新的訊息。

書店的後頭，有一個大玻璃櫃，陳列著各式的聖像。在最明

顯的位置上，就放著烏干達的殉道者。吸引我目光的，是一幅活潑生動的大型海報，類似我在那莫剛果看到的一幅畫。殉道者眾人都穿著傳統式樣的長袍，手握著大的象牙、十字架和聖經，凸顯著聖盧岡加站在中央的位置，而背景是一牆橘紅色熊熊的火焰。這張海報若掛在我們店裡，肯定增色不少，也能堵住烏干達朋友們的嘴，直到現在他們還嘟囔著，為何不用他們的聖人為店名。可是，手頭上錢不多，只夠買幾張小卡片。

我一眼就選定了三張聖像卡片，造型均類似，襯托在初陽的清晨，翠綠的草原上站著一位黑皮膚的聖人。聖布沙巴亞沃（St. James Buzabalyawo）站在火焰旁，手裡拿著兩條麵包，是「交易者和商人的主保聖人」——最合適我們正進行的各項小生意計畫。聖穆加嘉（St. Mugagga），手捧著一長疋的布條，另一手握著綴有珠寶的聖爵，是「裁縫師和社區發展的主保聖人」——為我們的加工合作社，譬如艾麗斯的裁縫店，很合適。最後一張，聖涂金得（St. Mbaga Tuzinde），「醫護和修道人士的主保聖人」——最適合我本人、會士同仁、和JRS一起工作的眾弟兄姊妹。於是，我買了兩套——一套自己留著，另一套貼在辦公室。

此後，我發現自己常向這些聖人祈禱。卡片的圖像和短句似乎也在跟我說話。在他們安詳的表情上，我彷彿看到每天都遇見的那些難民們的面孔，尤其在他們追憶完了痛苦的往事之後——在原籍地本鄉悲慘的遭遇；逃亡出來以後，難民營裡非人待遇的經歷；現今在奈洛比，更屢遭人白眼。我自己沒有這些必須面對的殘酷經驗，然而，我願意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在受到迫害，以及除了信仰之外不能另有奢求的極端景況中，如何勇敢地面對；更重要的是，如何逆來順受、甘之如飴地度著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在美國，很少人知道這些烏干達殉道者的故事（譯者註：在台灣，不也是？）就算聽過，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或許，聽說過聖盧岡加這個名字。其他的眾殉道者，也都是在一起為了信仰的緣故而受難，譬如年僅十四歲的小季齊多。然而，這些人僅輕描淡寫的被列為「聖盧岡加的夥伴們」。這種默默無名地遂行犧牲的表樣，對我來說，更有意義，更為聖潔。這是一種最高層次的聖潔——簡單，且不為人知。

在我所認識的這些難民身上，我也體驗到這種同樣地、不為人知的特性。這些男男女女顛沛流離的曲折始末，在西方人眼裡，最多只有模糊的一般概念。艾麗斯和她的裁縫店夥伴，在奈洛比城貧民區內的一間搭蓋的房間內默默地工作，她對未來的樂觀和在信仰上的作證，會更發人深省。

就這樣，我看見在這些難民們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了烏干達眾殉道者的故事。所以，我常向他們禱告——聖盧岡加、聖布沙巴亞沃、聖穆加嘉、聖涂金得，還有小季齊多，請為這些難民們代禱，也為我等祈。

16

他是我的寶中之寶

磊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

他堅忍執著的程度，不是後世的仰慕者所能體會的。他既執著又非常的慈憫，如此錯綜複雜的人格特質，導致他天國的榮冠贏來不易，我們可以說，他繞了一個大圈子，穿越過地獄，才到達了天堂。

——丹尼爾·伯利根神父
(Daniel J. Berrigan, SJ) 的評論

歷來尊崇磊思·公撒格的藝術家們，似乎過分地強調了他生命中的某些層面。在現今的各式聖像卡片上，這位年輕的耶穌會士經常被如此地描繪——身著耀眼的黑色長袍，外罩一件雪白的短衫，修長而整潔的雙手緊握住一尊十字聖架，用他那聖潔的眼光注目著它。另外，在某些略帶寫意的畫像中，他輕舉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象徵著他那守貞如玉的修道生涯。

這些表達出來的形象，都沒有錯，然而，它們給人的一般印象是，這是一個細膩精緻而多愁善感的生命。從而，可能阻礙了

年輕的信友們，對他的認同感。因為，事實上，他可說是一個「叛逆小子」。

西元 1568 年 3 月 9 日，路易·公撒格（Luigi Gonzaga）誕生在北義大利隆巴底地區一個名叫卡斯提利歐的城堡中（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i, Lombardy）。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這是一個顯赫有權威的貴族家庭。父親費朗德（Ferrante）是卡斯提利歐的侯爵，母親是西班牙皇宮的御前侍從貴婦，隨侍於菲利浦二世的皇后，而侯爵本人也是王宮中的大臣。

身為長子，路易乃家族的重望所託，父親盡心盡力地刻意培育他。年僅四歲時，父親就給他一整套的迷你型槍械，給他當玩具耍弄；侯爵在軍隊的演習時，把他帶在身邊，以見習武藝，連一般士兵們的常用髒話，他都已朗朗上口（令家人驚愕不已），就可見其一斑了。侯爵給他訂製一套小朋友穿的盔甲，陪同他一起檢閱軍隊，可見是多麼地熱中於培養小路易日後進入這個謀略的政治和威武的軍事的世界之中。路易七歲時，卻已萌生了自己的想法——對於他父親的那個世界，興趣缺缺，反而更嚮往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可是，父親認為路易具有潛力，更積極熱心地培養他，以便日後繼承他的爵位。西元 1577 年，遣送路易和弟弟魯道夫（Ridolfo）到友人托斯卡尼大公爵法蘭西斯科·麥地西（Grand Duke Francesco de' Medici of Tuscany）的宮廷中去見習，希望藉此琢磨他們兄弟兩人。麥地西大公爵的宮廷生活，是個爾虞我詐、背後捅人一刀的權謀而頹廢的世界，又再度證明了是不合路易的胃口。因此，小路易退避到他自己的天地中，拒絕參與那個他認為是腐敗的環境。他十歲時，因厭惡周遭的不良事物，而私下起誓，絕

對不要犯罪而違背了天主。

就在這段時期中，路易開始認真地厲行神修上的克己行動，時常，在克己的程度上，稍嫌過度，以至於四周的人們批評他，說他是個假正經、怪裡怪氣的少年人。也許，這也就是今日的某些熱心教友們，有時候會對於聖磊思·公撒格的一生，持著不甚認同的主要原因。他每週固定守齋三天，僅食用麵包和飲用清水；午夜之時，輒起身，跪在房間內的石板地上祈禱；冬天，臥室內不生火取暖，甚至於在酷寒的天氣時，亦然；尤其，他注意保持貞潔和謙虛為懷。《巴氏諸聖略傳》中提到，從九歲開始，路易就注意「看管自己的眼睛。譬如，人們說，有婦女們在面前時，他總是目光垂下；絕不在人前裸露雙腳，甚至於，在貼身服侍他的男僕面前，亦然。」

這些在神修上的克己工夫，在幾個世代以前的信友們眼中，是頗受嘉許的，然而，對於某些現代的信友來說，則頗不以為然，斥之為一種非人性的做法。

可是，我們在檢視他生命中的這些層面時，也應當一併考慮他的狀況和時代背景。首先，在當時的天主教會內，它符合眾所推崇的神修克己方式。就如同現代的我等眾人一樣，人們都受大時代洪流的影響，而這位少年貴族也不例外。其次，路易在少年之時就採行這樣極端的做法，也可用今日青少年的行為模式去了解——尚未有機會孕育出成熟的自我節制，是一般常見的青少年的激情。第三，在他的宗教生命中，缺少一個可以依循的模範。因此，以某種的意義來說，他被迫要自行去創造一個全新的神修模式。在急於逃離身處的腐敗環境，而且要確定不受它污染的情況之下，這位在神修的道路上硬闖的青少年，難免會操之過急，

或者做過了頭。

在未來的歲月中，他也覺察到了這種操之過急的狀況。後來，進了耶穌會時，他再回顧以往的來時路，就心有所感：「我是已經被扭曲而變了形的一塊鐵。我進了修會，就是要把它理順。」

西元 1579 年，在佛羅倫斯（Florence）的兩年宮廷生活之後，費朗德侯爵將兄弟兩人又轉送到曼杜阿地方（Mantua）的眾親戚家中。其中一個親戚，擁有一座漂亮的私人教堂，路易常停留在教堂內，閱讀聖人們的行傳和默想舊約《聖詠》中讚主嘆世的詩句。在此種氣氛中，小路易逐漸萌生成為司鐸的渴望。返回本鄉卡斯提利歐後，他仍然保持著這種閱讀和默想的習慣。有一次，樞機主教嘉祿·鮑榮茂（Charles Cardinal Borromeo）來家中作客，對這位十二歲青少年的宗教虔誠和學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發現路易居然尚未初領聖體，就親自帶領他預備心靈。終於，成就了教會史上的一段佳話——一位未來的聖人，從另一位未來的聖人手中，初領了聖體！

西元 1581 年，奧地利皇帝馬克西米連二世（Maximilian II）的遺孀瑪麗亞皇后，在返回西班牙娘家的途中，路過了卡斯提利歐。此時，侯爵仍認定路易是他未來家產和爵位的繼承人，因而抓住這個培育他熟悉宮廷生涯的絕佳機會，命他隨行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王宮內，他成為王儲亞斯杜瑞公爵（Duke of Asturias）的隨從，並被任命為聖詹姆士騎士團的騎士。

然而，如此尊崇的富貴榮華，並未吸引他的融入，卻更強化了他的決志。居留馬德里（Madrid）時，路易找到一位耶穌會士作為他的告解神師，也表態願意成為一位耶穌會士，但神師告訴他，務必先取得父親的同意。

費朗德侯爵得知這個訊息後，大發雷霆，威脅要鞭打他。接下來，是一場長期雙方鬥志的戰役：立場堅定的十六歲青少年，和絕不放棄的卡斯提利歐侯爵之間的對峙。為改變路易的心意，侯爵把他帶回義大利的本鄉，並且，立即安排他們兄弟兩人去周遊義大利境內的宮廷。在長達十八個月的遊歷之後，他們兄弟才返回本鄉的城堡。然而路易仍不為所動。

眼見兒子如此地堅持，費朗德侯爵終於讓步了，給了他書面的允許文件。那一年的十一月，這位十七歲的年輕人宣誓放棄了他的家族繼承權。下一順位的繼承人，是他的弟弟魯道夫，一個典型的公撒格家族人士，各式壞毛病集於一身。既已揚棄過去，他遂得以前往羅馬城。

磊思（Aloysius，這是他進耶穌會初學之後，所取的新名字，後人即以此稱呼他）隨身攜帶著這一封父親寫好的信，要呈交給耶穌會的總會長。在信中，關鍵性的字句是：「我只能說，現在，我把他交在可敬的你手中，那可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所擁有的最珍貴的寶貝。」

紐約市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了一幅格西諾（Guercino）的巨幅畫作，以隱喻的筆觸，描繪路易這個重大的轉捩點。畫中的路易，有著公撒格家族外形上典型的長鼻子和修長的臉頰，站立在彈奏著弦琴的大小眾天使的華蓋之下，身著黑長袍白罩衫的磊思·公撒格，凝望著祭台前的一位小天使，而那小天使的小手，指向祭台旁的十字苦架。一支純白的百合花，踩在他的腳下，象徵他的貞潔；在他的身後，一個象徵侯爵爵位的冠冕，棄置在地上；而更遠方、碧藍色義大利的天空下，矗立著他父親的城堡。在這位年輕人頭頂的更高之處，一位飛天的小天使，手持一個即將給予

他的新冠冕——聖潔的榮冠。

面對父親的嚴厲反對，磊思棄俗修道的意志堅決，這個事蹟，在我進入耶穌會初學的時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在我首次跟父母親提到，決定要離開當時正從事的企業工作，進入耶穌會初學院時，他們當時也是反對的（可是，沒有威脅要鞭打我）。幾年後，他們特地來修院看我，誠心地表達接受了我的決定，很高興能支持我的聖召。在那段雙方各自堅持的對峙期間，磊思成了我的主保聖人。

一心一意地尋求天主，同時，決志放棄世間的榮華財富，磊思的所作所為，是聖依納爵神操中具有關鍵性的「兩旗默想」的絕佳範例。在做這個默想時，聖依納爵要求參加避靜者，想像一下在眼前，有兩個旗幟鮮明的領袖——基督君王和魔鬼撒彈——而你，何去何從？如果，你選擇要在基督的旗幟下服務，那麼，藉著默想耶穌的一生，你必須要做各式各樣的抉擇——選擇：「貧窮，以示遠離財富；……受人輕慢或凌辱，以示遠離世間的尊榮；……謙遜，以示遠離驕傲。」很少人像磊思·公撒格這般，把這個默想彰顯得如此完整，所以，他是我的大英雄。

由於磊思一直保持著從青少年時期開始的嚴荷型克己神修，耶穌會的初學院，對他來說，就顯得太過於輕鬆了。戴連達神父（Fr. Tylenda）是這樣記載的：「他發覺初學生涯的要求，遠不如他在自己家中時的自我要求。」長上們鼓勵他，定時地進餐，祈禱的時間不必那麼長，多去從事一些輕鬆的活動，因而，大致上降低他自我克己做補贖的程度。磊思接受了長上的勸告。在一篇〈了解聖人〉（On Understanding the Saints）的文章中，理查·赫姆斯神父（Richard Hermes, SJ）提示說，雖然，一心一意要去尋求

天主的旨意，導致磊思採行某些極端型的克己補贖行動，可是，「同樣的這種一心一意服從修會長上的意志，讓他緩和了一些，而成為一位耶穌會士」。

「聖磊思的兩年初學生涯，我們除了表揚他是個模範生之外，沒啥可多說的。」《巴氏諸聖略傳》如是記載著。西元 1587 年，宣發貧窮、守貞、服從三個誓願。翌年，開始讀神學。

西元 1591 年的年初，羅馬城內爆發了一場瘟疫。在為病患四處乞求哀矜之餘，磊思更親身實地參與救助的工作——把瀕臨死亡的病患，背負到耶穌會創辦的一所醫院中；在醫院內，給他們洗淨身體、餵食以及準備他們的心靈以領受各樣的聖事。雖然，他積極地投身這些工作，然而，在和神師羅伯·伯敏神父（Fr. Robert Bellarmine，譯者註：伯敏神父後來被任命為樞機主教；死後，被冊封為聖人以及被尊崇為聖師）的輔導諮商中，他擔心內心深處對此工作的抗拒，因為親眼目睹的悲慘和所聞氣味的逼人，都令他反胃；因此，他只好悶著頭地苦幹，這樣才能壓抑住它。

當時，有許多年輕的會士，因此而感染到瘟疫，長上禁止磊思再去醫院。耐不住他一再地堅持請求，長上答應他可以再去醫院，但條件是，另一所醫院——聖母神慰醫院（Our Lady of Consolation Hospital）——那兒不收容感染此類瘟疫的病患。在那兒服務的時候，磊思從病床上將某一個病人抬起，伺候他完畢之後，又拖回他的病床。然而，這個病患已經感染到了瘟疫，磊思逐漸發病了，終至臥床，時為西元 1591 年 3 月 3 日。

磊思一度身體復元，但發燒未退、咳嗽未止，又病了好幾個星期。在祈禱中，他得到一個暗示——他將在基督聖體瞻禮日（Feast of Corpus Christi）去世。到了那一天，朋友們看到他的氣

色，比前一天好很多。晚間有兩位神父來給他送聖體。戴連達神父是這麼描述的：「當兩位神父走近他的床邊，注意到他臉上的變化，明白了這位年輕的磊思即將逝去。他的眼神，注目在雙手緊握的十字苦架上，在嘴上要發出『耶穌』這個聲音之時，他過世了。」如同聖女貞德，也如同烏干達的殉道者一樣，磊思·公撒格去世的剎那間，嘴唇上含著「耶穌」的名字。

逝世時，年僅二十三歲。

磊思他那獨特的聖潔，受到當時一般人的嘉許，而同會的弟兄們早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經如此公認了。他去世之後，有一次，羅伯·伯敏樞機主教帶領一批讀書修士，在羅馬城內某處，做聖依納爵神操的大避靜。在講述到某一種形態的默想時，伯敏樞機說：「我是從磊思·公撒格的身上學到它的。」

西元 1605 年，磊思死後十四年，獲教廷冊封為「真福」，西元 1726 年被正式列品為聖人。



我是在耶穌會的初學院時，首次認識了聖磊思·公撒格。事實上，你不可能遇不到他。因為，他和聖達義·葛斯加及聖若翰·伯滿（St. John Berchmans），都是英年早逝的耶穌會士，而這三人組，就是我們年輕會士的主保聖人。通常，這三人組，是以大理石雕像的造型，同時一起出現在耶穌會所管理的教堂內——磊思，手持百合花；若翰持玫瑰花；而達義，則雙手合十，舉目向天。

作為一位初學生，很自然地我請他們為我代禱——這些英年早逝的前輩會士，當然清楚地了解，在初學院的養成期中，是多麼需要艱苦地努力。事實上，在過團體的修道生活方面，伯滿修

士可是足資楷模的，他有一句名言：「過團體生活，是我最大的補贖。」已慣於獨來獨往、任意隨行的個人，要修行而且融入團體的修道生涯氛圍之中，豈是易事。

曾有一位修士，從團體的角度，來評論伯滿修士的這句名言，「我好奇，整個的修道團體，要怎麼樣來看待這樣的一個人！」

不過，我很認真地向磊思禱告，是好幾年以後的事，當時我在肯亞工作。為什麼那個時候會突然如此熱心？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時候，我在想，我們之所以會向某一位聖人禱告，那是因為那位聖人早已經在為我們禱告了。

無論如何，在奈洛比，每次遇上事情不順遂時，我就想到要找聖磊思幫忙，而且，不順遂之事，接二連三。早晨起床，突然發現停水了，在懊惱不已之中，我靜默下來，做一個簡短的禱告——聖磊思，請為我代禱。我那輛破吉普車，又發不動了，我就央求聖磊思，幫點小忙吧。竊賊闖入會院，偷走了我的鞋子、相機和辛辛苦苦存下來的一點小錢，我禱告，聖磊思啊，請按耐住我的脾氣，不要爆發。淋巴腺腫脹，發燒不退，躺在床上兩個月了，內心中犯著嘀咕，在肯亞的此時此地，我到底是幹麼呢？我即尋求聖磊思的代禱與鼓勵，他也經歷過，知道生病臥床是怎麼一回事。兩年的肯亞工作期間，我有一種感覺，聖磊思在天堂上一直細心地看顧我，至少，我可沒讓他閒著。



當初，決定要來肯亞工作時，我選擇從美國直飛肯亞，中間不逗留過夜。很多朋友當時勸我，幹麼這麼傻，要累垮自己啊！我的盤算是，航程中在歐洲的某個城市轉機且多逗留一晚住旅館，

那是沒有必要的浪費，何況，我是一個宣發了貧窮誓願的人，現在可是要去為窮人工作耶！

整整二十六個小時的直飛航程，從波士頓到紐約、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到乞力馬扎羅（Kilimanjaro）最後抵達奈洛比機場。很不幸地，全程沒闖過眼的我，下了飛機後，有若行屍走肉一般，整整的三天之後，精神才得以復原。

兩年以後，從奈洛比返美的回程飛行，我就決定要在羅馬多停留幾天，也算工作結束後的一個休假。羅馬會院的弟兄們，向我保證，會用各式各樣的義大利麵食，把我的胃給塞滿，補回這兩年來消瘦掉的十五磅肉。我也打算走訪羅馬城內幾處耶穌會的著名朝聖地。

羅馬，我以前去過，那是我大學甫畢業那一年的夏天，手持三十天的鐵路歐遊券，馬不停蹄地在歐洲四處觀光。羅馬是天主教會的名城，耶穌會總會的所在——從聖依納爵開始，耶穌會就在城內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建築和事蹟，當時，我哪裡會知道這許多。

可是，當年我是曾在羅馬城的觀光地圖上，注意到一個名叫「Il Gesù」（英文譯名：「The Jesus」）的一個大教堂。記得，當時還和偕行的朋友調侃了一番：「這是什麼樣的教堂，取名叫『耶穌』？」

現在當然就明瞭，那是耶穌會的一個具歷史性的大教堂。當地大家都稱之為「Il Gesù」，但它的全名是「耶穌聖名天主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Name of Jesus）。在羅馬城內，它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典型巴洛克式建築，極受藝術史學家所讚譽。這個華麗的建築，坐落在一個以風大而出名的廣場邊上。還有一則有關

的傳說故事：有一次，魔鬼和風，一起來到這個廣場上，魔鬼說，牠要進去教堂，就把「風」留在廣場上。從此，風就一直留在那兒了。很顯然地，這是一則取笑耶穌會士的閒話。我在波士頓的初學院時，就聽說了這個地方的大名，終於現在有機會親履斯地，還真的是差一點被大風給吹倒了，很是興奮。

另外，當年的旋風之旅，當然也錯過了莊嚴肅穆的聖依納爵大教堂（Church of St. Ignatius），更別提壓根兒不知道有三位耶穌會的聖人，埋骨於此——聖磊思·公撒格、聖若翰·伯滿和聖羅伯·伯敏。聖伯敏，就是前面提到的，磊思的神師輔導，是十六世紀著名的神學家、學者及樞機主教。他在去世之前，要求與這位聖潔的磊思同葬在一處。

聖依納爵當年的住所，在耶穌聖名堂的隔壁。他的幾個房間，最近才整修過，恢復了當年的面貌，非常地簡樸，但都空置著。內部的擺設，是依納爵撰寫《會憲》時，所使用的一張桌子和一個椅子，另外，還有一個依納爵的半身銅像，而其底座的高度，也考據了傳記作者的說法，以顯示他實際上的矮小身軀。

我也去了城外一個名叫拉斯道達的小鎮（La Storta），參訪一座赫赫有名的小教堂——聖依納爵在此小堂內有一個神視。在神視中，天主說：「在羅馬城內，我將使你順遂。」

現在羅馬的耶穌會初學院內，有一座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築的聖安德小聖堂（Church of Sant Andrea al Quirinale），是著名建築師吉安·勞倫佐·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所設計。教堂的樓上，是聖達義·葛斯加的紀念堂。覆蓋在他墳上的大理石雕塑，重現了他臨死時的景況——斜臥在床上，除了會衣的長袍是黑色的大理石之外，其餘的都是白色的大理石——剛踏進屋內時，我

的傳說故事：有一次，魔鬼和風，一起來到這個廣場上，魔鬼說，牠要進去教堂，就把「風」留在廣場上。從此，風就一直留在那兒了。很顯然地，這是一則取笑耶穌會士的閒話。我在波士頓的初學院時，就聽說了這個地方的大名，終於現在有機會親履斯地，還真的是差一點被大風給吹倒了，很是興奮。

另外，當年的旋風之旅，當然也錯過了莊嚴肅穆的聖依納爵大教堂（Church of St. Ignatius），更別提壓根兒不知道有三位耶穌會的聖人，埋骨於此——聖磊思·公撒格、聖若翰·伯滿和聖羅伯·伯敏。聖伯敏，就是前面提到的，磊思的神師輔導，是十六世紀著名的神學家、學者及樞機主教。他在去世之前，要求與這位聖潔的磊思同葬在一處。

聖依納爵當年的住所，在耶穌聖名堂的隔壁。他的幾個房間，最近才整修過，恢復了當年的面貌，非常地簡樸，但都空置著。內部的擺設，是依納爵撰寫《會憲》時，所使用的一張桌子和一個椅子，另外，還有一個依納爵的半身銅像，而其底座的高度，也考據了傳記作者的說法，以顯示他實際上的矮小身軀。

我也去了城外一個名叫拉斯道達的小鎮（La Storta），參訪一座赫赫有名的小教堂——聖依納爵在此小堂內有一個神視。在神視中，天主說：「在羅馬城內，我將使你順遂。」

現在羅馬的耶穌會初學院內，有一座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築的聖安德小聖堂（Church of Sant Andrea al Quirinale），是著名建築師吉安·勞倫佐·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所設計。教堂的樓上，是聖達義·葛斯加的紀念堂。覆蓋在他墳上的大理石雕塑，重現了他臨死時的景況——斜臥在床上，除了會衣的長袍是黑色的大理石之外，其餘的都是白色的大理石——剛踏進屋內時，我

還真的嚇了一跳。耶穌會的藝術史學家麥納比（C. J. McNaspy），和我的感想類似：「這個雕像，我覺得是個敗筆。人家會以為，這位年輕人的生前，痛苦得不得了。」

聖磊思當年在羅馬城的住所，是我心中急切盼望去參觀的。它位在聖依納爵教堂側邊的一棟建築內。這棟建築，現在已是個歷史古蹟，是西元 1551 年，耶穌會當初為推廣高等教育而創辦的羅馬學院（Roman College）的所在。

那天的大清早，人家就吩咐我，記得要去找一位值班的神父借鑰匙（聖磊思的房間，平時是上鎖的）。於是，我先參觀教堂的內部，步履輕慢地順著中間的走道下去，仰頭張望繪製在天花板上，有關依納爵生活的全幅大壁畫，那是十七世紀的一位耶穌會修士安得里亞·波佐（Brother Andrea Pozzo, SJ）的大作，在細節上非常寫實，而對於景物的透視手法，讓人感覺宛若就在實景的面前。遠方的景和物，襯托在陽光普照的義大利碧藍的天空之中，而逐漸地消失在朵朵白雲和前來迎接的眾天使及諸聖人的行列中。

一位光頭的耶穌會士，站在中央走道的最前方，正在唸著他的日課。我輕步上前，以我有限的義大利文拼湊著幾個關鍵性名詞——路易、公撒格、房間、參觀、鑰匙……他笑著點了個頭，從口袋裡掏出一串鑰匙遞給我，並指了一下方向。搖搖晃晃的古老式電梯，把我帶上了三樓，出了電梯，穿過一個門，唉，怎麼走到房外去了。橫在面前的是一座窄小的小鐵橋，跨越到對面的建築物，連接上那棟古老的樓房，老「羅馬學院」。我走過這座看起來不甚牢固的天橋，推開羅馬學院三樓的外門，沿著長廊走下去，不久，就看到一扇門邊上的指示牌，「聖磊思·公撒格的

房間」。

在興奮中，我掏出了口袋裡的那串鑰匙。在非洲兩年的生活中，我多次向聖磊思禱告，受到他代禱的恩寵和鼓勵，今天終於能來拜訪他當年的居所，也算是答謝報恩的一個特別的方式。站在房門口，我的朝聖之旅，即將實現了。

突然間，有人在另一頭大喊，「喂，喂」。我的鑰匙還沒來得及插進門鎖內，就看到一位紅臉的義籍會士衝了過來：「門是鎖上的。」我還沒來得及結結巴巴地說出那幾個關鍵性的義大利文，他就一把奪走了我手上的那串鑰匙，往前繼續走，穿過我剛才進來的那一道門，消失了。

我著實楞了好一會兒，再扭轉一下門把，確實是鎖上的。幾步路之外，還有一個房間，是聖若翰·伯滿的，也上了鎖。

我大惑不解，悶悶不樂地走回教堂，又遇見了那位借給我鑰匙、光頭的老神父。他問我，參觀得如何。慌張中，我用英語回答：「我沒進去，有人拿走了我的鑰匙。」正巧，那位紅臉的會士穿過了走道，我就指指他：「他是這裡的長上吧？」光頭的老神父挺直了他的腰，說道：「我才是這裡的長上。」說完了這話，他從口袋裡又掏出來一串一模一樣的鑰匙，微笑著遞給了我。

循原路回去，再度來到那個房門口，鑰匙插進門鎖，終於沒有人阻攔了。

我原先以為，這個房間一定和先前參觀過的依納爵的房間一樣，樸素而簡單。誰知道，正好相反。一座大理石的巴洛克式大祭台，幾乎占了一面牆的位置；一幅聖人的油畫像，吊掛在其上方。四面的牆壁，都罩在厚重的、紅色錦緞中。牆壁上，另掛著許多小幅的有關聖人的生活畫像。另一面牆的邊上，立著一個大

玻璃櫃，吊掛著聖人的會衣和他的私人衣物，以及私人用品。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都是歷代以來的景仰愛慕者，陸陸續續奉獻的成果。

靜靜地在這個古老的房間內，我雙膝跪下在祭台之前。熙熙攘攘地過了兩年的奈洛比生涯，此時，我首度覺得，身處在與外界隔絕的、寂靜的場景之中。腦海中念及，數個世紀以來，多少的信友祈求他的代禱。做為青年人的主保聖人，他一定曾經傾聽著年輕的學子們——請幫忙考試順利；困難的報告要完成；難纏的老師要應付。一個世代接著一個世代的青年耶穌會士，禱聲不停歇。因著他疫疾受害者的身分，多少男男女女的愛滋病患，祈求他的代禱。而對我兩年來東非生活的代禱，豈敢或忘。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竟收到了一份禮物——即聖依納爵所謂的「熱淚之禮」（gift of tears）——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暗自思索，這個情緒來自何方？步步為營、處處提防小心的兩年非洲的工作，終於完成了，是為能安全返回的慶幸？還是，懷念那些在肯亞結識的新朋友？抑或為了感謝磊思不斷地代禱？我望一下手錶，時間匆匆居然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為何人們會被某一位聖人所吸引？為何這些聖人的一生行誼，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和我們的大相逕庭，但卻能夠向我的心靈訴說？這種被一位聖人吸引，或是對某一位聖人特別地敬禮，這種狀況，似乎很難解說得清楚，套一句老生常談的話——這是一個奧蹟。既然如此，面對這種對聖人的敬禮之情，我們就應當尊敬地看待它。因為，它是在神修生活上的各式恩寵——天主所給的，驚奇的禮物——不是人們能心想事成的。

17

聖寵滿被

聖母瑪利亞
(Mary)

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

——傳統的祈禱文

是在什麼時刻首次接觸到聖母瑪利亞 (Mary)，就像大多數的天主教友們一樣，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天主教文化的這塊大錦繡之中，瑪利亞被縱橫交錯地編織在內。

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我臥房的衣櫃上，放置了一個紙雕的製品，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著名的大理石雕像——聖母慟子 (*Pietà*)——的一個複製工藝品。白色硬紙板製作的剪影雕像，在深藍色的背景襯托下，雖是昏暗的臥室，它仍微閃著白光，隱約可見。西元 1964 年，在紐約市的世界博覽會 (World's Fair) 上，特別展出了這尊梵蒂岡珍藏的大理石原件。我的祖父母當時買了紙雕工藝品，送給我做紀念品，我也曾跪在它的前面禱告。數年後，在母親購買的一本超大型的藝術書籍內，我才看到真正大理石的那尊雕像的照片，悲傷的瑪利

亞抱持著已經死亡的愛子耶穌，真的很難跟我的那個小紙雕像聯想在一起。當時的我，只知道放在衣櫃上的，是一種聖像，我要乖乖地在它的面前祈禱。

我的本堂是主顯天主堂（Epiphany of Our Lord），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普利茅斯米丁鎮。在教堂內有好幾座聖母像，其中，就有米色大理石的「聖母慟子」雕像，尺寸略小於原作，放置在靠祭台的牆邊上，後因聖堂改建，移到權充臨時聖堂的堂區小學（parish school，譯者註：因歷史上的因素，美國的本堂區幾乎都有隸屬的堂區小學）的體育館。就是在這個臨時聖堂內，我初領聖體和堅振聖事。堂區信友日增，也籌夠了建堂基金，新聖堂終於在西元1966年落成了。它是棕色磚砌的建築結構，挑高、類似穀倉的木製天花板，四周綴飾著亮麗的彩色玻璃窗，而在進口口的彩色玻璃圖案，就是標幟著本堂之名的「三王來朝」——身穿寶石紅和深藍色長袍的瑪利亞，懷抱著粉紅小臉蛋的嬰兒耶穌，而身著橘色和紅色袍的若瑟，以及三位東方來的賢士，恭立於前，朝拜耶穌。那尊大理石的聖母慟子雕像，當然也移駕回到新堂，置放在祭台的左邊，襯托於金色的地氈和沿牆的掛氈之中。

我初領聖體的紀念，是父母送的一串玫瑰念珠，附有一本如何唸玫瑰經的小冊子。念珠掛在我睡覺的床柱上，晚上我大翻身的時候，黑色的珠子就會跟著呱呱作響。有時候睡不著，我就抓起念珠，重複地唸著〈聖母經〉，不知何時就迷迷糊糊睡著了。早上，從床上跳起來，那串念珠早就不知道糾纏到床單和被單堆的哪裡去了。結果，總是在我上學後，母親來整理我的房間時，它掉落在地上。有一次，母親的吸塵器輾過它，把它吸了進去。就好似，附身在那一台老舊的胡佛牌吸塵器內的魔鬼，嫌惡我的

好念珠壞了牠的事似的。

母親嚇了一跳，趕緊打開吸塵器，從集塵袋中摸出這串念珠，清掉灰塵，銜接好折斷的鏈子，掛回我的床柱上，但是，少了三顆珠子。後來，我把這串念珠拿給妹妹瞧一瞧，她還打趣的說：「這樣，你禱告的時候，就會省一點時間了。」

漸漸長大了，對於瑪利亞的敬禮，也沒有更多些。上中學的時候，幾位猶太教的同學，流行戴掛有希伯來字「生命」（chai）的金屬牌子。因此，我也要求父母給我一個聖母顯靈聖牌，因為班上好幾位信天主教的同學都是掛這一個聖牌。在這個金屬牌子上，中間是瑪利亞的像，在像的四周，環繞著一行字——「噢，瑪利亞，始胎無染原罪，請為我等求助者代禱。」當時，我不太懂「求助」（recourse）的意思，心想，大概是某種的幫助吧，對我來說，那就夠了，毋庸再深究。

聖誕節時，我收到了這份要求來的禮物，它是一個銀質的聖牌，我立刻就掛在脖子上，只有每週的游泳課才取下來。夜間，在床上多次翻身，偶爾，脖子上的鏈條會把我勒醒了。我掛著這個顯靈聖牌，到處跟人炫耀，但也僅只是那種跟同儕看齊的時尚心理，並未因而增加對瑪利亞的敬禮之情。後來，我才得知，根據傳統的說法，顯靈聖牌會保護佩掛者免於不純潔的思想（這好像對我無效）。

但是，每次要為某件事情禱告時，我總是唸著〈聖母經〉。要考試考得好，求天主幫這個忙，為了證明我的這份渴望，我會反覆地唸好幾遍〈聖母經〉。愈是企求心切，唸的遍數就愈多。

現在再回顧往事，我自己也有點奇怪，為何當時沒有用〈天主經〉來祈禱，那可是耶穌親自教導的「完美的禱文」呀。也許，

是因為〈聖母經〉的禱詞，具有韻律性的節奏，容易朗朗上口吧！在大的考試，或者學校的樂隊練習有我獨奏的部分，那一天的早上，在上學的路途上，我會唸上幾遍的〈聖母經〉，作為我的禱告，腳上的球鞋，還會跟著經文的韻律，一路上打著拍子：

Hail Mary, 萬福瑪利亞
full of grace, 滿被聖寵者
the Lord is with thee …… 主與爾偕焉……

（譯者註：這是〈聖母經〉的英文字句，讀者可藉以想像出作者所謂的「韻律節奏」）就是這個樣子，從小學、中學、大學、就業，一路下來，我一邊走路，一邊唸著〈聖母經〉禱告。

雖然如此，瑪利亞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是一位遙遠的存在者。沒錯，我會誦唸她的禱文，以求恩典；而她的玫瑰念珠，也曾幫助我平安地入睡；她的禱文也陪伴著我，在人行道上前進。但是，瑪利亞是活生生、真真實實的一個人的觀念——她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的進程上，提供可效法的榜樣，而非一位半神奇的形象人物——卻一直要等到多年之後，我進了耶穌會的初學院，才能心領神會。



我的玫瑰念珠——初領聖體的紀念品，從吸塵器救了出來，少了三顆珠子的那一串——是隨著我進耶穌會初學院的少數私人用品之一。雖然不確定是否用得上，但至少帶著它是有意義的——我希望能夠適應並融入這又一次挑戰的一個外在的標記。我

希望其他的初學生不會認為，我是那一類老古板式的、虔誠過了頭、或是有點兒迷信的人。

顯然，擔心是多餘的。大部分的初學生都隨身帶有念珠，而且，他們對於瑪利亞在人類的救恩史上和一般信友生活上的角色，比我了解得太多了。跟隨著教會的禮儀年度，在會院內教堂的每日彌撒中，我聽了大量的、對於瑪利亞的禮讚。

對瑪利亞的禮讚，一個接一個，在我來說，是一個又一個的驚奇——它們展現出，瑪利亞是一位真實的血肉之人，而非冷酷又遙遠的存在者。在一篇禮讚中，瑪利亞被視為「（耶穌的）第一位門徒」：第一位接受天主聖言——耶穌——的人；第一位宣報耶穌即將誕生的喜訊的人，聖母領報後，即往訪她的表親伊撒伯爾。在另一篇禮讚中提到，瑪利亞在領報時讚頌上主的〈頌主曲〉（Magnificat），以先知的口吻宣告，上主將拯救她的同胞。還有一篇禮讚，我們視她為「祈禱者」——瑪利亞這位靜觀者，如《路加福音》的文字所形容的，「將這一切默記在心中，珍藏著」。再有一篇，稱讚她的富有機智、隨機應變——很年輕時，就已懷孕生子；隨著若瑟，懷抱著嬰孩，一起逃難他鄉異地；在困苦的環境中，養育兒子；經常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驚嚇、不確定和奧祕之中——全靠她的信仰，才能夠一路走來。

此外，在閱讀的書籍中，我也碰觸到她的某些神學上的榜樣，率皆源自於她在她兒子生命中的角色：為所有尋求把耶穌「帶給」這個世界的人，瑪利亞是一個楷模；瑪利亞，是把我們「指向」耶穌的人（在福音書的記載中，她最後一次的發言是，「無論祂吩咐你們什麼，你們都照著做」）；天主一直持續著在這個世界的救贖工作，瑪利亞就是一個標記；我們引用神學家伊麗莎白·

強生的話來說，天主對於「祂立了盟約的子民有永不磨滅的大愛」，而瑪利亞就是一個象徵。

然而，因著某種的理由，導引我本人對於耶穌的母親，真實地孕育出一股孺慕之情的重大轉折，是在《路加福音》中記載的那一段「聖母領報」（Annunciation）——天使聖佳播（Gabriel）來訪瑪利亞的那一幕。

這則故事，我曾多次聽聞，但都沒有認真地把它當成一回事。中學和大學的時期，我覺得《路加福音》的這段描述，幻想的成分居多，難以令人相信，倘若要應用在我的生活上，那就更難了。進了耶穌會的初學院，當我首次在彌撒中聽到這篇福音的章節時，感覺上像是第一次聽到似的，而且有著一種令人驚訝的壓迫感。彌撒後的晨禱時，它不斷地在我的腦海裡回響著；它盤據了我日間的思緒，成為我晚間默想的焦點。

好長的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思索這件事：到底「聖母領報」這個事蹟，有何等的內涵，以至於擄獲了我，以及眾信友們。

《路加福音》上的這一段簡短敘述，為何能成為古往今來、多少的藝術——繪畫、雕刻、馬賽克磁磚畫、大型壁畫等——創作的主题？它吸引了歷來多少偉大的藝術家的目光，超越了聖經新約中的其他故事，而與「耶穌誕生」以及「耶穌被釘十字架」，並列為最受歡迎的主题。

也許有人會爭辯：還有許多耶穌生平的事蹟，更具有神學上的重要性，譬如，顯奇蹟的那些故事、治癒病人、講道等等；新約中有許多的章節，對於教會的生活而言，更具有關聯性，譬如，任命伯鐸為教會的領袖，餵飽了五千人的聽眾等；對於信徒的精神生活而言，福音書中還有更多、更具意義的故事，譬如，「山

中聖訓」。為什麼《路加福音》第一章中的這一幕，如此特別地扣人心弦呢？

或許，就是因為在這個事蹟中，天上的神聖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現身在我等日常生活中的緣故：一個小鎮上，在一個簡陋的屋子內，天主向一位年輕的女子問候。或許，它凸顯婦女在天主神聖計畫中的特殊角色：瑪利亞完成的事，是男人家做不到的。也有可能是，瑪利亞立下了一個標竿型的榜樣，因而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信友們，極思迎頭趕上：謙遜、服從、慈愛、信靠。

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我個人還有一個特別的理由：似乎在這則福音故事中，瑪利亞極為傳神地彰顯了日常生活中一位信友的角色。

這則事蹟，周全地描述了一個人與天主的關係是如何地成長——那也是在初學的最初幾個月中，逐漸發現而領悟的。在依循這種領悟的實踐中，這則事蹟提供了神修生活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

首先，讓我們來看整個的事蹟，它發生的主動性乃是操之於天主。天主，經由聖佳播天使，開始了與瑪利亞的對話——「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天主在我等生命中的作為，亦復如此。祂主動地先找我們來對話，通常，是以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們驚訝地發現自己，因為某種場合或狀況，而被感動得流淚；寒冷而多雲的日子裡，乍現一抹煦麗的夕陽落日；期待許久的被寬恕，竟在耳邊響起；出奇意外地，接到了一位好友的來電。在這些的狀況中，在我們感性回應之中，驚訝地意識到了天主的臨在。經驗到某種的「渾然不知、毫無頭緒」的狀態，某種的不由自主，某種超凡入聖的感觸。

總之，是天主主動地來找我們，祂的臨在讓我們嚇了一跳，就如同對瑪利亞的那一幕。

在首度經驗到天主的臨在之時，瑪利亞的反應是，害怕，或者在不同的翻譯用辭上，是困惑的。這不也是我們的反應？當我們首度遲疑「天主會這樣地和我溝通嗎？」之時，我們會產生「害怕」或是「困惑」。在面對天主大愛的顯現時，我們會覺得自己不配，那是因為，神聖的臨在照耀出我們人的有限性。

聖經的新約和舊約中，記載了許多類似狀況下的人物，他們在天主的面前，覺得自己不配。讓我們打開《路加福音》，看一看那一段關於伯鐸和他的同伴在捕魚時的遭遇吧！忙碌了一整晚，沒有捕到魚，而耶穌卻要求他們再度撒網。奇蹟發生了，滿網的魚，快要撐破網了，伯鐸突然地覺悟到，站在他面前的這個人是誰。面對默西亞的臨在於眼前，伯鐸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不配——「主，請祢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

既敬且畏地面臨天主的尊威，我們會震懾於祂那極其美妙的巨大奧祕之中，既吸引我們上前去，又令我們懼怕而卻步。

在某一次的避靜中，我曾強烈地懷疑過我的聖召之路。行走在美國新英格蘭的海邊沙灘之上，我掙扎思索著——我去宣發「貞潔」誓願之後，還能夠經驗到「愛」嗎？是否將會淒涼寂寞？以後，我一生的意義，就是要持守「貞潔」？

剎那間，進耶穌會修道以來，我多年期間的種種人際交往的回憶，一一湧入我的腦海之中——那些我認識和喜愛的朋友們；殷勤照顧過我的幾位神師；各個耶穌會院內、手足情誼的弟兄們；那些聖潔的神父們、修士們、修女和教友們——全都是在成為一名耶穌會士後所遇見的，否則，哪有可能見到他們。我立即領

悟到了，這就是答案。對我在質疑的問題的一個非常清楚的回答——我的聖召，不僅是我愛天主的一個方式，天主也經由它來愛我。這個清楚的領悟，就是天主回答我的「Yes」。

我內心滿溢著感恩之情。然而，同時也對於造物主如此直截了當地和我互動溝通，感到焦慮不安和害怕。真的很難調和這兩種感受。

這個深具有代表性、人性上的害怕的經驗，在聖經中屢屢可見。讓我們翻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在那地區，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羣，「上主的光耀環照著他們，他們便非常害怕」。這是依照「新修定的標準版本」，而西元 1611 年出版的「英王欽定版」聖經的譯文，那就更傳神了——「他們嚇死了」。

在如此人性本能上的反應中，天主對這些畏縮的人們，傳達了相同的訊息：天使向牧人說，「不要害怕！」；在漁船上，對既害怕又困惑的伯鐸，耶穌也說了相同的話：「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天主見到了我們的害怕，也明瞭它。

在「聖母領報」時，天主也明瞭瑪利亞的反應，因此，聖佳播天使對她說，「不要害怕」。

天使又進一步地陳述了天主對瑪利亞的要求和說明（英文的 Angel 字，源於希臘文的 Angelos，其原意為「傳話者」messenger），「妳在天主面前獲得了寵幸。看，妳將懷孕，並產下一個兒子。」再度地，類似的場景也發生在我等的生命之中。在回顧與天主交往互動的經驗時，天主對我們的要求，會逐漸更清晰地看出來。為當父母的來說，首度懷抱一個新生的嬰兒，是一個鮮明的、與主相遇的經驗。許多這一類的新手爸媽們，曾和我分享他們的經驗。在感謝之餘，也有著害怕的感覺——要如何照顧這

個小孩？嬰兒生了病，怎麼辦？然而，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都會清楚天主要求他們的是什麼：愛你的小孩。

住在鄉下的地方，也許不識字，但她是一個很實際的年輕女子。依照路加的記載，瑪利亞反問道：「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是個童貞女。」

在領報事蹟的這一個層面上，或許，對我們大多數的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一個景況——在吾人生命的過程中，誰未曾質疑過天主的旨意？在面臨生命的幅度必須斷然改變的要求時，誰又未曾質問過：這怎麼可能是天主的計畫？

誰未曾向天主回覆：「這事怎能成就？」誰未曾質問祂：「為什麼是我？」

經常，天主答覆我們的方式，如同聖佳播天使回答瑪利亞一般。天使提醒瑪利亞去注意，那些天主的許諾已經實現在她的生命和其他人生命上的某些標記，「看，妳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現在已經六個月了，而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面前，沒有不能的事。」請想一想，天主能做什麼事，而祂已經做了什麼事。

我在給人做神修指導時，常會遇到這樣的場景——陷於困境者，質疑天主是否在陪伴他；某人失業了、父母或朋友生了重病、失戀了等的狀況中，甚至於熱心的教友都會開始質疑，天主是否臨在於他的生命中。通常，我會反問一句話：「那麼，在過去的歲月中，天主曾與你同在嗎？」停頓下來，再思索一下，常常是類似的回答：「對噢！每當我覺得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都會發現，是某個人或某樣東西幫了我的忙。我真的覺得，天主在那個時刻是與我同在的。」

幾年前，我在編輯一本書《我如何能發現天主》（*How Can I Find God?*）的時候，曾向許多的名人邀稿。我要求他們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有人問你「如何發現天主？」你會怎麼回答。回函中，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個說法，是來自當時耶穌會的總會長，荷蘭籍的柯文博神父（Peter-Hans Kolvenbach）。他的那篇回答，更能在這裡闡釋瑪利亞和天使之間的互動關係。

從羅馬總部寄來的這封回信中，柯神父先講了一則某修道院院長的小故事。這位聖潔的院長經常向院內的修道士們講述，發現天主、找尋天主、與主相遇等主題。有一次，一位修道士就詢問院長，是否本人曾有過與主相遇的經驗。在一陣窘困的沉默之後，院長承認，他本人沒有過這種直接與主相遇的經驗。接著，他闡釋道，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舊約的《出谷記》（*Exodus*，或譯：《出埃及記》）中，天主開口向梅瑟說：「你不可以正面地看我的臉。」可是，天主也曉諭梅瑟，在祂的榮耀走過他的面前後，他可以望著祂的背部，「你會看到我的背影」。因而，藉著回顧過往的時日，這位院長能清晰地看到，在他的生命中「天主走過的痕跡」。

柯神父來信的結論，是這樣說的：

就這一層面的意義來看，與其說某一個人去找尋天主，倒不如說是，這個人允許自己在生命的各種狀況中，被天主找到；在那些狀況中，天主未曾停歇祂的腳步，而且，在走過了之後，會讓這個人認得出來：「你會看到我的背影。」

經常，單純的一個動作——回首眺望生命的來時路，過往的某一段時日，也許上個禮拜或是昨天——你很容易就能看見天主的曾經伴隨，「是的，天主就在那兒」。發現天主，是一件單純的事，藉著一個回憶，或是一個留意。

本質上，天使向瑪利亞做了相同的告白。注意看一看天主曾經做過的事，和祂現在正做的事。妳看一看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現在已經六個月了，而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有一位學者珍·沙博（Jane Schaberg）如此闡釋道：「藉著平反了伊撒伯爾的羞辱，而顯示出，在天主面前沒有不可能的事。」

在如是地回顧反思之後，瑪利亞就能對天主這個奇特的要求，說「Yes」——「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吧！」

瑪利亞答覆，出於她完全的自由意志。吾人亦然。天主會邀請我們參與祂的計畫、來跟隨祂、和祂一起創造，可是，決定權操之在我。你可以自由地答覆「Yes」，或者「No」。

於是，瑪利亞成了全能者的夥伴，被賦予力量，將耶穌帶到這個世界上。而關於這一關鍵性答覆的重要性，聖納德（St. Bernard）在他的一篇講道詞中，闡述道：「因這一個字（Yes）的答覆，她接受了天主聖言。說出你自己的話，以孕育神聖的『言』。呼出一個會消逝的『語言』，去擁抱一個永不消逝的『言語』」（譯者註：Word（大寫英文字）意指「天主聖言」。茲抄錄英文的原文，以便能欣賞這個講道詞的鏗鏘有力：Answer with a word,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Speak your own word, conceive the divine Word. Breathe a passing word, embrace the eternal Word.）。

同樣地，在生命的轉捩點上，藉著「Yes」的答覆，我們也被要求，在我們自身之內孕育天主的聖言，而把基督帶到這個世界

上——當然，不是瑪利亞的那種方式，而是依照我們所處的情況。使用我們個人的才智能力，我們被召叫，去把基督帶給其他人的生命。

《路加福音》精闢地描述了聖佳播和瑪利亞的對話，完全可以借鏡在我們的神修生活上——天主主動地展開與我們的對話；起初，我們猶豫、害怕；我們尋求去了解天主的發言在我們生命上的用意；天主提醒我們，要留意我們的經驗；倘若，我們選擇用「Yes」答覆天主，將把新的生命帶給這個世界。

整個事蹟還沒結束哩，幾個月前，我有機會和珍妮絲修女討論這段福音章節。在討論將近尾聲之時，她問我：「如果你把聖母領報的內涵，借鏡到個人的神修生活上，那麼，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部分，你遺漏掉了！」

她在說些什麼？我完全沒有頭緒。

看穿了我內心的狐疑，她笑嘻嘻的說道：「天使便離開她去了。」接著，珍妮絲修女又闡釋道：「我們遇到的狀況，不也都是這樣嗎？在與主相遇之後——無論那是怎樣的情況——我們就要獨自去實踐那個被要求做的事。雖然，天主仍然是與我們同在一著，通常，我們似乎是孤獨的。在耶穌誕生之前，誰知道瑪利亞曾經與天主有如此深刻的相遇呢？」

珍妮絲修女說得好。這是最困難的一個部分：要全心信靠天主曾跟我們所說的話語。這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談到信仰這個層面，瑪利亞和聖佳播天使相遇的事蹟，是如何為人所知的，頗耐人尋味，這個聖母領報的事蹟，對於成人的

信友來說，是一個挑戰——就如同歷來聖人們的事蹟，有許多是難以理解的；更別提聖經新、舊約故事中，那些令人費解的情節。

譬如說，傳說中有一則有趣的故事，是關於聖奧斯定試圖理解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有一天，在百思不解這個奧祕的道理之餘，奧斯定到海邊去散心。在那兒，他看見一個小男孩，很有耐性、來來回回地從大海裡舀水，澆灌進沙灘上挖出的一個小洞中。奧斯定觀察了好一會兒，終於按捺不住，因而詢問這個小男孩在幹什麼。

小男孩不慌不忙地答說：「我要把大海裡的水，都灌進這個洞裡去。」

奧斯定立刻糾正他：「那是不可能的事，這個小洞怎麼可能裝進整個大海的水！」

「那你的腦袋裡，也裝不下天主三位一體的奧蹟！」是這個小男孩的回答，而奧斯定也立刻醒悟，是一位天使在跟他說話。

這一則故事，我們要怎樣去了解它呢？真的是天使在跟他說話嗎？一千六百年之前，確實有這樁事情發生了？它是否發生過有關係嗎？

這則故事，或許是千真萬確的。更可能，它是一則熱心信仰的傳說。或許，故事的核心內容是真實，其他部分則是穿鑿附會的情節。又或者，是奧斯定的友人，見到他如此地鑽研「三位一體」的道理，因而給他的一種開示。可以肯定的是，這則故事傳達出「三位一體」這個重要的真理，而且，奧斯定企圖要理解這個奧蹟。但是，問題仍然存在：何者為傳說，而何者為事實？

依照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傳統，經書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天主經由它而把自己顯示給我們人類——經由舊約中，天主和猶太人

民互動的事蹟；經由新約中，耶穌天主子在我們人類中間生活的事蹟。如同神學家所說的，經書是我們的「救恩史」。新約中關於耶穌生活、死亡與復活的事蹟，起初都是在信徒間口耳相傳的，後來才編輯成四部福音書。而每部福音書的作者——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因強調耶穌的不同層面，而略有不同。這就像不同的四個人，分別述說某一個人的故事時，因著要凸顯出這個人某些不同的性格特質，而對此人生平的各個事件有所取捨一樣。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人的敘述之下，倘若彼此有些差異，此乃顯示出故事主人翁有著複雜的多面性，並非敘述者有意誤導聽眾。

因此，這四部福音書描繪出了一個完整的耶穌圖像。我的一位神學教授就曾經這樣說，新約聖經給我們提供了「整個耶穌生平的輪廓」。

話雖如此，但細究起來，卻又不是包含周全的完整，或是，全然地無誤。比較這四部福音之間，有某些連貫性的不協調，而由於他們都不是專業的史學家，因此，在某些的細節上彼此有些出入。最具體的例子是，依照《若望福音》的敘述，耶穌的三年傳道期間內，至少到過耶路撒冷五次，可是，其他三部福音書只記載了一次。何者為正確？《路加福音》和《瑪竇福音》中，記載了許多有關「嬰兒時期的耶穌」的事蹟，然而，若望和馬爾谷卻都隻字未提，為什麼呢？在某些福音書中，耶穌用比喻來闡釋祂的道理，雖然門徒們聽不懂，祂卻不再加以解釋。在另外的福音書中，祂卻是憐憫門徒們的不解，而詳加解說一番。到底耶穌的哪一種態度是真實的？就這四部福音的內容來看，還很難論定。

在如此這般的情況之下，總而言之，在閱讀聖經之時，必須

理智和信仰兼備。

我們看待聖母領報的事蹟，尤其要保持這樣的態度。我曾對《路加福音》上這段記載的精確性心存疑慮——事情真的是這樣子發生的嗎？幾乎所有的聖經學者都指出，這段福音記載的原始資料，難以追本溯源。畢竟，除了瑪利亞之外，誰能知曉這個事蹟？

多年來，在閱讀許多神學家的見解，和我自己在《路加福音》這段章節的多次默想之後，我相信：瑪利亞的確是與聖佳播天使有這個相遇（大致上，如章節所言），或者，她的確是與聖神有一種戲劇性、獨特性的相遇，但只能使用天使的概念——依照猶太人信仰傳統上的天使與神聖訊息的說法——來表達。瑪利亞的這個經驗，套用路加的說法，一直珍藏於內心之中，直到她愛子的死亡與復活之後，一切的事情終於真相大白了之後，才拿出來和耶穌的門徒們分享。因此，這個事蹟，和耶穌生平的其他事蹟一樣，口耳相傳地流傳開來，但特別地被路加所屬的這個信友團體所珍惜，因此，路加就把它放在他所寫作的那部福音書之中。

縱然，僅憑著我的理智，未能全盤無誤地認知這段記載下來的事蹟，我的信仰卻告訴我，它基本上是真實的。我還是喜歡引用神學家伊麗莎白·強生的說法：「我們無法進入瑪利亞個人真實的宗教經驗之中，但是，我們能簡單明瞭地說，藉著聖神的力量，她與活生生的天主奧祕相遇了，那是她生命中賦予人恩寵的天主，是她猶太同胞的救贖智慧。在此相遇中，就默西亞來臨這件事而言，事已成定局了。」



以下是聖母領報的事蹟，抄錄自《路加福音》第一章。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聖佳播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到一位童貞女那裡，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天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聖寵者，上主與妳同在！」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天使對她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妳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妳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取名叫耶穌。祂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祂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祂的王權沒有終結。」瑪利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麼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天使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且看，妳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本月已六個月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瑪利亞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罷！」天使便離開她去了。



在聖母領報這一事蹟的默想祈禱之後，我發現自己益發地嚮往瑪利亞，她也開始出現在我的使徒工作上。藉著眾多受苦受難的信友們對瑪利亞的熱心敬禮，我和她相遇——一位老婦人，躺在波士頓一所醫院的病床上，在一輪接著一輪的病痛發作中，手上始終緊握著一串玫瑰念珠；一位無家的流浪者，在波士頓的街頭上跟我說，「瑪利亞是我僅有的母親」；一位失業的年輕女子，

在芝加哥市和我的談話中提到，她每天晚上都向瑪利亞禱告，幫她找到一份工作。

更特別的是，我看見瑪利亞的精神反映在貧窮者的面容上，在我的肯亞難民服務工作上，我的工作對象大部分是婦女。和她們相處時，瑪利亞的事蹟，以不同形態浮現心頭。來自盧安達的難民婦女，在隨時要面對重大變化以及不可知的未來的情況下，扶養照料她們的小孩，讓我看見了避難埃及的瑪利亞。在重重困難之中，貧民區內一羣來自烏干達的難民婦女竭盡所能地維持生計，讓我看見在納匝肋的瑪利亞。當來自衣索比亞的母親們哀悼那些死於愛滋病、痢疾、營養不良和暴力衝突中的子女時，我看見了在加爾瓦略山上的瑪利亞。

在耶穌會的養成教育接近尾聲之時，我已經多次和瑪利亞相遇，在我的不同類型的各項使徒工作中。



耶穌會的讀書修士，在專攻神學的期間內，要每週安排十個小時的課堂外的使徒工作。這項計畫的目的，不僅是未來各項全職使徒工作的預先實習和體驗，更是要讓我們這些讀書修士，在探索天主的本質、聖寵的奧祕、善與惡等神學上的各種概念之餘，能有機會把課堂上的所學，對照在社會現實生活的難題之中。

有人選擇在本地堂區的服務；有人到教會的小學去工作；也有人乾脆把這些時數，集中在暑假期間來運用——譬如，到阿帕拉契山區的避靜院去做暑期服務，而每個週末，各個堂區都會包租大巴士載送來此做避靜的堂區教友；還有一位修士，為附近一所堂區內的貧童們，舉辦了籃球夏令營。

在學年開始時，我就選擇了監獄牧靈——在本地的一個監獄內，擔任輔導神師。我的朋友喬治修士，多年從事此項牧靈工作。從剛進初學院，他就一直欽佩桃樂斯·戴的一生行誼，因此，始終不渝地信守著這份為社會正義而服務的承諾。

塞福克郡感化院（Suffolk County House of Corrections）是一座低矮的水泥和磚造的建築物，坐落於靠近波士頓市中心的地方。此處監禁的人犯，大多和服用禁藥和毒品有關，其他的，則涉及謀殺、偷竊、強姦和兒童性騷擾等罪名。喬治陪同我，到監所辦公室內，辦理登記手續——填寫一連串的問卷，以及照大頭照。經過若干天的個人背景資料調查後，我收到了臨時入監服務人員的身分證明卡（通行證件）。

隔週即開始工作了。進入監所的第一道防彈玻璃門之後，我耐心站上一個狹小的入口處，接受警衛仔細地查驗我的證件，並在我的手上蓋上一個日期章。然後，在轟隆的開門聲中穿過第二道防彈玻璃門，進入監所的內部。

在喬治修士的小辦公室內，我們商討如何分工。我的任務相當具體：帶領教友受刑人每週一次的恭領聖體聚會（包括，一篇精神鼓勵的講道）；去和單獨監禁的受刑人談話；有時在全體受刑人聚集的場合講話；偶爾，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服務或神修輔導。

我發覺，和單獨監禁受刑人的訪談，是最輕鬆的一項工作。或許，這些單人牢房內終日孤寂，非常歡迎有機會和人談話。這和我從前經歷的使徒工作，譬如，醫院的服務（很多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和我說話），形成相當強烈的對比。我站在牢房的門口，隔著門上的小開口，和牢內的受刑人談話。有時，則要跪在地上，透過鐵門下方、遞送餐盤的狹窄洞口，和裡面的人談話。

單人牢房內，是一個大 V 字型的排列，我從這一頭，一個接一個的牢房訪談下去，而從 V 字型的另一頭出去。通常，每一牢房門口，我停留五至十分鐘。除了生病的和睡覺的之外，一般都切望和我談話。如果在某一牢房門口逗留久了一些，其他牢房的人還會抱怨：「神父啊，還有我們呢？」

而和我談話的，則會盡量拖延時間。有一位受刑人每週都提出相同的一個聖經問題來和我談，起先我一直納悶，後來才想通了，他一定是認為，我會為了聖經的緣故，而和他多談談。

對聖經的知識，有的受刑人比我還厲害哩。有一次，我和一位黑人囚犯談話，問到他在「外頭」時的生活如何。這位受刑人一副很憂傷地表示，不管他如何的努力，一直都會做不法的錯事，「我願意去做善的事情，可是，不知怎麼的，卻一直無法做到。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些壞事。」當時，我的神學課程正在研讀聖保祿的羅馬人書信。因此，就跟他提到，他的情況有點類似聖保祿在他書信中的某種描述。這個人立刻答覆我：「那段話的出處，在《羅馬書》第七章。」正是羅七 18-19。我敬謹受教，回到學校上課時，要好好地注意。

雖然，會因臨時狀況而有所變化，但我仍非常期待每週的領聖體聚會。若當天，在監所內有狀況發生（如鬥毆事件），警衛就會禁止人犯來參加，聚會只得取消。在一般的情況下，到了預定的時間，行為矯正官（Correctional Officers，警衛的尊稱）會扯開嗓門大喊：「天主教服務時間！」幾分鐘後，二、三十位男性受刑人就會集中在一處等候著（單獨監禁者，當然不得外出）。

依照禮儀手冊，在分送聖體之前，我會先做一個簡短的祈禱。然後，一位受刑人朗讀一篇讀經，接著，我做一個簡短的闡釋和

反省，也鼓勵他們提出個人的感想和反省。

由於聖經是監所內唯一可以保留在受刑人身邊的書籍，他們經常有機會閱讀它，也因此常能就聖經的內容而發言。他們抓得住經文的要點，尤其是聖保祿有關過犯和得救的談論。許多人，憑其個人的直覺，常抓住人性較陰暗的一面，且為獲得救贖，需要個人的悔改和天主聖寵的幫助。經常，這些受刑人能明察出，聖經上的人物在其人性上的特質。也許是在牢房的閱讀聖經中，花了許多時間和洗者若翰、耶穌以及聖保祿在一起，這些聖者在他們的眼中，比起對於一般的基督徒來說更顯得真實。或許也因為如此，這些受刑人更能敏銳地注意到這些聖者在人性的一面。

將臨期的一個午後，我們在討論《若望福音》有關洗者若翰的一段章節。若翰論及耶穌說：「祂要興起，我必消失」。我詢問眾人，若翰要做此發言，是否很困難？若翰要謙遜是否很難？

立刻，有好幾隻手舉起來了。

有一位回答說：「不，一點也不困難。洗者若翰是屬於天主的人，而一位屬於天主的人，很清楚地知道要謙遜為懷！」

另外一隻手喊叫著：「不，這位老兄，為他很困難哩。若翰就像大家一樣——他想要當一個大人物。每個人都想當大人物。」

又一隻手插嘴了：「到底誰說得對？」

在我想來，這兩個人都說得沒錯。在此番的討論中，我們不經意地碰觸到所謂修道生活上的兩個要素——謙遜與自信。洗者若翰確信他的使命是來自於天主，但也能夠謙遜地認清，他的角色乃是在於為納匝肋的耶穌服務。也就是，在天主內有自信，而在天主面前謙遜自持。

有一次的聖經討論時，有一個無厘頭也放出了一句話：「蛇

會說話嗎？」

「你再說清楚一點！」我想確定一下。

「哪，就在《創世紀》裡的那一段，蛇不是在跟亞當（Adam）和厄娃（Eve）說話嗎？」

在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之前，另一位獄友就急忙搶白：「噢，老兄，別相信那個鬼話！」

立刻，第三位發言了：「我認為，如果天主要那條蛇說話，牠就會說話！」人人都點頭同意。

許多天主教受刑人樂於談論關於瑪利亞的事。有許多人把彩色塑膠珠粒製成的玫瑰念珠掛在脖子上，很難就此而判斷，是出於熱心的敬禮，還是出於迷信，或者另有其原因。多年前，我在牙買加的垂死之家服務時，每天早上都要徒步穿越一個貧民區，沿途上常有年輕人向我索要念珠的珠子。後來我才知道，多彩顏色的塑膠珠串，是幫派成員的標幟，而拘留所內，有許多人脖子上掛著它，也是這個意思。

但也不全然如此。曾有一位年輕的愛爾蘭裔教友，因臨時起意販賣毒品而被捕下獄，他告訴我說，他經常向瑪利亞禱告，因為，他未曾見過自己的母親，而「瑪利亞最了解我」。另一位獄友，把玫瑰念珠放在他的枕頭下。我們兩人曾仔細地討論玫瑰經的十五端奧祕。

在某一次領聖體的聚會上，一個魁梧的大漢向我諮詢，他認為自己唸玫瑰經的方式，一定不正確。

我告訴他，祈禱的方式，沒有「正確」與否，任何方式的祈禱，都能悅樂天主。我簡略地跟他說明，傳統上唸玫瑰經的方法。

他接著就說了：「噢，你知道嗎，那些人說，他們唸一遍玫

瑰經需要半個小時，可是，我只要一分鐘就唸完了。」

一分鐘？他是怎麼辦到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串塑膠製的念珠，一邊用手指撥動珠子，一邊解釋給我聽：「在這些小珠子上，每一顆珠子唸 Hail Mary（英文版〈聖母經〉的開頭第一句，也代表整篇〈聖母經〉禱文），而在大珠子上，我唸 Our Father（英文版〈天主經〉的開頭第一句，也代表整篇〈天主經〉的禱文）。」

「你是否可以表演給我看看，是如何唸法？」

「沒問題。」於是，他閉上了眼睛，開始快速地撥動珠串，「Hail Mary, Hail Mary, Hail Mary……」。

終於真相大白。我好整以暇地向他解釋道，「Hail Mary（萬福瑪利亞）只是〈聖母經〉經文的開頭第一句，接著還有——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我把整個經文唸了一遍，「而 Our Father（我們的天父），也是〈天主經〉的第一句，還有下文哩。」

他的臉一沉：「唉，那不是要一整天才唸得完！」

聖誕節快要到了。監所外的世界，正在興奮、忙碌地預備過節，而監所內的生活，則一如往昔，沒什麼改變。對受刑人來說，十二月份或許還是更為感傷的時刻，思念家人，但不能和他們團聚。然而，對監所內的某些人來說，瑪利亞成為他們光耀的慰藉。

事情是這樣的。幾個月前，我為女監的受刑人辦了一個讀經班。利用她們下午「放風」的時間——亦即可以從牢房出來，集中到一個空地上自由地休閒活動，閒逛或是觀看掛在牆上、肥皂劇式的脫口秀電視節目等——我召集了幾個人，就在活動場地的邊上，放幾把破舊的塑膠椅，大家圍坐一圈。聖誕前的一次讀經聚會，我選定了《路加福音》中兩則關於瑪利亞的故事——聖母

領報和她往見伊撒伯爾——作為閱讀和分享的主題。前一天的晚上，我又多準備了一些材料，萬一她們對於聖經的章節興趣缺缺時，可以用來導引發言。此外，在最近的一次避靜中，我默想了這兩篇的聖經章節，又有了一番新的見解和領悟。

往常，我認為瑪利亞是「耐心等待」和「信靠天主」的好榜樣，因為天使聖佳播向她報告天主的訊息後，她只猶豫了一會兒，就全心接受了。但是，在上次的避靜中，我的領悟是，瑪利亞在領報之初，不盡然是全盤的信靠和心境安詳，而是擔驚害怕和內心困惑不已。甚至於，天使對這個訊息的意義再詳加解釋之後，仍未能讓她釋懷，反而更多的問號湧上心頭——訊息的最終意義為何？我將來會如何？然而，就在面對這一切的不確定時，她做她應該做的事。縱然，對於將來發生在她身上或她家庭的諸般事情，毫無頭緒，她卻勇往直前。這個領悟幫助我看清楚，在某些時候，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順著日常生活的軌跡，繼續生活下去，雖然在自己的內心中，仍充滿著懼怕和困擾。某些時候，甚至於在神修的生活上，有一點兒的擔驚受怕，那是無妨的。

相同的內省，也反映在「聖母往親」的事蹟上，「瑪利亞急速動身出發」，往見她的表親伊撒伯爾。一般的說法是，因為她急著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的表親。但是，依照我的默想心得，瑪利亞迅速出發，是因為她的害怕，因而急切地需要婦女長輩的智慧 and 指導——她該如何是好。

把各種內省的小抄、筆記都備妥了，我遂能昂首闊步地走向我那個小小的讀經班了。

翌日的讀經聚會上，在簡短的禱告之後，我開始朗讀《路加福音》的故事。一共有五位婦女在場，全都是第一次來參加的，

此時全都在竊竊私語地笑著。其中一人，用濃厚的異國口音詢問我：「你會說西班牙話嗎？」

我嚇了一跳，總算明白了——這五位婦女都不會講英文（我的西班牙語，是小學生的程度）。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失望極了。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和精神，準備了如此豐富、精采的省思材料，眼看如今將是「雞同鴨講」了！

我只好用蹩腳的、斷斷續續的西班牙話，解釋一下今天要討論的聖經章節。話剛說完，其中的一位婦女翻開她的西班牙文聖經，開始向大家朗讀這兩篇的章節，她的語調清晰而堅定。

她朗讀完畢以後，我只提了一個問題：「妳認為瑪利亞是怎樣的人？」

接下來，關於瑪利亞的談話，未曾間斷，整整一個小時。

她們的語調，有時快速得像似連發的機關槍，還帶著激情和感情，間或，被笑語聲打斷了一下。以我破碎的語文程度，大致了解的是，她們在談論瑪利亞所遭遇的困境——在貧困中生養孩子，又眼望著愛子的死亡，內心當是如何的悲慟。更多的時候，她們談到，是如何地喜愛瑪利亞，在所有的天上諸聖之中，瑪利亞最了解她們。她們也談論到伊撒伯爾：「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而且老婦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強過那些老頭子——可以向她請教事情，所以，瑪利亞真是幸福，在此亟需之時，有人可以照顧她。有一位獄友還提到，她認識一位老婦人，也是在很大的年紀才有了孩子，她是多麼的高興。

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擺滿了我曾精心預備的筆記，全然派不上用場，整整一個小時，我也無從插嘴。注意傾聽這幾位婦女的談話，我又想到在東非的肯亞服務時遇見的那些婦女們，我又

再一次的體察到，一羣遠比我更加懂得瑪利亞的人們，就在我的身邊。因此，我只能傾聽她們，真的，除此之外，我還能添加什麼呢？



我對於瑪利亞的敬禮，對於天使向她傳報喜訊的這位年輕女子，對於把耶穌帶到這個世界上的這位婦女的敬禮，是聚焦在她是一個血肉之人的層面上——她是如何回應天主的邀請；她展示給我們的榜樣，要如何在大家都認為不可能的狀況下，依靠信德而生活；如何在最困難的狀況中，堅持不懈；她是如何地信靠天主；她是如何地愛了人們。

我也非常地敬禮「天主之母」、「可敬的貞女」——現今和她的愛子樂享著全新的生命、傾聽我們的禱告、為所有人不斷代禱的這位婦女。我敬禮這位玫瑰經祈禱的婦女——我生平的第一串玫瑰念珠，仍在我身邊珍藏著，它時時刻刻提醒我，要保持我的信仰。這份信仰，間或受損、遭受打擊、經常是不夠完美的；然而，不管怎麼樣，它還是完整的，生根於我的童稚期，持續成長到現在，一直在天主的創造和永不止息的大愛的光輝照耀之下。

18

人人當成聖，各個皆精采

結語

我要從諸聖的身上擷取他們德行的精髓，而不是他們的表相。我又不是聖磊思·公撒格，他獨特的修德成聖之道，不是我必須要照單全收的。我追尋成聖的道路，必須依照我自己的本性、個性、不同的生活條件來決定。一個聖者的榜樣，無論它是多麼的完美，我一定不是他一成不變的翻版。天主熱切盼望我們跟隨諸聖的芳表，吸取他們德行上的精華，融入於我們自身的血肉之軀中，並以每個人獨特的能力和環境，再加以調適。要是聖磊思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那麼，他修德成聖的路徑，肯定會有所改變的。

——摘自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心靈日記》

在我讀神學的時候，教我們天主教會歷史的是若望·歐馬力教授（John O'Malley）。在冗長而又旁徵博引的課題——譬如，中古時期的歷任教宗，或是西方修道院體系的歷史淵源——告一個段落之時，他會暫停一會兒，環視一下全班的同學，然後，提

出一個問句：「那它跟我有什麼關係？」

接著，他就會再進一步地分析和解說他剛才講授過的歷史演變，對於當時的天主教會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它如何繼續地影響了日後的教會和教會所處的現實社會。就是用這種方式，他總結授課內容，並展示它和我們生活的相關性。

在我們這趟尋訪歷來諸位聖人、聖女的旅程將盡尾聲之時，我也想套用這個問句，「那它跟我有什麼關係？」來跟讀者們做一些交流。

首先，我當然希望前面所介紹的諸位聖人、聖女中，有一位或幾位跟你相當的情投意合，因而使你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他們，就像我在書內曾提到的一個假設性的命題——我們之所以會被某一位聖人的風範所吸引，那是因為他（她）早已經在為我們代禱的緣故，雖然，這個假設，我必須承認是無法證明的。

對我來說，作為可效法的榜樣，是諸聖最重要的功能——既然，我視他為榜樣，從他各式的經驗中，我就能受益，不同的聖賢，經歷不同的苦難折磨，因此，遇到類似的狀況時，我們會想到某某聖人也曾經歷相同的試煉考驗，會有感同身受的慰藉，何況，這位聖人也會為正在受此磨難的我們，向天主代禱。

譬如，聖女小德蘭和伯爾納德，在她們短暫的生命中，經常要和疾病奮鬥，而伯鐸·雅魯培晚年時中風，長期臥病在床。被類似的病苦所折磨而灰心喪志的我們，就可以檢視一下，連聖女小德蘭也曾因疾病而沮喪過，或者，去效法伯爾納德，不屈不撓地信靠上主，臥病中的雅魯培則勉勵我們，要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一旦清楚認識了聖人們的生命歷程，我們就能從中汲取他們的智慧。聖人有如經驗老到、見多識廣的旅行家，對於在

苦難道路上行走的你和我，是一位可靠的好嚮導。要閱讀聖人傳記的一個重要的理由是，你能從他們的真知灼見中受益。

再舉一個例子來闡釋。對教會當局的某些舉措有所不滿的信友，也能從過去的聖人們的經驗中學習。即便是在教會中熱心奉獻的好門徒，桃樂斯·戴也常援引羅曼洛·瓜爾迪尼的犀利言詞來批評教會，「教會是一個十字架，今天的基督被釘在上面」。在長上禁止他繼續對外發言並保持沉默時，多默·牟敦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對於這種不允許他高呼反戰的措施，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內心的憤怒：「老兄啊，我倒認為，我的高聲疾呼，對於一個許多人認為已是行屍走肉的教會組織來說，可能是拯救它免於最後沉淪的解藥哩……」在西元十四世紀羅馬教廷的一片腐敗聲中，聖佳琳寫信給在羅馬城的樞機主教們，毫不客氣地指責道：「你們是一叢敗壞的花朵，不但不綻放香味，反倒釋放出惡臭，熏壞了整個世界。」你看，連聖人們——也許，更好說尤其是聖人們——都會正面地遭遇到此種對教會當局的失望、挫折感和對其組織運作上的憤怒。

在這一個層面上，對我尤其有所啟發。在我臥室的牆上，貼滿各式聖像的卡片（基本上，就是本書所提到的諸聖）。每當我對教會當局的某個舉措感到失望時，我會聯想到桃樂斯·戴、牟敦和聖佳琳等人，他們都曾面臨對當時教會的不滿，卻都堅定不移地決定繼續留在天主教會的大團體中。在受挫的時刻，我會勉勵自己，「他們都比我聰明，比我聖潔，而他們選擇堅持不離去，而且都熬過來了」。

聖人給我們鼓勵，像似一位跑在我們前頭的跑者，頻頻地回首，給我們加油打氣，提示我們要調整好步伐。不僅在病痛、失

望之中，更在身體健康、生活順遂之時。工作忙碌不堪，我輒憶及十三世紀那位同一時間能做好幾件事的聖道茂——他雇用了三位抄寫員，輪番記錄他不同主題的口述——即使工作這麼忙碌，他都沒有忘記祈禱更是重要。在我勤於寫作之時，便想到多默·牟敦——這位著名的多產作家提醒我，要出名不是我寫作的理由。在為社會邊緣的人們服務時，德蕾莎姆姆常浮現在我的眼前——這位伺候窮人的聖者提醒我，我正在服務的對象，就是基督本人呀！在為某項正義之事而奮鬥時，聖女貞德來到我的記憶中——這位勇往直前的戰士提醒我，要依靠的是上主，而非其結局。

聖人，可以是我們未來生命的一個標竿。藉著遵循他們生命歷程中的各樣芳表，我們可以被塑造，正如同他們一樣。套用勞倫斯·肯寧翰的話，「我們希望成為他們的那個樣子」。

我也能感受到聖人們的友誼相助。愈是深入地認識他們，我愈是能感受得到，這些現今與主同享榮福的聖人、聖女們，不斷地在拉拔我，守在我的身邊，祝禱我於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上，做一位好的耶穌會士，做一位好神父。雖然難以提出有力的證明，但是，自從我和他們的首次相逢開始，我就確信，他們一直在為我祝禱著。他們會對我說，「不要放棄」；他們會提醒我，「切莫擔憂」；他們會撫慰我，「一切都會順當的，真的，都會順當，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會順當的」。

我會走向這些聖人們，請求他們的代禱。伊麗莎白·強生在她的大作《上主的朋友們和眾先知》中指出，在我們基督徒悠久的傳統中，聖人們有兩大功能：夥伴和護佑。

這兩種角色功能，在我的生活中重疊地出現——我在祈禱時，面向某一位聖人（護佑功能），因為，在他（她）的事蹟中，能

看到我現在的處境，同時，也請求他（她）伴隨我（夥伴功能），度過這個難關。因此，在臥病之時，我仰望小德蘭；和教會當局的意見相左之時，我指望多默·牟敦；在信仰的火光暗淡之時，伯鐸會振奮我，同時，他們都會為我而禱告。

代禱能奏效嗎？在某些基督徒的眼中，它似乎是一種迷信——聖人的塑像、聖牌、禱文和點燃蠟燭奉獻的敬禮儀式的祈求，看起來都似乎是某種神奇魔術的符咒。然而，許多基督徒則認為，聖人的代禱，是他們信仰的一部分。彌撒中常唸的〈信經〉中有言，「我信……諸聖相通功」，就包涵了諸聖在為我們祈禱的這個信念。為我來說，聖人的助佑，在現實的層面和和神學的層面上，都是有道理的——現今在天堂上，和天主在一起的人們，為什麼會不願意幫助我們這些仍在塵世旅程的人們？為什麼他們會不願意為我們向天主代禱？我認為，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雖然，我拿不出證據，來證明這種說法。

我心知肚明的是，當我祈禱的某件事，蒙主應允了在我的身上時，而之前，我也曾就此事請求某一位聖人的協助，那麼，我首先會感謝天主，其次，會感謝這位聖人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願在此提出一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來進一步加以闡釋。就在不久之前，紐約市的一個演藝團體，要在外百老匯的一家戲院，製作一齣以出賣耶穌的那位猶達斯為主題的話劇，邀請我作他們有關宗教事務方面的顧問，因而參與了製作的過程。整個劇情的焦點，在猶達斯因他在世時的作為，而於煉獄中開庭受審，以判定他是否該受永遠的懲罰。在劇中，將傳喚所謂的「專家證人」——譬如，伯鐸、多默、瑪竇等，當年和猶達斯曾同處在一起的宗徒們，甚至於，德蕾沙姆姆、多默·牟敦也被庭上所諮詢。

因此，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劇組人員在一起討論本書中所提到的一些聖人、聖女們。甚至於，因為現在的這本書尚未出版，我還影印了有關篇章的書稿，供他們閱讀，以增進了解相關聖人們的背景。

編劇史提夫，是一個半調子的天主教友，但是憑著他職業上的敏銳直覺，頗能掌握信仰上的重點。舉個例來說，他的劇本凸顯了聖婦莫尼加的角色。西元第四世紀聖奧斯定的母親莫尼加，曾多年堅定地為愛子的悔改而祈禱，因而被視為堅持不懈地禱告者的主保聖人。在這個劇本中，口出俚語、具有街頭大姊的風格、情緒激昂而年輕的聖莫尼加，自許為一位喋喋不休、愛嘮叨的人，她長期堅定不移地嘮叨天主，終於拯救了愛子。

「你知道嗎？」莫尼加面向全場的觀眾獨白，「我就是一個愛嘮叨的人！如果我不是這樣的人，那我自己絕成不了聖人，而天主教會也不會有一位名叫聖奧斯定的教會聖師！」她還進一步地鼓動觀眾尋求她代禱，以求得天主的聖寵：「當你需要天主幫忙的時候，記得要吼出來讓我聽到，因為，我的名字是莫尼加，是聖奧斯定的媽媽。嘿，你知道嗎？我死纏活纏祂的工夫，是會得到效果的！」

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在觀賞完全劇的演出後，對我說道：「你知道嗎？我應該時常祈求聖莫尼加。」

這齣話劇演出的檔期結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我預定要在當地耶穌會掌管的一個本堂，做主日的彌撒，也邀請了一些劇組的人員來參加。尤其，我更盼望編劇史提夫先生能來，他好久沒進堂了。當天的清晨，史提夫來了電話，是個壞消息：「嗨，吉姆，我想我大概不能過來了。我住的公寓的水管裂了，水灌進了

我的房間，公寓的管理員要十點鐘才會到達。」

我在電話中告訴史提夫，我會向聖莫尼加禱告。掛了電話後，我就在我房間內跪下來祈禱，我還點了兩隻蠟燭以表示我的誠心誠意：「莫尼加，我在這裡向妳吼叫：讓史提夫能來參加這台彌撒。」

赴教堂的路途中，我在計程車內打了一個電話給史提夫，告訴他，我正在祈求一個小小的奇蹟。「噢，我也不知道。不過，看起來不太妙，管理員還沒出現哩！」進了教堂以後，我又點了一隻蠟燭，恭敬地放在聖磊思·公撒格的塑像座前。

我走進更衣所的時候，電話響了，「有奇蹟啦？」

史提夫說：「我想大概沒事了。是樓上人家熱水器的管子裂了漏水。我把進水管的水龍頭關閉上了，不漏水了。」

彌撒開始的時候，還沒見到史提夫的蹤影。彌撒中，我站起來，準備上前去朗讀主日福音時，我瞥見教堂的門打開了一點，史提夫輕手輕腳地閃進來，坐在最後一排的座椅上。領聖體時，他也上前來，領了聖體。

這件事的發生（就是那個我禱告祈求的小奇蹟）和莫尼加及磊思有沒有關係？誰也無法斷言。但是，為我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在此，我又想起了《伯爾納德之歌》電影中的一句旁白。對於僅只有伯爾納德一個人目睹的露德聖母的顯現，以及隨後發生的各個奇蹟，眾人都七嘴八舌地要求明確的證據。此時，其中的某一位人物開口說話了：「對於那些有信仰的人們，解釋是多餘而沒有必要的；而對於沒有信仰的人，再多的解釋也不夠。」

對於現今的信友們敬禮聖人的諸多方式和形態，我自己的看法如何？有些人特別地熱心恭敬某位聖人，而他們的某些舉措，

看在局外人的眼裡，似乎顯得有些怪異，要怎麼樣來看待呢？有人為了他的房子能順利出售，而把大聖若瑟的塑像埋在地裡，這樣的傳統有何意義？在自家屋前的草地上，常有人豎立一個某聖人或聖女的聖龕，甚至於用搪瓷浴缸把聖龕罩起來，這怎麼說呢？幾週前，我步行經過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義大利人的社區，令我訝異的是，許多人家的前院內，有瑪利亞、聖安道或聖猶達的聖龕，是用水泥塑造的，塗上各種顏色的水泥漆，還張燈結彩地裝飾一番。

作為一位天主教徒，我已經很習慣了這種情形，它是西歐天主教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某些前進派的教友，更別提基督新教的人士，就看不慣了。我認為，就宗教信仰的角度來說，人們若對此有所質疑，而且去加以探討，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而對這些保守傳統的信友來說，藉著敬禮心目中的聖人、聖女，而能幫助他們貼近這位聖人，再更進一步感受到貼近天主，那就太好了——只要信友們記住，天主才是他們祈求的最終對象，而且，對某一位聖人的熱心敬禮，絕不應該掩蓋住了耶穌才是他們生命的重心。

就像跟朋友交往的情形一樣，敬禮聖人不能只是純功利的觀點，亦即，只把聖人懸為某種的模範人物，只是一位代禱者，來幫我們的忙的。這種對聖人的了解太狹隘了。我們自己也時常把聖人的角色縮減至為我們做事，甚至更糟的，為我們獲取某件東西。

聖芳濟佳斯·薩威·嘉布里尼（St. Frances Xavier Cabrini）是義大利籍修女，十九世紀時來到紐約市為移民服務，成效卓著。最近，我聽一位朋友說，她在紐約市區內要找停車位的時候，常向嘉布里尼姆姆祈求——顯然，這位曾在紐約市內慷慨助人的姆

姆，成了遍尋不著停車位、百般無奈的駕駛人的救星了。這位朋友的禱詞，仿效自著名的聖安道禱詞：

嘉姆姆啊，嘉姆姆，
請妳幫我找個停車位，
讓我的小車子停一下吧！

試想，聖嘉布里尼在幾個停車場上空，搜尋空置的停車位，似乎是一幅有趣的圖像。如果，僅只把聖人的角色定在為我們服務的功能上，那就會忽略了，他們在天主的國度裡所綻放出來、多采多姿的豐富贈禮。聖人不僅只是世上人們有用處的工具，更應當受到人們的稱頌。他們在世時的各類事蹟，是留給世人的珍貴禮物，為此，吾人應當心存感激，就如同看待傳世的藝術珍寶一樣。曾有人用這樣的比喻來形容：聖人是人生劇場上的主角演員，而其劇本就是耶穌的福音。

借用聖女小德蘭的比喻來形容，則吾人愛慕諸聖，就像在一個花團錦簇的花園內，駐足觀賞各式各樣美麗的花草一般。你是樂在欣賞一朵花的俏麗模樣，而不是因為它能做什麼。源自聖保祿書信中所說的「天空中證道者的雲彩」——諸聖宛若天空中的雲，常籠罩著我們——是一般信徒普遍的概念。經常能遙望諸聖的光彩，固然也不錯，但似乎有冷冰冰、非我族類的不親切，我個人還是喜歡那種多采多姿花園的比喻，在這片花團錦簇之中，每一位聖人，各自以其特色，綻放出上主奇妙的化工。

我認為，毫無疑問的，聖人的這一個層面，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他們教導我們，要成為你自己。套句教宗若望二十

三世的用語——每一位聖人修德成聖的路徑，各有特色。諸聖各自成長於不同的時、空、環境中，各自的個性不同。你再回顧一下本書所介紹的諸位聖人，就能知道，這個論調絕不是空談。

我們試著比較一下聖女小德蘭和桃樂斯·戴這兩位聖者。小德蘭明白，天主召叫她，畢生在加爾默羅修道院的高牆深院內生活；而桃樂斯·戴則體會到，天主對她的邀請，是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之中，為大都市內的窮人和社會邊緣人羣服務。兩個人都掌握住各自的不同召叫，都能欣賞別人不同的成聖路徑。譬如，小德蘭極為羨慕在越南的傳教士，而桃樂斯更佩服小德蘭寫了一本記錄靈性生活的自傳。

耶穌當年所揀選的門徒，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也是個很好的例證。聖經學者威廉·巴克萊曾為文指出，為何耶穌揀選漁夫作為首批的門徒？因為，漁夫勇敢地與大自然搏鬥；具有耐性，為捕捉不同的魚種，會使用適合的魚餌，如何不動聲色，以避免驚嚇到水裡的魚等等。

但是，這只解釋了前四位門徒。召選其他的門徒，又作何解？耶穌為何召選一位稅吏？為何收錄了一位宗教狂熱者？在更外圍的門徒中，還有一位是娼妓出身的哩！

可能的一個原因是，每一位門徒各自擁有獨特的東西，可以貢獻給整個的團體。因此，古往今來的整個教會，包容了豐富的多樣性，就如同聖保祿給格林多人的書信中所言：「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會是為人的好處……就如同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的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東西帶來，放在桌子上。因著各自不同的

神恩，每一個人彰顯其個人的修德成聖方式，聚攏在一起，就能活躍整個的團體。每一個人，以別人不能的方式，貢獻於天主國度的建立。德蕾莎姆姆的名言，充分回應了這個觀念：「你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我能做你做不到的事，讓我們攜手共同為上主做一些美事！」



多樣性，也是人性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結果。簡單地說，聖人們各有其人性上的渴求，因而導引出不同的方式，為天主服務。各人的渴求，不僅影響到各人的作為，也決定了他成為怎樣的人，藉著這種人性自然取向的方式，天主能在迥然不同的地方，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完成祂的大業。記得我在讀神學的時候，我會院的起居室的牆上，有一幅小海報，是用拉丁文寫的小詩：

Bernardus Valles, 納德喜愛溪谷，
Colles Benedictus amavit, 本篤悠遊於山間，
Oppida Franciscus, 方濟甘居小鎮，
Magnas Ignatius urbes. 在城市依納爵得意自在。

（譯者註：頗有孔子「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雅趣。）

合宜施展身手的場地，各人不同。而各人的渴求，也就形塑了各自的召叫。依納爵也許會覺得，在鄉間小鎮的地方，他的野心抱負難以施展。若要從羅馬城指揮一個龐大的修會，方濟一定會被逼得發瘋了。

基本上，天主依循各人天性上的渴求，激發他的召叫。在最

基礎的層面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由於渴求而在一起，進而發現他們的召叫，而成為夫妻。出於渴求，夫妻發現了成為父母的召叫，創造了他們的孩子。以類似的方式，「渴求」在聖人的生命上發揮作用，吸引他去從事某一類型的工作，而產生特別的召叫，導引他過著有其個人特色的、修德成聖的生命。安傑羅·龍開禮因自己的渴求，而成為一名神父。桃樂斯·戴因她自己的渴求，而進入天主教會。查理·富高由於他自己的渴求，而在沙漠中度著擁抱貧窮的生活。總之，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渴求，引導他走向天主，去完成天主所願意給這個世界的志業。

《七重山》書內有一段我所喜愛的章節，頗能闡釋我的這種領悟。牟敦在領洗後不久，告訴他的朋友賴斯（Lax），他要成為一個好的天主教徒。賴斯用了一個醍醐灌頂的語句回應他：「你應該這樣說，你要成為一個聖人。」接下來的故事，就讓牟敦自己來說吧：

聖人？丟給我這樣的一個念頭，有點怪異吧！

「你認為，我要如何做，才能成為聖人？」

賴斯直截了當地回答：「只要你真心地想要，就可以。僅只憑著你想要的意念，你就可以成為聖人。難道你不相信，天主會使你成就祂創造你的目的嗎？當然，先決條件是，你要允許祂這麼做，藉著這份真心渴求成聖的意願。」

翌日，牟敦為求解惑，又去就教於恩師范道倫教授（牟敦受業於這位哥倫比亞的英文教授），而恩師的開示，更是言簡而意賅：

「賴斯到處跟人家說，一個人要成為聖人，僅只憑著想要的意念即可。」

「噢，那當然。」范道倫如此回答。

依循各人的個性渴求，聖人們成就了各具特色的聖潔。如同聖道茂的名言：「聖寵植基於本性。」依納爵捨棄了我武維揚的軍旅生涯，去跟隨天主；聖女貞德答覆天主，因而積極地投入戰役；桃樂斯·戴發行報紙，以傳揚福音；但伯爾納德卻因她的事蹟公諸於世，而引以為憂。聖道茂畢生在書堆裡打滾，然而聖方濟卻諄諄告誡他的弟兄們，連一本書都不要擁有，以免變得驕傲。多樣化的人心渴求，導引出其同歸天主的不同途徑。

然而，在五花八門的狀況下，有一個挑戰，必須要正視。那就是，要能欣賞別人的修德門道，和你有所不同。一個主張行動的人士，可能會質疑靜坐式的默觀祈禱生活。（什麼事情也不做，光是祈禱有什麼用？）而反之亦然（整天跑來跑去的活動，豈不知，天主所要的就是祈禱，跟祂在一起）。試看，伯鐸和保祿，兩人的個性和作為，有多大的差異。

如果對於自己的使徒道路沒有把握，就可能難以接受他人不同的道路。若因而產生誤解，就可能導致教會團體內彼此的不和及衝突。

聖人之間，彼此也有不同意見的事例——有時候，還爭論得相當厲害哩。這在教會的歷史上，不勝枚舉，我們還可追溯到伯鐸和保祿的意見不一致。

在彼此的意見分歧之時，何種力量能凝聚眾人？什麼力量能促使諸聖在一起共融？

把堅持不同看法的善心而聖潔的人們凝聚在一起的元素，在於相同的許諾——對耶穌基督的許諾。看一看門徒們是如何地信靠吾主耶穌的所作所為，我們就應當同樣地信靠天主——祂召叫各人的理由，不同於我們的認知，甚至於是高深莫測的。在我自己同會的弟兄中，我認為有人太沉默了，有人甚至不近人情，或有脾氣不好的，可是，我常聽別人讚美他們，這就是很好的一個記號——召叫我們全體弟兄來到一塊兒的那位，展示了祂的智慧，派遣我們一起去從事一個使命。

或許，把互不相讓的門徒們凝聚在一起的動力，在於耶穌身上——並非指望耶穌來排解他們之間的爭執，而在於根本上對耶穌本人的信賴。想像一下這般的胸懷：「好吧！吾主，我不喜歡那個小子，真搞不懂他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如果你說他是我們團體的一分子，那我就聽你的了。」



行文至此，也許你還有意見：「好啦，這本書內提到的聖人聖女，沒有一位適合我的風格。我不適合像桃樂斯·戴那樣活躍的社會運動者；像牟敦這樣沉潛的默觀祈禱者，我做不來；像聖道茂一般的大學者，我更是望塵莫及；深謀遠慮如伯鐸·雅魯培這樣的宗教領袖，豈是我所能望其項背的？我也不會有伯爾納德那般的福氣，能見到聖母顯現的異象。聖潔，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事。」

我不同意。我認為，修德成聖的境界，是天主賦予世上每一個人的人生最終目標。套用德蕾莎姆姆的話來說：「聖潔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包括你和我。」

「人人成聖」不是一句口號。仍有一些信友認為，成聖是已亡的聖人、聖女們的專利。間或，專務修道的人士——神父、修士、修女們——能做得到。或許，某些傑出的一般信友——譬如，全心全力照顧窮苦人家的善心人士，或像桃樂斯·戴這樣奉獻的社會運動者——也能成聖。世人在滾滾紅塵的日常生活中，能修德成聖的概念，似乎仍衝擊著一般人的認知。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加以闡釋。試著想像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兩個孩子，一個四歲，另一個六歲。清晨，鬧鐘驚醒了睡夢中的母親，而兩個孩子是早已醒了，小女兒可能做了惡夢，正在哭叫著，兒子要喝水，要找玩具，不曉得丟到哪去了。假設她的先生去外地出差了，她必須趕緊做早餐給孩子們，吃完後，送去托兒所，自己再趕赴職場工作。

此時，半睡半醒的媽媽，腦海中快速地輪轉著今天要做的事情——家裡的事，老闆交代的工作；就是找不出時間來做自己的私事——今天要是能做完一半的事兒，就不錯了。

在這樣匆忙的生活空檔中，或許她會為了找不出時間來祈禱和做默想，而引以為憾，她多麼希望，有更好的宗教生活。德蕾莎姆姆是她所喜愛的一位現代的聖人，最近她才閱讀過一篇有關德蕾莎姆姆的報導。這位母親可能會感慨地自言自語，「我永遠做不到像姆姆這樣子」。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上天不會要求她，成為第二個「德蕾莎姆姆」。她要成為自己，在自己的狀況下活出「真實的自我」。

依照多默·牟敦的說法，要先分辨出「虛假的自我」和「真實的自我」。「虛假的自我」，是我們呈現給周遭的世人看到的「我」，那個我們認為別人看了會喜歡的「我」——有魅力、有

自信、是一個成功的人。而「真實的自我」，是在天主面前的「我」。因此，修德成聖的境界，就包括了去發現那個真我，並奮力去達成真我。如牟敦所說：「為我來說，成為一個聖人，就是去成為我自己。」

如此這般地看來，我們的這位職業婦女，切勿要求自己成為第二個「德蕾莎」，而是要去愛她的兒女、丈夫、同事，找出在她所處的世界中，她生活的意義。她要去經驗，天主在她生命中的臨在，以及在她周遭人們生命中的臨在。有時候，這意味著，要用愛心來做大事情，譬如，扶養兒女；有時候，卻僅只是做些微小的事。這就是聖女小德蘭所說的「神嬰小道」。而對這位年輕的媽媽來說，在她的工作崗位上調適自己的脾氣（縱然，生氣的理由十足），也是其中可做的一件事。

在此番的努力過程中，這位媽媽還要揚棄想要成為別人的那種渴求。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德蕾莎姆姆得心應手的事情，換成她來做，可能一塌糊塗。再換個角度來說，這位職業婦女應付自如的工作，德蕾莎姆姆可能也做不來。

天主邀請我們，各自活出獨特的召叫，是這個世界如此豐富多采的原因之一。魯益師說：「諸聖是多麼榮耀地各自不同。」若我們相信，一定要成為某一個別人，才能成聖，那問題就會開始出現了。當天主已經在我們的靈魂內，植入了我們所需的路徑方向，而我們卻想要使用別人到達天堂的路徑地圖時，我們成聖的召叫，就因而被扭曲了，或被忽略了。在仰慕者來到印度的加爾各答，想要完全地仿效德蕾莎姆姆，她會告誡他們：「去尋找你們自己的加爾各答。」

但這不是說，不要去閱讀他們的路徑，迎頭趕上他們。閱讀

聖經的四部福音書和聖人們的行傳，是發現自己成聖新途徑的好方法，也是牟敦所謂「發現真我」的過程的一部分。我本人就是在閱讀牟敦一生的傳記之後，找到了自己的某種路徑圖。經由閱讀、與人交談和祈禱，我逐漸在修德的路途上成長，進入我自己的模式中。而與諸聖接觸的生命歷程，讓我能看得更清楚，更加熱切地擁抱天主早已為我預備的東西。

為求在修德成聖的道路上穩步前進，傾聽他人對成聖意義的詮釋，是有必要的。不僅僅如此，一旦揚棄了想要成為別人的念頭之後，就必須立刻開始踏上發現真實自我的漫長旅程，以及如何去行動。

此番領悟的核心，在於接受那個面對天主的自我。《聖詠》一百三十九篇有言：「祢造了我的五臟六腑，祢在我的母胎中締結了我。我讚美祢，因我被造，驚奇神奧。」愛我自己，因為我是天主所創造的，是成聖道路的起跑點。這個自己，是全部的整體，包括可能自我嫌惡的那個部分（要是天主當初沒有創造那個部分的我，那該有多好啊）。天主愛我們，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般——愈是殘缺受損的小孩，愈是受到父母的疼惜。時常，這些軟弱的部位，反倒是成聖之道更重要的路徑，因為，它提醒我們，要信靠天主。

聖保祿宗徒在寫給格林多教會的書信中說道：「所以，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教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為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



成為真實的自我，是天主所要的，這個信念讓我能大徹大悟。在靈性的道路上成長之時，天主要求我在遭遇狀況時，以真我去面對它。每當我傾聽朋友訴說他的苦惱之時，傾聽教友來告解之時，站在街頭上一位流浪漢的面前之時，我不會對自己說：「要是伯鐸，或是方濟、小德蘭、若望二十三世，站在這個地方，他會怎麼處理？」的確，這些聖人們都是我的表率，然而，天主把我，而不是他們，放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中。天主，以祂奧祕的智慧，把我置放於這個節骨眼上，以我的才智和能力，以我的軟弱和有限，來面對它。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說得好：

因為，基督在千千萬萬的場合中出現，
以可親可愛的手，或腳，或眼神，而非其本人的。

換句話說，那是你的眼神，你的手或腳。

從被召叫成聖的確信，深深地聖化了平凡的日常生活。梵二大公會議的宣告——「修德成聖的普世性召叫」——讓即使是最平凡而不為人知的世間生活，都被賦予特別而有價值的恩寵。

這個召叫，是一種邀請，邀請我們成為真實的自我；邀請我們牢記：平凡日常生活的神聖性；邀請我們明瞭：天主給我們已經預備好的偉大目標——修德成聖。這是諸位聖人、聖女都領悟到的——或許，在轉瞬間的頓悟；或許，歷經多年後的覺悟；無論是生活在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地方，或是第十三世紀的法國地

方，或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境內；或許，是生活在庭院深深的里修隱修院內，或許，是生活在摩洛哥孤寂沙漠的帳篷內，或許，是生活在梵蒂岡富麗堂皇的教宗寶殿內；可能，在加爾各答為窮人中的窮人服務著，或是在為羅馬城內瘟疫的病患服務著，或是，在小亞細亞的外邦人中間，為主見證著；他可能生病英年早逝，他可能為主殉道，他可能安享天年。

修德成聖的召叫，是一種與主為友的邀請。這個召叫，徹底地改變了諸位聖人、聖女的生命，成為奉獻給那位愛他們的創造者的禮物。這是一輩子的召叫，召喚人們一步一腳印地走向天主。而祂所要的，不過就是要和我們相遇，以真實的自我面貌，和最終的成聖。



雖然，現在已到了本書的末篇，且將近尾聲。但我認為，它並未結束。還有許多的聖人、聖女有待我去認識。多年前，在我臥室的牆上，貼了一張聖女凱塞林·德瑞克（**St. Katharine Drexel**）的聖像。我只知道她是十九世紀美國費城一位令人欽佩的女士，她捨棄了可觀的財富，而成為致力於在美國的黑人和印第安族羣中傳揚福音的修女。我父親在世最後時日的病痛中，我曾極熱心地請求她的代禱（很不尋常的是，我的父親不僅因她是美國本土的聖女而敬禮她，更因為她是費城本地的聖女，而引以為傲）。此外，數個月前，在往露德的飛機上觀賞到了《良相佐國》這部電影，不禁聯想到，在初學院時期，曾閱讀了聖多默·穆安（英王亨利八世的首相）的傳記，因而心中喜悅。還有一位聖人，我對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樂觀、愉快、喜歡開懷大笑——聖斐理·

乃立（St. Philip Neri，他也是聖依納爵的朋友）。

這幾位聖人、聖女，都有待我再進一步去認識。因此，以某種的意義來說，本書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尋覓旅程的起步而已。

對於閱讀本書的讀者，我期盼這本書也是一個起步，希望它能鼓舞你，踏上與聖人們相遇的旅程。在這本書中所提到諸位聖人、聖女，是我自己覺得，曾與我本人親密相遇過，他們曾給我鼓勵、打氣，在我遭逢困難的時候，曾經為我代禱。我希望，這其中的某幾位，也能成為你人生道路上的夥伴。將來，有一天我們大家在天堂上共融時，能因這些聖人、聖女們，曾經是我們的表章、我們的朋友、並不斷地為我們代禱，而感謝天主。

延伸閱讀

小德蘭

- 205087 愛的科學 吳經熊／著，宋超群／譯
- 205184 一粒細沙 翁德昭／著，彭瑞婷／譯
- 205202 祢的愛伴我成長 瑪利尤震／著，周弘道／譯
- 205247-1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 小德蘭／著，荊嘉婉／譯
- 205247-2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下） 小德蘭／著，荊嘉婉／譯
- 205262 另一種愛 派翠克·艾亨／著，荊嘉婉／譯
- 205265 小德蘭的自我奉獻 加爾默羅會修女／著，姜其蘭／譯
- 205297 聖女小德蘭二十一篇祈禱 荊嘉婉／譯
- 207031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 小德蘭／著，張秀亞／譯
- 207033 小德蘭神修精華 陳百希／編
- 207066-1 聖女小德蘭書簡（上） 小德蘭／著，劉鴻蔭／譯
- 207066-2 聖女小德蘭書簡（下） 小德蘭／著，劉鴻蔭／譯
- 207069 我都選取：聖女小德蘭的生活與訊息 莫里涅／著，鄭開茶／譯

多默·牟敦

- 205173 默觀生活探祕 牟敦／著，江炳倫／譯
205287 遇見牟敦 盧雲／著，黃美基／譯
205290 找到天主，找到自己 詹姆士·馬丁／著，姜川／譯

聖依納爵

- 205107 聖依納爵神操 房志榮／譯，侯景文／校
205113 神操——通俗譯本 侯景文／譯
205158 聖依爵書信選集 依納爵／著，侯景文／譯
205182 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 雅魯伯／著，石室／譯
205183 神操淺釋 劉益思／著，沙微／譯
205185 耶穌的同伴與依納爵的遺囑 裘理雅尼、多德爾／合著，石室／譯
205244 上路去朝聖 安東尼·白坦哥／著，李驊／譯
205255 耶穌會神恩的特徵 雅魯伯／著，陳雲棠／譯
205291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 保祿·顧定豪／著，李驊、張令憲／譯，小俞／繪
207058 依納爵這個人 多鐸／著，滌塵／譯
207063 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 聖依納爵／著，侯景文、譚璧輝／譯
207064 耶穌會的第一位聖人 伯納德／著，易利利／譯
207065 聖依納爵畫傳 伯羅沙／繪，光啟編輯部／編譯
209026-1 基督的僕人 I 依納西·艾坎立／著，楊黎芳／譯

伯鐸·雅魯培

208045 雅魯培神父訪問錄

迪吉／著，沈載祺／譯

伯爾納德

302035 是幻覺還是奇蹟？

巴遜克·德里葉／著，陳燁儀／譯

德蕾莎姆姆

205217 我的心，靜守於安寧中

德蕾莎修女 等／著，唐鴻／譯

207049 德蕾莎修女

傅文輝／編譯

208042 和平的愛

林東陽／編著

教宗若望廿三世

205139 教宗若望廿三世家書

梁偉德／譯

桃樂斯·戴

206161 靈修大師的幸福八堂課

羅勃·埃斯柏格／著，譚璧輝／譯

聖方濟

205296 貧窮的喜樂

賀朗·彭諾方／編著，王書芬／譯

磊思·公撒格

209026-2 基督的僕人 II

依納西·艾坎立／著，尤淑雅／譯

聖母瑪利亞

- 103006 耶穌的母親 張春申／著
- 103018 師母篇 帆行／譯
- 103020b 會晤聖母之（二） 拉法朗／著，明鏡、黃定吉／合譯
- 103020c 會晤聖母之（三） 拉法朗／著，明鏡、黃定吉／合譯
- 103021 玫瑰經、苦路合璧禱詞 柏瑪利／著，成文／譯
- 103022 福音中的聖母像 達樂／著
- 103023 聖母——和好之母 德蕾莎修女、羅哲弟兄／合著，袁國慰／譯
- 103024 救主耶穌的母親——聖母論 張春申／著
- 103025 從現代母親看聖母 胡國楨／主編
- 103026 奧蹟的窗戶——彩繪玻璃中的玫瑰經 丁松青／著
- 103027 串起希望之鍊——玫瑰經二十端奧蹟默想
葛羅謝爾／著，梁偉德／譯
- 108035 逾越之路 富怡／著，招德蘭／譯
- 108038 玫瑰經祈禱 察爾斯／著，蔣平權／譯
- 205140 瑪利亞之書 甘易逢／著，劉河北／譯
- 205228 瑪利亞——幽影中的恩寵 麥肯娜／著，蔡時、張令憲／合譯

其他

- 205292 沙漠裡的靈光 馬賽·納斗／撰述、選輯，逢塵瑩／譯
- 207074 慈母莫尼加
芳濟佳·艾利絲·法碧絲／著，陳芝音、賴巍楷／譯
- 207002 懺悔錄 聖奧斯定／著，應楓／譯
- 207061 我心難安——聖奧斯定「懺悔錄」簡縮本
古倫／改寫，黃美基／譯

I hope that the reflections in this book will encourage reader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saints, blessed, holy persons, and companions. There are few things more satisfying, I think, than reading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and seeing how God's grace manifests itself in different ways and in different lives. To that end, I've listed a few books that may be helpful in coming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se holy men and women. I drew heavily on all of these books in my research and thank the authors for their work.

The standard reference for the lives of the canonized saints (that is, those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church) remains *Butler's Lives of the Saints*. Its original form is a colossal, multivolume work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saints' feast days, with each volume corresponding to a month. There is also a shorter version, called *Butler's Lives of the Saints: Concise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ed by Michael Walsh of Heythrop College, in London (HarperSanFrancisco, 1991). Though it is, like the original work, heavily oriented toward the English saints (such as St. Michael of Wyche, bishop of Chichester, and St. Cuthbert, bishop of Lindisfarne), its concise descriptions are models of clarity.

Fr. Richard McBrien's more recent *Lives of the Saints: From Mary and St. Francis of Assisi to John XXIII and Mother Teresa* (HarperSanFrancisco,

2001) is similarly lucid, helpful, and wide-ranging, and not quite so Anglocentric. It is a worthy successor to Butler's *Lives* and even improves on the original by including 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anonization process. (It is also, like Walsh's revision, more readable than the original.)

Robert Ellsberg's *All Saints: Daily Reflections on Saints, Prophets, and Witnesses for Our Time* (Crossroad, 1997) is a rich compendium of traditional saints (Thérèse, Joan of Arc), as well as other, less traditional holy individuals (Mozart, Gandhi), organized day by day: it's a perfect companion to prayer and reflection. So is *Blessed among All Women: Women, Saints, Prophets, and Witnesses for Our Time*, by the same author (Crossroad, 2005). Ellsberg's *The Saints' Guide to Happiness: Everyday Wisdom from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is a look at the way the saints viewed our quest for joy in life and is a sort of narrative version of *All Saints*. Lawrence S. Cunningham's *The Meaning of Saints* (HarperSanFrancisco, 1980) is a more theological look at the place of saints in the life of faith. And Cunningham's *A Brief History of Saints* (Blackwell, 2005) is perhaps the best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evotion to the saints. Kenneth Woodward's fascinating book *Making Saints: How the Catholic Church Determines Who Becomes a Saint, Who Doesn't, and Why* (Touchstone, 1996) offers a detailed look at the making of saint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Finally, *Saints and Feasts of the Liturgical Year*, by Joseph Tylenda, SJ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 a perfect pocket-sized overview,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iturgical calendar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Other books on individual saints are listed on the pages that follow. The saints are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first name.

ALOYSIUS GONZAGA

The best short version of Aloysius's life can be found in *Jesuit Saints and Martyrs: Short Biographies of the Saints, Blessed, Venerables, and Servants of Go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by Joseph Tylenda, SJ (Loyola Press, 1998). Also, *Aloysius*, edited by William Hart McNichols, SJ, and Clifford Stevens (Our Sunday Visitor, 1993), is a quirky and fascinat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reflections, and drawings by a variety of authors about the young Jesuit saint. There you will find the essays by Daniel Berrigan, SJ, and Richard Hermes, SJ, quoted from in this book.

BERNADETTE SOUBIROUS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superb books about St. Bernadette and what transpired at Lourdes. The first is *Lourdes: Body and Spirit in the Secular Age*, a fascinating study by Ruth Harris, an Oxford University historian, that looks at the life of Bernadette, the history of the apparitions, the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the region, the documentation behind the healings, and the sociological and ecclesial factors that helped popularize pilgrimages to Lourd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t is an exhaustive, scholarly, and sympathetic study. René Laurentin's *Bernadette of Lourdes: A Life Based on Authenticated Documents* (Winston Press, 1979)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dividual biography of the saint (thoug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clunky in places). Laurentin uses numerous original documents to give an accurate portrayal of her life. And, of course, *The Song of Bernadette*, by Franz Werfel (St. Martin's, 1989), is the often sentimental but finally touching book that brought the story to millions and inspired the movie of the same name.

CHARLES DE FOUCAUL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is *The Sands of Tamanrasset: The Story of Charles de Foucauld*, by Marion Mill Preminger (Linden Books, 2002). For his own writings, you might try *Charles de Foucauld*, edited by Robert Ellsberg (Orbis, 1999), whose introduction offers 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life of this remarkable man. (The book is one in the publisher's series Modern Spiritual Masters.) You might also want to read a beautiful book by one of Charles de Foucauld's latter-day followers, Carlo Carretto, called *Letters from the Desert* (Orbis, 2002). In the 1960s, Carretto, an Italian, left behind a prominent career as a Catholic activist for a life in North Africa with the Little Brothers of Jesus. It is a magnificent book, deeply moving, that perfectly illustrates the notion of "the hidden life."

DOROTHY DAY

Dorothy's autobiography *The Long Loneliness* (HarperSanFrancisco, 1997) is the best way to meet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atholic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r book *On Pilgrimage* (Eerdmans, 1999) is also lovely and fills in some of the gaps of *The Long Loneliness*.

Robert Coles's book *Dorothy Day: A Radical Devotion* (Perseus, 2000) provides an admiring and person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founder of the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by someone who knew her well.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her works, including articles from the *Catholic Worker*, is *Dorothy Day: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Robert Ellsberg (Orbis, 2005), which includes a précis of her life a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Also, Paul Elie's book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 An American Pilgrimage*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is a brilliantly realized history of the interwoven lives of Dorothy Day, Thomas Merton, Flannery O'Connor, and Walker Percy. You will get to know these

four American Catholics better, and you will find few books that better describe what it means to live a hol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FRANCIS OF ASSISI

There are probably hundreds of books about St. Francis. *The Little Flower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edited by William Heywood (Vintage, 1998), is a compendium of beloved stories about the saint (preaching to the birds, converting the wolf of Gubbio, and so on) compiled by some of his earliest admirers. Adrian House's *Francis of Assisi: A Revolutionary Life* (Paulist, 2001) is a successful account that considers both the facts and the fictions of his life. Nikos Kazantzakis, in *Saint Francis* (Touchstone, 1971), offers a compelling (though fictionalized) portrait of the saint as a lively and fearless young man. Valerie Martin's *Salvation: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St. Francis* (Knopf, 2001) is a marvelously poetic retelling of his life. Lawrence S. Cunningham does an exceptional job in *Francis of Assisi: Performing the Gospel Life* (Eerdmans, 2004) of situating Francis with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that he rejoiced in. Finally, Julien Green's *God's Fool: The Life and Times of Francis of Assisi* (Harper & Row, 1985) is, to me, the most successful at capturing the overall appeal of Francis, as well as his radiant personality. Sadly, Green's book can be hard to find, but it is worth the effort of tracking down a used copy. (And Francis, no doubt, would be happier if you bought used books!)

IGNATIUS OF LOYOLA

Instead of the dry books I plowed through in the novitiate, I wish I had first read *The First Jesuits*, by John W. O'Malley, SJ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t is simply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Jesuits, with a focus on St. Ignatius. It shows how,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the Society of Jesus was not founded to "count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but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souls.” The detailed work of an eminent scholar, the book is superbly written and in places even witty. For a more focused look at Ignatius, Philip Caraman’s book *Ignatius Loyola: A Biography of the Founder of the Jesuits* (Harper & Row, 1990) is a good resource.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Loyola*, translated by Joseph F. O’Callaghan and edited by John C. Oli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 the saint’s story as told to his fellow Jesuit Gonçalves da Câmara. (But remember, when it comes to prose, Ignatius is no Thomas Merto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esuit spirituality and the “tensions” inherent in Jesuit life, you will do no better than a short book called *Contemplatives in Action: The Jesuit Way*, by William A. Barry, SJ, and Robert G. Doherty, SJ (Paulist, 2002). *Eyes to See, Ears to Hear: An Introduction to Ignatian Spirituality*, by David Lonsdale (Orbis, 2000), is a much longer treatment but an excellent place to begin one’s study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More of a how-to book on the same topic, covering contempl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 is *Inner Compass: An Invitation to Ignatian Spirituality*, by Margaret Silf (Loyola Press, 1999).

There are many good resource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themselves. Two of the most useful translations are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George E. Ganss, SJ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2), which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key words and phrases, and *Draw Me into Your Friendship: 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Reading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by David Fleming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6, from which I’ve taken some excerpts for this book), which offers an alternate (and very helpful), modern translation alongside the traditional one.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e Exercises are more appreciated in their doing.) A very fine and very brief book discussing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Exercises

is *Letting God Come Close: An Approach to the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by William A. Barry, SJ (Loyola, 2001).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directing the Exercises, an expert's handbook is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by Michael Ivens, SJ (Gracewing, 1998). Finally, Paul Mariani wrote a compelling journal of his long retreat at the Jesuit retreat house in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entitled *Thirty Days: On Retreat with the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Viking, 2002).

JOAN OF ARC

Donald Spoto's superb biography *Joan* (HarperSanFrancisco, 2007), which uses all the tools of modern historical research, is the best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Maid of Orléans. Vita Sackville-West's *Saint Joan of Arc* (Grove, 2001), first published in 1936, is a lively retelling of her story. *Joan of Arc: Her Story*, the classic biography by Régine Pernoud and Marie-Véronique Clin, has been revised and translated by Jeremy duQuesnay Adams and published by St. Martin's (1999). Written by two distinguished French scholars, it is a model of careful historical research. It also has great appendixes. And no one should miss *Joan of Arc: In Her Own Words*, translated by Willard Trask (Books & Company, 1996), an exceptional book that takes Joan's trial testimony and arranges it chronologically so that the reader feels as if she is telling her life story from inspiring start to moving finish.

JOHN XXIII

Deeply moving in places (though slow going in others), John's autobiography, *Journal of a Soul: The Autobiography of Pope John XXIII* (Doubleday, 1999), is a compendium of his diary entries from his seminary days to his years as pope and is readily available. Just as moving (and even exciting in places) is Peter Hebblethwaite's highly

readable biography *John XXIII: Pope of the Century* (Continuum, 2000), which gives an overview of not only the man but also his influence o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Pope John XXIII: A Spiritual Biography, by Christian Feldman (2000), is part of the Lives and Legacies series from Crossroad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pirituality of Angelo Roncalli. *A Retreat with John XXIII: Opening the Windows to Wisdom*, edited by Alfred McBride, O. Praem (St. Anthony Messenger, 1996), is also part of a series (A Retreat With) and uses John's writings as a way to foster prayer and reflection.

The little book that initially drew me to John is called *Wit and Wisdom of Good Pope John*, collected by Henri Fesquet (P. J. Kenedy & Sons, 1964). It is out of print but worth the effort to track it down.

JOSEPH

Since there is little known about the life of Joseph,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re are comparatively few books on the saint. For an exegesis of his brief appearances in the New Testament, you will do no better than Raymond E. Brown's landmark work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A Commentary on the Infancy Narratives in the Gospels of Matthew and Luke* (Doubleday, 1993). There is also a description of the carpentry skills Jesus might have learned from Joseph in Nazareth in the first volume of John Meier's magisterial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called *The Roots of the Problem and the Person* (Doubleday, 1991).

There are, however, two short books that attempt to construct a tentative portrait of Joseph and trac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evotion to him. They are *Saint Joseph: Shadow of the Father*, by Andrew Doze (Alba House, 1992), the more serious and pious approach, and *Saint*

Joseph: His Life and His Role in the Church Today, by Louise Bourassa Perrotta (Our Sunday Visitor, 2000), a book written in a rather more accessible style.

JUDE

Thank You, St. Jude: Women's Devotion to the Patron Saint of Hopeless Caus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y the historian Robert A. Orsi, is a study of devotion to the sai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Jude: A Pilgrimage to the Saint of Last Resort*, by Liz Trotta (HarperCollins, 1998), is the author's personal journey (literally: she travels to the reputed place of his birth) to come to know what you could call the "historical Jude."

MARY

Elizabeth Johnson's book *Truly Our Sister: A Theology of Mary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Continuum, 2003) is a magnificent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mother of God by a leading American theologian who is acutely sensitive to the place of Mary in the Catholic world. After *Truly Our Sister* was published, the author excerpted essays on Mary's appearances in Scripture from the work and collected them in a short book called *Dangerous Memories: A Mosaic of Mary in Scripture* (Continuum, 2004). In Jaroslav Pelikan's *Mary through the Centuries: He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 Lutheran scholar looks at how the image of Mary has changed and grown over the years. Sally Cunneen's book *In Search of Mary: The Woman and the Symbol* (Ballantine, 1996) is similarly helpful in tracing the influence of and devotion to Mary throughout Christian history. *Meditations on Mary* (Viking, 1999) is a collection of fascinating essays by the always insightful Kathleen Norris, illustrated with lavish full-color reproductions of Old Master portraits of Mary.

PEDRO ARRUPE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Fr. Arrupe is *Pedro Arrupe: Essential Writings*, selected by Kevin Burke, SJ (Orbis, 2004), who also included a short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in the book. Just as good is a book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called *One Jesuit's Spiritual Journey: Autobiographical Conversations with Jean-Claude Dietsch, SJ* (1986), a series of lively and moving interviews. If you want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Arrupe's thoughts on social justice, religious life, education, culture, and a host of other topic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offers a series of Arrupe's major talks, essays, and letters in *Challenge to Religious Life Today* (1979), *Justice with Faith Today* (1980), and *Other Apostolates Today* (1981).

PETER

Perhaps the best recent study on Peter is PHEME PERKINS'S book *Peter: Apostle for the Whole Church* (Augsburg Fortress, 2000),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Peter," with an emphasis on his role in the early Christian community. RICHARD MCBRIEN'S book *Lives of the Popes: 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II* (HarperSanFrancisco, 2000) gives a good brief summary of the life of the "first pope." Finally, RICHARD ROHR'S book *Soul Brothers: Men in the Bible Speak to Men Today* (Orbis, 2004), which is illustrated with portraits by Louis Glanzman, includes a touching meditation on how Peter came to God not by doing right, but by "doing wrong."

MOTHER TERESA

KATHRYN SPINK'S *Mother Teresa: A Complete Authorized Biography* (HarperSanFrancisco, 1998) makes for an engrossing read and details especially well the struggles of Mother Teresa's early efforts to found the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Because it was published shortly after her death,

Thomas Merton (HarperSanFrancisco, 1995–98) provides the rest of the story, in Merton's own words. There is also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se same journals, entitled *The Intimate Merton: His Life from His Journals* (HarperSanFrancisco, 2001), edited by Patrick Hart and Jonathan Montaldo. The excerpt included on page 53 is from *No Man Is an Island*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5, p. 126).

Moving from autobiography to biography, *Thomas Merton, Brother Monk: The Quest for True Freedom* (Continuum, 1997) is a splendid treatment of the monastic roots of Merton's spirituality, written by a fellow Trappist (and writer), M. Basil Pennington, OCSO. Monica Furlong's *Merton: A Biography* (Ligouri, 1995) is also a good brief introduction. Henri Nouwen,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writer, offers a series of perceptive meditations in his very short book *Encounters with Merton* (Crossroad, 2004). Finally, for a more complete and more scholarly (but no less interesting) telling of the tale, you should try Michael Mott's utterly fascinating biography, *The Seven Mountains of Thomas Merton* (Harcourt Brace, 1993). It's very long and very worth it.

UGANDAN MARTYRS

As a measure of how little they are known in the West,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books about the Ugandan martyrs. *African Saints: Saints, Martyrs, and Holy People from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by Frederick Quinn (Crossroad, 2002) includes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ir story, as do a number of other general books on the saints. The story of Mutesa, the ruler of Buganda, can be found in Edward Rice's *Captain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Scribners, 1990). The general interest book about Charles Lwanga and his companions, however, has yet to be written, and their lives still remain largely hidden from many of u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襪子堆裡的聖人 /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著; 范京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光啓文化, 2009.08 [民 98]

面; 公分

譯自: My Life with the Saints

ISBN 978-957-546-655-8 (平裝)

1.天主教傳記

249.6

98013145

襪子堆裡的聖人

2009年8月初版

2011年6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譯者: 范京生
准印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 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 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 (02)2740 2022
傳真: (02)2740 1314
郵政劃撥: 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發行者: 胡國楨
E-mail: kcg@kcg.org.tw
網址: <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367 3627
定價: 420 元

光啓書號 208073

ISBN 978-957-546-655-8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多默·牟敦曾說：
「新發現一位聖人，是一種美好的經驗。
在聖者身上，天主奧妙地被彰顯出來，
而諸聖的光環，則各異其趣。」



在天主教會裡，聖人代表著典範，是神聖的標記，完美的化身，同時，也意味著遙不可及的距離。然而，這些曾經同為「可腐朽」的人類，究竟和我們有著什麼相似和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們除了讓聖像卡片更為豐富多彩外，還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和改變？

馬丁神父以異於一般聖人傳記誇張和充滿奇蹟式的寫法，反倒是盡力挖掘出聖人們較為平凡、掙扎、矛盾和痛苦的一面，與一般人的生活遭遇極其類似；他們之所以成聖，不在於他們完美無缺，而在於他們信靠天主，在迎向天主的道路上毫不退卻。

書中，除了有聖人的生平介紹、修德過程外，作者也分享自己寶貴的人生經驗，將它們與聖人曾有過的掙扎和經歷相映照，使聖人們降臨凡間，我們不僅和聖人們更加接近，閱讀此書，也是一次豐富的靈修洗滌。

原來，聖人是如此可親可愛，靈修是如此平易近人！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55-8 \$420



9 789575 466558 0 0420

光啟書號 208073

定價 420元